

# 周恩来与蒋介石

袁小伦 著



周恩来

蒋中正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内容介绍

关于赫赫有名的一代巨人周恩来和蒋介石均有不少的文字记载，可惜大部分是孤立的、年谱式的政治评传或纯粹猎奇式的野史传奇，更未有人发现他们的漫长岁月的交往和较量及其意义。

一部现代中国政治史，基本上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抗争为轴心而转动的历史。政治运作的焦点历来集中在少数政治领袖身上。周与蒋的较量和交往就生动体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分裂、和好与交恶、以及力量互为消长的过程。本书揭开这纵横婢固的历史帷幕，探索周、蒋的活动轨迹，从故人的脚印中规划出今人的步履——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国共两党的三度合作乃是历史之必然。

本书以恢宏的史学构架。机智的文学式穿插和生动活泼的语言针脚，记载周恩来与蒋介石既在同一条壕沟里并肩战斗，又在对立营垒间血肉相搏的故事。在这中间，或在尸骨遍野的沙场中、或在兵不血刃的谈判桌边、或在匿影藏形的特工领域里、或在气象万千的外交舞台上……内容丰富多彩，不少情节鲜为人知，极具可读性。

## 周恩来与蒋介石

## 引子 夫人亮相 抚今思昔

如果我们的历史记忆是虚假的，那就不能很好地为现实服务，就会驱未来于困境。足信的历史知识于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它使过去的经验成为我们的指南，使万事臻于圆满。前人解决难题的经验之递承起着绝对的审度作用。总希望摆脱历史的人往往役使于现实。

——（美）尤金·莱斯：《历史与现实》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的西侧，有一个绿树环绕的地方叫中南海。中南海的西花厅，庭院静谧，鲜花长开，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仍然居住在这里，她在客厅里挂着周恩来忘我工作的油画和红梅盛开做斗霜雪的国画。工作之余，她经常在西花厅后面的庭院、在周恩来生前喜爱的海棠树下散步和做操。

这位素为中国人民所敬慕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以自己的丰富阅历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为祖国统一大业，日夜操劳，费尽心血。

1984年，甲子新春，泱泱春水和荡荡春潮带来了五彩缤纷的新天地、带来了希冀和新生。邓颖超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活会上为祖国春天送来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新信息，她满脸笑容地向欢聚一堂的几百名各界人士祝贺新年，并在欢声四起、掌声阵阵中发表讲话。她说：

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进行平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团结则安，分裂则危，这是尽人皆知的民族大义和客观真理。我想提醒蒋经国先生和他的同仁，不可不看到和平统一一日不实现，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局面就一日不会结束。海峡两岸中国人民分离了几十年，时至今日，谁再阻挠祖国的统一，谁就对不起先人，对不起后人。我在这里再一次邀请台湾当局人士和台湾同胞以各种身份和各种形式，来大陆看看，就祖国建设问题提出宝贵意见。

屈武、许德珩、胡厥文、周谷城、苏子衡、黄鼎臣、雷洁琼、胡子昂、林丽韞、费孝通相继发言。这些大都八九十岁的老人，亲身经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是中华民族蒙受灾难、奋起斗争、终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历史见证人。邓颖超的讲话，激起了他们对国家强盛、民族团结的喜悦，勾起他们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关切。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龙的传人……”从台湾问到大陆的黄植诚、李大维、侯德建、黄益腾合唱了《龙的传人》。歌声牵动着人们感情的丝缕，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里欢乐气氛更浓烈了。80高龄的邓颖超拿起话筒，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说，“欢迎4位从台湾回来的同胞。合唱《龙的传人》。这是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代表了台湾同胞强烈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

半个月后，邓颖超又神采奕奕地重登政协礼堂的讲坛，在国民党“一大”6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重温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统一大业》的演说。她带着长者所特有的跳荡的沉思，带着过来人理性的波澜，从如水如烟的岁月里，寻找回忆的彩霞：

60年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在那黑暗而艰难的岁月里，顶着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排除自己周围一些不能随时代前进的顽固分子的阻挠，主持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使国共两党在谋求祖国独立、民主、统一、繁荣、富强的共同基础，在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下携手合作，形成一股浩浩荡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潮流。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大凡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年中，获得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北伐战争胜利的巨大成就。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制度的理

想，随着 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实现并继续向前推进，这是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都会清楚地看到的。

一个甲子过去了，岁月这般漫长，又如此急促。邓颖超以“惯看秋月春风”的历史老人深邃目光，抛开历史恩怨，对台湾国民党人晓以民族大义，她诚挚感人地说：

我已是 80 老人了，国共二度合作，取得胜利的种种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希望台湾的国民党人能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榜样，在认清历史的必然趋势以后，拿出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来，排除一切干扰，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抉择。如果台湾的国民党朋友们，由于过去的长期隔绝，一时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希望，这种犹豫和拖延不要太久了。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

邓颖超最后以慈蔼有力的语调结束了演说：

一部中国历史证明：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我深信，祖国大统一的千秋功业，一定能够早日得到实现。

春的信息所到之处，冰雪消融、树木抽芽、鲜花开放，就连冬眠的动物也睁开惺松睡眠醒了过来。邓颖超的演说，像和煦的春风，迅速吹遍海峡两岸、海内海外，引起强烈的反响。2 月 16 日，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在北美洲的土地上传来了一个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回声：居住于美国的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首席委员宋美龄发表了一封涉及国共合作历史、其动机与意义殊堪玩味的《致邓颖超的公开信》。

宋美龄在美国纽约长岛她外甥孔令侃的豪华别墅里，已经度过了 9 年十分舒适而又离群寂寞的“隐居”生活。1975 年，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溘然长逝后，曾有传言：为了国民党内部团结，宋美龄可能被推举继任国民党的总裁，作为元老派和少壮派的桥梁，然而，丈夫尸骨未寒，“经儿”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由中常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拥护他为一党之首。随着“太子派”蒋经国上台，“夫人派”，失势，宋美龄即于是年 9 月 17 日“赴美医治乳癌”，在异邦开始了漫长而平静的生涯。

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是超然度外的。家中挂满了蒋介石的相片，奉祭亡夫的鲜花常年保持清新；她平时深居简出，莳花、读书、练书画。实际上，她和台北政治没有绝缘，尽管母子心存芥蒂，但在维护蒋家的权力与尊严、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上，却是一致的。蒋纬国、蒋孝勇多次赴美请安，蒋家的动静，了如指掌；驻美“地下大使”钱复经常代表当局探望她·聆听指教；台北中常会周三例会之后，她常用电话垂询政情。难怪台湾舆论总是说：夫人身在海外，但对国事十分关心。

“第一夫人”的身价加上“首席评委”的头衔，使宋美龄过问台湾政事自然名正言顺且一言九鼎，在讲究辈份与伦理的国民党体制中即使“党国元老”张群、谷正纲、何应钦、陈立夫等人也要对她礼让三分。因此，宋美龄虽不具备蒋经国那种扭转局势的韬略和权力，却也足以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力。于是，蒋经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请继母发表了致邓颖超的公开信。

鱼雁相通，善莫大焉。宋美龄的公开信，总算是对邓颖超在演说中所希望的“多商量、多交换意见”的回应，总算是第一次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给

共产党领导人所写的信函。

宋美龄在信中公开赞扬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才智、声望，她从前曾多次对人讲，我们国民党有这么多的党员，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像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她还回忆先前与邓颖超共同从事抗战事业的情景：“前在重庆抗战时期，曾与大姊孔夫人数度与先生聚首交谈，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的见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过于偏颇之处，实我女界有数之才。迄今思之……犹记尝告家姊：若邓颖超能力国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脱颖而出，甚至超颖而出也。”宋函也放弃了人药味甚浓的，诸如“反攻大陆”的口号，也提出要以孙中山为榜样。要统一中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把国民党“一大”时的中共竟形容为一个穿开裆裤，流鼻涕的幼童，要靠国民党这个“保姆”才能成活，难免有些荒唐，孙中山这位目光如炬的政治家，眼力何以如此不济？不仅“联”不上有力量的盟友，反而背上一个要“仰赖”“育养”的包袱。国民党“一大”闭幕不久，孙中山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的血液。”

函末，宋美龄“总结”国民党在国共关系史上所谓“惨痛”“殷鉴”，断然拒绝邓颖超提倡的第三次国共合作，重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老调，淋漓尽致地倾泻那种孤臣孽子的满腔怨毒和悲愤心情。

一部现代中国政治史，基本上是以国共两党的抗争和合作为轴心而转动的历史。邓颖超的演说和宋美龄的公开信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重温了国共关系史。海外人士对国共政治舞台上两位年逾古稀的老夫人先后登台亮相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对邓、宋两人作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国共两党的两位元老派人物，老夫人对老夫人，台对台地唱起来，格外引人注目，且颇具戏剧性。因为这两位老夫人堪称‘门当户对’、‘旗鼓相当’。一位是中共领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遗孀；一位是国民党先总裁、国府总统蒋介石的未亡人。”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说“历史是巨人的传记”。政治运作的焦点历来集中在少数政治领袖身上。周恩来与蒋介石，这两位时代巨人，不论在同一条壕沟里并肩战斗，还是在对立营垒间血肉相搏的故事，都生动体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和好与交恶，以及力量互为消长的过程。这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尸骨遍野的战场中、在兵不血刃的谈判桌边、在匿影藏形的特工战线里、在气象万千的外交舞台上……所进行的漫长岁月的交往和较量，就是一部既惊天动地又纵横交错的现代中国政治史。

时间的链条是沉重的，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我们将要揭开这纵横捭阖的历史帷幕，透过昨天的风云，探索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活动轨迹，从历史的辨踪中规划出今人的步履。人们将从中看到：宋美龄想摆脱国共关系的真实历史，以虚假的记忆重温往事。如果以这个“虚假”的“历史记忆”为前提“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那么必然会驱使台湾国民党“未来”于炭发可危之“困境”，并将受历史之嘲讽。相反，邓颖超则抱着“只有忠实于历史，才能忠实于真理”的态度，真实地回顾国共关系史，借鉴“前人解决难题的经验”，“审度”今日海峡两岸之大势，提醒国民党当局，响应中共的呼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历史的必然。

## 第一章初会黄埔悲欢南国

### (一)

黄埔岛像一块碧玉浮现在广州东郊的珠江河面上，南连虎门、地势险要，号称“南国第二门户”。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在这里创办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所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从此，黄埔岛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和聚光点。

岛上放眼，江天浩淼，绿涛翻腾，滚滚而来，荡荡而去，令人陡然产生“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情感。历史的大潮卷起革命的狂飙烈焰，把蒋介石、周恩来推上黄埔岛，先后分别就任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0日诞生于盐贩之家。盐是清朝的专卖品，蒋家勾结官府，牟取暴利。父亲蒋明火，为人奸滑，被称为“埠头黄鳝”；母亲王菜玉出身土产贩家庭，后被蒋明火纳为填房。

蒋介石少时顽劣，天天惹事生非。爬树捣鸟窝，把人家的狗崽偷来用稀泥糊了烧着吃。有一次，他违反塾规，先生要打他的手心，不料鞭未着手，他已倒地哭闹，说：“打伤了，要你赔。”

父亲生前矢志做官而未遂愿。临死时，他把8岁的蒋介石叫到床前，说：“你应该努力读书，将来有些成就，也可以稍为补偿我平生之缺憾。”父亲病故后，蒋介石和生母与异母同父的长兄分家，家境日益困难，常遭官吏欺压。火性大脾气躁的王氏望子成龙，而蒋介石偏不争气，于是痛加鞭挞。出人头地后的蒋介石曾回忆这段经历，说：“孟母断机”之后，自己立志“耀先人之幽德”。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少年蒋介石形成了任性、骄横、孤僻、多疑和暴戾的怪脾气。

“有枪便是草头王”，他做梦都想当一名军人。15岁，他考取了保定军校，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留东4载，师长的评语并不高：“留学时代的蒋君，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的表现”；然而，认识了足以影响他一生的青帮大头目陈其美。日后，陈其美把他介绍给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

1911年冬，陈其美承武昌起义的锋威，在上海组织起义，并自任都督。蒋介石闻讯，知机不可失，即从东京返回上海。他以一连串的暗杀手段赢得了陈其美的赏识，并因这些不能见光的活动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频频交往。

1914年7月，孙中山鉴于革命失败的教训，在日本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规定了严格的形式和组织纪律，黄兴一批军事干部和胡汉民、汪精卫等士家出身的人反对按手指印、立誓约以绝对服从总理的入党仪式；而陈其美却第一位宣誓并按了手指印。蒋介石因陈其美的关系逐渐被孙中山信任。

1916年5月，陈其美被暗杀，孙中山顿时失去一个重要的助手。蒋介石则因一向紧随陈其美，而进一步获得孙中山的重用。不久，他担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参谋长，开始与孙中山的军事行动结下不解之缘。

“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上海莫利哀路寓所里，以悲愤的心情，专心著述，从理论上总结“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蒋介石时常前来探望，并逢人就说：孙中山是我的老师，我经常登门拜见他，“受教弥久，慕

道益笃”，以显示他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寻常。

1920年9月，当孙中山欲返粤重建革命政权时，其挚友和助手朱执信被降兵所杀，蒋介石更受器重了。10月29日，孙中山在上海致函蒋介石，称，“执信忽然殁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又过之。”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悬赏20万元取“中山首级”，炮轰观音山。孙中山冒着枪林弹雨突围，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得到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之电报，即从沪赴穗，登舰服侍孙中山、指挥与叛军作战达50余天。最后护送孙中山脱险到香港，并转赴上海。

蒋介石“间阎赴难，临危授命”，孙中山感激万分，亲书“患难与共”四字相赠，还夸奖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从此，孙中山把他当作国民党“最重要的干部”，多次向他表露让他“为党负重大之责任”的心愿。

蒋介石也俨然以有功之臣和唯一可重托的人自居。1922年冬到1923年春，正是革命军与陈炯明叛军浴血奋战的时候，他却跑到福建鼓浪屿来游玩。他借宿“四面皆泉、滴水若琴”的涌泉寺，挥笔写下“其介如石”四字，并请人刻在一块石头上，以自炫其志。他在对孙中山的表面恭顺中已流露出伸手要权的神情了。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9月，任命他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联考察军事。

蒋介石十分乐意接受赴苏任务。他眼见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质上的帮助都不可忽视，加上孙中山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信念越来越强，知道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与苏联搭上关系。他的长远打算是：利用苏联的帮助，凭借革命的名义，建立一支新式的军队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实力，然后以军事实力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莫斯科，托洛斯基代表列宁告诉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开进中国外，其他如武器和经济的需要，都当竭力援华。”蒋介石听后，不禁喜形于色，他乘兴瞻仰了拿破仑进犯莫斯科时的驻军旧址，并模仿拿破仑的姿态，挺胸昂首，俯瞰四方。

1923年冬，蒋介石打道回国。他首趟赴苏，显然抬高他在国民党中的身份，同时也使苏联领导人认识了这么一位国民党的青年高层人员。这种优势，是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先决条件。1924年初，经孙中山催促，他从上海返回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早晨，军校总理孙中山偕夫人乘“江固号”军舰来到黄埔岛。只见，刷得干干净净的校门上横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子，左右门柱上贴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去，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校园里的一幅幅标语，写着“拥护本党本校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等字样。孙中山和宋庆龄兴致勃勃地巡视课堂和寝室后，来到大礼堂，这时，黄埔健儿正在礼堂里高唱他们的校歌：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  
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歌毕，孙中山发表演说，言简意赅地剖析着过去的教训并说明了现在的宗旨。他深刻地指出：“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所以今天在这地方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黄埔初创，异常艰难，因为广州的重要税收多半控制在滇桂军阀范石生和杨希闵手里，有一次，范石生当面奚落向他要钱的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那几根‘吹火筒’顶个屁用，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蒋介石听后，连哼一声都不敢，就黯然销魂地返回黄埔。党代表廖仲恺看他那无精打采的样子，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苦口婆心地劝慰他：“介石，你专心管好学生吧，经费的问题，都由我负责。”被誉为“黄埔的慈母”的廖仲恺，常常在夜半三更的时候来到范石生或杨希闵吸食鸦片的床前，曲意周旋。老烟鬼要在烟瘾过足后才肯签字，让他领到有限的军校用款。

廖仲恺解决了后顾之忧，而蒋介石也处处给人以“励精图治”、“热情洋溢”的好印象。他亲自教唱校歌，并就做人的意义、军人的目的、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加强独立生存能力乃至卫生防疫的多方面问题，对学生进行训示。他经常对学生们说，“我们跟孙总理于革命，就应当不怕苦、不怕死。怕苦怕死，就干不了革命！我国受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凌，国内军阀各据一方，横征暴敛，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救国救民，由我们之手建立起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谁反共我们就反对谁。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我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为了构思这些讲话内容，人们常见“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早晨，他一个人便站在校园中，凝神沉思。”

蒋介石住在学校里，起床号角一响，即巡视师生宿舍。一天早晨，他发现教员刘峙、顾祝同、陈继承睡懒觉，当即不顾情面地严加斥责，直使他们面红耳赤，寄颜无所。对教员尚且如此，对学生就更加严格了，一次，他经过禁闭室，听到有位学生在里面号陶大哭，马上扳起脸孔，高声训斥：“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

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的人格，错上加错，特再加禁闭3天。”说罢，扭头就走。

练兵场上，只要蒋介石一出现，便充满了严肃的气氛。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风姿：穿戎装、着披风、昂首挺胸，威严有度，标准的步幅和步速。值星官见校长莅临，当即一声拉长“立正”口号，一切操作都停上下来，官兵们像受到“定身法”的支配，肃立无声。值星官跑步换正步，走向校长举手敬礼。蒋介石戴白手套，举手还礼，操练才重新开始。

在节假日里，他却能轻松自在，寓教于乐。一个周末的晚上，他特地备好茶点，请一帮得意门生来家里做客。当大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他就说：“我家里藏有3件宝贝，谁人找得，大大有赏。”大家既好奇又有趣地翻遍每个角落，搜出的东西送到校长面前，校长均摇头微笑。眼看就成僵局，蒋

夫人陈洁如悄悄地对李之龙耳语几声。李之龙随即在校长枕头底下搜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俾斯麦传》和《曾文正公家书》。校长见状高兴得眉开眼笑：“之龙到底是我的好学生，懂得校长的心意。这3部书我每天必读。因为做人做事，成大业做大事，以及教儿育女都少不了它们。希望你们认真领会其中奥妙。”

黄埔军校实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特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部署方能生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在特殊情况下可行使党代表职权。政治教官被视为军校灵魂，对学生起极大的影响，开始，孙中山任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要职。

可是戴季陶辜负了孙中山的期望，他反对国共合作，歪曲三民主义。说什么“总理的思想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断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的发扬光大。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总理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他经常在军校发表这样又长又臭的演说，引起学生们的哄笑，孙中山对他也甚为不满，有一天，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邹鲁家里闲谈中无意他说了句国共合作的公道话，在场的“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张继怒不可遏，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因受了冤枉而反唇相讥，说张继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张继暴跳如雷，一面怒斥戴季陶反复无常，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一面拳脚交加打他。形销骨立的戴季陶无力还手，当场痛哭。夜里，他感到十分委屈，又想起在黄埔狼狈不堪的样子。天刚亮，他便心灰意懒，悄然溜回上海。

戴主任“失踪”，副主任邵元冲代理。这位国民党要员原是前清举人，封建思想浓厚，根本不懂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不联系学生，不接近下级军官，与党代表、苏联顾问也极少来往，只是每隔几天从广州乘船到黄埔走一趟，看一看例行的文件。偶尔的演讲也因口才极差、内容无聊而被学生们戏谑为“催眠术”。

军校总理孙中山食不甘味，忧心如焚。因为政治部已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黄埔建军的心血将付诸东流，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临难受命，就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他出世不久，任淮安知县的祖父去世，家道中落。父亲忠厚老实，在外省任小职员。

周恩来有两位母亲。未满周岁即过继给病重的四叔“冲喜消灾”。嗣母陈氏，生于“书香门第”，富有才学，丈夫病故后，她把自己的理想和全副精力都倾注在养育小恩来身上，使小恩来3岁时就开始读书习字、背诵古诗词。生母万氏，小时拒不缠足，随父亲出入官宦之家，经历过大的场面，出嫁后便成了周家理事的能手。她性情开朗、人情练达。公公去世后，家境日益困难，但知县家的门面还是要维持。维持周府的面子，要讲究排场；解决经济的入不敷出，要典当借贷；缓冲大家庭的内部矛盾，要多方奔走，排解纠纷。生母在处理这些家政大事时，经常把周恩来带在身边。就这样，他兼挑两户，深受嗣母和生母的熏陶，逐渐养成如嗣母的好学求知、恭谨有礼。温文尔雅以及如生母的意志坚强、精明干练、勤劳俭朴、豪放大方的性格特征。

9岁，生母和嗣母不幸先后病逝。周恩来作为长子，担负起家庭的重担。

辛酸的生活和炎凉的世态，使小恩来感受到现实社会的冷酷。

12岁那年春天，周恩来随伯父离开淮安到东北。走出沈阳车站时，伯父指着一片繁华地带对侄儿说：“这里是外国租界，你不要去。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咱中华不振啊！”周恩来对伯父的话似懂非懂。有一天，他背着伯父，闯进租界。这里映入他眼帘的是耀武扬威的宪兵队、巡警，以及插着五颜六色的外国旗的领事馆，还有那尖顶或圆顶的教堂，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向一个中国巡警哭诉其亲属被洋人汽车压死的惨事，然而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洋人，反而把她训斥一通，围观的中国人也敢怒不敢言。少年恩来明白了“中华不振”的含义。

周恩来牢记伯父语重心长的嘱咐：历史上革命的先驱，都是学识渊博的。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符合时代步伐的学问，是挑不起挽救中华的重担的。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努力探求人生真谛，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上修身课时，老校长问道：“诸生力何读书？”“为明礼”、“力光耀门楣”、“为家父”，学生们纷纷回答，老校长无动于衷。这时，周恩来响亮回答：“为中华之崛起。”掷地有声的江南口音，老校长不由得一怔，并激动得大声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13年夏天，周恩来考进天津南开学校后，更显出非凡才华。他创立了探求真理的“敬业乐群社”，在社刊发刊词中以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说道：

“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海外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能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7年夏天，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获南开金质奖章。南开《毕业同学录》在周恩来小像下记载：

“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千万苦干难之中，多才多艺，造就斯绩，殆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者欤。”

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下，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离别祖国时，他写下一首充满济世豪情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周恩来听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读到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这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卖国，21岁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报》，猛烈地抨击孔孟的旧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他和天津学生代表到北京请愿，反对军阀枪杀爱国人民；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社会，就需要唤起学生和民众的觉悟”，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觉悟社”，提出了最终要铲除剥削阶级的奋斗目标。

1920年1月，周恩来率领天津各校数千多名学生前往省公署，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的二十多名学生代表，请愿遭到镇压，他和另外几位学生领袖又被捕入狱。他把牢房变成宣传革命的场所，组织难友们与狱方斗争。在那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敌人监狱里，他给难友

们连续讲演“马克思传”和“马克思学说”，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几月后，当局迫于社会舆论释放了他们，同学们欢欣雀跃地来到监狱大门前，把缀有“为国牺牲”的金字纪念章戴在周恩来的胸前。

为了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抵达法国巴黎，参加勤工俭学。他来到巴黎，立即吸引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的中国青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领袖，旅欧期间，他边学习边做工，同时考察那里的工人生活。除了大学的正规课程外，他每周参加讨论会，研究共产主义教科书，分析中国的革命斗争。他曾去英国考察，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始末》一文；他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和里尔煤矿等处做工、调查；他还经常到德国工人中间去，并对鲁尔区工厂的劳动条件作详细了解；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励他们继续走爱国主义道路，即使他们未必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斗争实践中，他“表现出卓越的观察能力和组织运动的领导才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然而，有意思的是，思想相同的人，彼此相隔万里，竟会几乎同时考虑采取相同的行动。同年3月，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它和其他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小组一样都在积极活动，目的都是为着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周恩来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他主编的《少年》（后改名《赤光》）月刊，起了中共在欧洲的“喉舌”作用；为加速干部培养工作，迎接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旅欧学生中选派不少青年去莫斯科劳动大学进一步深造。

1923年初开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积极从事国共合作。他因协助国民党特派员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绩斐然，而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1924年初，他又建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他的卓越才能引起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瞩目。不久，廖仲恺与中共有关部门协商后，请周恩来的旅欧老朋友张申府写信并汇款到巴黎，待邀周恩来回国参加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

秋天，周恩来从法国返回广州。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孙中山十分器重他，亲自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11月初，为挽救黄埔军校的政治危机，经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商定，孙中山又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廖仲恺亲自把周恩来接到黄埔。码头上，38岁的蒋介石和26岁的周恩来握手，好像彼此要从对方的手中汲取力量，去迎接未来的战斗。

周恩来上任后的首次露面，是在军校大花厅发表演讲。那天，学生们力目睹新主任的风采，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英俊的外貌和优雅的姿态，使学生们如痴如狂。而抑扬顿挫的音调和引人入胜的内容更不时被掌声所打断。黄埔一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赓看到靠在自己身边的小同乡宋希濂正在聚精会神听周恩来演讲，不禁想起一件事：几天前，他俩漫步江边，畅谈军校的战斗生活。初出茅庐的宋希濂对陈赓表达崇拜校长的心情，说：“蒋校长是实现孙总理革命目标的栋梁之才。”……陈赓想到这里，会心暗笑地凑到宋希濂的耳边，小声问道：“怎么样？周主任也是栋梁之才吧！”宋希濂连头都没有转过来就脱口而出：“当然，周主任是栋梁之才，而且是年轻的栋梁之才，英俊的后起之秀！”

不久，周恩来就雷厉风行地对军校政治工作进行革故鼎新，使几乎瘫痪

的军校政治部有如前进的车轮一样转动起来。

在政治部工作会议上，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军校也没有多少政治工作可言。蒋校长门前挂的是‘登高望海远，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编写的《曾、左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训练出真正的革命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他接着分析孙中山从事军事运动失败的教训和苏联红军的经验，然后说明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要使军队成为被压迫阶级可以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具，就必须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实施政治教育，讲清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解除压迫与痛苦的途径。使每个军官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明白士兵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这样，才能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装。”根据这种指导思想，政治部制定了全新的《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

周恩来作风朴实，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众，亲自主讲一些重要课程。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向师生们灌输了一种崭新的观点：

“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谁都可以利用，资本家拿起这个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者拿起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逞他的声威，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周主任的讲课最能感动人。”这是师生们的一致评价。《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分析》就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因为他对国内外形势了如指掌，每次讲演都有新意。而且，他的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清楚，易于记录和背诵。学生固然喜欢听，带队的长官也经常肃立一旁、静听到底。有人还写了一首《清平乐》来形容他讲课的情景：

风儿止步，雀儿悄悄顾。  
屏听堂上细谈吐，拨尽心头迷雾。  
一副和蔼笑容，亲如浩荡春风。  
红棉摄其笑靥，衬得花儿彤红。

有一天，曹渊、许继慎、金佛庄等学生去见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曹渊入学前，曾在家乡参加反袁斗争，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又曾在上海刻苦读书的情况。他对曹渊说：“一个人，对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生各种问题，要想看得透，就要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人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在顺境和逆境的比较中体验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很宝贵的。你从淮上来，已走过许多坎坷的路，学到许多东西；以后带兵打仗，转战千里，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走到哪里学到那里，不是很好吗？那些悲守穷庐，乡不接世，年与时驰，遂成枯落的人，哪里有你们这样的胸襟，哪里懂得什么奋斗的情趣。”一番勉励的话，说得曹渊心里暖融融的，也把在座的几位，逗得开怀大笑，大家都感到周恩来可敬可亲，平易近人。

仅仅几月，军校的面貌就焕然一新。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学生们迫切要求早日学到杀敌本领，冲向反帝反封建的战场。军训再苦，任务再重，也都情绪高涨、精神饱满。他们白天参加紧张的训练，晚上参加政治部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参加血花剧社；编辑报刊；到球场去打球；结伴散步畅改理想；登高望远憧憬美好未来。学生唐克的家人对他学习军事表示不理解，他就在寄给家里的照片背面写下一段话，“亲爱的工农啊！你们光眼

看到自己的地位是如何的痛苦，中国的军阀是如何的猖獗。我们再不武装起来，杀这少数的军阀而救国内多数的人民，中国就要亡国了。”

热烈的青春奏鸣曲，从黄埔校园飞出。美丽的黄埔岛，充满了春天的生机，黄埔健儿在茁壮成长，周恩来如雄龙昂首，头角峥嵘，深受师生敬仰，廖仲恺对他推崇备至，蒋介石也不禁赞叹说：“周主任年轻有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啊！”

## （二）

国内外反动派却对黄埔军校不屑一顾。被孙中山斥责为“戴着我的帽子，蹂躏我的家乡”的驻穗滇桂军嘲笑说，“几个小孩子，几根破枪怎么能打仗？这不过是孙大炮晚年所谓国共合作的消遣而已。”盘踞东江时刻不忘进攻广州的陈炯明叛军则蔑视他说：“黄埔新编一、二团成不了大气候。”

1925年1月7日，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倾巢出动，向广州进攻。战火越烧越近，形势愈来愈紧。大元帅府广州留守处，在中共的推动下，决定组成东征联军，出师讨伐陈炯明。2月初，东征开始，由于滇桂军决意坐山观虎斗，逡巡不前，粤军许崇智部和黄埔学生军两个教导团成了东征主力。

学生军教导团在蒋介石和周恩来的率领下从黄埔出发。途中，黄埔健儿高唱着“同志们前进！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的《杀贼歌》和“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蒋介石乘坐轿子，团长何应钦、王柏龄骑着战马，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则和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

2月4日，东征军攻下东莞县城，蒋介石、周恩来进驻东莞县署。第三天，两人应邀出席东莞商会欢迎东征军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调指出，“我军是真正革命军，以革害国害民贼之命为目的。我军为救国救民而来。人民有痛苦，我军必使之无痛苦，这与其他军队给人民带来痛苦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广东军队，多如牛毛且腐败得不成样子，都是因为他们不是真正革命军。真正的革命军为保护人民而战，纵无衣食，亦不变志。”他还热情把周恩来向大家介绍，并说明革命军特设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与人民有关系的事情。

周恩来接着演讲，略谓：“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各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下来的，即使有新招之兵，也仿照前清编制。这种军队不顾人民痛苦，不懂政治意义。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认为，要实现中国和平，必须有真正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因此，总理特设军事政治并重的军官学校，使军官和士兵懂得，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和军阀的压迫，懂得如何解除农工商各界之痛苦。现在人民非常痛苦，不是受到土匪侵害，就是遭受反革命军队的骚扰。此次我军出发，是为解除人民痛苦而来，但全靠本校军队则力量太少，如果没有人民援助，仍然不足负此重任。因此，极其盼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成革命成功。”

广大群众分清了东征军和土匪、军阀的区别，满腹疑虑，终于冰释。一时间，莞城内外到处洋溢着军民同乐的气氛。东莞本是出产爆竹的地方，那一串串又响又脆的喜庆之声响彻云霄，比过年还显得热闹。这种气氛，使蒋介石深受感染。在队伍经过常平车站时，他曾口诵感怀一首：

亲率三千子弟兵，  
鸱鸢未靖此东征，  
孤军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涕泪横。

东征军直趋淡水城下，淡水距惠州 70 里，陈炯明企图利用其城墙高厚坚固、城壕既深且宽的易守难攻地势，据城而守，并迅速从惠州发兵援助、消灭东征军。当晚，东征军组织了攻城奋勇队。周恩来布置各级党代表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踊跃报名参加，勉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以满腔热血去浇灌主义之花。蒋介石许以奖赏每个队员 30 元或大元帅金牌胸章一枚。

15 日拂晓，教导团炮兵轰击敌军工事，随后，由 8 名共产党的和 2 名国民党员的营连党代表以及 100 名士兵所组成的奋勇队向城墙冲锋。由于云梯未及时运到，无法登城，城下的奋勇队员遭到重大牺牲，蒋介石、何应钦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在这危急的关头，当过消防队员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献计“人梯法”。奋勇队员迅速搭起人梯向墙头攀登。

两个小时后，陈军副总指挥洪兆麟率援兵到来时，城头已换上东征军大旗。他指天发誓：“不夺回此城，死不瞑目”。

东征军进城后，王柏龄团以为城他既破，万事大吉，而疏于防守。等到洪兆麟反扑过来时，何应钦团能适时投入战斗，而王柏龄东一个、西一个地拉了半天，勉强凑够一连人。蒋介石不能容忍这种漫不经心，潦草塞责的行为，当即撤了王柏龄的团长职务，并斥责说：“我是叫你当团长，不是叫你当连长。你怎么只带一连人来见我？你给我滚开！”还有王手下的一个连长，他自恃是蒋介石的亲戚，而擅自从火线率队逃审到数十里外的龙冈。周恩来闻讯后立即面报蒋介石，要他大义灭亲，以张军纪。开始蒋介石犹豫不决，可是根据《革命军连坐法》的规定：“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不好徇私舞弊，只得硬着头皮，下令枪决。

军纪严明，军心大振。东征军击退反扑的洪军。2 月 16 日，蒋介石致电北京，向重病卧床的孙中山告捷。陈炯明惊闻洪兆麟败绩、东征军进逼他的老家海丰，立即从汕头乘船，仓皇出逃香港。

海丰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策源地。2 月 27 日，教导团进入海丰县境，人民群众“一路箪食壶浆，欢迎校军”。男女老幼，簇拥观光，彩幡鞭爆，樵歌牧唱，助我捷音”。3 月 1 日，海丰各界 1000 多人，在林氏祖祠召开欢迎革命军大会，周恩来、彭湃分别发表演说，当地群众表演了欢迎东征军的文娱节目，“农协”在城里设立办事处，送来生猪、蔬菜等慰劳品。亲眼看过这种情景的蒋介石还颇发了一番感叹。

东征军占领海丰后，兵分三路进攻潮汕。3 月 7 日，攻占了粤东重镇汕头市。这时，原驻扎兴梅和粤赣边的陈炯明“救粤军”第一军军长林虎部，乘东征军刚踏入潮汕，脚跟未稳之机，从背后包抄过来，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前后夹击东征军。东征军从揭阳、普宁回师，迎击林虎。3 月 13 日清晨，何应钦团首先在棉湖与林虎部接火，因右翼粤军许济部和左翼校军第二团没有如期投入战斗，而使何应钦团 1000 多人迎战林虎部 9000 人，力量相差悬殊，战况极其不利。蒋介石心想，此仗万一打败，校军将元气丧尽，遗祸不堪设想。因此，他严令何应钦“坚决抵抗，不准后退”。周恩来和加伦顾问也在战场上鼓舞士气，指挥战斗。

敌人凭借其优势兵力，紧紧咬住何应钦团指挥所，猛攻猛打。何应钦大惊失色，炮兵连撤退到团部后也连发哑炮。蒋介石急得来回走动，周恩来沉着地带领炮兵连官兵校对炮位，连长陈诚见状鼓起勇气瞄准发炮。“哑炮”停息了一段时间，撞针已冷却，大炮被陈诚打响了，恰好又打中了密集的敌阵。蒋介石高兴得合不拢嘴，马上把陈诚升为营长。下午2时，校军第二团在代理团长钱大钧率领下从左翼开到，投入战斗。猝然之间，枪炮声大作，嘶杀声连绵不断。那打了一整天恶战，又累又饿的何应钦团，闻援军已到，顿添勇气和斗志，纷纷跃出阵地扑向敌群。林虎部不能持久，山崩河决似地向五华、兴宁方向溃逃。

棉湖战役结束后，周恩来沉痛地向东征军将士公布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不幸消息，勉以“墨经从戎，乘胜长驱，力翦凶仇，以报孙大元帅”。蒋介石惊闻噩耗，失声痛哭，遂撰诗表志。

轩草须除根，擒贼必先擒王，  
不除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  
祭我总理神灵，肃清东江余孽，  
实行三民主义，继承先烈生命，  
完成本党任务。

3月30日，当东征军肃清潮梅全境，首次东征获得胜利的时刻，军校教导团在兴宁召开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战士大会。周恩来宣读祭文，蒋介石宣读誓词，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就任潮汕善后督办和东江各地党务主任，处理东江地区的党政大事，进一步拓展革命新局面。

5月下旬开始，蒋介石和周恩来率领教导团班师回穗，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妄图夺取广东革命政权的武装叛乱，消灭了这些祸粤经年、拥兵数万的叛军，巩固了大革命的策源地。7月，在中共的倡导下，国民党改组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成立了委员制的国民政府。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整编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5年秋天，陈炯明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大力支持，乘东征军回师广州之机，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再度占据了整个东江地区。他还约同南路的军阀邓本殷一致行动，夹击广州，阴谋颠覆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为打倒军阀、统一广东，作出了出兵东江和南路的决策，9月底，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东征军3个纵队4万人，开始了二次东征。

10月10日，东征军进抵惠州城外的飞鹅岭。惠州城自古号称“东江锁钥”、“南中国第一天险”，三面环水，一面枕山，据说自宋朝以来从未被攻破过。惠州又是陈炯明长期精心构筑的顽固堡垒，用大青石板堆砌得又高又厚的城墙，经得起炮火轰炸，难怪孙中山生前屡次组织精兵进攻，都未能奏效。这时，惠州的城防司令是陈炯明的骁将杨坤如，他以3000清一色英式优良装备之精兵凭险婴城固守。

面对如此坚城，蒋介石却采用强攻战术。13日，他命令东征军大举攻城。杨坤如凭借城上工事，拚死顽抗；隐藏在暗角的机关枪也伸出墙洞开火。东征军攻城先锋队一排排地倒下，尸骸成堆，牺牲惨重。

夜幕降临，蒋介石乘轿在阵地上转了一圈，便带着悲观沮丧的情绪返回



指挥部，提出了放弃惠州、改道前进的主张。周恩来反对这种“罢兵另谋”的消极观点，说：“攻下惠州，藩篱撤而破竹之势成，对整个战局将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影响。而罢兵改道，则意味初战夫利，动摇军心，显然对东征全局极为不利。”

蒋介石仍然信心不足，说：“城高池深，急切难下，实在是没有把握。”周恩来耐心解释，说明只要打法对头，惠州还是可以拿下来的。他生动地陈述了“围师必缺”的战斗原则：“瓮中捉鳖，鳖会咬人的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捉它就较为容易。围城道理也是这样，应示活门，使守敌觉得有路可逃，以动摇其守城信心，利于攻城和歼敌。”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三面围攻，网开一面，待敌外逃，聚而歼之”的破城方案。随后，周恩来召集团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王逸常等人开会，要求他们带动广大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保证攻下惠州城。

第二天下午，攻城开始。蒋介石和周恩来在飞鹅岭指挥，何应钦在城下督战。东征军集中炮火，猛轰北门，并鉴于昨天的教训，尤其注意摧毁城上暗藏的工事。转眼间，一架架竹梯靠着城墙，敢死队员争先攀登。坐镇城内的杨坤如，起初仍以为惠州万无一失。当他正欲开台唱戏、宴请宾客时，忽报北门告急，东征军已爬上城墙。当他走出司令部，准备到北门督阵时，又遭到炮火袭击。杨坤如知大势不妙，悄声问左右：“可有突围之路？”侍卫参谋说：“东门空虚，可由此出走。”东征军终于占领了惠州城。杨坤如被弹片打伤，狼狈从东门逃走，其所部在弃城而逃时，又遭东征军的聚歼。

亲身经历惠州之役的苏联顾问切列藩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是共产党人拿下来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攻克惠州后，蒋介石、周恩来进驻惠州督办署。10月16日，东征军在惠州城的第一公园举行“攻城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场布置十分庄严，中间安放牺牲将士238名灵位，上面悬挂“阵亡将士精神不死”的横额，两边贴有“一鼓攻克天险惠城，取义成仁，长留浩气；余事力后死者本责，鞠躬尽瘁，共建殊勋”的挽联。蒋介石主祭，周恩来发表演说，号召东征健儿化悲痛为力量，完成先烈遗愿，他说：“孙中山先生的愿望，第一是统一广东，第二是统一中国，第三是打倒帝国主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第一军3个师的部队就够了，而必须全中国的军队，都化为革命军。”

10月16日晚上，蒋介石发布向潮梅进军、彻底扫荡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军的命令。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张挞伐。仅仅十来天，就占领了海陆丰、紫金、老隆等地，基本上控制了通往潮梅的要冲之地。

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蒋介石以及东征军总指挥部，随谭曙卿所率领的第三师出发。谭师在惠州之役后就翘起尾巴，以为可以一举荡平潮汕，于是轻敌冒进。10月27日下午，蒋介石一行到达距五华县华阳墟10公里的羊高墟时，谭师长送来急报：“今晨4时出发，7时半在塘湖遇敌。敌有人马万余，抵抗顽强。职部兵力，尚嫌单薄。恳请调兵向梅林、龙村两翼增援，以期一鼓歼灭，”蒋介石觉得蹊跷。

原来，谭师懵懵然陷入敌丛后，遭到凶狠强悍的林虎属下的黄任寰部的突然猛扑，牺牲了自团长以下的1000多名官兵，全线崩溃。蒋介石得悉真实情况后，急忙命令总指挥部的护卫陈赓，“陈赓，你代理第三师师长，立即收集溃散部队，重新组织抵抗。”无奈为时已晚，兵败如山倒，陈赓也无力

回天。从塘湖、华阳败退而来的谭师队伍，已如潮涌。总指挥部的随从人员也被冲散，蒋介石的坐轿和行李也丢失了。

此刻，蒋介石心里明白，无论是孙武子还是拿破仑也难改变这种溃败的局面。也许是首战旗开得胜使他的头脑过于膨胀，眼前的事实又完全出乎意料，因此，他的自尊心简直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他想到追兵在即，顿时一阵阵心悸，颓然坐在地上。十分伤感地对陈赓说：“我唯有杀身成仁，我没有脸见江东父老。”陈赓蹲下来劝慰他：“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仅是一个新编过来的师，校长何出此言！校长是总指挥，考虑的应该是战争的全局。这里太危险，请校长赶快离开。”说完，陈赓背起已经茫然不知所措的蒋介石，向安全地带撤离，来到几里外的小河边。敌军眼见就要追上了，陈赓找到一只小船，赶紧把蒋介石送过对岸，终于脱离了险境。这时，天已黄昏。

夕阳的余辉，像一层彩油抹在蒋介石那长长的脸上，更加显露他焦躁不安的神情，他看到总指挥的东西丢个精光，又想到与周恩来失掉联系，自感狼狈不堪，便大发脾气。接着，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要跟周主任联系，谁愿意去送信？”没有人开口接受任务，陈赓目睹那几个军官面面相觑畏缩不前，便自告奋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连夜出发。

陈赓越过崎岖险要的山路，寄过深邃莫测的丛林，历尽艰辛，一夜半昼赶路100多里，于第二天正午在河婆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何应钦见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队把蒋介石接回来。

在华阳打败谭师的林虎所属部队，此刻正转势南下，企图与驻守棉湖、鲤湖一带的洪兆麟部合谋，夹击位于河婆的东征军。战事的中心，由华阳转到河婆。河婆之役，东征军采用大包围的灵活战术，经过几天奋战，打败了林虎、洪兆麟部主力，扭转了华阳失利的局面，取得二次东征的又一重大胜利。10月31日，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致电广州国民政府告捷。国民政府在嘉奖令中说：“经此一役，逆敌势潜，潮梅一带，肃清可期。”

11月4日，周恩来率领东征军总政治部进驻汕头市；6日，蒋介石率领总指挥部也抵达汕头市，汕头数万市民箪食壶浆，迎接东征军登岸。7日，全市性的“欢迎东征军大会”召开，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发表演说。会后，庆祝二次东征胜利的鞭炮声响彻云霄。两次并肩东征是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团结战斗的一曲凯歌。随着东征以及南征的胜利，把帝国主义的走狗、盘踞广东三分之二地盘的陈炯明、邓本殷等军阀势力，逐出历史舞台，使新生的国民政府改变了过去那种四面掣肘、内外交困的局面，为稍后进行的北伐战争把革命从广东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 （三）

广东统一了，革命阵线内部却出现了裂痕。

二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一起住在汕头市联兴里适宜楼。1925年底的一天傍晚，夕阳尚未落尽，漫天里燃烧着桔红色的晚霞，鲗岛虽届冬天，却无寒意，蒋介石突然邀请周恩来陪他到潮州一行。

第二天一早，天却阴沉沉的，灰溜溜的寒云压低了天空，古城潮州的土地上结起薄薄的霜花。用完早餐，蒋介石又告诉周恩来：“我要在西湖饭厅召集大会，请周主任出席。”这种不正常的表现引起了周恩来的警惕，尽管表面上仍是若无其事地答应着。

会议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满脸笑容地把周恩来拉在他身边就座，然后，他一反平时气势汹汹的样子，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东征胜利后首次召开的连党代表和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广东统一后，北伐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取得北伐的胜利。”这时，他斜睨了周恩来一眼，并故意挑起两党关系问题，“大家想想，我们队伍中有国共两党的同志，如果大家认为两党齐心，那么我们就要很好地合作下去；如果认为相互间有矛盾和磨擦，那又应该怎么办呢？请同志们随便发表意见。”

蒋介石话音刚落，早有准备的孙文主义骨干分子就纷纷抢先发言。倪弼倚老卖老，危言耸听他说，“我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就让我先说吧。两党同志常有磨擦，这怎么办呢？戴季陶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我认为，叫共产党去信仰国民党，或者反过来，都不大可能。然而，共产党可以作为在野党，继续与我们合作。”

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接着站立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发厥词：“今天的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来的，说你们共产党是客人或是主人都不像。国共毕竟是两个政党，迟早要分道扬镳，而迟分则不如早分。”

主席台上，城府深奥的蒋介石露出了一丝不易看到的笑意，显然，他对两位得意门生的发言颇为满意。周恩来英俊严肃的脸容上则是一副神态自若、声色不露的样子。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代表，也就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发表他们的见解。第七团团团长蒋先云，既是蒋介石最赏识的黄埔一期生，又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黄埔特支第一任书记。他直抒己见：“国共两党的分和合，都应从革命的前途来考虑。目前两党虽有矛盾，但可以调和。今天我们才占有广东，北方还有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在虎视眈眈，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强得多。大敌当前，根本不是讨论分合的时候。”

共产党员许继慎义正辞严地指出：“东征中，有多少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说我们是客人，那就根本不需要作出这样的牺牲。相反，有一位担任攻城指挥官的国民党人临阵逃脱。不过，那也是个人的事情，我们校长已处罚了他。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占绝大多数的。”

会议开了半天，大多数人都站在蒋先云、许继慎等人的立场上，反对国共分裂。蒋介石眼见事与愿违，只好草草收场，说：“今天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以后还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当天傍晚，蒋介石又客客气气地和周恩来从潮州坐船回汕头。

周恩来望着那暗淡的匆匆流水，仿佛看到笼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的越来越严重的阴影。他从刚刚结束的潮州会议追忆起自己与蒋介石共事以来的磨擦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所潜伏的裂痕。

周恩来初到黄埔的时候，为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发展优秀学员加入中共，并成立中共黄埔特支。第一次东征前夕，周恩来为改造广东革命政府属下军人的思想意识，发起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该会以“拥护革命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建立有革命纪律的革命军”为指导思想；以“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为己任。陈赓、蒋先云、徐向前、许继慎、李之龙等人都是该会的骨干，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出版会刊，活动范围日益扩大。

蒋介石开始同意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那时他高唱联俄联共的雅调，并在一定程度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看到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

响愈来愈大、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必定会妨碍他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实力以作为实现其政治野心之基础的目的。他开始感到惴惴不安，并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暗中指使其心腹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该会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基础，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出版《孙文主义会刊》。在王柏龄、贺衷寒、胡宗南、吴铁城等核心人物带动下，他们经常寻衅作乱，同青年军人联合会制造磨擦，监视进步分子，偷窃文件。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内部权力角逐顿时激烈。急于要成为总理继承人的汪精卫，为了战胜其强劲对手“代帅”胡汉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廖仲恺而见风使舵地急速向左转，积极联俄联共，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他也看到黄埔军校的重要性，选中蒋介石作为自己的盟友。蒋介石因在党内资历浅，十分需要汪精卫的支持，于是一拍即合，互相利用起来。

不久，省港大罢工的风暴席卷南部中国，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者刺杀了廖仲恺。右派集团本想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工农革命运动压下去。但是，事与愿违，暗杀廖仲恺，激起了左派和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慨，他们同仇敌汽，奋起反击。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即赶到医院探望廖仲恺，并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发表《勿忘党仇》等悼念文章。他主持的“廖案检查委员会”查明了案件的真相：右派集团多次在胡汉民家里开会，策划暗杀阴谋，最后决定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等人收买凶手……

蒋介石和汪精卫因被右派集团列入行刺的黑名单而身价猛增，他们利用人民的力量，实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名义，宣布戒严，控制全市。汪、蒋谴责胡汉民知情不报，要他对廖案负政治责任；蒋介石又乘许崇智因部下与刺廖有关的微妙局势，派兵将他软禁起来。不久，胡、许离开广东。

除掉许崇智就是扫清蒋介石成为“军界领袖”的最大障碍，不久，他一跃成为东征军总指挥。同时，廖案也使许多元老派在国民政府内无法存身，对蒋介石这个晚辈在政治上也造成较好的机会。

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暂时停息后，蒋介石又想方设法防共限共了。国共关系成了一根最敏感的神经，稍一触动便牵动整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机体。

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把军队和军校的共产党员以及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他。周恩来看穿他的意图，严正指出：“此事关系到两党大事，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蒋介石曾很想重用救他一命的陈赓，可是当他弄清陈赓原是一个青年老布尔什维克之后，态度便截然不同。他在黄埔名册“陈赓”旁边批注：“此人是C·P，不可让他带兵。”作为侍从参谋的陈赓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周恩来授计陈赓，托辞母亲病重向蒋介石请假回家。蒋介石看了陈赓送来的假条，狡黠地说：“不是吧！陈赓你一定看了什么东西吧？”陈赓没有吭声。蒋介石自知理亏，只好叫人送来船票路费和一委任状，让陈赓回黄埔军校任中校队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潮州会议，蒋介石故意挑起国共关系，是他测试军心的一个有计划的步骤……

周恩来从潮州返回汕头后，立即召集黄埔特支主要成员，介绍潮州之行并提醒大家。他说：“蒋介石这次拉我到潮州开会，搞了突然袭击，事先我一点也不清楚。我本想发言驳斥他，揭穿他的假面具。但看到同志们的发言

已达到目的，同时也为了更有利于两党合作和今后斗争，我保持了沉默。大家应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他不会就此罢休，更严峻的斗争就要到来了。”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的省议会大厅开幕。会场内外显得朴素庄严，门口设置一个很大的地球仪，象征着世界革命运动大团结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会秘书处经常播出雄壮的《国际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会上占着绝对优势，有五分之三的代表是中共党员。出席大会的陈璧君曾对她的丈夫汪精卫说：“你看看，这次大会上能办事会说话的，一考查，都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预料到这种局面。大会开幕的前几天，他从汕头到广州，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

中派、扩大左派的策略，拟定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回击“准备叛变，但尚未公开背叛三大政策的新右派”蒋介石，从第一军中撤出中共党员，另组国共合作部队。周恩来还中肯地分析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十师，而且第二师师长王桩功接近左派汪精卫，除了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上述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后，周恩来又赶回汕头，等中央批准，即付诸实施。

然而，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接到周恩来、陈延年的函件时，他正在非常殷勤地请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人到广州出席“二大”，好像少了这几个人，大会就开不成似的。他回电广州，不仅不同意周恩来、陈延年的计划，反而派张国焘任国民党“二大”中共党团书记，来广州执行他的妥协退让策略。

蒋介石是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从汕头赶来出席的。当他步入会场时，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为吹捧和讨好他的把兄弟，立即起来向大会代表提议，说：“蒋总指挥刚从前线归来，劳苦功高，大家应该向他起立致意。”可是应声而起者寥寥无几，使蒋介石感到十分尴尬，陈肇英真是讨个没趣。

蒋介石本已对共产党人心存疑惧，此刻，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告诉他，“二大”的政治空气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正气完全压倒了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邪气。因此，他在大会期间，表现了异常的进步，在《再论苏俄》的演说中声称：“我们只有谨守总理生前的策略和死后的遗嘱，如果再有违反者即是叛逆。”

陈独秀和张国焘被蒋介石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拒绝采纳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的正确意见，而一味妥协。结果，正如出席这次大会的共产党人吴玉章回忆：“本来我们有条件使进步力量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取得优势，但我们却自动地放弃了。事实证明，不进行斗争、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戴季陶、孙科等人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更是一跃为中央常务委员，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蒋介石不满足于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他要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进而在北伐中以武力统一中国，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但是，要实现这一政治野心，在他面前还有种种困难和矛盾。

首先，蒋介石和周恩来的矛盾日趋公开化。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党代表制度和设立政治部是孙中山制定的政策，蒋介石不便公开反对。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到1926年春，军校和各军的政治部，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在工作，第一军的各级党代表也是中共党员占多数，

士兵中还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深得人心，使蒋介石感到军校和第一军不是他所能任意摆布的。有一次，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潮》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背着孙中山，走向阴森的孔庙，要孙中山吃冷猪头肉，孙中山两眼落泪，站在旁边的洋人、军阀和党棍则拍手称快。这幅无情揭露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漫画，很快贴遍全校，甚至广州街头。蒋介石看后气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他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将前功尽弃，黄埔军事力量将成为工农革命武装。因此，他决心把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力量从军校和第一军中排挤出去。

其次，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季嘉山等人有了原则的分歧。苏联顾问认为，眼下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北伐不能搞成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必须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而蒋介石急于实现其政治野心，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即北伐；也坚决反对把工农组织起来配合北伐军作战的办法。他要独吞胜利果实，惧怕像东征时那样，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在东征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抢先占领县城、选举县长、建立工农政权，使东征军到达后反成为“客人”。至于北伐的进军路线，季嘉山主张，打至武汉后，继续向北以与冯玉祥汇合，使苏联的援助可直接从陆路输入，然后以西北为基地，向东南沿海一带的帝国主义势力集中的地区进攻。蒋介石却提出一条对于自己实现大权独揽美梦的最佳进军方向，即迅速打回“老家”去，以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和美国人的帮助。这样，蒋介石和季嘉山存在着几乎是势不两立的矛盾。

还有，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日益激化。两人私人关系本来就不融洽。东江平走后，蒋介石提出与汪精卫结为换帖兄弟，遭到陈璧君的反对。有一次，她看到丈夫给蒋介石的信中有“介弟”字样，当即破口大骂：“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不愿意做他的把嫂。”骂得汪精卫再也不敢在老婆面前称“介弟”了。政治上，合作的蜜月时期业已过去，如今已是同床异梦、相互排斥。道貌岸然将为青面獠牙所代替。一身兼任国府主席、军委主席和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不愿作挂名领袖，而开始伸向军队。他经常到军校讲演、调解两派学生的纠纷，以树立自己在军队的形象。殊不知这样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他一贯把黄埔军校视为自己的领地，别人不能越雷池一步。二次东征时，汪精卫坐镇广州，乘蒋介石远在潮汕前线之机，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代理蒋介石的广州卫戍司令。王原是从许崇智手下投靠蒋介石而被升为师长的，现在受到汪精卫宠爱后逐渐疏远了蒋介石。随着形势的发展，汪精卫校国共两党和人民群众公认为左派的旗帜，蒋介石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他意识到自己已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刚刚夺得的军界领袖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寻找扫清障碍的突破口，蒋介石从国民党“二大”后就开始处心积虑，苦思冥想。

淡黄色的春月挂在黄埔的夜空中，使小岛变得苍白而神秘。月光在山岗、营房、课室投下黑糊糊的阴影，好像在隐藏着什么可怕的故事。校长办公室里，蒋介石夜不能寐，独自在来回踱步。忽然，他的脚步停了下来，紧锁的眉头松开了。他决心向身兼数职的李之龙开刀，达到一箭三雕——打击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的目的，变被动为主动，图谋夺取最高权力。

李之龙原是蒋介石所赏识的黄埔一期学生。二次东征时，蒋介石派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中山舰舰长。然而，他却和王懋功一样，经常出入汪

精卫的门坎，每次汪精卫到黄埔调解学生矛盾时，作为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的李之龙总是极力亲近他。蒋介石听到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反映这些情况后，开始对他感到不顺眼。不久，李之龙又把蒋介石的把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走私活动向汪精卫报告。汪精卫知道陈肇英是由蒋介石保荐而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便把陈肇英撤职查办，乘机打击蒋介石的力量。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

李之龙因任过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的翻译，而同苏联顾问团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也是中共建党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因此颇为自得。尤其是缉私事件后，他被汪精卫提升为海军局代理局长，更是有恃无恐。中共曾派教师党代表包惠僧去看他，要他讲究斗争策略，不能一味好大喜功，并告诉他：“蒋介石对你的举动颇有意见；周恩来和陈延年同志也说你管事太多了；陈肇英走私，吴铁城还不是一样走私！你管得了这些事吗？这种事应该先报告区委，现在你最好去向蒋介石报告缉私经过。”谁知李之龙听后很不高兴，当即顶了包惠僧，说：“我奉汪主席命办事，蒋校长他也管不了我，我和他不是在一个系统的，我何必向他报告呢？至于延年、恩来同志那里，我国太忙，才没有去。”

李之龙的地位和行为，的确是蒋介石发动阴谋事件的最佳突破口。

3月17日黎明，蒋介石秘密由黄埔岛乘汽船来到位于广州东堤八旗馆的卫戍司令部（王懋功已被他突然解职）。与此同时，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散发危人耸听的谣言：“共产党人要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汪精卫加入共产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正在黄埔查蒋校长的账”、“共产党唆使中山舰劫蒋校长、押送苏联”。

18日晚上，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尤在广州文德路寓所里

收到海军学校校长、蒋介石的把兄弟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蒋介石给海军局的命令的公函。公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禱。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三月十八日

李之龙马上按公函的要求，用笺纸写了两行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交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命令略云：“着该舰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早晨，“宝璧”、“中山”二舰相继驶抵黄埔。因蒋介石不在黄埔，中山舰舰长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不知此事，可稍待他请示蒋校长。蒋介石在接到邓演达的电话时，竟说自己不知道有命令军舰返校之事。

上午，李之龙到局里上班。刚处理几件公文，作战科长进来报告：苏联顾问团来电话，询问中山舰是否在省。顾问团按原定计划，要检阅中山舰。李之龙一拍头：“怎么把这件事忘了！中山舰起锚了吗？”科长说：“清晨5时就起锚了。”李之龙发了愁，科长献计：“听说蒋校长回省城，可能住卫戍司令部。能否请示他调回中山舰？”李之龙点点头，抓起电话要通卫戍司令部。蒋介石在电话里“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同意。”

傍晚，在中山舰从黄埔启程返广州的同时，蒋介石在卫队保护下从卫戍司令部来到越秀南路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军经理处。在这里，他开始导演一场

初试锋芒的好戏——孤注一掷，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发动突然事变。

要来的人都来齐了。蒋介石坐了下来，说：“茂如，你把有关情报说一下。”茂如，即是那个在东征战场被蒋介石撤职的团长、如今又被蒋介石提升为师长的王柏龄。今晚，他全副武装、神色活现，想到身负校长的重托，心中非常得意。他诬称：“我得到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李之龙，诱骗校长乘舰回黄埔，在途中劫夫校长，直驶海参威转送俄国。此刻中山舰升火，戒备森严，就是明证。”听完报告，蒋介石面无表情：“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生死，自不足惜；而党和革命的存亡，则刻不容缓。我身负卫戍重任，不能不负起责任。现在宣布全城戒严、立即平叛。各位同志都是总理的忠实信徒，也是校长的忠实同志，务必遵守命令，即刻行动。”

随后，蒋介石向他的亲信打手发布命令：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占领海军局、扣留中山舰等军舰、逮捕李之龙；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团办事处及住所；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住宅；拘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秘密监视邓演达……

午夜3点钟，蒋介石目送最后一批奉命而去的军官。很快，全城军警子弹上膛、刺刀闪闪、警车怪叫，一片杀气腾腾的夜景。蒋介石似有倦意，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片刻。经理处处长徐桴俯身轻声问：“校长，您是不是休息一会儿？”蒋介石睁开眼睛，摇摇头，然后站起来说：“我现在到造币厂去，那里隐蔽些。你坚守在这里，密切注视其他军和叶挺独立团的动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报告。”……

20日凌晨，李之龙和新婚妻子在甜梦中被扣门声惊醒。几个士兵把他们从床上拉下来，拳脚齐上，打了一顿，随后给李之龙胡乱穿上衣服，捆起来押走。街上，李之龙还以为是土匪绑架。他看到有警察巡逻而过，便大声叫喊：“我是海军局长，土匪绑架我，救人呀！”押送他的一个士兵用枪顶着他的后脑骨说：“嘿，是土匪，那就一枪打死你！”

过了几条大街，李之龙被押到第一军经理处。徐桴坐在写字台后面审问他：“你是李之龙吗？”李之龙厉声问道：“为什么捉我？”徐桴冷潮热讽地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校长的事吗？”李之龙有所醒悟。这时陈肇英露面了，他望着李之龙，想到自己既报了公仇又泄了私愤，心里十分得意。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李之龙，你也有今天哪！”又转过脸来吩咐士兵：“校长命令，把这个王八蛋再捆紧些，然后押到造币厂去，校长要亲自提审他。”李之龙被绑得痛入骨心，脸色灰白。

周恩来对蒋介石本是洞烛其奸的。2月上旬，他从汕头赶到广州后，看到蒋介石用驱逐许崇智出境的手法解除王懋功的职务、同右派的来往也比往日频繁得多，便同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张太雷商量此事，要他向苏联顾问团汇报。张太雷于是对苏联顾问报告说：“看来右派在准备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似，到处是谣言。”然而，这种提醒并未引起苏联顾问的警惕。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作小问题，儿戏对之。”3月17日，周恩来又急忙从汕头乘船来到乌云滚滚的广州。第二天，他出席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的宴会，并特地提醒各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密切注视时局的骤变，警惕突然事变。

果然，两天后，中山舰事件发生了。



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当天上午 10 时接到包惠僧报告事件经过的电话。为了营救被捕同志，他不顾安危，带领几个士兵从东山驱车直奔黄华路造币厂。惠东升的部队守住在大门口，缴了周恩来卫士的武器。他看到周恩来走进大门后，恶狠狠地对东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马文车说：“我看姓周的，进得来，就出不去。”马文车狞笑说：“不！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蒋介石没有料到周恩来知道他在这里，更想不到周恩来会直接来找他。他心怀鬼胎，侧目而视，假惺惺地说：“李之龙和中山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逮捕了李之龙并解除中山舰的武装。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为保障他们的安全，也由有关人员集中看管起来。”企图以恶人先告状的手法瞒住周恩来。

周恩来如剑的目光扫过蒋介石阴沉沉的长脸，用手指向那些在押的共产党员，义愤填膺地指出：“蒋校长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又何必捆绑起来呢？这显然是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

蒋介石脸上忽红忽白，张口结舌。他装成生气的样子，向手下的人喝道：“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面对大义凛然的周恩来，他一时为敢下毒手，只好叫惠东升把武器送还周恩来的卫士，令马文车送周恩来出门。

周恩来从造币厂出来后，马上去看望汪精卫。事件发生时，汪精卫正在家里养病，当他从蒋介石打来的电话中得知消息时，气得将话筒摔在地上。他经这一刺激，病情加重，面色苍白地躺在客厅的一张帆布床上，见周恩来进门便颇为费力地坐了起来，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校党代表，蒋介石有何权力在首都宣布戒严、调动军队、发动事变。他事前一点也不报告我，这不是造反吗？……”汪精卫对蒋介石目无“主席”的潜越行为大为震怒，无奈话未说完，禁不侄一阵头晕，倒在帆布床上。周恩来本是来和他商量有关对策的，见此情景，不免忧心如焚：汪主席这种弱不禁风的身体素质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斗得过蒋介石。

下午，周恩来又来到位于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室，与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军事顾问季嘉山研讨对付蒋介石的策略。

兼任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首先分析了时下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及其他各军的矛盾：“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就是第一军，除了第一军和新编的广西李宗仁第七军，广东 6 个军长，没有一个军长买蒋介石的账。‘二大’后，蒋介石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们更不服气。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的资格最老，民国元年就任湖南督军、1924 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他经常说：‘介石的位置提得过高了。’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拒不参加东征，就因为蒋介石是总指挥。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战功卓著，两人对蒋介石代表军委在‘二大’作军事报告、出足风头，感到不满；对他目中无人气很难平。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则是广东‘地头蛇’，也没把客籍的蒋介石瞧在眼里。”

27 岁的区委书记陈延年，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连连点头说：“恩来讲得很对，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孤单的。”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身材不高，体魄健壮，经常穿一件半旧的粗哔叽学生装，很有活动能力。他接着分析了中共方面的力量优势，“我们在各军中均有一定的力量，在各军党代表中，第二军有李富春、第四军在廖乾吾、第六军有林伯渠。第一军的军长虽是何应钦，但真正打起仗来，他能指挥的力量也有限，因为有能力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数是我们的人。此外，我们还有叶挺独立团、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等武

装力量。”

周恩来又说：“广东革命力量雄厚，有几十万有组织的工人以及许多农民自卫军做我们的后盾。总之，共产党人组织革命力量，完全可以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但是，季嘉山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反对周恩来和陈延年的强硬策略。他说：“真的打起仗来，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东的税收比肇庆多10倍。其他各军即使被我争取，也只能是站在中间立场上袖手旁观而已，这样，蒋介石的兵力对付独立团绰绰有余。独立团只能用现有的弹药，根本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在事件前夕还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武器弹药。就这点而言，叶挺独立团就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

在苏联顾问团团团长鲍罗廷回国述职期间，季嘉山任代理团长。他的意见是中共广东区委所不能忽视的。由于观点无法一致，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写信请示上海中共中央。

周恩来、陈延年的分析和主张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在惶惶不可终日、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横下一条心进行这场军事冒险和政治赌博的。事前，他虽然经过反复思考，一环扣一环，一步一个脚印，但也清楚自己的处境是“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掌颠危”，一旦遭到中共和左派力量的联合反击，确是成败难卜。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处于四面楚歌、前后夹击的境地。

黄埔学生看到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和党代表被迫离职，非常痛心和不满。他们在校园内外贴着“批倒新军阀！”等醒目大标语。后院起火了，蒋介石感到心慌，亲自到黄埔召集学生训话，并进行安抚。他指着礼堂“亲爱精诚”的校训，大声说道：“我们遵循总理遗训，精诚团结。如果校长背叛三民主义，成了新军阀，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这时，一位操湖北口音的大个子学生站起来质问：“校长要我们真诚团结，请问我们的汪党代表哪里去了？”当蒋介石讲到“李之龙有罪也是个人问题，不能涉及团体身上”时，另外一位学生也站起来发难：“报告校长，你说不能牵涉到团体，那为何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都逮捕了？”蒋介石面红耳赤，无话可答，而学生们诘难之声仍此起彼伏，“为什么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李之龙要指挥中山舰叛变却为什么不在舰上而在家熟睡呢？”蒋介石找不到台阶下，只好装模作样，在孙中山像的面前立正低头默哀，似乎是承认错误，请求先总理原谅，企图以这种表演，来欺骗纯洁的学生。

他狼狈不堪地从黄埔返回广州后，仍感觉到心有余悸，急忙为自己寻找一条退路。3月25日，他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递交“自请处分”的呈文，说：“惟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夜深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就在蒋介石处于孤立被动的形势下，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否决了中共广东区委的正确意见。陈独秀回电广州，批评周恩来、陈延年，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在共产党人过于“急进”，包办国民党事务太多，“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情况下，蒋介石误信“谣言”的结果。还要周恩来等人，不可把事情闹大，必须妥协退让，维持国共联合战线。陈延年看了中央的指示后，大骂：“老头子，老糊涂、老混蛋。”

由于陈独秀为蒋介石补缀了伪装网，蒋介石也乐于顺水推舟。他宣布中山舰事件是一场“误会”，并释放李之龙等被捕共产党人。接着，又演出了一场愿打和愿挨的“苦肉计”：免去王柏龄第二十师师长职务；责令陈肇英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新编第十七师师长职务并送虎门要塞监禁；对欧阳格、徐桴等人也作了相应的处理。这样，中山舰事件的始作俑者，如今却以第三者的领导身份，“公正”地处理了善后。

4月初，陈独秀派张国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广州解决国共纠纷。在区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以钦差大臣自居，在蛮横压制陈延年、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后，“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守。对蒋介石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

会后，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乘船抵黄埔岛与蒋介石晤谈。张国焘主动寻找妥协办法，摧眉折腰地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彼此仍然精减无间地合作，使广东的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全国统一的革命愿望。”

蒋介石先表示了类似的意向，然后以无可争辩的口气，直截了当地提出：“为了避免中山舰事件之类的‘误会’再度发生，我希望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否则要交出名单。”

张国焘当即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并进而“虚心求教”：“外间都希望蒋先生能与汪先生继续合作，未知蒋先生对此有何意见？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蒋先生的，他们犯有错误，未知蒋先生今后如何教导他们？”

蒋介石对于是否继续和汪精卫合作的问题，含糊其词，没有说死。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因为还要在北伐中做一笔大生意，还需要利用中共的力量。正像周恩来分析的：他在这时与中共“是不敢决然分裂的”，所以，他表示：“黄埔的中共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今后也一定重用他们。”

张国焘和蒋介石谈判结束后，周恩来一方面保留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他向中共黄埔特支传达中央的决定，舌燥唇干地说说服不服气的同志：“为了国共合作，在处理问题时，千万不要草率从事，要听从中央的指示。”随后，他率领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不久，他又遵照中央指示，受蒋介石的委托，在广州大佛寺举办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把退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工作人员编进该班学习，为北伐战争培训骨干人才。在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上，蒋介石还来发表演说，讲什么“撤回政工人员虽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我很诚实地承认我的错误，将来的罪过应归于我一个人身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了这段历史：

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多加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他的处事手腕。对于以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的在黄埔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蒋介石利用陈独秀的畏缩和汪精卫的软弱，改变了事变后曾出现的被动局面，再次获得主动。于是，他决心继续扩大战果。他说什么中山舰事件的

发生，“实在”是因为中共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国民党的疑惧和不满。言外之意，就是要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才能避免今后再有类似事件的发生。为了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以解决国共合作两年来的“纠纷”，他特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该案主要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以上，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党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指示要先经过两党联席会议的讨论。

4月19日，回苏联述职期满的鲍罗廷到了广州，并首先在黄埔岛与蒋介石进行首轮会晤。诡计多端的蒋介石急于从苏联手手中拿到大量的武器和运输装备，即抓住鲍罗廷“喜欢人家托大脚”的特点，吹捧起来：“现在总理不在了，听鲍先生的话就是听总理的话，早在3月21日，我就希望鲍罗廷顾问速回广州。”鲍罗廷是按照斯大林指示，急忙赶回广州修补因季嘉山与蒋介石关系恶化所造成的缺陷的。他听了蒋介石的话，知道他并没有与苏联彻底分裂的意向，心情顿时畅快得多，说：“从前，苏联援助土耳其革命，很多顾问同志都被杀害了。这次中山舰事件，只不过是这个小误会，撤走几个顾问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鲍罗廷心目中重修苏联和蒋介石的合作关系是最重要的，而国共关系以及汪精卫的去留则是次要的。因此，他不仅不同意反击蒋介石，反而把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并进而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

再说“易地就医”的汪精卫，他实际并没有离开广州，而是隐匿起来，观察事态的发展。他希望中共和苏联顾问能压倒蒋介石，以便自己东山再起。当他看到陈独秀和鲍罗廷步步退让，而蒋介石的声势却咄咄逼人，局势无可挽回时，便心灰意懒，于5月11日轻装简从，悄悄离开广州，启程去巴黎。事情也真凑巧，他从天字码头上船时，正遇上第二次受蒋介石冷落、只身离粤的胡汉民也搭乘同一只船去香港。胡、汪二人在同盟会成立时就同为孙中山的助手；孙中山逝世后，却一个成为左派领袖，一个成为右派首领；如今又一同被蒋介石逼走他乡。不过共舟渡海，却无话可谈。

5月15日，在蒋介石把持下，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整理党务案”。他的盟兄张静江被推上中常会主席位置，而蒋介石则兼任中组部长、军人部长。共产党人纷纷辞职，右派因此占了极大优势。

蒋介石殚精竭虑，党同伐异，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扎实，功夫也都用在刀刃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已把国民党的大权抓在手中，这时，他又拉拢了广东军界的头面人物谭延闿。谭延闿与孙中山有深厚感情，谭夫人去世后，孙中山曾介绍小姨子宋美龄给他续弦。谭延闿以自己年老体弱无法消受而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美意，并把宋美龄当作义女看待（若干年后，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了，她没有忘记义父的恩情，把谭延闿的女儿谭祥介绍给陈诚作妻子）。中山舰事件后一个多月，谭延闿在感情上仍倾向于汪精卫。蒋介石为拉拢他，把孙中山生前给自己的书信用上等好纸精印成《孙总理翰墨手迹》，送给谭延闿。谭延闿睹物思人，涕泪交集。当他读到孙中山批评汪精卫的一段话时，感情的天平骤然倾向于蒋介石一边：蒋打击汪，看来是总理生前本意。谭延闿最后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蒋介石的傀儡。

蒋介石继续高唱联俄高调，说“我们不但应该和第三国际联络，而且还承认它是处于指导的地位。对鲍罗廷更是卖力吹捧，悦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听从他的指挥，甚至称“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吹得鲍罗廷心花

怒放。

大批苏联军火运到广州后，周恩来要求鲍罗廷拨给中共 5000 支步枪，遭到拒绝。鲍罗廷要全数送给蒋介石。周恩来怒不可遏：“鲍罗廷被绑票了。”身材高大，棕发绿目的鲍顾问老羞成怒，暴跳如雷。他一语道破了天机：“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命中注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

## 第二章分庭抗礼强弱斗智

### (一)

历史的脚印有抹不掉的斑斑血迹，历史的情绪好像割不断的滔滔江水。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充满着胜利的狂欢和失败的悲歌的岁月。

1926年夏天，时局微妙地向两个互相矛盾的方向发展着。虽然自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共联合战线中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对反对北洋军阀，把革命努力发展到全国范围内，为完成孙中山北伐以统一中国的遗志的行动要求，还是大体一致的。这时，除两广地区以外，国内所有地区几乎都在北洋军阀以及大小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他们听从不同洋主子的指挥，各占一方，相互争战，践踏祖国的河山和人民。经英国和日本的撮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打出“南北讨赤”的旗号，向北进攻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向南进攻广东。

敌我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即将来临。

蒋介石既要极力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又不敢断然与共产党决裂。这个北伐军总司令虽然已经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但是，地位并不稳固、威信也不太高，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中利用中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隐蔽国民党新右派的真面目，唱起“国共合作到底”的高调。他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对师生训话时说：“我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冲突之后，两党诚心诚意地团结起来。”他对周恩来还是和颜悦色，非常礼貌。蒋介石曾单独邀请周恩来长谈，周恩来认浙江同乡，要周恩来在广州待命，表示还要重用他。

中国共产党也看到：蒋介石极力主张北伐是抱有个人企图和目的的，但北伐的主张客观上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对蒋介石采取了最大限度的退让政策，认为，这时的中国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一个人，规劝他，爱护他，简直是像慈母爱护幼子一样地原谅他的错误，希望他能进步。周恩来以革命利益为重，为挽救国民党和蒋介石，委曲求全地同蒋介石打交道，积极开展北伐的准备工作。他积极协助邓演达组建北伐军总政治部，推荐一批有能力的共产党员在总政治部任职，并应邀为“战时政治训练班”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重要讲演。在广州太平餐馆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和亲信王柏龄、刘峙、钱大钧、张治中、俞飞鹏举行的欢送晚宴上，风度翩翩的周恩来举杯衷心预祝他们旗开得胜。

周恩来亲手组建的叶挺独立团是中共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全团2000多人，连以上军官多是共产党员，是一支很能战斗的队伍。为了战胜强大的北洋军阀，北伐前夕，周恩来把这支队伍从肇庆调回广州，然后在司后街叶挺寓所里召开军务会议，命令该团担负起北伐先锋的艰巨任务。周恩来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他指示第四军参谋处长、独立团团团长、共产党员叶挺“要加强中共的纪律，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牺牲精神，与友军亲密合作，打好头阵，为北伐开路。”最后，周恩来满怀豪情地激励大家说：“饮马长江，武汉再见。”

1926年5月下旬，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湘江

两岸，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而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仍远离前线一丝不苟地选择黄道吉日筹备誓师典礼。他把誓师典礼看成开天辟地以来最隆重的典礼，看成树立威信、巩固权力的必经程序。从湖南前线来广州求援兵的将领认为，军火急如星火，刻不容缓，要求马上派兵入湘。蒋介石听后文绉绉、慢吞吞地说：“汤武革命，莫不誓师。”

等到择好黄道吉日，蒋介石还要为物色合适的监誓人和授印人搜索枯肠。誓师典礼意味着国民政府把北伐之权授于蒋介石，监誓和授印的仪节，本应由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分别担任；然而，蒋介石却以为这样还不够隆重。他嫌张静江既无功业、无学业，又无虚名，不过一富翁而已，而谭延闿资格虽老，但实质上也不过是总司令属下的一个军长。蒋介石要求的是一个地位很高，名声很大相当于孙中山那样的人物，但这样的人哪里有呢？最后他选择了吴稚晖。吴稚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孙中山的朋友，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多年，与蔡元培齐名，被北京政府通缉后蛰居上海，以写作为生。他曾发表“不作官”的宣言，颇有清名。

7月9日，烈日炎炎。广州东校场，军旗飘飘，10万军民人头涌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等口号声此起彼伏。金碧辉煌的主席台耸立在北端，孙科高举着孙中山遗像站在中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分悬两边。北伐誓师典礼开始，由吴稚晖监誓和授印，蒋介石宣誓并发表长篇演说。他说：

今日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已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多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月底，蒋介石离穗北上。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随蒋介石踏上北伐的征途。早些日子，这位具有政治家眼光的军事家曾请教周恩来：北伐战争过程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周恩来为解决这一“政治问题”跑了一趟上海，郑重请示党中央。那时陈独秀正在生病住院，与世隔绝。他不识时务地在《向导》周刊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受到党内同志的善意批评，更遭蒋介石恶意攻击。闹得他如槁木死灰般的失意愧丧，心情消沉。因此他对加伦提出的问题不敢答复，而一反往日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竟然“谦虚”地对周恩来说：“你们开个会研究好了。”最后，张国焘向加伦说了模棱两可的两句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反对蒋介石。”

后来，周恩来曾沉痛地回忆了当时中共对蒋介石所采取的自相矛盾的态度所造成的恶果：“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蒋介石地位的提

高。”

蒋介石率司令部全体人员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北上途经韶关、乐昌、郴县、耒阳、衡阳、株州等10余个城镇，历时半个月，于8月11日抵达于一个月前已被北伐军占领的长沙。蒋介石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抵达长沙时，已是凌晨3时，但长沙5万余欢迎群众，在中共的组织下，从炎热的中午，一直等到次日的凌晨3时，迎接北伐军总司令的到来。蒋介石“心

殊感激”地说：“此次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发至长沙，沿途民众放爆致敬，商店公平交易。迷路者则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授食。其对全军溪来与助之诚意，盖有如此者。”

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以夺取武汉，消灭吴佩孚为主要目标、对江西实施监视”的第二期作战方针。

8月14日，天气晴朗，蒋介石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检阅了整装待发的第七、八两军。他骑着枣红战马，缓慢进入主帅位置，第七军长李宗仁居第二，第八军长唐生智排第三，其他高级将领也都分乘骏马相随。将帅们春秋正富，按辔而行，马上英姿，器宇轩昂。首先检阅的是第七军。身穿土制旧军装的广西兵，不仅身材瘦小，而且对操场上的制式操练陌生，对军乐队、仪仗队也无暇多加注意，所以检阅起来着实不够壮观。第七军阅毕，将帅们来到第八军的排头处。官兵身材高大，军服整齐，旗帜鲜明，操场的训练有素。蒋总司令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态度从容肃穆，举手答礼，颇有主帅风度。军队奏乐，声若裂帛，高低疾徐，蒋总司令的坐骑已有些不听调度的样子。紧接军乐队的是号兵队行列。只见队长口令一下，金光一闪，队员们举号吹奏，号声响如春雷，震耳欲聋。蒋总司令坐骑受此惊骇，前蹄高举，大嘶一声，向校场中心狂奔。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勒缰不住，瞬间失掉重心，手足朝天，翻鞍坠地。众将士见状，惊恐失色，不知所措。幸亏蒋总司令只被拉了二丈远，便和狂马脱离。他惊魂未定，气喘吁吁，帽脱靴掉，哗叽军装也沾满污泥。最后，只得一颠一跛地徒步阅兵。

阅兵坠马，蒋介石讳莫如深，以为是不祥之兆。好在北伐健儿横扫干军如秋风卷残叶，才使惴惴不安的总司令心中释然。

8月19日，攻克了北洋军阀汨罗江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平江。“平江失，岳阳不保，武汉亦危。”22日，占领岳阳。随着这座以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吟咏的岳阳楼而著名于世的古城被收复，湘境的北伐战争基本上结束了。战争很快发展到湖北境内。8月27日，北伐军浴血奋战，攻克了鄂南的第一门户——汀泗桥。吴佩孚精锐尽丧，退守贺胜桥，他横刀勒马于桥头督战，企图凭借有利地形、武力与坚固工事，和北伐军决一死战。30日下午，叶挺独立团无坚不摧，率先突破防线，占领贺胜桥，打破吴大帅死守贺胜桥以保武汉的梦想。

攻下贺胜桥，北伐军沿粤汉铁路追击，直捣武汉。吴佩孚为了挽回败局命令部下沿城挖掘战壕，并构筑了坚固的炮兵阵地。9月2日，北伐军陆续到达武昌前线。当天晚上，蒋介石并未分析敌情，不顾武昌城高壕深，易守难攻的地形，强令“限于48小时以内攻下武昌。”北伐军两次强攻，均未能奏效，担任主攻任务的独立团一营几乎全部阵亡，周恩来的好学生、共产党员曹渊营七以身殉职。北伐军只好改变策略，在围困武昌同时，轻取汉口、汉阳，10月10日，被困40天的孤城武昌终被克复了。赫赫一时的吴大帅自此一蹶不振。

湖北战事结束，北伐军主力转向讨伐孙传芳，江西成了北伐的主战场。10月上旬，蒋介石从武昌转入赣境，亲自指挥南昌会战，由于他指挥错误，加上敌人早有准备，北伐军连攻不克，伤亡甚大，被迫停止进攻，撤除南昌之围，等待战机。11月初，随着北伐军主力到来，江西战场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孙传芳的后院失火，局势不稳：浙江省长夏超卒部起义、福建周荫人部下倒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采用加伦之计，先



扫清南昌东南之敌，切断南浔路，然后再攻南昌。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军舰逃回南京。8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孙传芳在江西的部队全线溃退，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彻底动摇了。

对于蒋介石北伐途中的武昌、南昌战役的错误指挥，周恩来曾于10年后——1936年7月9日在陕西白家坪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作过精采的评述。斯诺问周恩来：“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有何评价？”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回答说：

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蒋介石采用了拿破仑的办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依靠猛攻夺取阵地。1926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敌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南昌，蒋介石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伏击地带，致使蒋军大败。

江西战火停息后，北伐军进一步调整作战部署，决定以三路追歼敌军，以唐生智力总指挥的西路军沿京汉铁路对付来自河南之敌；东路军分别由何应钦、白崇禧率领兵分两路向浙江挺进；中路军由蒋介石亲任总指挥自江西沿长江两岸东进。北伐军的战略要旨在于夺取上海、南京，推翻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

## （二）

自从武汉被北伐军攻占后，几年来局促于岭南一隅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势力，便扩展到长江流域，武汉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1926年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亦随之迁武汉办公。

这时，随着北伐之节节胜利，蒋介石收编了不少军阀部队，他的个人势力亦已膨胀到有能力独霸一方、自立为王的境地了。他有感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不利于自己直接摆脱政府，因而纠集了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决意要政府迁到南昌来，达到控制中央的目的。

蒋介石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国民党政府则要收拾他这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南昌与武汉分庭抗礼了。武汉方面为不让蒋介石搞军事独裁，操纵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决定把政权和军权分离，让蒋介石只负责军事上的责任并受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指挥。在南昌的蒋介石则发表演说，对武汉提高党权运动进行攻击，称武汉的“党政”“联席会议”“非法”，“提高党权就是排斥异己；污蔑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他利用手中控制的军权为所欲为，令武汉方面奈何不得。他挪用国民政府的大量金钱，封官晋爵，收编了倒戈的大小军阀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向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右翼“暗送秋波”。

在这种革命形势继续高涨，但革命阵营内的危机与日俱增的复杂局势下，28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秘密从广州乘船到上海，准备策划上海工人起义，解放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上海人民，以革命的海军直接援助和配合北伐战争向东南的进军，并制止蒋介石的反动。

1927年1月上旬，北伐军进攻东南的局势日趋明朗。武汉政府派出的由

程潜指挥的江右军进展缓慢，距上海还十分遥远；而从浙江北上的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则进军神速，已经攻入江苏。上海人民日夜盼望的北伐军只能是蒋介石的部队，而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阶级也早和蒋介石取得默契，要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内外合作地反对共产党”。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周恩来十分沉着、冷静。他考虑到，既要欢迎北伐军，又要反对北伐军的总司令，这是群众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上海人民心目中，蒋介石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就是在中共党内也还没有形成一种浓厚的反蒋气氛。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严格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内部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提高对蒋介石的警惕。同时，他决定放手发展民众运动，使工人、学生、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在中共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控制住上海的政权，使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迫使蒋介石顺从民意。

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占领了杭州。上海总工会发动了全市大罢工。19日早晨，朔风刺骨，春寒料峭，总同盟罢工开始了。繁华热闹的上海，顷刻变了样。电车静静地躺在马路上，浦江上看不到航行的轮船，邮局关闭、工厂的烟囱不冒烟，汽笛不吼叫，熙熙攘攘的南京路显得格外萧条，只有几个穿黑制服的警察和外国巡捕踟蹰街头，打着寒噤。第三天，大罢工转为武装起义。阴险毒辣的蒋介石得悉上海工人起义后，即下令已推进至嘉兴的北伐军停顿下来，故意拖延对上海的进攻，使军阀李宝章腾出手来，全力镇压起义工人。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了。

蒋介石眼中的敌人，已不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而是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他之所以继续向北洋军阀进攻，只是为了争夺个人地盘和势力，增加独霸为王的资本而已。3月9日，赣州、吉安两市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梁一清被杀害；3月16日，九江总工会被袭击；3月23日，安庆总工会被捣毁。

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根据工人的斗争情绪和北伐战争的形势，全面考虑前两次（10月，上海工人举行首次起义）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亲自担负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任，紧张繁忙而又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一幢临街的房子办一间“学校”，作为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他经常身着西装、戴上眼镜，化装成教员的样子来这里“讲课”——召开会议、部署从中央到上海各区的一套严密军事领导体系，听取工人武装纠察队训练情况的汇报；布置有关人员密切注意北伐军的进展情况……。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周恩来了解到工人纠察队人多枪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便用“白皮红心”的计策，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上海军阀政府允许组建一支合法的资本家武装——保卫团，保卫团共有一千多枝枪，分属各工厂的资本家掌握，没有统一编制。参加保卫团的每个人可发制服、枪枝和子弹，周恩来发动一些优秀工人打进去，既能参加军训，又能取得武器，等待时机，配合工人起义。开始，朴素的工人都不愿加入为资本家效劳的保卫团。周恩来爽朗笑问：“我们现在缺少什么？”“缺武器！”工人们回答。周恩来接着说：“对，我们打入保卫团，就是为掌握更多的武器，把保卫团变为我们自己的武装，这就叫做‘白皮红心’策略。”大家听了，深受启发，很快贯彻周恩来的主张。

起义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周恩来密切注视北伐军的动向。他想利用北伐军向上海进军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声势，孤立和分化敌人，迅

速夺取武装起义的胜利。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看到上海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正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之下，他不愿意看到周恩来借北伐军的军威，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不愿意看到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出现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起义而占领上海的局面，他要自己的能力能绝对控制上海的情况下才进军上海。3月3日，他发一份密电：

何总指挥勋鉴：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军队以不越此线为妥。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此类机关，应即勒令取消可也。中正江西。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继续缓慢对上海进军，北伐军渐移于杭嘉湖一带，按兵不动。蒋介石吸取东征进军海陆丰时的教训，深怕北伐军进入上海后成了起义工人的客人。他拒绝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任何联系。

周恩来利用他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影响，想方设法与推进东南的北伐军取得联系。他曾派总工会的章旭庵，利用其兄任北伐军谍报处长的关系直接向白崇禧“报告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及促他们速进兵”。周恩来还亲自写信给何应钦“把口号告诉他”，劝他前进，并说明上海罢工的情况。然而，何应钦、白崇禧对此置之不理。

3月20日，北伐军的前锋已秘密抵达距城区仅15公里的近郊龙华。这时，孙传芳的部队全部撤往江北，代替孙传芳统治上海的奉鲁联军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的革命激情却空前高涨。21日早晨，周恩来从白崇禧司令部一个军事人员的家信中，得悉北伐军预定在20日至22日到达上海的消息，即和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负责人共同研究，一致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果断决定是日中午12时举行同盟总罢工并立即转为武装起义。

初春的阳光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显得格外柔和。中午12时正，南市的钟声响过，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全市工厂的汽笛齐鸣。顿时，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工厂停工，上海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了。平日耀武扬威的反动军警，如今都蜷缩在自己的巢穴里。不敢再出来逞威风了；那些帝国主义的巡警和“包打听”，战栗地仁立在租界华界的交界处。

总罢工立即转为武装起义。罢工工人按照指定时间，从四面八方涌向指定地点集合。然后以武装纠察队为先锋，以广大群众为后援，向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7个区的各敌军事据点发起猛烈进攻，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合到华界参加起义。

闸北宝山南路起义总指挥部办公室中，身穿灰色棉袍西装裤、脚穿黑皮鞋，颈项里围了一条灰色围巾的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工和其他起义负责人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他一会儿伏在西厢房桌子前，在市区地图上一边指划、一边用电话调动武装，发布进攻命令；一会儿又向各区军事联络员们急促地交谈分析敌情，重新组织兵力，向奉鲁联军决战。

工人武装截断了铁路和电线，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自来水公司……致使上海水电交通全部中断。晚上，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6个区的各个警署和兵营被接连攻破，最后全部被占领。只有闸北区守军在铁甲车和火炮的掩护下仍在负隅顽抗。

为就近指挥战斗，掌握战机，周恩来把起义总指挥部移到驻闸北的第五警察署。同时派人到尤华，要求北伐军东路军前线总指挥白崇禧迅速出兵进

攻上海，援助工人起义，但白崇禧按蒋介石的密令仍按兵不动。在失去外援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起义部队作了重新调配，战术作了必要的调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周恩来冒着枪林弹雨，身先士卒，来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亲自抬木头、背沙包和队员一起加固街头工事。突然间敌人的炮弹落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溅满了一身泥土，队员们劝他离开阵地：“周总指挥，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恩来说：“当指挥的怎能老呆在指挥所里？你们不是同样危险吗？”总指挥亲临前线，纠察队员们勇气倍增，终于在22日晚攻克了闸北区，残敌纷纷弃枪而逃。

周恩来指挥上海工人阶级，鏖战两天一夜，终于夺取了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在封建军阀政权崩溃时，诞生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市民政府，上海人民心花怒放，沉浸在胜利和欢乐的海洋之中。

### （三）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早已密谋凭借军事实力在富庶发达的江浙地区建立一个对外联合帝国主义、对内联合反动派，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集团，不能容忍上海工人常备武装和上海市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处心积虑要解除工人武装、镇压上海人民。

1927年3月23日，当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的时候，蒋介石乘“楚谦舰”正经过芜湖，准备“亲赴南京”处理列强炮击和平居民事件。24日早晨，他得悉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的消息后，脸色立即沉了下来。在南京码头，他派出特使上岸去向各国领事“道歉”，自己直达上海。

3月26日“楚谦舰”驶抵上海高昌庙码头，蒋介石由海军司令杨树庄陪同驱车前往龙华的白崇禧司令部，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阶级代表闻讯纷纷前来拜会。租界外国当局派员专程送来特别通行证。他们称赞蒋介石是“唯一有能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上海局面的人物”，是“唯一可以使长江江南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而蒋介石也多次向他们表示友谊：“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尽管目前的障碍使我们不能互相了解、共同澄清局面，但是，我希望可以扫除这些障碍，使中外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

3月29日，蒋介石在《民国日报》发表一篇讲演，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暴露了他建立独裁统治的野心：“以现在中年的历史，中中的地位，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无论什么人想假借一种不落边际的宣传和诋毁，或造出一种不利于革命的空气，或赐我以独裁的名号，或污蔑我是新军阀，以反对中正革命，老实说，这是不行的。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

4月1日开始，蒋介石多次会见刚从欧洲回国的还戴着“国民党左派”桂冠的汪精卫，反复磋商清党分共的问题。两人在“以谁为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蒋介石心急如焚主张汪精卫不必到武汉而在上海立即进行分共。因为蒋介石的势力集中在上海地区，分共的结果必须以蒋为主，奉蒋介石为领袖。他赤裸裸对汪说：“我可以服从你，但你必须听我的话，第一，要将共产党及接近共产党的人看起来。第二，改组中央委员会。”汪精卫则不同意在上海立即分共，主张先到武汉，然后将中央党部和国府迁到南京召开中

央全会解决。汪精卫想到武汉联络集中在那里的拥汪势力，然后由中央全会拥戴他为领袖。他道貌岸然地说：“分共清党，政军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

两人尽管争吵不休，但“分共”的根本利益驱使两人作出先稳住共产党，伺机动手的决定。汪精卫于4月4日会见陈独秀，他别有用心地用国民党右派污蔑中共的谣言来责问陈独秀，试探陈独秀的态度。陈独秀果然中了圈套，极力表明中共的诚意，亲手起草“辟谣”的声明，请汪精卫签名并于第二天联合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革命群众“不听信谣言”。这样，汪精卫借陈独秀提高自己的地位，加重他“领袖实力”的砝码。而蒋介石则利用汪精卫麻痹共产党和上海工人阶级。

麻痹了共产党之后，蒋介石立即在总司令部召见上海黑社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的策略，拨款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和“中华共进会”专门反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武装纠察队。接着，又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孙中山旧居召集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立夫、陈果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秘密召开反共会议，蛊惑人心地叫嚷：“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由于蒋介石倒行逆施，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预感到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3月30日，他在党的特别会议上作报告，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指出上海局势的严重性。他说蒋介石到上海后准备打击的“四个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左派。为此，蒋在国民党内拉住了文武两套人马，文的是建立了一个秘密“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武的是“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四大金刚”。指出：“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要随时随地准备与右派军队发生战斗。”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即看到胜利中潜伏着危机。他一直留在闸北总指挥部整编工人武装，扩大工人纠察队并加强对队员的军政训练，以防不测。蒋介石进入上海后包藏祸心，虎视眈眈，周恩来深感自己力量的单薄，还想通过争取和团结有革命气节的北伐军与工人阶级结成军事联盟，以缓和局势，推迟与蒋介石决斗的日期。这时周恩来与驻在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长薛岳、驻苏州的第二十一师长严重保持着良好关系。薛岳公开保卫工会，第一师与上海总工会关系融洽，兵士与工人经常联欢。蒋介石对此十分害怕，感到正规军一旦与工人武装“联盟”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急忙把薛岳师调离上海，换上由北洋军阀残部改编的周凤歧部队进占闸北。

然而，毋庸讳言，中共对公开提出反蒋的口号仍有所顾虑。因为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幼年的中共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那是触犯“天条”的大事啊！当上海党组织派入到武汉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陈述意见并请求指示时，鲍罗庭主张同蒋介石妥协，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局面。这样尽管周恩来觉察到蒋介石的诡计，并作了一定斗争准备，但是未能采取根本措施来击破蒋介石的阴谋、来摆脱被动挨打并最终惨遭镇压的命运。

4月9日，上海叛变准备停当，蒋介石密令白崇禧、周凤歧以淞沪戒严正副司令的名义执行政变计划，并留下特务处长杨虎协助青红帮打先锋。当天傍晚，他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溜到南京。他要在地导演大屠杀的

惨剧。

4月11日下午，法租界杜月笙公馆，帮会流氓正在设计陷害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江寿华。杜月笙派他的大管家万墨林到闸北湖州会馆，十分“虔诚”向汪寿华送上请帖，请他当晚8时到杜公馆“赴宴”，磋商“要事”。汪寿华明知来者不善，但考虑到此关键时刻，需摸清敌人动向，便不顾个人安危准时赴宴。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杨虎等人见汪寿华只身来到，暗自高兴，上前寒暄几句后，就威胁他交出工人纠察队，汪寿华晓以大义、严词拒绝。张啸林于是使出惯用的流氓手段，大声喊打。埋伏在四周的打手蜂拥而上，将汪寿华打昏后装入麻袋，用汽车运至枫林桥附近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杀害。

杀害汪寿华，使这伙亡命之徒像吸食了鸦片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12日凌晨2时许，他们换上工人服装，戴着印有“工”字的臂章，全副武装，准备上阵，张啸林用上海滩特有流氓腔调叫嚣说：“等我们迈出杜公馆大门一步，就要应生死有命这句老话，碰碰看谁的额骨头高。”杜月笙则假斯文尖着嗓子说：“今天的事，不管成功失败，我们唯有尽心尽力。”

清晨4时，上海滩枪声大作，蒋介石发动的白色恐怖大屠杀开始了……。

上海总工会发布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以示抵抗。但是，上海人民对昨天的同盟者、今天的刽子手的面目还没有看清，上海市民代表会致电蒋介石：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十二日晨四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迫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的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入生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则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著有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决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定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刊赖之。临电不胜迫切特命之至。

4月13日上午，蒋介石对上海确实是“迅赐严命”，但不是“彻底查究”对工会的“横施摧残”，而是密令二师司令部，对要工和请愿的工人群众实行血腥屠杀。这天，天空阴沉，气氛凝重。中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大会。会后10万群众整队去周凤歧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有布置的二师士兵用机关枪向徒手群众扫射。死者尸横满街、伤者纷纷倒地。刽子手杀红了眼，如痴如狂，连逃到天主教堂躲藏的工人也被拉出来枪毙。此时，阴沉的天空，忽然下起稠密的春雨，雨水渗红血水，血水染红雨水，宝山路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上海变成了蒋介石血腥统治的世界。他把周恩来列入通缉名单的第一个，他愿出8万大洋买周恩来的头颅。

二十六军第二师在收缴工人武器前夕，师长斯烈特地派人送信给周恩来，缴请他到第二师司令部谈判。周恩来虽然感到形势紧张，但认为斯烈不会立即动手，便由工人纠察队长顾顺章带着6个卫士陪同来到宝山路二师司

令部。斯烈这时已接到蒋介石逮捕共产党领袖的密令，他缴了周恩来卫士的枪械并扣留周恩来。周恩来双眼怒视斯烈，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你还是总理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做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原先认识周恩来，他的弟弟斯理也是黄埔学生，与周恩来有师生关系。他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如剑的双眼，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恰好这时，坚持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及时赶到。他和周恩来的公私关系都很好，他对二十六军所做所为十分愤慨。他多次反对无效，正准备通电全国并辞职，他看到跟随自己多年的斯烈竟然把周恩来逮捕起来，立刻把斯烈叫到隔壁房间来训斥一顿，并要他立即释放周恩来。一会儿，他俩出来见周恩来，斯烈面有愧色，说：“请周先生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他们在送周恩来出门时一再表示歉意。

不料，逃出狼窝又入虎口。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周恩来为逃避敌人的追捕，曾乘小舟渡过黄浦江潜入较为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避风几天，想不到这里也风声很紧。几名士兵抓住周恩来并押到所在的团部，倾向进步的鲍靖中团长在审问时发现对方竟然是自己在黄埔军校时所敬重的老师、赫赫有名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表面不动声色，打发走士兵，暗中让周恩来换上军装，扮成自己的士兵，一块骑马离开浦东，让周恩来脱险。

#### （四）

面对蒋介石斩尽杀绝的残暴政策，是就地求饶，引颈就戮，还是挺起身来，实行武装反抗？

4月16日，由周恩来、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委，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开会，商讨对蒋介石的新策略。

周恩来首先指出中共的错误和对付蒋介石的根本办法：“我们必须致电武汉党中央，指明：政治上，如继续上海的暴动后的右倾错误，是非常危险的。‘四·一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不过是对我们表面缓和，实际是准备整个的打击，但事前武汉与国际都太缓和，没有好好进行反蒋宣传，汪、陈国共宣言不仅毫无积极意义，而且在民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害。军事上，武汉方面对蒋介石没有积极对付的方案，害怕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而一味主张北伐，自己完全站到软弱地位上。目前应先解决蒋介石，然后才可以北伐。”

赵世炎语调沉重地点明目前局势的严重性：“目前实为中国整个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如果策略稍有差错，关系非常重大。中山舰事件的右倾错误，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中山舰事件还要严重。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

刚从武汉抵达到上海的李立三通报了中央的情况。“武汉对蒋介石的问题，不但军事上犹豫，政治上也发生动摇。中央认为奉方进攻甚烈，如果蒋介石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先行北伐。”

罗亦农汇报了4月15日上海区委紧急会议的情况：“区委一致同意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在昨天会议上恩来指出：蒋介石，在宁、沪等地的统治地位并未稳固，死心塌地为他打仗的仅三万人，其他部队如薛岳帅、严重师都下愿跟蒋介石镇压人民。如果武汉抓住这一时机发来精兵五万，估计一个月

左右即可削平蒋介石。”

陈延年指出，“讨蒋介石的时机，稍纵即逝。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能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缓，资产阶级政权已经稳固，打起来就十分困难了。”

周恩来最后强调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中央的错误：“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这次上海都是如此。对中央的错误，应有根本的解决办法。中央只有完全承认上海与广东两次错误，才能指导全国。”

会后，周恩来亲笔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建议武汉“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周恩来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行径。分析了东征讨蒋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迅速讨蒋，“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因此“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恩来还解释了讨蒋取胜的可能性：国民革命军主力军队有12个军。9个军表示服从武汉，只有3个军受南京指挥。蒋介石“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5个师。”且其中3个师已死伤过半，“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周恩来最后讲明：“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周恩来为挽救革命危机而提出的对蒋策略可谓高瞻远瞩。可惜，武汉争论的结果，却是否定了这一真知的见。鲍罗庭与陈独秀作出了符合汪精卫希望同蒋介石妥协的心理的决定——继续北伐。

由于放弃对主要敌人的讨伐，使蒋介石得以站稳脚跟，巩固反革命政权。苏、浙、皖、闽、粤、桂等广大地区均落入他的独裁的魔掌。

五月下旬，周恩来乘搭英国估和公司的轮船秘密离沪赴汉，继续主持中央军委。这时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在表面上还披着国民党左派的外衣，但还是露出宁汉合流的端倪，周恩来到达武汉，就敏感地察觉到武汉政府将要叛变，国共两党必然分裂，武装斗争不可避免。而陈独秀在右倾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他一厢情愿地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换来的却是一片反共杀声。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他咬牙切齿他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剑子手焉。”大江南北，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

风云突变，烟雨莽苍，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鲜血和挫折给人以痛苦也给人以觉醒，它常常出现历史转折的契机。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调回鲍罗庭，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众望所归的周恩来，被选为新的五人常委之一。7月13日新的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新策略。这时，南昌出现了有利于起义的军事条件，驻南昌的朱培德部队，大部分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兵力单薄。而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受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即贺龙领导的第二千军和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等，正从武汉开到九江、准备集中南昌。

中共中央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建议并委派他担任领导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中旬，贺龙、叶挺的部队从武汉开到九江铁路沿线。汪精卫匆忙于7月24日跑上庐山，和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密谋策划，企图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以解除他们的兵权。在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察觉了这个阴谋，立即秘密会见了贺龙、叶挺。他们在烟水亭附近



的甘棠湖面的一条小船上，商讨了对策，决定下上庐山、不理睬要部队集结德安的命令，立即将部队直开南昌。

7月下旬，周恩来仆仆风尘、不顾疲劳和危险，身穿朴素的中山装，手提一个黑色皮包，在陈赓的护送下，从武汉出发，途经九江于26日秘密到达南昌，住进朱德在花园角二号的寓所。周恩来很快了解南昌敌我情况，日以继夜运筹决策。7月27日，在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周恩来主持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在南昌起义临近爆发的紧急时刻，中央常委张国焘从武汉赶到九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接连给前委发来两封密电，说“暴动宜慎重”，要等他到南昌再决定是否起义。7月30日早晨，他赶到南昌，又提出种种“理由”反对起义。周恩来毅然决然地拒绝他的错误主张，指出：“我党应该站在革命队伍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陈独秀已经把我们害得好苦，再接他的主张搞下去，就要招致亡党之祸。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否则将断送革命。必须按计划进行起义。”31日晨，张国焘又以修改起义宣言为借口，企图继续阻挠起义。面对张国焘的无理纠缠，周恩来抽身断丝，激动地对他说：“宣言我来改”。接着，当机立断，签署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作战命令。

8月1日凌晨2时，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长空，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枝。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东方出现了曙光。经过战斗洗礼的南昌城，生机勃勃。鲜红的旗帜，迎风飘扬在总指挥部的大楼顶上。颈系红领带的战士，豪迈地进行在大街上。胜利的欢乐气氛溢满全城。指挥所里，周恩来扬起两道浓黑的眉毛和一对晶亮的眼睛，安详地微笑着。虽然一脸兴奋的神色，但可以看出，为了起义的胜利而呕心沥血，他已经有几夜没睡觉了。在胜利声中，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由周恩来宋庆龄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周恩来最后审定的《八一宣言》，提出毫不妥协地打倒蒋介石新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改革，维护工农利益等政治主张。周恩来还发布了《通缉蒋介石令》、《通缉汪精卫令》。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南京和武汉随即调兵遣将，向南昌反扑，欲置起义军于死地而后快。汪精卫听到南昌起义消息后，从庐山赶回武汉，“心摧发指”地大骂：“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

因“二期北伐”败绩，引起多方不满，而采取“以退为进”策略，“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在表面上悠然于山水之间，实际上一刻也未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直指广东，使他心急如焚。蒋介石对于和江西接壤3000余里，历来军政变动互相影响的战略后方广东，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尤其当他确知与自己尚存芥蒂的汪精卫对周恩来挺进广东乐得“拱手相送”时，便立即相应采取措施，急令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李济深加强粤湘边界、粤赣边界警戒，并主动进入赣境，阻截周恩来。李济深把两广反动军队4万人编为左中右三路，分别由范石生、黄绍竑、钱大钧为总指挥，全力阻击。

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打了一些胜仗。他们一心想打回广东，再次举行北伐，因而没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着手建立根据地。9月下旬，起义

部队在潮汕同优势敌军的战斗中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流沙天后庙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南昌起义的擎天柱周恩来病魔缠身，高烧40度，由担架抬来主持会议。他首先就战事失利作了检讨并部署善后工作：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坚持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按中央指示，分别向海口撤退，然后赴香港、上海。他最后以坚毅的目光巡视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我不能离开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

在敌人疯狂追捕的艰难环境中，周恩来带着重病之躯转移到陆丰南塘黄盾寨。周恩来兴奋他说：“这就好了，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猛烈燃烧起来了。”然而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有时因高烧加上发疟疾而神志不清，必须迅速转移到香港就医。10月底，周恩来在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以及叶挺、聂荣臻等的护送下，乘木船赴香港。

9月底，住在溪口的蒋介石脾气很躁，对亲信侍从往往滥发脾气，妄加指责。有一次，蒋小品烧了一只鸡汁芋艿，蒋吃得津津有味，不觉多吃了一些。当他伸手着孟副官添饭时，似觉过饱，就问孟添过几次？孟答已添过两次，蒋介石即离席回卧室休息。一会儿因肚饱难受，他怒气冲冲地将孟叫到卧室大骂：“你是个饭桶！我叫你添饭你就添，难道你没有发觉我吃饱了吗？”有时他心里不高兴，就戴着白手套去抚摸窗栏门档角落，发现白手套有些污渍，对着侍从者臭骂一顿，以泄胸中闷气。

后来蒋介石获悉周恩来于潮汕败局已定，当即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心情随之舒畅愉快。在张群等人陪同下，由上海乘日轮“上海丸”前往日本。10月4日，蒋介石在神户有马温泉拜见未老太太并送去宋美龄的订婚戒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约达成之后，在日本立即开始了频繁的政治活动。10月13日，蒋介石在东京拜会了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的首领山头满，亲笔书赠“亲如一家”条幅。山头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蒋介石对于共产党，不管在国内或者国外，一定要加以排斥的。”

11月10日，即周恩来十万火急从香港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第三天，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

### 第三章万里坎途围追截堵

#### (一)

1931年12月的一天清晨，黄浦江上空袭来的湿漉漉寒雾，笼罩着上海市区。周恩来习惯地早早起了床，轻声地唤醒邓颖超。然后，他走到窗前朝外望去：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宽阔的街道隐没在一片朦朦的灰白色中。

为了革命，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什么安宁的家庭生活。1925年8月8日，这对在学生运动中相识、在革命风云中相爱了6年的恋人，于广州一个很简朴的小房子里结婚了。从此，他们生死相托、携手奋进。东征时期，邓颖超曾与廖仲愷夫人何复凝、蒋介石夫人陈洁如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问将士；1927年3月21日，他在上海指挥工人起义的这一天，在广州的她却在经受一场磨难——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难产窒息而不幸夭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差点落入敌手；而她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时，因产后住在医院里，情况也非常危急，在医护人员掩护下她化装出院。直到5月他与她才在上海见了面。夫妻相见，席未暇暖，5月下旬，他动身到武汉去开展革命工作，她也于6月到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危在旦夕。7月下旬，他经九江赴南昌准备武装起义，两人又在惊涛恶浪中分子了：一个转战在南昌起义后艰难险阻的征途中；一个坚持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两人都是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政权所掌握的“要犯”。直到这年冬天，他俩才在上海重逢。……

今天，周恩来又要离开战斗了几年的大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直接领导工农武装与蒋介石独裁统治作生死斗争。

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已做好动身的准备。他满脸胡须，头戴鸭舌帽，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胸上装和深灰色洋布新裤，脚趿一双厚底木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10岁左右，像40岁的样子。他面对镜子，一面端详着自己，一面问身边的邓颖超：“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我这个广州客人的破绽吧？”邓颖超正在为他收拾行装，她提醒周恩来：“你的广州话不太好，在船上不要说话，当哑巴最妥。”两人爽朗地大笑起来。

外滩的海关大钟响了10下，周恩来与邓颖超握手告别。在交通员“小广东”的护送下，乘坐三轮车赶往十六铺码头，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英国小火轮。去年秋天，周恩来为沟通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指示中央交通局开辟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水定，到达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如今，周恩来沿着这条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的秘密通道，战胜恶水猛兽，冲破黑暗，进入苏区。

12月22日，周恩来抵福建长汀，隔天来到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他给上海临时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伍豪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就在周恩来到达长汀的那一天，被迫下野的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从南京返回溪口老家。

矢志“剿灭赤祸”的蒋介石自1930年冬天开始，共用精兵60万，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规模地“围剿”中央苏区，1931年9月18日，当他行色匆匆乘“永绥舰”离宁赴赣，再次督师“剿共”时，日寇公然炮击沈阳，同时进攻吉林、黑龙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石头城里的党国大员慌乱一

团，21日蒋介石姗姗回宁，他密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几个月内日寇即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坐视东北沦陷，姑且勿论这是军机失误，或是他对日军的强势有所介怀，恐怕正面冲突，损兵折将，但无论如何天理不容，大失党心、民心，无论如何他是需要有所交代的。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要他下野的呼声很高，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及各地一片抗日请愿的狂潮下，蒋介石被迫自动提出下野。

与此同时，国民党元老们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号召，奔走调停，终于使各方面达成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协议，推“年高德劭”的林森力主席，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常委，1932年元旦就职。蒋介石这时只以中央军委姿态出现。军机要事，一概推说已是下野之身，不便随意云云。军政大事，可谓群龙无首，时局更乱了。

1月28日，日寇继九·一八之后，又在上海闸北挑起战衅，企图开辟第二战场。驻沪的十九路军不顾军令起而应战，全国人心大力振奋。十九路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大挫日军的骄横霸气。“一·二八”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再次独揽军事大权。

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叫嚷“救国必先剿共，对共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他们，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他们。”

6月18日，他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湘赣5省“清剿”军事会议，确定了“围剿”苏区的部署：第一步，对中央根据地暂取守势，先解决鄂豫皖和湘鄂根据地；第二步，集中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不能成功，誓当成仁！”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准备进攻鄂豫皖苏区。中共在该区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对敌军“进剿”毫无准备，一味坚持“坚决进攻，包围武汉，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命令红军出击京广线，围攻麻城，逼进黄陂，威胁武汉。8月，当敌军向根据地内实行总攻击，本来已被张国焘弄得十分疲惫的红军急促应战，陷入被动局面。9月中旬，张国焘致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上海临时中央不知所措，将电报转给在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周恩来代表中央即复电张国焘，指示：“为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充分地发挥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的一点后，迅速转移至另一点，以迅速、果断、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张国焘拒不执行这一正确方针，他由开始轻敌一变而为惧敌。10月，未经中央批准，即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越过京汉线向西转移到川北。

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进攻湘鄂苏区。由于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贯彻“左”倾冒险主义，拒绝贺龙关于集中主力转移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决定分兵把守策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曾去电说：“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宜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选择敌人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打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但夏曦不听，仍然坚持分兵作战的意见，9月，苏区腹地被敌占领，损失惨重，只好退出湘鄂苏区，转战湘鄂川黔边境。

蒋介石赢了第一步棋后，乘初战得手的声势，又投下第二着棋。1933年

1月，他集中24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50万人兵分3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

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重的。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左”倾中央从上海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指责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采取了“单纯防御”、“游击主义”的方针，要求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能“重复过去的消极态度”。按照临时中央指示，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开展了“无情打击”，旨在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权力，以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会议还强调“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方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会议中途从前方飞马赶来出席，他在做会议结论时，对前方在战争指导上与临时中央的不合之处，主动承担了责任，维护了毛泽东。对“左”倾中央提出的“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指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提出了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的两项方案，即或由他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在前方协助；或由毛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他则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是，后来，对主持战争有兴趣的毛泽东还是调回后方“养病”，职务也被撤销了。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刚开始，“左”倾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直接干预战事，更增加反“围剿”的困难。博古等人既不懂军事、又不上前线，不顾客观实际，敌我兵力之巨大悬殊（中央红军主力不过4万人），发出了强硬命令，要红军集中主力，转移到抚河西岸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临前线，担任指挥战争的重任。他对这种“左”倾错误决策进行坚决抵制并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制定了“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等灵活机动的反“围剿”战略战术。1月底，周恩来致电博古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脱离实际的武断命令，并分析了“强攻坚城”的五不利，“暴露企图”、“易受夹击”、“损伤大”，“不能筹款”和“耗费时日”。电报中还指出攻城夺地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而主张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只有消灭敌人主力，才“是取得攻城的先决条件”，因为“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

兵力，攻坚下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在电报的末尾，周恩来以无私无畏的气魄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博古等人说：“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

这时，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中路军以抚州（临川）为中心，用3个纵队共10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中央苏区包围和截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周恩来、朱德判断出敌之行动意图，命令一、三、五军团及红十一军等部队，乘敌人各路军集中和准备未完成时，于2月1日迅速“佯攻南丰”以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打乱敌人的计划，以便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围攻南丰果然调动敌军。2月7日下午，周恩来收到参谋送来的情报：陈诚沿抚河向广昌推进。周恩来即同朱德研究，毅然“放弃”南丰，转而消灭敌人的援兵。主力红军撤南丰之围后，折而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的山地隐蔽集结，待机破敌。行军途中周恩来对朱德说：“战国春秋的孙武，曾讥笑带兵的人不懂得有进有退。在战争中，以退为进、迟

中求进，取得胜利，我想这是军事上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对于掌握战争主动权，是十分紧要的。”

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敌人则下明了红军的行动。增援南丰的敌军主力之第一纵队的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仍继续向南丰挺进，远离其第二、第三纵队，孤军深入，翼侧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逼近了红军的集中地。2月27日拂晓，这两个师钻入红军设下的口袋——宜黄县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将其全部歼灭，并生俘了五十二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长陈时骥。

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均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全部用最新式的德国造的“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装备起来的。因此，在南昌督战的蒋介石得知这两师被歼时，气急败坏，即用飞机到抚州上空向前线总指挥陈诚空投手谕，大骂陈诚：“如果不击退赣匪，即不要回来见总司令的面。”他并令陈诚马上改变进攻战术：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垂头丧气地叹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为挽救其颓势，3月15日，敌军分成两个梯队，取道新丰、甘竹，继续向广昌方向进攻，急于从中间突破红军防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使粤、闽左、右两军前进、收到合围的效果。

周恩来仍坚持“各个击破”的原则，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和吸引敌先头部队向广昌东进，然后以主力截断敌人后尾的两个师（第十一师和第九师），相机歼灭。3月21日，红军在东肢地区乘大雾向敌军发起攻击，激战1天，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师长肖乾重伤毙命；歼敌第九师小部，其余敌军乘夜溃退黄陂。敌先头部队也仓皇退往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在周恩来的英明指挥下，红军历时50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3月底，天气晴朗，风和日暖，周恩来率领红军从前线浩浩荡荡地返回瑞金。一路上，人们挥舞花束彩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胜利归来的子弟兵。周恩来看到这感人至深的情景，激动地对身旁的朱德说：“听说古时送行到十里长亭，算是深情厚谊了。可跟眼前比，那又算得什么？现在何止十里、二十里。真是凯旋百里迎亲人，情更深谊更长啊！”

蒋介石的惨败是空前的。他的3个精锐师全部被消灭、大量新式武器被缴获，而且，使得中共的力量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地跨湘赣闽粤四省且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共有10万平方公里，300多万人口；中央红军达10多万人，全国红军则有30多万人，全国共产党员也有30万人。这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黯然销魂地承认：“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失败过。此次挫折，凄惨异常，乃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 （二）

“匡庐奇秀甲天下”。庐山风光，奇山怪石，峡谷飞瀑，苍松翠柏，宛如人间仙境。但是，此刻却乌云密布，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四“剿”红军惨败后，军事专家柳维垣和戴岳向蒋介石献计：老一套的作战方法，无法战胜擅长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共匪”，必须改弦更张。蒋介石采纳两位“军师”的建议，从1933年7月开始，苦心经营“庐山军官训练团”，轮训了7000多名蒋系军官。

他聘请德国军事家赛克特为首席顾问，重点研究堡垒主义，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的战法。蒋介石尽可能抽出时间来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耳提面命。他说：“国家大患不在日寇而在江西的土匪。剿共不成亡于俄，抗日下成忘于倭，亡于倭尚可图恢复、忘于俄永世不复翻身。”凡经过严格考核毕业的军官均能得到蒋介石所赠的一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的所谓“军人魂”短剑。

9月，蒋介石结束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工作后。即在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团的参与谋划下倾全国人力物力，调动正规军60万人和地方武装40万人、配有飞机200架，四面包围中央苏区。

10月中旬，蒋介石由南昌行营出发，到达临川亲自督战。他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改变过去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策略，以战略攻势和战术守势原则，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竭泽而渔”。

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下的党中央，在这次反“围剿”中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军事方针。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深得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信任和重用，独揽红军的指挥大权。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李德常常是收到敌我态势报告后，没有作认真的实地调查，就凭借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书本知识，进行教条式的瞎指挥。他“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冥思苦想，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用尺子比量着，然后就口述意见，让伍修权同志起草电文。”“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哨兵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一个碉堡配置在什么地方，这些细节他都作了规定，然后在电话里（当时通讯相当落后，电话时通时断）通知部队按地图标定执行。当时我们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较大，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方名都不准。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给部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加上李德不了解实际情况，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心中无数、手忙脚乱，结果贻误了许多战机。”

战争一开始，敌人占领了北线的黎川。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一地的丧失，认为这等于被敌人打开了苏区北面的门户，因而必须夺回黎川，保住“国门”。他们命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的硝石、资溪桥等自区敌人的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

11月，厌恶内战、要求抗日的国民党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鼎等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被迫改变原来的“进剿”计划，决定先“收平”闽变，再“围剿”红军。于是，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从江西调9个师，从宁、杭等地抽调2个师去福建围攻第十九路军。

蒋介石嫡系部队大部入闽，江浙一带兵力顿时空虚，因此，蒋介石的“围剿”计划被打乱了。这是一个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打破敌人“围剿”的天赐良机。毛泽东建议乘敌“围剿”力量削弱的机会，红军主力应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挺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芜湖、南昌、福州之间，转入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后方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的地带寻找机会作战。这就能迫使蒋介石的军队回援江浙，调回部队去守卫老巢；红军就能乘此机会，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周恩来主张：红军必须主动出击，痛歼途经资溪、光泽南下入闽的国民党军队，借以支援第十九路军。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计谋，正抓住蒋介石的要害，是扭转时局的关键一着。据蒋介石的知情人透露：蒋介石很害怕红军经过闽北，突进到浙、皖、苏一带去，尤其害怕红军同第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他。为此，他日夜坐卧不安，神色异常紧张，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忽而嘶着嗓子唱起《剿匪手册》中的军歌，忽而又急呼身边的侍从们去赶快寻找有关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

然而，博古、李德根本不懂得利用国民党营垒内部的矛盾，反而把中间派别看成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他俩不但不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日反蒋行动，反而说他们是玩弄“欺骗民众的把戏，”因而要“最严格的、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李德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因此，他们没有在军事上给十九路军以积极的援助和配合，没有利用有利形势，向敌人主动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结果1934年1月蒋介石在顺利地抽兵镇压了十九路军之后，将国民党人闽各部改编为东路军，再次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之势。一时出现的有利形势丧失殆尽。

接着，蒋介石集中全力，继续步步力营，堡垒推进，逐步地分割与压缩中央苏区。

4月初，蒋介石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占领中央苏区腹地，集中主力正面进攻苏区的北面真正门户——广昌。而李德的部署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9个师开赴广昌，在广昌城外构筑坚固的3道防线，加固阵地，摆出决战姿态。蒋介石在侦悉这一确凿情报后，立即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纠集11个师的兵力，由北南下。同时，还把从德国购买的大炮、轻重机枪、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调供前线使用，并派从德国请来的军事顾问赛克特上前线，协助陈诚指挥空地、炮联合作战。一场敌强我弱、“乞丐向龙玉比宝”式的消耗战开始了。经过4个月的恶战，红军损失惨重。8月底，红军被迫全部撤出广昌县。

广昌战役后敌人叫嚷：“门户一开，堂奥难保。”蒋介石兵分6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进攻。李德继续实行防御中的堡垒主义，6路分兵，全线防御，“短促击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逐渐烧向中央苏区的心脏地区，内线作战已极小有胜利的可能，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中共中央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处理军事问题。

在中央军委所在地云石山梅坑，“三人团”之间曾发生了一场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秘密谈话。30多岁的周恩来这时已留起有几寸长的黑胡须，他闪着—双精明的眼睛严肃他说：“该是决定突围的时候啦！”博古和李德对实行战略转移显得优柔寡断：一方面认为需要突围转移；另一方面却企图用一切力量来捍卫中区，同敌继续拼消耗，争取战役上的大胜利来改变战局。

李德在房间里踱步不止。他一边凝视地图，一边讲道：“国际6月来信讲明，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考虑退出中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吗？放弃中区可不是小事，必须请示国际。”

周恩来紧盯着博古讲道：“同国际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怎么请示？何



况已经过几十月，情况又有了变化嘛！我们应独立决定。你负总责，要拿主意。”

博古犹豫着，由于战争的连续失利，他对李德的绝对信任也有所动摇。他感到自己的责任太重了，已经不是自己那 27 岁的肩头所能承担得了的。他试探着讲：“要不要再打一仗看看，也许战局还有转机。同时，我们也加紧准备转移。”

周恩来正色道，“博古同志，我们可不要抱侥幸心理，现在几个军团各守一方，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大量歼灭敌人，而只会被敌人所消耗。陈济棠最近有与我秘密谈判停战的迹象，因此，目前南线还有一段口子可以利用，等局面更不利的时候，再转移损失就大了。”

在周恩来的强争力辩下，博古终于作出了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计划来：“如两个星期内再收不到国际指示，我们就自行决定。我负责各机关拟出随行干部的名单，你们负责军事上的事吧！”

“少数人秘而不宣”的长征准备工作在仓促地进行着，连很多高级领导人也不知道，但蒋介石却知道了中央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

南京，秋空爽朗，金风飒飒。青翠欲滴的紫金山北麓宋美龄的一座心爱的别墅里，蒋介石正在会见一位极其重要的客人、美国驻华公使纳尔逊·詹森。

蒋介石身着长袍白褂，因长年“剿共”奔波显得面有倦色。宋美龄担任译员，她身着缎子旗袍，容光焕发。公使感到，蒋夫人的魅力和风采同蒋介石的老气横秋相比是很不协调的。

蒋介石呷了一口白开水后，缓慢而清楚地回答公使的问题：“本次剿共已近一年了。目前，国军已全线逼近匪之中心区域。”然后以奴才乞求主子施舍的口气说，“日本此刻在华北和上海都在对我们紧逼，只怕在此‘剿匪’军事大功垂成之际，发生事变。切望关键时间能得贵国的全力支援。”

“请委员长相信，合众国永远是国民政府的好朋友。我们将继续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力争不使日本在此剿匪的关键时刻捣乱。同时，美国国会已批准政府贷给中国 4000 余万美元的航空借款，其中的一半直接提供军用飞机。数达 800 余架。”公使沙哑的嗓音讲道。

蒋介石喜形于色，公使又从黑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恩赐般地递给宋美龄。

这是一份由美国驻华武官致国务院的报告副本。宋美龄择其要点简要地翻译给蒋介石听：

“战略专家判断，江西共军在日前态势下已不可能支持一个月以上，美国驻华武官根据空中侦察照片分析，江西共军有集结实围的企图。但突围也不能使他们避免至少被大大削弱的命运。很可能，苏维埃的浪潮会从此在中国平息下去。”

像垂死的禾草突然得到甘霖，蒋介石忽然兴奋起来，眼珠发亮：“江西的赤匪顶不住啦？”最近几十月来，尽管战地指挥官和幕僚参谋不断上报战果，判断红军已难以支持，但他最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今天，他才确信自己赢了。他深信美国人的话是有充分根据的。

“对”。詹森公使一反稳重的常态，也高声讲道，“美国政府切望委员长一鼓作气，全力阻击红军突围，力求全歼其于赣境，以根绝中国的共产主义。”

送走詹森公使。蒋介石返回客厅，侧身坐在沙发上。他感到周身热血沸腾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撞击着他的心扉：“五年心血，一朝成功呀！多少回失望，多少回震怒，多少个下眠之夜，今天真的苦尽甘来了。”突然他似乎想到一件重要事情，像触电似的猛地站起来。

当天晚上，蒋介石召集高级军事幕僚研究对江西红军的最后“围剿”计划。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沾沾自喜地介绍江西战局：“国军北、东、西三路大军已全面逼近红军中心瑞金……。”

“南路如何？”蒋介石绷着脸，打断了熊式辉的话。

“自从占领了钨门岭后，他们有几十月不进攻了。”

“哦。”蒋介石应了一声，然后吩咐道：“给陈济棠发电，要他加紧进攻，打下会昌把会昌划给广东军防区，打下瑞金也一样。”

蒋介石嘴上虽然这么讲，心里却在盘算：“该死的陈济棠，占领个小山头就不思进取，还一个劲要经费和军火，下知安的什么心？”

### （三）

粤系军阀陈济棠，为维护 and 巩固他的“南天王”地位，一直和蒋介石勾心斗角。第四次“围剿”红军前，蒋介石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奉命，把粤军主力调往赣南粤北，封锁赣粤边境。他一方面采取阳奉阴违，虚张声势，避实就虚，谎报战果的做法，有意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同红军保持秘密联系，想借助红军的力量同蒋介石抗衡。他曾找到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在广州的内弟作为联络媒介。

周恩来和朱德在看到这一情报后，决心利用蒋陈矛盾。“三人团”那次会谈后，周恩来即同意陈济棠的代表到瑞金来。

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陈济棠的高级参谋徐某专程来瑞金面见周恩来。

一见面，周恩来就觉得来人有些面熟。这时，徐参谋快步上前同周恩来握手，叫声“周主任”后，递交陈济棠“面交周恩来总政委”的亲笔信。原来，他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学生。

周恩来态度开朗，雍容大度。他双手接过信函后，打了个手势，让徐参谋在木椅上坐下来。周恩来从容不迫地拆开信封。陈济棠在信中说：“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3人为谈判代表，建议贵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徐参谋前往商定谈判时间、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

周恩来看完信后，徐参谋开始陈述了一番自己对周恩来的敬慕之情，接着谨慎地阐明来意：“我们陈总司令详读贵方提出的‘抗日救国六条行动纲领’，很受教益，愿同贵方进行秘密谈判。详细情况他在信里已说明。学生前来时，受陈总司令单独召见并反复叮嘱：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万不要误事。信函一定要面交周恩来先生，速去速回。”

周恩来静静地听他讲完、微微点了头，郑重地说：“请你转告南线总指挥陈济棠先生，红军赞成和粤军谈判，但必须绝对保守秘密。”

10月初，周恩来派遣何长江、潘汉年南下与粤军谈判。陈济棠出门派了一个连到钨门岭外迎接他们。于是，红军代表坐着粤军士兵抬的大花轿，穿过钨门岭，向寻乌县一个寂静的山村走去。在路上一位认识何长工的粤军连

长说：“不要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我们打败你们，捞不到什么油水，你们打败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啃几根甘蔗。”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从第二天开始，持续三天，何长工、潘汉年开始和杨幼敏、黄旭初、黄质文秘密谈判。达成了“同盟停战、解除封锁、相互借道，各撤退40华里”的协议。谈判快要结束时，何长工收到周恩来的一封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杨幼敏敏感地猜到电报的隐义，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机灵地巧辞掩饰：“这是询问谈判是否成功？和平鸽上天了吗？”

谈判结束后，粤军骑兵连把何长工和潘汉年护送到会昌。这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云山转移到于都，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干部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风趣而满意地说：“好，这次工作算是做到家了，你喂的鸽子，总算脱出牢笼，从此要在新的天空飞翔了。谈判的结果，对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将会起到重大作用。”

晚秋风寒，山岭一片枯黄，像是满怀忧愁。中央红军马上就要离开这块经过多年流血奋斗换来的自由土地。

博古、李德乘机甩掉他们不喜欢的干部。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等被留下来了。开始李德和博古甚至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只是在遭到周恩来的激烈反对才罢休的。周恩来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不让他随军行动，军心难服啊！”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力争，毛泽东被留下，日后的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也许不能实现，中国现代历史可能成为另一样了。

10月10日，在浓重的离情别绪气氛中，中央红军8万人踏上了万里坎途。

博古和李德缺乏主力部队大规模战略转移的经验，一心想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结合，放下行李后，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于是，部署了一次大搬家式的长征，后方机关有1万人和1000多副担架，极力庞大，各军团机构臃肿，携带了大量辎重，包括需要十几人抬的笨重的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X光机械，大批的《红星报》的旧报纸，等等坛坛罐罐。几个主力兵团分别在前锋、后面和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为隐蔽红军意图，避免敌机轰炸，中央红军采取爬大山和夜行军。每当夜幕降临，8万多人的队伍就出现在现在五岭山脉那羊肠小道上。队伍拥挤不堪，停停走走，每天只走几十里路，有时一夜才翻过一座大山。这样的军事部署和行军速度面对着有现代化武器和交通工具的敌人，前途确实堪忧。

蒋介石获知中央红军突围行动后，便着手部署堵截红军的军事行动。10月下旬，蒋介石命令陈济棠在江西南部的赣州、南康、信丰、安远、筠门岭、会昌一线构筑一道突不破的“钢铁封锁线”。

周恩来根据与粤军达成的“相互借道”的协议，派人通知陈济棠。陈济棠即在红军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40里的通道。25日，红军胜利渡过信丰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红军继续西进，蒋介石急令何键和陈济棠在湘南的桂东、汝城和粤北的仁化城口一线布置了第二封锁线。11月初，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没有派兵重点阻截，只图自保；湘敌受到红军多次打击，心颤胆寒；而蒋介石嫡系部队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敌人的第二封锁线又被红军所突破。

11月6日，国民党行营发布紧急“堵剿”电令。该电令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据此对“堵剿”红军作了具体部署，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的湘境内一段——良田到宜章之间，设立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乘敌人兵力还未部署完毕，选择了敌人较弱的宜章、嘉禾、临武突围，越过粤汉铁路。

蒋介石对红军连续突破封锁线，颇为恼火。11月12日，他急急忙忙赶到南昌，在南昌行营和他的幕僚们加紧策划“追剿”方案。他委任湘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将他进入湘南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纵队也统归何键指挥。蒋介石和何键拼凑了约40万大军，在湘江及其附近地区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计划：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第二步，万一第一计划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之滨。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希望手下各头目能认真贯彻他的围迫堵截计划，特地在电令中写上古代军事家尉缭子名言：“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从宜章出发。向潇水西岸的大渡口道县西进。这时敌王东原部在追击红军，薛岳、李云杰亦正向潇水西岸布防。红四团和红五团抢在敌人的前面于11月18日占领了道县，使中央军委纵队和各军团胜利渡过潇水。蒋介石的第一步计划落空了。

中央红军渡过潇水，锋芒直指湘江。这时敌人纠集了20个师的兵力，向红军蜂拥而来，逐步地紧缩包围圈。红军周围的敌情虽然严重，但是，蒋介石和湘、桂各军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蒋介石企图达到“一箭双雕”：既想歼灭红军，又想乘机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而地方军阀则既怕红军深入其统治区，又怕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进，攫取他们的统治地盘。李宗仁认为，蒋介石“迫使共军人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可有借口入占广西，用心极其险恶”。

11月下旬，当左路红军向湘、桂边境的江华、永明前进时，广西的富川、恭城等地，顿时暴露在红军的兵锋前。桂敌白崇禧害怕红军深入广西，同时害怕蒋介石的“追军”跟进广西，占其地盘，因而急忙放弃全州、兴安、灌阳防线，将部队撤向恭城、富川、龙虎关一带。这时湘敌刘建绪的部队还没有赶到全州，全州兴安一带的敌人兵力顿时空虚，是红军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如果红军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动作迅速，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极其难得的有利时机，抢先渡过湘江的。可是，博古和李德不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舍不得轻装前进，仍然龟行蛙步，动作迟缓，以致痛失良机。

湘敌刘建绪获悉白崇禧“闪开大道，让红军人湘”，马上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气急败坏，即致电李、白，严厉斥责，“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殊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灭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

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各路敌军集中全力向红军追围堵截，其嫡系和桂系空军轮番出动轰炸红军在界首的浮桥和行进中的部队。敌机撒下传单公开叫嚣：“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的天罗地网。”

红军的牺牲越来越严重。指战员们希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能走快一些，快点渡过湘江，因为他们走得快一点，就可以减少伤亡和流血！但是，

李德和博古仍然舍不得轻装，仍然像“小脚女人”一样，按常规走路，70多公里的大道整整走了4天。

庞大而慢动作的红军后方机关被掩护在约100乡里长的狭小甬道里，缓慢地向湘江前进，直到11月29日，才开始在湘江渡口过江。

激战达一周之久的湘江西岸流血大搏斗，是红军有史以来的大惨败，减员5万多人。它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最后破产。

随着湘江战役的惨败，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者更加不满。博古深感责任重大，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在行军途中，他痛心疾首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我确实无法向全党交代，向国际交代。”言毕，把手伸到腰间抽出手枪要自杀。幸亏周恩来早有提防，手疾眼快，把手枪一把夺过来，说：“不要激动！博古，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说着，将手枪交给博古的警卫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到博古颓然靠在大树上，一声下吭，也严肃他说：“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者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 (四)

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北部的山区。这里山势连绵，峰峦重叠，悬崖峭壁。途经险崖绝处，真有“风从人面起，云倚马头生”之感。红军向何处去？回头看血迹斑斑，朝前望云山茫茫。

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制订了围歼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岗以南；永川、桂村以西；龙胜、洪州以北”的计划。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仍是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他在追剿的兵力重点摆在湘西。在这个方向上，他摆成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何键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在湘西地区修筑了4道防御碉堡线，修成21座碉堡；同时加强了集中指挥，他把5路兵力重新编成为两个兵团，分别以刘建绪和薛岳为兵团总指挥。蒋介石和何键已经布置好袋口，等红军去钻。相反，从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兵力最弱，名义上有王家烈为军长的一个军人马，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领无能，兵有“双枪”。

1934年12月12日，红军高级领导人在刚刚占领的靠近湘黔桂三省交界的湖南通道县城里，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事关生存死亡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照原定方案去钻蒋介石的口袋，自取灭亡。在这紧急的时刻，两颗伟大的心渐渐靠拢了；毛泽东挺身而出，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不能再让蒋介石牵着鼻子走，而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同意与支持。

李德平时只喜欢与博古亲近，对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人根本下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了。通道会议，他感到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遭到动摇，心中十分恼火，竟然中途退席。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来到李德住的地方，他见李德余怒未熄，翻译又下在场，只好勉强压住火，用英语说：“李德同志，你今天过早退席，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李德翻着黄眼珠，粗鲁地回答：“我认为粗暴地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很不妥当。”周恩来极力压制自己，他反驳说：“恐怕不能这样说，这要看意见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敌人已经把重兵集结在湘西，我们还要把红军送往虎口去吗？”李德被

周恩来激怒了，他站了起来，手指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我不认为你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我想提醒你，是共产国际派我来的，同时我也是抱着对中国革命的赤诚来帮助你们的，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军事人才，那本来可以离开，但我看下出哪个真正懂得军事……”一向性格温和的周恩来，今天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李德说：“李德同志，我也提醒你，我们欢迎一切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但是中国革命没有救世主也能够胜利！”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如入无人之境，进军极力迅速，一下子把蒋介石摆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红军利用敌人调整部署的时间，获得了第一次休整的机会。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城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否定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毛泽东关于改变战略方向，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的决策。会后，部队旋分左、右两路纵队，以钳形之势，向乌江逼近，挺进黔西北。

蒋介石仍怕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取得会合，继续调兵遣将，进行前堵后追，他命令“中央军”薛岳率周浑元、吴奇伟等经湖南黔阳、芷江向三穗、玉屏、镇远、施秉推进；命令湘军刘建绪派陶广、李抱冰等师进抵沅陵、会同等地阻拦红军；派陈光中师和黔军何知重、李成章等部向黎锦屏、施秉、黄平方向尾追红军。桂军廖磊的一个军，也进到都匀、独山地区。同时蒋介石一再电令黔军军长王家烈，要他增派重兵，防守乌江一带。

中央红军避开了蒋介石“围剿”主力，在贵州到石阡之间北上黔西北，一路上势如破竹，左、右两个纵队都于1935年元旦前夕抵达乌江南岸的乌江渡口茶山关和大乌江。随后周恩来就忙着召集红一军团领导人部署抢渡乌江的战斗。他神情严肃地说：“现在我军已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为争取战略主动，中央红军应迅速向遵义、桐梓进军，使部队得到短期休整和扩大。而横在我们面前的乌江则是遵义和桐梓之间的天然屏障，欲下遵、桐，必先过乌江。我军必须于元旦前作好一切准备，严密封锁消息，乘敌不备，于元旦突破乌江，为挺进黔北扫清障碍。”

乌江，又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由本省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入四川。江面宽约250米，最深处约15米，南北两岸均是高矗10华里路程的悬崖陡壁，波涛汹涌的江水酷似一条咆哮的巨龙，以每秒两米的速度奔腾，令人感到震耳欲聋、颠簸不宁，确是名不虚传的天险。“贵州四大军阀”之一侯之担负责乌江北岸的防务。他的地盘、财产和家小集中在黔北。开始他认为“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走其他路线”。直到他获悉红军确有渡乌江的意图后，才急令驻川南的侯之玺旅昼夜兼程赶来遵义，加强防守乌江兵力，但为时已晚。

在周恩来的严密部署下，红军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简陋的器材架上浮桥。1935年元旦过后，红军征服了乌江天险。英勇的红军锐不可挡，侯之担眼见部下望风而逃，认为屏障既失，遵义难保，急借入川向刘湘求援之名仓惶亡命重庆。红军乘胜追击占领了黔北首府遵义。

1月9日，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等随同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红军进入遵义地区后，10多万追敌已被扔在乌江以南或以东地区，敌情稍缓，于是，部队进行了休整。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总司令部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在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就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

发言以后，他又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批评，指出只有改变错误领导，红军才有希望，同时竭力举荐毛泽东，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坦荡胸怀，受到同志们的钦佩和赞扬。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领导权，“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三人团”成员，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事后对贺子珍说：“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周恩来与毛泽东开始了“共生共栖”关系。

遵义会议结束时，蒋介石纠集的湘、黔、川、滇、桂等省军阀及其嫡系部队约30余万人，正从四面八方红军合围而来，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为了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堵追截，党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离开黔北地区，经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1月19日，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沿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向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前进。下旬，红军在土城重创川军一个师后，鉴于敌人已向土城猖獗，红军腹背受敌，继续战斗，颇为不利，力保存自己，避敌锋芒，寻机再歼敌人，1月29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渡过穿行于川、黔、滇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水流湍急、滩多浪大的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县境，准备向长宁集结，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蒋介石见中央红军将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滇等省军阀部队和他的“中央军”堵截红军渡过，并聚而歼之。中央军委鉴于敌情的这一变化，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上渡江的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区实行机动作战，命令红军各部由叙永、古蔺折回云南东北部，敌兵力较为空虚的扎西集结，待机歼敌。蒋介石又命令重兵进逼扎西聚歼红军。中央军委根据敌人主力被吸引到川黔边境而黔北敌人兵力薄弱的情况，决定避实击虚策略。2月18日中央红军开始在太平渡、二郎滩一带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向黔北挺进，把敌人远远抛在长江西岸，使蒋介石围歼企图变成泡影。

中央红军回师黔北，直取桐梓、遵义，引起敌人的极端恐慌。贵州军阀王家烈慌忙由贵阳赶到遵义，急令遵义地区的部队加强防务，同时致电薛岳求援。红军披星戴月，连夜兼程疾进。2月26日，采用正面进攻和两侧迂回的战术，控制薛岳通往遵义的必经关口、雄踞娄山山脉的娄山关。接着乘薛岳两师援敌来到，遵义守敌较空虚的时机，沿川黔公路迅速南下。28日凌晨占领遵义。是役，红军首占桐梓，再取娄山关，继克遵义，直抵乌江边，共歼敌20个团，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胜利。王家烈遭到致命打击，而不得不向蒋介石致电请罪，蒋介石则乘机“假途灭虢”免去了王的职务，掌握贵州实权。

遵义大捷的震波，撼动了石头城，蒋介石致电薛岳连声哀叫：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坐不住了，3月2日，急忙飞赴重庆“督剿”，狂叫要“雪遵义失败之耻”。第二天，他亲下手令谓：“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备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并采用第五次“围剿”的老办法，用堡垒主义与

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妄图压迫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围而歼之。他命令“中央军”周浑元部，在长干、仁怀、鲁班场一带，吴奇伟部在乌江以南的息峰、清镇一带，黔军王家烈的残部在西安寨、金沙一带，滇军孙渡部在毕节、黔西、大定一带，构筑碉堡，逐步推进。他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和新调来的“中央军”上官云相第九军，由松坎、桐梓等地沿川黔大道向南移以加紧对红军的进攻。敌人采取南守北攻碉堡推进的办法，紧缩包围圈，最后想吃掉红军。中央军委洞察其奸决定将计就计，有意在遵义地区徘徊，以诱使国民党中央军出动，在黔北再度歼灭其主力，伺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15日，红军主力西进攻击在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战斗十分激烈，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前来增援。红军为避免消耗，待机歼敌，黄昏时主动撤出战斗，向赤水河上游转移。3月16日，红军从茅台渡口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水地区。红军这一大佯动使蒋介石一时摸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大伤脑筋。气急败坏地要薛岳迅速搞清红军的行动意图。原先他见红军在鸭溪、长于山辗转求战，认为红军“尚欲盘踞西南地区”，一会又说：“似有东窜乌江之势”，后来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现见红军重入川南，便判断红军必然“西进无疑”，于是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奔集，合力进剿，把红军消灭于赤水河以西的占蔺地区。3月20日，他发出了“筑碉阻歼红军”的电令，疯狂叫嚷：“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联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置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正当敌人遍筑碉堡，纷纷向川南麇集，企图围歼红军的时候，3月22日晚，红军以秘密神速的动作，出敌不意，于二郎滩、九溪口一带四渡赤水，再次进入黔北。这使蒋介石在川南的部队扑了个空，使他的碉堡群完全置于无用。蒋介石彼弄得昏头转向，莫名其妙。他在给滇军司令官孙渡的电报中哀号；共军“现复向东回窜，马辰已于太平渡，二郎滩过赤水河，……是否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不得而知”。

为就近指挥“督剿”红军，3月24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从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陈诚、“洋顾问”端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随后吴稚晖、陈布雷电专机飞来。一时贵阳城内要员云集，羽电飞驰，俨然成了首都。蒋介石一到贵阳，立即召集在贵阳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部署在乌江北岸聚歼红军的计划，他颇力自信他说：“红军是强弩之末，现在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口，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严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处境，希望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

谁知红军渡过赤水河后，迅速南进，从那些向北追击之敌的中间穿插而过。3月31日，南渡乌江，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把敌人的主力都甩在乌江以北的地区。这不仅使蒋介石的围歼阴谋又一次破产，而且为实现红军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的战略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军继续南进，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大标语。4月初占领扎佐，逼进贵阳。

贵阳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正在这里“督剿”的蒋介石吓得丧魂失魄，手忙脚乱。因为在贵州的敌军，大部已被红军吸引到乌江以北地区，贵阳守军十分空虚，仅有几个团的兵力。陈诚、薛岳都认为红军可能乘虚袭占贵阳。蒋介石素知红军善于奇袭动作神速，深怕神兵而降，大祸临头，于



是急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连夜在城头赶筑碉堡，加强守卫；急电据守在滇、黔边境一带的滇军孙渡部“兼程猛进”火速赶到贵阳来保驾。

红军前锋部队打到贵阳近郊，蒋介石面如土色，汗毛直竖。当他得到贵阳附近清镇机场已出现红军便衣队的情报时，确如热锅上的蚂蚁，立刻要王天锡挑选 20 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 12 匹好马，两乘小轿，马上到行辕听用。

蒋介石一面准备逃命；一面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盼滇军“救驾勤王”。

这时奉命驰援贵阳的孙渡，率领部队经大定、黔西、清镇兼程赶到贵阳，派兵守卫清镇机场，为蒋介石保住逃走的出路。蒋介石见孙渡如此卖力，称赏他“动作迅速、果敢奋战”，“殊堪表尚”，特发给孙渡 3 万元奖金。蒋介石用金钱物资收买、笼络手下，要他们守住贵阳，可谓熬尽心。

饱读兵书古籍的“国军”统帅蒋委员长竟未读通唐代社佑《通典·兵典六》所云：“声言击东，其实击西”妙计和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名句。红军的真正意图不在进攻贵阳，而在以“攻其所必救”的计策：调虎离山，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扫清红军西进云南的障碍。4 月中旬，红军迅速从贵阳、尤里之间南移。穿过湘黔公路后，即迈开大步，像长了翘膀似的以一天 120 里的速度西进云南。这时蒋介石如大梦初醒，无比沮丧，惊呼上当。他手下的一位师长万耀煌悄悄地发牢骚：“共军转个弯，国军跑断腿。”

4 月下旬，红军逼近昆明，昆明顿时陷入混乱，外侨女眷纷纷撤退。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非常恐慌，因为滇军主力刚被调入贵阳“救驾”，云南境内十分空虚，而昆明则几乎是一座空城。龙云深怕红军毁了他的老家，一面急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调动各地民团增援昆明。其实，红军进逼昆明，只是为了迷惑对手而已。当薛岳奉蒋介石急令率部入滇增援昆明时，红军虚晃一枪，忽然向西北方向前进，蒋介石终于弄清了红军“真正意图是强渡金沙江”。于是，急令薛岳所部和滇军继续尾追红军，川军到金沙江北岸阻截，“同仇敌汽、灭此朝食，”把红军消灭于金沙江畔。

金沙江蜿蜒穿行于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险要，红军只有迅速过江，才能避免被压在深谷里歼灭的危险。时间像流水一样地匆匆流逝，敌我双方的兵力都正在向江边集结，形势愈来愈紧迫。周恩来对抢渡金沙江作了周密的布置。他亲自找干部团负责人，布置抢渡的任务，并叮咛该团指战员，沿途不要同敌人纠缠，不要恶战，要快速前进早日到达江边。干部团指战员以 30 小时急行军 280 里的罕见速度，抢占了皎平渡两岸渡口。5 月上旬，红军用 7 条小船七个昼夜、秩序井然地渡过金沙江。毛泽东高兴他说：“过了金沙江，我们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伟大胜利。”

当敌人赶到这激浪滔滔、浩荡东去的金沙江畔时，红军早已不见踪影了，他们只得无可奈何地望江兴叹。

## （五）

直到 5 月 12 日，蒋介石才获悉红军已全部渡过金沙江，他急忙带少数军

事人员由贵阳飞抵昆明。他判断中央红军的意图是要渡大渡河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因此，他亲自布置所谓大渡河会战，调遣 20 万大军企图把红军压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他两次从昆明乘专机到川康边境前线观察督战，空投“手令”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功。”

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一路北上，经过历来被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沿着崎岖曲折的山路，直指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大渡河聚积高原、雪山、草地的涓涓清溪，汇成一股滚滚洪流，自北向南，直下群峰倾压的横断山脉，千回百转，劈山裂岭，来到安顺场时，河流向东一指，呼啸而去。安顺场位于大渡河中游河床急转之处，是一个险峻难越的渡口。72 年前，同样是转战千里，同样是河水暴涨的 5 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大军经过安顺场，想过河进入四川腹地。不料欲渡不能，在蜂拥而至的清军、彝兵夹击下全军覆灭，蒋介石满怀希望红军“蹈石达开的覆辙”，重演历史悲剧。然而，

“极其相似的事件，如果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大渡河的波涛认识了真正的勇士，极为相似的历史没有重演，因为他们毕竟是不同的军队。

蒋介石为达到他的“确保河防、困死红军”的目的，三令五申河防部队收缴南岸渡船和其他可能作为渡河的材料。5 月 24 日，红军先遣队红一军团夜袭安顺场，从俘虏中夺取了一只小船，25 日上午，17 名勇士踏着滔滔巨流，冒着密集弹雨，

强渡过河，控制北岸后，他们又找到 3 条小船。几叶小舟频繁往返于惊涛骇浪之间，不断将红军将士送到北岸。小舟往返 1 次，约需 1 小时，照这种缓慢渡河速度约需 1 个月才能把红军全部渡完。而这时追敌薛岳的部队已渡过金沙江到达西昌以北礼州，川军杨森部离安顺场则只有几天行程。处于狭隘河谷的红军，若不能迅速过河是极端危险的。

26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安顺场。周恩来果断决定，红军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已经过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作为右路纵队；其余未过河部队为左路纵队。两路纵队沿河而上，齐头北上，飞夺泸定桥。恩格斯有句名言。“如果谈到贸易上时间是金钱，那么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周恩来、毛泽东等冒着倾盆大雨，随左路纵队，前进在左边高耸入云的峭壁、右边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之间的蜿蜒曲折的小道上。红四团在 24 小时内走完 240 里路，于 5 月 29 日早晨进抵泸定桥西岸，消灭了正在毁坏铁索桥的敌人，占领了西岸阵地。与此同时，右路纵队到达离泸定桥 50 里的尤八步，消灭了该地守敌。夜晚，夹河而上的兄弟部队会师泸定城。随后，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通过大渡河，把长途尾追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薛岳所部完全甩掉。实现向西北进军，汇合红四方面军的关键一着。

泸定铁索桥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 1705 年），是千里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它架设在急浪滔滔、礁石耸立的河面上，桥西岸连着海拔 7556 米的贡嘎山，桥的东端就是海拔 3437 米的二郎山。这正如桥西石碑上所刻的两句诗：“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万里长。”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曾参观这里，说：“渡过泸定桥对长征而言确实有重要意义。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千古不朽的泸定桥作证，中国革命被蒋介石逼到这几根光溜溜的铁索上前进。大渡河的波光浪影，永远使人们忆起红军勇士们的赫赫英姿；而蒋介石妄图在河边消灭红军的梦想，却像肥皂泡一样瞬息破灭了。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沿途击溃川军的阻堵，6月10日前后，相继来到宝兴地区。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挡住了去路。越过夹金山，是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的关键。

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白雪皑皑，积雪终年不化，历来极少有行人经过。如今，有这样一支浩荡队伍要过山，确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当地群众很惊愕，摇头说：“雪山是‘神山’，过不得哪！常言说：大雪山、大雪山，只见有人上山去，不见有人下山来。”红军勇士们，不畏山高雪寒，他们沿着崎岖曲折的小路，迈步上山，透迤前进，泛长的队伍，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在山坡上。这时周恩来虽然身体不好，但也和普通战士一样，拄着木棍，踏着冰雪，走在队伍的前头。他边走边鼓励大家：“同志们，快上啊！加油上啊！看谁先到山顶啊！翻过雪山就是胜利啊！”巍峨雄伟、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终于被踩在英雄的脚下。

在山下的达维木城沟，中央红军前卫红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七十四团胜利会师了。经过多少艰难征战，在这荒凉的雪山脚下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了。他们心潮激荡，欢欣若狂。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懋功两河口，冒着滂沱大雨，欢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所作的报告，作出“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在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的正确决策。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力量集中，士气高涨，“全体将士欢腾无比，会合欢声远震邛崃”。

相反，蒋介石督师几个星期，以失败而告终。尾追红一方面军的薛岳等部队，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处境狼狈；四川军队又屡遭重创，将馁兵怯，士气低落。6月底，他在重庆悉知红军两支主力部队会师的消息，“痛定思痛”地在日记中写下：“共军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

为了除掉“后患”，蒋介石于7月下旬来成都，召集幕僚研究消灭进入川西红军的对策。他认为，红军目前所在的川康边睡，地广人稀粮缺，藏汉杂居，天气奇寒，而草地乃是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因此他决定调集川军和中央军的薛岳部、胡宗南部共20万兵力，进行包围封锁，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在这一地区聚歼红军。

虽然蒋介石部署十分严密，但北面胡宗南部27个团分散于文县、松潘、平武等地，兵力尚未集中。这是红军攻打松潘，东出北上的有利时机。可惜，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出兵川康边境的异议，对中央关于两军合击胡宗南于立足未稳、控制松潘地区的“松潘战役计划”更是阳奉阴违。张国焘发难，延误了红军一个多月的行程，使蒋介石军队争得从南、北、东对红军包围的时间。8月初，川军占据懋功并控制整个岷江东岸及西岸的杂谷脑；蒋介石嫡系薛岳、周浑元部集结于雅安；胡宗南部集结于松潘地区布防，并于巴西附近的高山大筑碉堡群。

鉴于蒋军的这一态势，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行北上

什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之，“夏挑战役计划”。这意味着红军必须去横踏那块“仍不见人，鸟飞下下，兽挺亡群”的千里沼泽。横踏草地，北上甘南，这是一个出乎敌人意料的英明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严峻冒险。8月下旬，右路红军在中共中央的率领下，从毛儿盖北行向茫茫草地挺进。

草地的气候变幻莫测，时而丘风暴雨；时而漫天大雪；时而冰雹骤下。而那无垠的草丛泥潭，酷似一张张污黑、恶臭的大嘴，随时都准备吞噬踏在上面的行人。红军进入草地后，就不断有人被陷入这些泥潭。一个战士不小心，腿陷进了泥潭；身旁的战士急忙伸手去拉，猛一用力，自己也陷进去。战士们的躯体很快不见了，而那魔鬼似的泥潭，除了起几个眼睛似的泡沫外，依然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草地的最后几天，粮食发生了严重困难，病中的周恩来同志叫警卫员把仅有一点青稞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泡水喝，警卫员担心说：“那以后吃什么？”周恩来严肃说：“有同志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个力量。”

严酷的一周过去了，右路红军终于走出大草地，到达草地边缘的班佑、巴西一带。当战士们从茫茫的草海中踏上干地，看见了矮小的房屋、成群的牛羊、葱绿的树木时，都禁不住发出了欢呼：红军英雄们像久久漂流在海上和飓生死搏斗的水手们一样，一旦发现了陆地，心都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似的激动。

红军一出草地，就把蒋介石部署在松潘、漳腊一线的准备“迎头堵截”红军的几万胡宗南部队，统统甩在后面。

9月中旬，由于张国焘拒绝党中央关于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进军的指示，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川康边境。中共中央在指出南下是绝路的同时，果断将左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甘南。

此刻，认定红军必覆灭于雪山草地，并带着实现了统一西南喜悦的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邀游峨眉山。峨眉山天下名山，峻秀雄奇，自然是令人惬意之所在。尤其是位于红珠山的蒋氏别墅，那洁白幽雅的白漆小楼，在绿树掩映之中，四周不是飞瀑就是流泉，怎不令人心醉神驰呢？突然间，他接到薛岳、胡宗南的急电，说红军突破封锁线。跨越草地，正向甘南方向挺进。蒋介石在震惊之下冒火万丈，马上把失职的师长撤职查办、急令胡宗南返回甘南堵截。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从甘南北上岷县的必经天险——岷山腊子口。

腊子口两边悬崖绝壁，既高且陡，周围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宽约30余米。中间有腊子河，水深流急，不能徒涉。在腊子口的前沿、两山之间横挂一条东西走向的木桥，河北岸有一条通往岷县的路。到岷县必经腊子口，要过腊子口，必经这小木桥。这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蒋介石也听人说过：“人过岷山像过鬼门关；走过腊子口像进老虎嘴。”他眼看红军就要进鬼门关和老虎嘴了，又简直乐不可支。

但是，仅仅几天，9月17日，前线忽来电报，说这疲惫不堪的红军竟然虎口余生冲破腊子口向北去了。这下非同小可，蒋介石真像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从那天起，他一直心绪不宁、坐卧不安，神情悒郁、暴躁异常。

红军马不停蹄翻越白雪皑皑的大刺山，来到甘南岷县哈达铺。在哈达铺街上，红军获得一张《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国军”进攻陕北刘志丹部的

消息。从这则消息可以断定刘志丹领导的部队和根据地还不小，且有群众基础。9月下旬，红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突破蒋介石经营的所谓渭河封锁线，抵达通达县榜罗镇。在这里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红军越过南连秦岭、北濒大河，逶迤二百里陡峭峥嵘的六盘山，进入长征的第十一个省份陕西，在陕甘鄂根据地的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下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蒋介石再也没有心情游山玩水了，一种难于驱除的悒郁把他的心紧紧箍住。他偕宋美龄走下峨眉山时说：“想不到我蒋某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但他不会就此罢休，下到峨眉山脚，他又对夫人说：“我此生以反共为职志，不剿灭共产党是死不瞑目的。我要亲自到西北去。西北还有30万大军，共产党连1万人都不到。我不乘此良机，更待何时？”

## 第四章兵谏临潼冤家相逢

### (一)

陕北高原，朔风凛冽，雪盖冰封。

正当日寇对华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以后的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周恩来兼任白区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全国救亡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重大步骤。

红军对不久前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3个战役中被俘的数千名东北官兵以礼相待，晓以抗日救国之大义，揭露“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本质。经过短期教育，红军允许东北军被俘人员去留自选，并交还枪枝和马匹。他们对中共抗日救国的诚意赞不绝口，许多人感激涕零地表示，愿意返回东北军，说服更多的人同红军合作抗日。红军抗日的呼唤，如晨风吹醒了东北军官兵的心灵，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真正朋友。

在榆林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官兵中，有个团长叫高福源。开始，他自忖必死，但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死在抗日烽火中，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然而，红军没有虐待他，更没有杀头的样子，相反还派人来同他谈话，告诉他：红军现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东北军联合起来打回东北老家去；红军历尽万里坎途，为的就是北上抗日。亲切的话语感动了他。他和很多东北军人一样，由于身受家乡沦亡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本来就强烈，而且秉性爽直，具有正义感。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红军的疑惧心理逐渐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并鼓起勇气要求见中共领导人。不久，中共联络局长李克农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直爽而恳切地对李克农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衷心地表示赞同。我想，如果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很感动，并且有可能在抗日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你们如果相信我，放我回去，我愿意说服张副司令。”

1936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高福源从瓦窑堡来到东北军的洛川驻地，面见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要事。

在西安的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密电后，十分高兴，隔天一早，就亲自驾驶他的座机，急忙飞赴洛川。

张学良是东北军首脑，曾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时，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撤退到关内。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他被解除了副总司令的职务。后又引咎辞职，出国考察，替蒋受过。在西欧的爱国华侨骂他不抵抗，唾他丢掉东北。他在意大利住过几十月，对意、德两国的法西斯政治发生了兴趣。回国后，仍追随蒋介石，主张法西斯，积极“剿共”。到1935年冬天，他的思想才逐渐起了变化。这年10月，他偕赵堤乘飞机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飞机上，他想起不久前，在崂山和榆林桥两地，何立中的一一师和高福源的六一九团全部被红军消灭了，蒋委员长不给一点安慰和补充，反而取消了一一师的番号。他感叹像这样“进剿”一次就取消一个师的番号，东北军有多少番号可供取消呢？张学良不禁黯然神伤。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呈现在他眼前的，又是一种今非昔比的情景。从前，他每次到南京，政府部组织了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一

群军政大员都亲自到机场迎接，可是这次只有一个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来接他。张学良怅然若失。

当国民党“五大”正在吵吵嚷嚷之际，张学良又接到一 九师全部覆没、师长牛元峰阵亡，而一 六师又大受损失的噩耗。张学良感到万分痛心，他恳求政府抚恤何立中、牛元峰两师长每个家属 10 万元。可是，蒋介石、何应钦等忙于大会的争权夺利，对东北军的损兵折将，好像与他们无关痛痒似的，陈诚等一帮嫡系将领则幸灾乐祸，对张学良大加奚落。他悲愤地对赵媵说：“我的声望已经降低到不值 20 万块钱了。”

新愁旧恨，张学良感慨良多。父亲张作霖丧命于日本军阀之手，家乡东北横遭日寇侵袭。自己掌握的数十万军队，本应效命疆场与日寇决一雌雄，可是，却天真地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成了“不抵抗将军”。此后，又信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说教，带了东北军在西北“剿共”，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仅没有把红军剿灭，反而东北军屡受重创。自己受了损失，却还要受蒋介石的窝囊气，这太使人难堪了。这不是钻进一条死胡同了吗？而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领导全国人民从事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同东北军全体官兵抗日复土的要求不是一致的吗？红军经过长征，克服了无数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到达陕北，并在疲惫不堪之际还能以劣势的武器击败自己装备优良的东北军。这里面有什么不可战胜的道理吗？

大会闭幕后，张学良到上海请教爱国人士杜重远。杜重远看到这位爽直慷慨的老朋友良心未泯，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借内战之机消灭异己的诡计，批评张学良过去的错误做法，并介绍了红军的抗日政策，最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抗日主张。

挚友的良好言使张学良茅塞顿开。返回西安后，他审时度势，思考着沟通与红军联系的问题。这突如其来的高福源，正是他没法寻找的红军使者。

为了考查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张学良拍着桌子大骂道：“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辽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这样对待他，也就把心一横，慷慨陈词：“张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难道您忘了，先大帅被日本军阀炸死，东北的大好山河被日本鬼子所强占，3000 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现在人家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您有何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更有何理由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打内战就快要完蛋了，更还有什么理由还去打人家？”张学良听了，马上拉着高福源的手，说：“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和真情。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吧！”倾心深谈后，张学良要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

2 月 21 日，李克农应邀启程赴洛川面见张学良。张学良又希望能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晤。

1936 年 4 月 8 日，周恩来按预约的时间来到陕北军事重地延安。因电台失灵，在西安的张学良在 9 日上午才知道，于是急电驻守延安的周福成师长盛情招待，并自驾飞机从西安急飞延安。

夜幕降临后，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天主教堂开始会晤。

周恩来真诚相见，他首先问张学良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张学良直抒胸怀：“周先生，我看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主义，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

救中国，所以竭诚拥戴蒋介石做领袖，心想先统一再抗日，中国一定有救，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周恩来听后，析理入微地说：“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主张领袖至上，个人独裁，连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自由都不要了，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主张。张将军要是真想抗日救国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搞法西斯独裁，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打内战，只能为亲者痛，仇者快。因此，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民主，给人民以自由，才能调动千百万民众抗日的力量，把日寇赶出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张学良表示接受这个观点，表示今后不再谈法西斯主义。然后又问道：“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蒋介石呢？”

周恩来但然而谦虚地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反蒋抗日的，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

张学良沉思片刻后，郑重陈言：“蒋介石是中国现在的实权统治者，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在他手中。据我多方观察，他还是有抗日的可能性。”

周恩来有意反问：“如果蒋介石南京政府决心抗日，为什么还一定要消灭最积极抗日而为日本所仇视的中共和红军呢？”

“这是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结果。目前最主要的是设法扭转他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抗日救国徒增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这个意见，说：“中共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跃进下一步。我本人现在可以表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我会把张先生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我们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答复。”

周恩来推心置腹的诚恳态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由衷的感叹脱口而出：“周先生以民族利益为重，眼光远大，虚怀若谷。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这次会谈，解决了我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延安会谈，是张学良由“剿共”到联共的转折点。周恩来揭开了张学良戎马生涯新一页，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当张学良送周恩来离开延安时，已是红日东升，朝晖满地的早晨了。

周恩来返回东征前线后，向党中央汇报延安会谈的情况和分析张学良对中共“反蒋抗日”方针的看法，指出：连张学良这样已经向联合抗日迈出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继续坚持反蒋，势必影响统一战线的扩大。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再次转变政治策略，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并准备派代表同国民党谈判。

差不多同一时间，陕西地方实力派，西北军首领杨虎城也和张学良一样，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张、杨之间以及东北军和西北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般军阀集团的武装冲突，加上蒋介石挑拨离间，双方关系一直不太好。



在他们不约而同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后，由于中共的穿针引线，从中沟通，张、杨之间便渐渐地由猜疑变合作，由磨擦变成友好。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终于实现了联合。西北战场，战云消散，抗日救民的呼声代替过去剿共内战的喧嚣声。

## （二）

石头城里的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围剿”，对于西北局势的骤变岂能熟视无睹！

但是，当他准备北上“督剿”的时候，两广事变爆发了。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病逝，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企图乘机分裂两广，各个消灭。广东军阀陈济棠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各地反蒋力量，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反蒋。6月组织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求抗日；通电全国，成立军委会和抗日救国军，以北上保卫华北为名出兵湖南。蒋介石急派部队入湘防御。为平息两广事变，避免顾此失彼，蒋介石对西北只好采取暂时缓和的策略。

而日寇的继续侵略也危害到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政府。蒋介石为保护自己最大利益，维护英、美在华势力，也开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这时，在国际上能和日本抗衡的，除英、美外，还有苏联，蒋介石在急于改善对苏联的关系，也必须做出姿态改变对中共的政策，于是指令CC派头子陈立夫与中共取得联系。7月13日，蒋介石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演讲，表示了内求团结，外御侵略的意向：“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8月27日，张子华（黄君）奉陈立夫之命，携带国民党电台密码到陕北，转交国民党希望周恩来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

9月1日，周恩来亲笔致函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言词恳切地再次陈述共产党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周恩来在信中对陈氏兄弟说：“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

此信由中共联络员张子华（黄君）带往南京转交国民党当局，但20天过去，仍未见回音。9月22日，周恩来决定派潘汉年直接会晤陈立夫，为此，他再次亲笔写信给陈氏兄弟，说：“前由黄君奉陈一书，想已入览。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年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

同一天，周恩来亲笔致信蒋介石：介石先生：

自先生揭发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忧甚于民国十二年改组，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之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红军主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耶？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督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回百折以赴，不过目的不止者也。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九先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其政党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渴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变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奉上八月二十五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顺祝起居佳胜！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这是自首次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给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第一封和平信件。

9月底，潘汉年携带这封重要信函到上海。不久，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见到了陈立夫，面交周恩来致蒋介石、致陈氏兄弟的两封信，口头转达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内容。此时，陈立夫的态度大不如前了。因为9月17日蒋介石已完全平息了两广事变，他的目光已移向西北了。陈立夫看了周恩来的信件后，即代表蒋介石答复说：

“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啰，首先对立的政权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最后，在军队和政权问题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观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你们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以及曾养甫派人到苏区，

所提的条件并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问题。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以为红军已经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是受困于日本人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急忙转变话题：“你和我都不是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蒋委员长愿和他面谈。”他知道周恩来在这种条件下是不会出面的，因此他要潘汉年向周恩来报告时，不可讲明蒋介石所提的上述条件。

潘汉年听后很气愤，他义正词严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说清楚，反说蒋先生愿意见周恩来副主席，岂不是要我骗了他？何况现在正在激烈交战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周恩来副主席是无法出来的。”

双方不欢而散。

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即腾出手来，杀向西北。他自以为，南方各省苏区都摧毁了，全国主力红军已被击溃，逃到西北的不过3万多人，实在不难一鼓荡平。

10月，他决定亲赴西安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并扬言：“我们的最近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

### （三）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来到西安，驻进西安东郊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是个风光绮丽之所在，它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而闻名于世。

他初到西安，假装出一副颇为悠闲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陪伴着，游览了秦陵、黄陵、华山、终南山。他要先观察张、杨的动向，两个月前，蓝衣社“十三大保”之一的曾扩情到广州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派兵围抄陕西省党部，目无法纪，背叛中央；而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更是逆迹显著。”

在游山逛景的消闲气氛中，蒋介石询问张学良：“汉卿，你近来看了些什么书？”张学良坦率地回答：“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叫《辩证唯物论》，一本叫《政治经济学》。”蒋介石心想，这还得了，怪不得他们在西北搞什么联合抗日，下愿意跟我去“剿共”。他一本正经地数落张学良：“这些书都是苏俄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你要读好《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读通了，就能一辈子受用不尽。”张学良听后，不以为然地笑了一笑。

东游西转几天后，蒋介石暴露出他此行的真面目，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他的“剿共”计划，要求张、杨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向陕北红军进攻。谁知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同意他继续“剿共”，反而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张学良甚至把毛泽东、周恩来10月5日给自己的信转给蒋介石看，请他顾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接受中共的建议，互派代表商谈合作抗日问题。蒋介石对张、杨破口大骂，声称自己“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情。”

10月下旬，蒋介石加紧筹划新的“剿共”军事部署，把自己的嫡系精锐部队约30个师的兵力，统统北调，摆在平汉铁路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铁路的郑州至灵宝段；调派他唯一的装甲部队进驻河南西部，准备随时开入陕西；下令扩大西安、兰州机场，调来100架美式战斗机和轰炸机。

部署既毕，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由西安飞往洛阳。张

张学良借“祝寿”之机到洛阳劝蒋抗日。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就指怒目：“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主抗日好了。”

11月，日寇再次进犯绥远，驻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陕北前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因临近绥远，抗日情绪特别高涨。深刻体验到民族危亡惨痛的东北军将士和流亡关内的群众，胸中燃烧着民族仇恨的怒火。

27日，心情焦灼的张学良在西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态度诚挚、语意恳切的《请缨抗战书》：“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殒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久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但张学良枕戈待旦、翘首盼望“大命朝临”，等来的却是蒋介石从洛阳发来的予以拒绝的6字电令：“时机尚未成熟”。

12月3日，张学良未带随从，孤身一人，亲驾飞机，再赴洛阳进谏，他耐着性子向蒋介石陈诉：“东北军中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剿共’军事因太不得人心实难继续，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不料话未说完，蒋介石就教训起来：“汉卿，你不在陕北剿匪前线，怎么跑到这里来。你的使命是集中全力消灭共匪。”张学良又请求蒋介石“俯纳民情”，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他心直口快地说：“上海七君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中央一直讲不清楚，民众对此反响极大。事实上，他们只要求抗日救国，如果这样有罪，那真如沈钧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委员长，赶快放了他们吧，免得失去人心，铸成大错。”一听张学良提起释放“七君子”，蒋介石更不耐烦了，他盛气凌人说：“你就专心剿共好了，政治上的事你不要管！”张学良也开始激动起来：“委员长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蒋介石一听此话，直气得他身体连同嘴唇一起抖动起来，用手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唾沫飞溅、大声嚎叫：“放肆！除了你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下革命的滚出去！”张学良极为痛心，愤恨满腔地退出蒋介石的房间。

蒋介石深感西北局势不妙，对张学良、杨虎城更加不信任，心想要发动新的“剿共”战争，必须解决张、杨问题，于是暗中准备撤销他们的职务。而张、杨激于国家危亡之巨祸，受中共统战政策的影响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忍无可忍。蒋介石与张、杨的矛盾急剧地表面化。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抵西安部署最后“剿共”步骤。“中央军”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和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邵元冲等先后接踵而至。紧接着数十万大军纷纷进逼潼关；西安上空，战云弥漫，机声隆隆；西安街头，军车狂奔，宪警趾高气扬。蒋介石抵西安即向张、杨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或者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而中央军则在后方接应督战；或着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者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所不能接受的。

东北军和西北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尽管如此，张、杨仍然希望通过乞请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办法，感动他、说服他。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进谏，痛切地向蒋介石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第一，部队抗日情绪不可限制，他指出：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

告警，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他再三“苦谏”，继之以“哭谏”，同蒋介石争辩达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竟拍案大吼：“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哭谏”失败后，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都不允许再拖下去了。12月8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九府街芒园秘密磋商，权衡国家民族存亡之利益，最后决定了“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决策。

12月9日，是北平“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这天，朔风呼啸，寒冷异常，天寒地冻。上午，蒋介石召集参谋人员开会，定于12月12日正式发布总攻红军命令，若张、杨不服，即行解除武装。这天，学生热血沸腾，怒火燃烧。下午，蒋介石在华清池听到1万多学生高举“抗日救国”的标语牌，列队向临潼推进，来向委员长请愿、示威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格杀勿论”，还命令中央宪兵队，在十里铺布置队伍，架设机枪，准备血腥屠杀。

就在游行队伍快到十里铺，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深怕学生受害的张学良偕王以哲亲自驾车赶到了。学生见张学良来了，立即蜂拥般地围着他，接着“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有如春雷，滚地而起。

张学良阔步走上土坡，斜了一眼那高高架起的一排排机并枪，再回头看这一张张无所畏惧的年轻面孔，激动地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情，我十分钦佩。只是今天时间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不如请大家暂时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陈述。”学生表示救国不怕吃苦，风餐露宿也要去临潼。张学良见群情如此激昂，意志如此坚决，使耐心解释说：“你们的救国行动，我并不想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一听“流血牺牲”，站在前面的东北大学生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抗日而牺牲！”万余人声泪俱下，高呼口号。刹那间，哭声、喊声和风声混成一片，震动天地。这悲壮的气氛使张学良非常感动，这宏大的群众运动场面，增添了张学良的勇气和力量。他悲愤交集，情不可遏，高声说：“我张学良的心情和你们一样。自从失掉东北三省，全国人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上峰不许我打啊，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失土之恨，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也一定要流在抗日战场上，请你们相信我，”他恳切而坚决地说，“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作答复。如果逾期欺骗大家，我张学良甘愿让你们随时随地处死。请大家先回城去吧！”张学良发自肺腑的誓言和诚挚的表态感动学生。他们听从他的劝告，整队回城。

当晚，张学良去临潼会见蒋介石，推心置腹向蒋介石转达学生的心愿，借以再次劝谏。张学良刚讲几句，蒋介石便劈义盖脸地责问他：“学生要来找我，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张学良愤慨而归。

10日下午，杨虎城为缓和气氛，前往华清池。他冷静地对蒋介石说：“蒋委员长，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没有希望。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着办，但实在不宜打内战了。”但蒋介石态度仍旧顽劣，他先是企图收买杨虎城，

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跟共产党势不两立，消灭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接着又狂叫起来，“红军已成流窜之众，我决心用兵，我有把握消灭红军。”

张学良和杨虎城彻底失望了，遂决定抓紧时机，于12日凌晨实行“兵谏”。

12月11日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欢宴中央军高级将领。灯红酒绿，猜拳行令，浪静风平。

陕北高原一条狭长崎岖的山谷里，坐落着一个古老的小城镇。这就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在这里，上至中央首长，下至普通老百姓，都为抗日救亡事业忙碌着，到处是生机健旺，朝气蓬勃的景象。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约12平方米的小草房里。小草房分隔成两间，内间只有一个土炕，当作卧室；外间有一张小桌和4条长板凳，墙上挂着军用地图，这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每天，从全国各地发来的电报和文件，像雪片一样飞到这小草房里，一叠叠地堆在小桌上。

1936年12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机要科，忽然收到从西安发来的密电：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扣起来了……。

当天黎明时分，临潼华清池，万籁俱寂。被窝里的蒋介石正做着“剿共”的美梦，突然被枪声惊醒。他惊惶失措、浑身打颤，匆忙从床上爬起来，披着睡衣，趿着拖鞋往外跑。这时，院外枪声大作，出门无路，他在侍卫的搀扶下爬上后山墙，跳下墙外7尺深的乱石沟摔伤脊梁骨，丢了一只拖鞋，然后忍着疼痛，跌跌撞撞地爬上陡峭的山腰，一头钻进那块叫卧鳖石后面的乱草丛中。

孙铭久率张学良卫队营进入蒋介石卧室时发现人已不在，急忙上山搜索。当卫士接近卧鳖石附近时，蒋介石一个侍卫听见人声，便探出头来观察，不料被“砰”的一枪打死了。蒋介石见势不妙，举起手来就喊：“我在这里。”孙铭久应声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低着头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两只手扶着石头弯腰站着，浑身像筛糠似的直打哆嗦。孙铭久细看蒋介石的样子，于瘦多皱的脸上，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深陷的眼睛向下斜视；光秃的头颅，残存着稀拉的几根白发；嘴巴因未来得及戴假牙而于瘪得像个老太婆；裸露的小腿，被荆棘、石块划破后，正渗出一缕缕血痕；古铜色的睡袍满是草屑尘土。他刚到西安的那种杀气腾腾、目空一切、耀武扬威的神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看到这副原形毕露狼狈相，孙铭久心里暗自好笑。

住在西安城内的京西招待所的党国大员们。11日晚上，他们酒足饭饱，12日凌晨还沉浸在甜甜的梦乡里，直到杨虎城的宪兵枪声响了，才被惊醒下床，裤子当上衣，上衣做裤子，个个魂飞魄散，大喊倒霉，束手就逮。只有军政部次长陈诚人小机灵，一听枪声，马上躲进地下室，拿起一个空啤酒箱倒扣在里面，宪兵营的班长搜到这里，上前把啤酒箱翻过来，发现下面蜷伏着一个满身尘土的矮子，立刻上前抓住陈诚的衣领，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提上来，大叫宋文梅：“营长，这不是漏网的陈诚吗？”宋文梅一搭眼，只见身高不及宪兵一半的陈诚神情尴尬，面色惨白，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讥讽道：“军人嘛，怎么这样丢人！”

日上三竿。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势力，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了，新城大楼里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几天来过度的劳累和紧张得像上紧的发条，如今如同石头落地，顿时松弛下来，紧接着感到一种无法支撑的疲乏。他俩一下子瘫

在沙发上。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咱俩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得想想下一步该怎么收场。”杨虎城说：“咱们对全中国人负责，立即发电给保安的中共中央说明事变情况，邀请中共要人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和捉蒋善后事宜。”……

周恩来看了西安发来的捉蒋电报后，异常激动，立即走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也万分兴奋，他也刚刚看过同一内容的电报。

是啊！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疯狂推行独裁统治和反共卖国政策，打了整整10年的“剿共”内战，欠下人民数不清的血债，如今抓到他，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很多人在最初刹那的想法，就是要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

然而，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穿着一身普通的红军制服，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两只锐敏的眼睛炯炯发光，他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说：“临潼兵谏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动的。这是它的进步性质。但是，扣留了蒋介石等人，使南京与西安处于公开对立的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因此，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接着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深刻地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发展前途。他说：“由于事变的发动而引起的新的人规模的内战，使南京的中间派走向亲日派，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日本更顺利侵略中国。这是德、意、日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所欢迎的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则是由于事变的发动，结束了‘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而得到早日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国际和平阵线和全国人民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决定：全力争取实现第二种前途，应张、杨要求，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

#### （四）

12月15日凌晨，风寒雪舞，周恩来一行就要离开保安了，他换去平时的红军服，穿上一套东北军官服，腰间束着皮武装带，脚上穿着黑皮鞋，尤其是那长胡须也用剪刀处理掉，因此越发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一下子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他仔细地检查每个随行人员的准备情况，热情地同前来送行的毛泽东等人握手道别。周恩来骑着骏马走远了，毛泽东还站在原地向他频频招手。

周恩来一行顶着大风，踏着积雪，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向延安进发。12月17日下午2时，周恩来一行在延安转乘张学良派来的专机，向南翱翔。周恩来把张学良派来的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刘鼎拉到身边的座位坐下，向他详细了解事变爆发后，国内外的反应。刘鼎就所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

事变的突然爆发，震动世界。日本企图乘机扩大中国内战，于暗地里积极支持亲日派何应钦轰击西安，乘机杀蒋；德国支持正在柏林养病的汪精卫兼程返国，和何应钦组成亲日反共政府。英、美两国因为日本在华侵略势力

已直接危害到他们在华利益，也看到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因此他们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使蒋介石维持统治，以便继续在其操纵下对日本作某种抵抗。

国际斗争反映到南京政府内部，就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的矛盾。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政府，就像一窝被捅了一棍的黄蜂，立即造成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乘机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他企图借“讨伐叛逆”的旗号。“不惜玉石俱焚”，轰炸西安，以置蒋介石于死地后自己取而代之。他一面急电汪精卫赶快回国，一面举行“白衣誓师仪式”，调动大军进逼西安。

在上海的宋氏兄妹获悉临潼兵变，如遇“晴天霹雳，震惊莫名”。惊恐交集的宋美龄慌张赶回南京，看到何应钦正趾高气扬，准备“讨伐”，一时如坠五里雾中。她心想：讨伐即要蒋命，随之四大家族的权势也落到何应钦之手，而且美英老板利益也大受损失。她决定要以“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的办法救蒋。她一面与何应钦大吵大闹，一面与英、美使馆紧急磋商，央请与张学良有深交的澳籍美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飞抵西安，探明真相并调解。

14日傍晚，端纳飞抵西安，带来宋美龄分别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两封信。宋美龄希望张学良考虑张蒋之间的公与私关系，确保蒋的人身安全，不要操之过急。张学良看了信后告诉端纳：只要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并无危害他的恶意。当夜，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到新城大楼会见蒋介石。蒋介石从端纳手里接过来美龄的信，当他看到信末尾那句“目前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时，明白那是何应钦在搞他的鬼，竟然伤心得咧嘴哭泣起来。端纳把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真实意图告诉蒋介石。端纳的话，使蒋介石受到一次震动，他开始了解事变的真相，知道他在西安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因此，死灰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意。随后，蒋介石搬到安全清静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15日下午，端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西安之行的收获，并转告“西安方面欢迎南京的人来陕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第一次发现希望的曙光”“惊喜若狂。”可是何应钦极力阻止派人入陕，且于16日早晨，发布对张、杨的“讨伐令”，指挥中央军进入潼关、飞机入陕狂轰滥炸。宋美龄惊喜立刻转为惊惧，她深怕飞机不长眼睛，危及丈夫生命，匆忙急电端纳，要他请蒋介石对何应钦下停战手令。蒋介石深知，打起仗来他的处境和命运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内心深处极力害怕何应钦发动所谓“扫荡叛逆”战争。但是，狡猾至极的蒋介石，又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抓任何应钦的武力“讨伐”这张牌，作为向张、杨讨价还价的资本，要挟张、杨尽早放他回南京。17日晨，蒋介石给何应钦写手令，内称：“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

再说，张、杨两将军对如何逼蒋抗日，颇感棘手。

刘鼎说：“张、杨两将军真像久旱待甘露的禾苗一样，翘首北眺，急盼周副主席的到来。来延安之前，张将军对我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一边听刘鼎的汇报，一边潜心思索如何迎接这场激烈的斗争风暴。代表团的同志们，看到他那成竹在胸、泰然自若的神情，接触到他那洞察千里、睿智明亮的目光，深信：在西安事变后所出现的危疑震撼的局势中，



周恩来将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着飘摇不定的事变航船穿过惊涛骇浪，绕过危险的暗礁，胜利到达团结抗日的彼岸。

黄昏，霞落云飞，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

当周恩来来到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注视着周恩来的面庞，问道：“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周恩来微笑作了手势，说，“剪去了！”张学良略带惋惜的神色说：“那样长的美髯，剪掉了太可惜了啊？”站在旁边的东北军将士，见此亲热劲儿，颇为惊讶：“副司令与周先生很熟悉呀？”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告诉大家：“我们是老朋友了。”

当晚，张学良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宴后，周恩来即和张学良到公馆西楼秘密单独会谈。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以及各方面的反应之后，诚恳地说：“有何指教，请毫无保留。”

周恩来对张、杨的爱国热情和正义行动作了肯定，并坦率指出：“你们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惊险手段把他捉了起来。这种做法，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因而将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是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张将军出以公心，发动西安事变，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周恩来说：“只是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尼古拉二世，是在群众革命暴动、推翻了他的政权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拿破仑一世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捉住的。但蒋介石这次被捉住，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这与上述二例不能相比。目前，在全国救亡运动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他手下的官兵已有所觉悟，抗日思想逐渐增大。从大局着想，对蒋介石的处置都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张学良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周恩来继续说：“目前西安事变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会使中国变好，一种会使中国变坏！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而如果要是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反而会引来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寇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岂不是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吗？”

“那你看，该怎么办？”

“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张学良听到这里，眼睛为之一亮。他尤其十分钦佩周恩来的高瞻远瞩，自己虽然也主张释蒋，但没有像周恩来考虑得如此周密，高屋建瓴。他在徘徊、朦胧、担忧之中，感到有了主心骨，天塌不下来了、地也陷不进去了！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他兴奋地走过去，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由衷地表示：“共产党人胸怀博大，确是一心为国家，为了民族的未来。”难怪几十年后，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时，还承认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谋主”。

第二天，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赴九府街芷园会晤了杨虎城。杨虎城非常清楚，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搞了10年的“剿共”内战，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和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就是周恩来的脑袋也是从蒋介石的屠刀下侥幸留下来的，心想，共产党是不肯饶过蒋介石的。因此，当周恩来介绍昨晚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后，杨虎城感到非常意外，

思想上一时未转弯，他坦率地向周恩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和疑虑：“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政党，地位平等，可战可和。可是我们是蒋介石的部下，如果轻易把他放走了，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蒋为人气量狭小，睚眦必报，阴险狠毒。”

周恩来对他的疑虑表示理解，并耐心解释：“蒋介石统治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武力，现在虽然捉住他，但其实力丝毫未减，在这种情况下，把他杀掉，实不利于发动全面的民族抗战。”

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今天，不只是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蒋抗日，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也在争取他抗日，他的英美主子也从本身的利益着想，促使他遏制日本独吞中国。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所以，乘他被捉之机，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是可能的。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比杀掉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说蒋介石日后的报复问题，我看这不取决于蒋本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就是他想报复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周恩来至情至理的言辞和顾全大局的崇高精神，使杨虎城深受感动。他说：“周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党派的历史深仇而不报，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无比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周先生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周先生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已成为赤色恐怖的世界”，“红军要把蒋介石押送陕北。”各种谣言传到南京，使宋美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尽管端纳已回南京报告西安无险情，尽管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停战手今后已暂停“讨伐”行动。

为探明真相，12月20日，宋子文冲破何应钦障碍抵达西安。一下飞机，立即要求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共并未参预。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善后。”周恩来还请宋子文认清国内外形势和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宋子文还会晤了张、杨，探望了蒋介石。

第二天，他即飞回南京。到处宣传蒋介石在西安情况，称赞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了不起的人，恐怕南京没有这样的人。”并带讥讽的意味斥责何应钦，“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去挽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宋子文的宣传使何应钦的猖狂气焰顿时收敛。

12月22日，宋美龄借宋子文、端纳等人飞抵西安。蒋介石一见宋美龄来到面前，如梦中惊呼：“达龄，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来了，你入虎穴了。”不禁泪如泉涌的宋美龄强装镇静：“你受了伤，我来看你呀！”“我今天早晨打开《圣经》，正好看到那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我一思忖，就知你要来，果然你就来了。”两人唏嘘不已。

23日，周恩来和张、杨二将军开始与全权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谈判。周恩来先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即：“子·停战，撤兵至潼关以外。丑·改编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有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借口中日武力相差大悬殊，不能马上抗日，只能作抗日准备工作，并且提出红军必须改编为国军，必须听从国民党指挥，方可停止内战，停止“剿共”。周恩来既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从大局出发，作了光明磊落而又赤诚感人的让步，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表示，如果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提出的6条，那么“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同时严肃指出，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嘱，打了十年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灭亡。能识大局，立即实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我党既往不咎，张、杨二将军也会放蒋先生回去。如若坚持内战，则将成为千古罪人。宋氏兄妹救蒋心切，蒋介石本人更是归心似箭，况且英美老板一味督促和解。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

经过两天谈判，终于以周恩来提出的6项主张为基础，达成6项协议，即“（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五）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六）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西北军仍由张、杨负责。”

24日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10年冤家今天重逢，这确是历史注目的一刻。蒋介石被捉后最害怕共产党插手，心想一旦蒋人共产党之手，必死无疑。周恩来到西安后，色厉内在的蒋介石整天提心吊胆。直到他知道共产党并非想置自己于死地时，情绪才稍安定下来，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大义凛然出现在面前时，还是显得很不安的样子，显出一副窘态。他努力控制自己的神经，勉强从床上坐起来，一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走时摔伤的腰，一手招呼周恩来入座。

周恩来神态从容地与蒋介石握手，望着老对手那衰老憔悴的脸容，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听后点头叹气，但他见周恩来态度温和，就装腔作势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心想对方又故作姿态了，立即面容庄严，说话的语调也显得威严有力：“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十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脑袋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他有意停顿一下，见“委员长”的架子没有了，就放缓语气，给对方留点面子，接着又说：“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一见周恩来不究既往，又松了口气，他瞟了周恩来一眼后，装出几乎要落旧的样子，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这时，站在蒋介石旁边的宋美龄赶紧打个圆场：“周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捐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我这次来西安，不是来算旧帐，而是来商谈今后的救国大计的。”

宋氏兄妹又一次对周恩来表示感激。宋美龄还重复周恩来的话，俯身指着蒋介石说：“周先生是来同您商谈救国大计的，您听清了没有？”然后又站起来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

安出事，多亏周恩来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

周恩来看到气氛较轻松了，便主动和蒋介石拉拉家常。会见蒋介石之前，周恩来从张学良那里看见蒋介石刚被捉时写给宋美龄遗嘱式的电报底稿，要她“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以慰余灵。”据此，周恩来看出蒋介石身陷囹圄之后，对妻儿老小极为挂念。他嘘寒问暖地说：“蒋先生，好些年没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在苏联的经国接回来，让你们父子团聚（周恩来不曾食言，很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1937年3月25日携夫人，儿女回来）。

蒋介石一听周恩来主动提出使他们父子团聚，不由得鼻子一酸，又感激又羞愧。这时周恩来又谈到今天刚达成的谈判结果时，蒋介石又沉默了片刻，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恩来，我们不要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表现出疲劳困顿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还有机会再谈。”蒋介石连声说：“好！好！”

## （五）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可是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将士都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人的事。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在协议上签字，干脆就干掉他。”25日就是圣诞节了，这天早上，宋子文收到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的一封联名信，提出放蒋走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宋氏兄妹和蒋介石惊慌不已，立即要张学良想办法。

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深想夜长梦多，便决定悄悄地送蒋介石走，并准备亲自陪送去南京“赔罪”。下午，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来，杨到后，张学良说：“现在不走不行啦！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这时，蒋介石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

他们离开公馆10多分钟后，孙铭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连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在疾驰的汽车上，他心情沉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张学良个人前途，而且还会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带来困难。

在机场上，蒋介石又“以领袖的人格”重申他许诺的6项主张。

周恩来驱车赶到机场，飞机已向洛阳方向飞去。他不禁叹息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飞机上的蒋介石为自己能保住一条老命，离开西安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而又回忆起这段没齿不忘的日子：20天前，当他从洛阳来西安部署数十万大军，准备一举荡平“赤匪”的时候，一大串军政要员跟在屁股后面，一大批侍从警卫前呼后拥，那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啊！如今却是在许诺“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才得以偷偷摸摸离开西安的。“最高领袖”的面子往哪里放啊！他越想越恼火，暗中盘算着如何报复张学良、杨虎城。

27日，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由陈布雷代拟的所谓《对张、杨训词》，掩盖他接受西安方面6项条件的真相，并把被释放说成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接着他背信弃义扣押、软禁善意陪送他的张学良。新年元旦，蒋介石还调兵西进，筑垒布阵，威胁西安。

西安方面不见蒋介石实行抗日诺言，也不见张学良归陕，见到的却是中央军对陕西的威逼和南京政府对西安的压迫。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西安军民的无比愤怒。周恩来以冷静的态度处理面临的复杂局势，与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研究了一系列对策，做了应付时局的安排：一是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但应采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二是组成三方面联军，拟定了联合作战纲领，进行备战。1月1日，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的西郊机场举行了大阅兵，对南京方面进行示威，反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纵兵西进。1月5日，由杨虎城领衔发出措词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扣张进兵，并坚决表示：

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由于西安方面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又以军事准备为后盾，加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舆论压力，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贸然进犯。所以，双方虽然拉开战线，摆开阵势，但内战的枪炮声并未打响。1月19日，蒋介石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并转达了张学良的嘱咐。杨虎城表示“遵照张副司令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须双方协商再作决定。”

1月11日，周恩来写了亲笔信托王化一、吴瀚涛带给蒋介石，请他撤兵释张，实践诺言，再次表明中共和红军的一贯态度和和谈诚意。信的原文如下：

蒋先生：

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

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均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过，伫候回教，并颂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

蒋介石在溪口与其幕僚精心研讨从西安带来的信息后，1月13日，蒋介石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水以西的西兰路上；西北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驻12个团。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西北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米春霖还携带了张学良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的信函。张学良在信中说：“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编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西安方面考虑结果，于是在1月中旬和下旬，几次派李志刚、米春霖、鲍文樾赴南京、奉化同蒋介石等人谈判，要求释放张学良并了解他经过这次事变是否把“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变过来了。1月24日，李志刚在南京电告杨虎城，说：蒋介石虽然拒绝释放张学良，但内战他是没有脸面打下去了。

接着，西安方面直接与驻潼关的顾祝同就军事问题直接谈判。一致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军事问题。西安方面同意接受甲案，因为按照甲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是连接的，可以互相支持。

不料，大好的形势竟然发生了不可收拾的逆转。

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和元老派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深受张学良信任而政治上幼稚的少壮派，把“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谈，张副司令不能回来只有去拚命”作为行动纲领，不顾一切后果地进行战争宣传，搞请战签名运动、压迫主和派将领。他们的主战行动，在西北军一部分军官中也引起共鸣得到支持。另一方面，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谈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但也有的高级将领一面主和，一面在蒋介石的分化下，向南京靠拢，引起少壮派不满。元老派与少壮派的分歧日趋紧张，愈演愈烈。

杨虎城作为自张学良陪蒋赴宁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最高统帅，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也摇摆不定，多次反复。他为消除心中的积愤，未尝不想同蒋介石决一胜负。所以当他受主战派包围时，同情主战派，甚至对中共代表团产生误解，避而不见。

西安内部矛盾尖锐、形势险峻。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实现对外抵抗，周恩来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多次强调要注意维护内部团结，多次同两派代表谈话，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有一次，他在东北军的军官会议上，语重心长的强调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

他说：“国难当头我们一定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利益为重，一定要加强团结，消除内部分歧、联合起来打日本。”他那生动有力的讲演，深刻地扣动了东北军军官们的心弦。会议结束了，他们还恋恋不舍不愿离去。一位军官以极其尊敬的口气提议：“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唱一支歌！”顿时欢笑声和掌声响彻全场，周恩来微笑着指挥大家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悲壮的歌声把他们引向那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东北老家，再一次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对于杨虎城，周恩来总是以广阔的胸怀对待他，主动找他，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向他开导。一次，周恩来向他指出：如果打起来，当然中共不能站在局外。不过，那样它同国共战争将混在一起，便会越打越大，不能收场，这不是与你的搞事变的宗旨相违背了吗？而且无论胜负属谁，都是国力的消耗，对抗日不利的。我们不能把破坏和平的罪责自己揽上身来。如果南京方面进逼不已，当然只有抵抗一途，那时破坏和平的罪责就不在我们一方了。总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动摇。杨虎城听了这番话，好像在三岔路口徘徊时突然发现了路标，模糊的局面变得清晰了。

可是，少壮派军人不顾周恩来的反复说服和再三解释。2月1日晚，少壮派军官在孙铭久家秘密聚会，决定手掉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堵塞和谈之路。2月2日早晨，孙铭久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闯进王宅，将病中卧床的王以哲击毙。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得免于难。中午，东北军驻防渭南前线的刘多荃、缪澂流部一听军长王以哲被害噩耗，立即掉转枪口向西安开拔，要杀孙铭久等人祭灵。眼看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就要上演，和平解决事变的成果即将毁于一旦。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团结抗日，周恩来支持杨虎城以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派刘鼎将少壮派代表人物孙铭久、苗剑秋、应德田送往红军驻地。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周恩来就亲自率领红军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表明了中共的严正立场，及时粉碎了汉奸、特务、托派分子企图嫁祸于中共的阴谋。周恩来希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两派军人以大局为重，携手并进。

少壮派军人的鲁莽行动，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南京方面乘机对西安施加压力，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2月7日，“中央军”进驻西安，9日，顾祝同成立“西安行营”。……

蒋介石虽然报复了张学良、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局面，并苦思冥想消灭红军。但是险些使他丧命的西安事变如同劈头一棒，给他一顿严厉的教训，使他不得不承认，反共内战的政策是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如再打内战，他的统治就要垮台了，因此，他不敢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2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会议根据蒋介石所提出“对内避免内战”等5项方针，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会议在宣言中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承认“整个民族之利益终将超出于一切个人团体利益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对日本侵华“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

2月16日，蒋介石密电指示顾祝同：“对于第三者处理方针”，“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与之切商”“此仅对军事而言，至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顾祝同遵照蒋介石

的指示，就军事问题和周恩来进行会谈，达成了中共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办事处的协议，这是血战十年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

周恩来像智勇双全的舵手，使西安事变这只飘荡不安的航船，绕过了暗礁、险滩、恶浪，终于驶达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的罪恶政策和团结抗日的彼岸。国际舆论认为，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一跃为闻名世界的主角而登上了舞台。

3月中旬，周恩来离开战斗60多天的西安，胜利返回延安。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两双扭转乾坤的巨人之手紧紧握在一起。

陕北高原，春山如笑，生意盎然。

延安，残冬尽消，春色正浓。



## 第五章二度携手共赴国难

### (一)

日寇在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魔爪伸入关内。中华民族继绝存亡之问题，无法回避地摆在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国共两党停止了自相残杀。为了巩固西安事变所奠定的和平局面，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在西北、东南之间往返奔波。在谈判桌上与蒋介石展开拉锯式谈判，求同存异。

1937年3月下旬，杭州西子湖边的一座别墅里，两党领袖人物开始了高层的直接谈判。

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和诚意，希望国民党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他郑重指出：中共系站在民族解放、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目标上，拥护蒋委员长统一和抗日的，而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具体要求国民党做到如下6点：1.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2.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4万余人；3.3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4.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6.红军防地必须增加。

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合作，口头允诺周恩来提出的有关红军苏区的各项意见。说了好多好听的话：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即使他死了，也要不生分裂”。

蒋介石要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恩来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希望周恩来赶快起草一个共同纲领。

4月初，周恩来返延。

4月上旬，中共中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同意拟定共同纲领和合作宣言作为两党永久合作的基础，并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拟定几项建议在下次同蒋介石会谈时提出。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提议在中共方面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基础上结成新的民族联盟，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其团体；同意推荐蒋为领袖；对其他具体问题，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原则下，进行一切谈判；如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能满意解决，中共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5月下旬，共同纲领草毕后，周恩来到洛阳会见蒋介石，约定下次谈判地点在庐山。

6月上旬，周恩来飞抵庐山与蒋介石继续会谈。周恩来提交了由他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说明中共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

但是，蒋介石推翻了杭州谈判时许下的诺言，撇开周恩来起草的这个纲领，提出：国共合作问题，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指定国民党若干干部和中共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共同组成，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传统由同盟会决定后执行，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同盟会工作如能顺利进行，那么在条件许可时，它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政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周恩来当即意识到，蒋介石关于“国

民革命同盟会”的方案的中心思想是妄图首先把共产党控制起来，然后予以吞并，因此强调指出，共同纲领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只有先承认纲领，才便于商谈组织形式，包括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等问题。

在双方谈及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人员安排问题时，蒋介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改编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从师到连各级副职均由国民党派员充任；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经国民党调查后进行遣编，原指挥员须调离部队。陕甘宁边区问题，由国民党派正职长官。周恩来据理驳斥这些谬论，斩钉截铁地申明：现在是国共两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向国民党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收编。因此，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均不能同意。

这次谈判未获结果。

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蒋介石的意见。本着互让互利的精神，中共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作让步。首先在两党合作问题上，中共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必须先确定共同纲领，并以此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一致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两党各推荐同等人数组成最高会议，蒋介石出任主席，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国民革命同盟会将来的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为了不使它成为国共合作的障碍，可不加以反对，但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政治宣传自由。其次红军及边区问题，中共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适当考虑调改意见，如陕甘宁边区的正职长官可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任等，中共中央曾将这个方案的内容电告蒋介石。

为唤起民众，进一步促成国共继续谈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3项基本政治纲领。并以共产党人以光明磊落、委曲求全的态度，提出中共4项保证，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统一。4.取消红军及其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蒋介石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一天，中共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7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来到牯岭，准备和蒋介石、张冲等人进行第二次庐山谈判。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致上一函，指出“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并随信附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时，蒋介石正在牯岭传习学舍，主持全国各大学教授、各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座谈会”，蒋介石在报告芦沟桥事变经过并发表对外谈话。他言辞沉痛、坚定地学者名流，社会贤达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当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应战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7月17日，国共双方开始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尽快将其发表。蒋

介石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边区政府正职人选上不同意中共所提出的 3 人，主张派“立场很坚定”的丁维汾。关于红军改编，蒋介石仍不同意红军设总指挥部，坚持成立政训处，除派政训处主任外，还要派 3 个师的参谋长，周恩来在红军统帅、机构、名义上作了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的原则，拒绝蒋介石派人参与红军军事指挥。这样，谈判又陷入僵局。

7 月 20 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要员到南京研究抗日对策。随后，周恩来等人转到上海、南京，以等待时机。蒋介石下山前，他的国策顾问、正在庐山养病的陈布雷前来话别。蒋介石看着他心爱的“文胆”，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也来庐山，与我谈判红军改编的事。”说到这里，他凝思着，说，“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显然，他为对手高超的谈判艺术和随机应变的才能所折服。

8 月上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出席，以共商抗日大计。在 11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必须动员全国军民抗日，方能取得最后胜利。听说有人要在外交途径上寻得妥协途径，恢复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事。当前战争中，必须注意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战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应采取游击战。在交通大道，则坚壁清野；在敌人的侧面山地则不退，并组织民众，以军事人才加以指导，奋起抗战。”最后，国防会议决定了“持久消耗”的抗日战略。

国防会议期间，周恩来继续和蒋介石谈判发表《宣言》和红军改编问题。此刻，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但是对国共合作这一关系抗日战争成败的大问题上却仍一拖再拖，不作具体解决。相反，他还授意康泽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宣言》，把其中的 3 项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共产党的 4 项保证。周恩来拒绝这些修改，并主张如果不作改正则暂缓发表。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周恩来再次申明：必须设立总司令部；中共推荐各级指挥人员，均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红军保持独立，国民党不得派遣军政人员。

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上海。8 月 19 日，蒋介石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和急于红军出兵抗日，终于表示同意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编 3 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不派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军队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行派配，南京政府对 3 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一名联络参谋。达成协议后，周恩来、朱德即在当天离宁返洛川，叶剑英留宁继续交涉。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该谈话虽未承担十年内战的责任，对共产党也未持平等态度。但它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宣言所列诸项“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开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

之生命与生存。”实际上承认了国共合作抗日。

中国人民为国共携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振奋。9月24日，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宋庆龄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她的肺腑之言，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心声：“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激动。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料到的。到最后，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重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的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 (二)

抗战初期，蒋介石是积极的。

1937年8月13日，日寇根据“欲置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的策略”，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统治中心直接受到威胁。蒋介石公开发表了抗战声明，下达全国紧急动员令，决定“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淞沪会战爆发了，日寇投入上海战场计有10个师团和海、空军共30万人，中国军队投入47个师，共70万人。蒋介石亲自担任上海战场最高指挥官，亲自制定作战计划，以顾祝同为副总指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分左、中、右三翼抵抗。蒋介石不时带领高级将领亲赴前线督战，鼓励士气。10月间的某夜，他带领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乘专车抵苏州前线，路遇10架敌机空袭，满天照明弹照耀如同白昼。蒋介石一行人躲入车站月台，幸而敌机狂炸苏州市内而未炸车站，才免于死伤。10月22日，宋美龄赴上海前线慰劳将士，行车途中遇敌机轰炸，为逃避轰炸，车速太快而翻车，使她肋骨折断数根，同车的顾问端纳也受重伤。

中国军队抱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同仇敌忾，寸土必争，以低劣的武器抗击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以沉重的牺牲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梦想，开始打乱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直到11月12日，日军以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占领上海。

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际，周恩来正在华北抗战前线。

日寇侵占平、津，兵分3路侵入我国内地：一路沿津浦线南下进入山东；一路沿平汉线南下攻入河北；又一路沿平绥线攻入山西，华北战局十分危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重托，于9月初从延安抵达太原，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问题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使八路军在战局危急的时刻，能够顺利地开赴华北前线。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分别进入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北、以吕梁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以太行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南，开始了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八路军刚开进山西时，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相继失守，骄狂的日军长驱直入，阎锡山为“守土保疆”挽回晋北危局，准备在平型关与日军会战，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周恩来与他研究了平型关战斗的计划，决定八路军以运动战配合。9月下旬，平型关战斗打响后，八路军将士奋勇杀敌，使得阎锡山筹划的战役以八路军获得空前大捷创造了抗战的首胜之役。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也使国民党军队为之振奋。阎锡山等人决心对日军进行有效抵抗。周恩来为推动他们抗战，应邀参与作战计划的研究，协调八路军与他们的军队共同作战。10月初，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到太原与阎锡山一起部署忻口会战。他得悉周恩来也在太原，立即要求见面。卫立煌对周恩来一直敬佩，东征陈炯明时，周恩来是他最信任的领导，这次在阎锡山的客厅里，他一见周恩来进门，立即站起来恭恭敬敬行军礼。周恩来热情鼓励他到忻口迎敌，并精辟地提出了有关的战略原则：“从整个战略来说，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办法，主动去迎击敌人。就是正面作战的部队，也不可使用单纯防御消极的战法，而要采取积极的‘反突击’”。

忻口战役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以后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战例。为了进行这次战役，阎锡山调集了8万兵力，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黄绍竑负责娘子关方向阻敌。周恩来携带电台随阎行动，协调八路军作战。会战之初，阎、卫等人根据日军三路推进的态势，将主要兵力放在代县、忻口间的中地区正面阻击。周恩来根据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指导思想，认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钳制当面之敌。而以大部诱敌，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同蒲路东的右地区部队应以广泛的游击战牵制敌军；同蒲路西的左地区以游击战来破坏和阻止敌军前进；在晋东组织铁路员工和炼矿工人破坏铁路、煤矿、配合忻口战场；电请南京增派3个主力师实行战略的北上出击。阎、卫等完全赞成这一计划，并下令执行。周恩来还与他们商定：参战部队为统一指挥，右翼晋军10个团归朱德指挥；中路归卫指挥；左翼归晋军将领杨爱源指挥；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

战斗展开后，国民党仍习惯于正面作战方法，周恩来一再建议：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数钳制敌军，主力向东北出击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敌突入、避免败溃。阎等表示同意这个部署，但以后的实际战斗并未完全按照这个建议展开。参战的八路军各部执行了这个部署获得了很多胜事，包括一二师袭击敌人交通线，一次摧毁敌运输汽车500多辆，歼敌500余人；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烧毁敌机24架；一一五师一度收复了繁峙、蔚县、曲阳等城镇和平型关等隘口。由于八路军的有力配合，忻口会战正面战场坚持近一个月，成为抗战初期，国民党有较大影响的战役。

忻口失陷后，卫立煌从前线退到太原，再次见到周恩来，他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部队帮了大忙，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向八路军表示感谢。”

11月7日，日寇的炮声已震动了太原城，周恩来还在伏案工作。直到晚上处理完工作，才从容不迫地问他的机要组长李金德：“阎锡山走了没有？”李金德回答：“他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周恩来这才说，“好吧！那我们也走吧！”这时，日寇逼近太原城，周恩来一行匆匆来到汾河岸边。8日，太原沦陷，第二战区首脑机关迁往晋南的临汾，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也进驻城郊。在这里，他继续指导华北战局、指挥八路军逐步推进到华北各前线作战。

16日，周恩来在山西临汾党政军联合大会上，以《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说。他首先分析目前抗战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军队抗战颇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外的调停空气相当抬头。其次指出：必须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坚持抗

战到底。最后，号召八路军必须以坚持华北战场为中心，留在华北前线，发挥自己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须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建立民主地方政权，实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和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周恩来的演说，鼓舞了华北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参与山西抗战 80 天。他统一领导了入晋的中共党、政、军各方面工作，正确地执行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各方建立良好关系。这是国共两党在整个抗战期间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

东南战场的蒋介石，淞沪沦陷后，日寇水陆并进，西犯南京。于是南京的防守问题益发突出。为此，蒋介石于 11 月 17 日起在南京连续召开 3 次高级幕僚会议。作战组长刘斐根据敌我态势和地形等不利形势，认为南京是守不住了，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支持刘斐意见。蒋介石说刘斐的看法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训练总监唐生智则坚持主张死守。他说：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表示南京必须防守，11 月 24 日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11 月底，日本空军已对南京多次空袭，其中两次轰炸飞机场，所有中央机关都已纷纷迁往武汉。而蒋介石则继续留在南京，为避免遭受敌机轰炸，他和宋美龄住到中山陵山下树林荫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极小的两间房子里，吃饭、会客、办公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12 月 4 日，日寇进抵南京郊区。晚上 8 点，蒋介石召集南京师长以上高级官员开会，作临别讲话，他说：“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都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的神圣职责。”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武汉。

唐生智抵抗不住日寇的大举进攻，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大批日寇进城后，惨绝人寰地屠杀我军民 30 万。日寇的野蛮暴行，实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宣言，表示要长期抗战。他说：“国军退出南京，绝不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12 月中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周恩来在指导中共在我国南部工作的同时，继续同蒋介石就两党关系、团结抗日的有关事宜进行会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实际已转移到武汉。国共两党共赴国难，携手抗日，使一个在刀光剑影下几乎窒息了近 10 年的江城重新沸腾起来，为中国现代史谱写了绚丽璀璨的一页。

在民情激愤，举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既以周恩来为谈判对手，又想通过接纳周恩来以表明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1938 年 1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蒋介石任命其嫡系宠将陈诚任部长，也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周恩来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有关规定，向蒋介石婉言推卸；另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当蒋介石采取合作态度时，一般应采取赞助的立场，开诚合作；说明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中共在该部任职，对推动政治工作，改造军队，坚持抗战，扩大中共影响均有好处。在蒋介石再次坚持要周恩来出任时，他又一次请示党中央，说明“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的力量得到加

强”，同时他也感到，虽然与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但周恩来早在黄埔就认识他，双方容易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终于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也是国共合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因而颇为社会所瞩目。

在武汉，周恩来对蒋介石既要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要批评和反对其损坏两党关系以及损害抗战的行为。同时，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建立起来，但却没有共同纲领和组织的组织形式，只能采取有事协商，临时约见的办法，更增加合作的不稳定性。

在周恩来就任政治部副部长不久，国民党通过武汉《扫荡报》发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想把共产党吸取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2月10日，他对周恩来说：“对各党派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明确回答他：“党是不能取消的、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在联合中找出路，”最后蒋介石也觉得理亏，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能限制各方，对党派亦无意取消，马上通知各报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同时，周恩来对蒋介石所表现的抗日积极态度，则予以充分肯定。日军占领南京后，认为国民政府可能屈服，就提出了苛刻的和谈条件，包括承认“满洲国”、在华北和内蒙古占领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和日本合作，等等，这些要中国放弃被日本武装侵占的全部国土的条件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对此，蒋介石表现了对日的强硬态度，发表谈话，驳斥了近卫的《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周恩来对蒋介石在谈话中所说的“共同反共即灭亡中国”的论点，表示拥护与赞赏。

在周恩来努力下，武汉时期国共关系较为融洽，蒋介石也毕竟做出一些民主姿态和积极抗日的表现。

日本在威逼蒋介石投降不成之后，继续向中国内地大举进犯。为对付日寇的侵略，国民政府于1938年春改组最高统帅部，任命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调整了军事部署，把全国重新划为6个战区：第一战区（平汉路地区）司令长官程潜；第二战区（山西省）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苏、浙地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两广地区）司令长官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第五战区（津浦路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六战区（甘、宁、青地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

为严肃军纪，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到河南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会上他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那么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你负担！”韩主席就是韩复榘，他是第三集团军司令兼山东省主席，为保存实力，竟然不战而逃，被称为“长腿将军”。韩复榘一向以资格老而傲上，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山东的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话音未落，蒋介石即声色俱厉地截断他的话：“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还想反驳，身旁的刘峙即劝他走出会议厅。蒋介石早在外边布置好军统特务，他们将韩

逮捕，押回汉口，经军法处会审后枪毙在关押他的房里。

3月底，蒋介石在武汉主持了国民党全国临时会议，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和设立国民参政会。《抗战建国纲领》体现了国民党抗战初期的进步政治主张，与抗战前国民党的国策相比，无论是从对外的抗日政策还是对内的政治开放，都有相当大的进步。在外交项目中，提出“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在军事项目中，规定加紧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武力训练，并“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政治项目中，规定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严惩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经济项目中，规定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工、矿业，实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整理发展交通事业，调整和管理内外商业贸易等，并提到“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项目中，规定了在有限范围内发动群众抗日、组织群众团体。教育项目中，规定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

会后，国民政府设立非常委员会主席团，由17人组成，其中有蒋介石和周恩来。非常委员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容纳各抗日党派，并允许各抗日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其中中共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参加。

不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恢复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的决定，虽然事先未征求中共方面的意见，但确实是国民党要求合作的一种表示。

在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和谐气氛中，周恩来以他的辛劳和智慧推动与扩大统一战线，领导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中旬，为宣传中共抗日路线和方针，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共在国统区的唯一合法报刊《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周恩来特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报头，日后该报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的精神，积极报道中国军队的抗日战绩，起了抗日战争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周恩来则在创刊号上发表：“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亲笔题词。2月8日，他又为《新华日报》“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工农日特刊”题词：“工农大众，是中国抗战的柱石，是世界反侵略战线的先锋。你们如果联合起来，日本侵略的魔鬼，将要在你们面前崩溃，全世界的法西斯阵线，将要在你们面前瓦解。”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日子。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文，指出：民族战争剧烈进行着的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不朽导师和统帅的时候，应该学习他艰苦卓绝的革命史迹，忠实地遵循他的三大政策之路，结成铁一般的队伍，紧携着手，迎接强盛独立之中国的来临。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被选举为名誉理事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全国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团结起来。这种团结不仅仅在最近，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艺术家们分赴各战场、各地，更多地接触人民的生命，尤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们的英勇奋斗和敌人的残暴，后方动员的热烈，以激发全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



5月2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从武汉派出两架轰炸机，由第十四空军队队长徐焕章驾驶并领队，于凌晨2时45分飞赴日本九州上空，并继续飞往长崎、福岗、久留米、佐贺等城市，投发了20万张反战传单。上午10时，飞机从容渡海安全返航。21日晨飞抵汉口机场。22日，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向凯旋归来的空中英雄进行慰问并献旗。周恩来在献旗慰劳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国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的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5月25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在汉口中山路“一江春”举行盛大茶会，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以及日、美、英、比、法、苏、荷等国人士共400余人应邀出席。周恩来在致词中说：我们共产党人，特地召开这个茶会，来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并邀请国民党党政军当局及其他各界代表人士参加，表示我们全中华民族，已经团结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经过十年内战后重新出来和外界接触，各方面人士都很想了解中共的情况。周恩来利用在军委会政治部的任职，广泛地结交朋友。

在国民党上层政界人士中，他不仅与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人有较多的工作接触，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与冯玉祥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冯玉祥是国民党的主战派，1938年2月，周恩来登门拜访了他，向他介绍了中共全面抗战的主张，分析持久抗战条件，给他以很大的启发。他对周围的人讲：“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他在会客室写下8个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既表示对周恩来的敬佩，又要以多读书，开阔思想，提高认识以自我鞭策。这以后，他常请中共代表团人员给他的办公室人员讲课、作报告，一系列的友谊交往，使冯玉祥在思想感情上更加接近中共，成为力主国共合作的重要代表。

周恩来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一直保持友好联系，经常约他们座谈、杂叙。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在汉口中央银行大楼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勱，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事，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同时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些交往，不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为促进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中共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

### (三)

日寇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力嚣张。1938年1月，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进而直逼武汉。日寇决心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这时，国民政府集结重兵于津浦铁路南北两段间，依托既设阵地阻击敌人，牵制敌主力于津浦铁路，以迟滞日军溯江西进武汉。蒋介石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坐镇徐州，指挥南北两线作战，并调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前往协助指挥。他在下达守卫台儿庄的命令中称，“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长、林次长亦有处分。”

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能和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3月上旬，白崇禧上前线之

前，专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他在熊廷弼路的寓所，商谈对津浦战场的作战指导方针。周恩来分析说：“日寇现在是调集精锐分进合击，这就需要我们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驰骋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这里的日寇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寇。而在徐州以北，则采用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

“周公言之有理！”白崇禧对周恩来鞭辟入里的分析由衷叹服。白崇禧走后，周恩来又叫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赶赴徐州，会见李宗仁，转达一些补充意见。张爱萍首先向他介绍敌军最近信息和徐州周围地形：日寇侵占济南的一个不完整的师团非常嚣张，企图从华北到南京，长驱直入，这个师团孤军直入，骄兵必败。而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好，有利于我，张庄、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张爱萍见李宗仁在沉思，又鼓励他：你们广西兵历来有战斗力，况且有八路军战略上的配合，可以取得相当可观的战绩。这样，既给日寇以一次沉重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的威信。李宗仁听后连连点头称是。

李宗仁基本按照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3月上旬，李宗仁采取诱敌深入、包抄围歼的战术，将日寇矶谷师团4万人诱入徐州西北60公里的台儿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与日寇在台儿庄激战7昼夜，汤恩伯的第二十集团军从外线将日寇包围，我军里外夹攻，对陷入重围的日寇发动歼灭战，消灭敌2万人以上，击毁敌坦克30余辆，缴获大炮，机枪不计其数，取得了我国抗战以来的一次空前胜利。

台儿庄捷讯传出，举国欢腾，抗战精神为之一振。武汉还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蒋介石也感到吃惊，因为在战斗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他的嫡系部队。

台儿庄大捷，虽然是一次很大的战役胜利，但没有起到扭转中国整个战局的作用。开始，蒋介石颇为冷静，认为这只是抗战的初步胜利，不足以言功。他发电勉励全国同胞：“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之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个月来全国之期望，消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难苦未已：凡我全体同胞与全体袍泽，处此时机，更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务当兢兢业业，再接再厉，从战局长远着眼，坚毅沉着。竭尽责任，忍耐劳苦，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

然而，国民党内还是很多人骄傲起来，错误地估计日寇已无决战能力。蒋介石也一心想扩大台儿庄战果，便不顾实际情况，又向徐州地区增调20万兵力，使这个地区兵力合计不下60万之众。他命令李宗仁在津浦线正面集中优势兵力，将日寇“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4月下旬，日寇放弃了津浦线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机动的机械化部队，从西侧迂回包围，总兵力增至40万人，并投入大量飞机、坦克作战，使我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李宗仁为避免集中在一个地区的几十万大军成为日本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大批杀伤的对象，决定向豫皖突围，5月19日，弃守徐州。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忻口会战之后中国抗日战争又一次大的会战。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虽然最后以中国撤退徐州而告终，但为掩护全国的战略转移，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四、五个月的宝贵时间。

日寇侵占徐州后，南北两战场的日寇已联结起来，日本大本营决定武汉

作战大纲，叫嚷，“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企图一举攻克武汉，围歼中国部队野战军主力，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于是，日寇集中兵力，沿陇海铁路四进，准备占领郑州，然后沿平汉铁路垂直南下，直取武汉。

蒋介石认为，郑州一失，则不仅直接威胁武汉、西安，而且进而窥视我西南大后方。为拒敌于郑州以东，于6月6日在郑州花园口炸决黄河堤，结果淹死了3万群众，却没能挡住日寇的进攻。7月下旬，约40万日寇兵分3路，在强大的海、空军和毒气部队的支援下，迂回包围武汉。

武汉会战前夕，周恩来为阐明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思想，推动蒋介石抗战，于《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他强调：在动员上，要用最大的决心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线外线结合夹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

蒋介石亲任“保卫大武汉”战役的总指挥，部署了第五、第九战区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30师的兵力参加会战，他在江南组成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第二兵团（总司令李汉魂），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依托幕阜山、九宫山、庐山等山脉构筑阵地防守；在江北，组成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依托大别山、富金山等山脉构筑阵地防守，并在马当、湖口、武穴、田家镇等江防要塞设防。

8月初，武汉会战开始，敌我双方在数千里的战线上，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战。在长江南北、皖西及豫东等各个战场，我军英勇抵抗了日军的进攻，在马当、瑞昌、万家岭、马头镇、田家镇、固始、高城等战斗中，浴血奋战，反复肉搏。我海军面对日寇大批飞机和占优势的军舰，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击沉敌舰13艘。“中山舰”在长江金口抵抗着15架敌机的轮番轰炸，舰长萨师俊被炸断腿，血流如注，他忍着剧痛紧抱铁柱继续指挥全舰官兵战斗，直到战舰下沉，全舰将士英勇殉国。

在日寇优势火力，精良的部队进攻下，我军死守的防线一再被攻破。至10月中下旬，日寇已逼近武汉。我军被迫于10月25日撤出武汉，江北及鄂北的部队撤往平汉路以西的沙洋和随县一带，江南的部队沿粤汉路撤至岳阳以南。

这次会战，虽以中国放弃武汉告终，但它使日军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消耗，日寇的战略进攻在此次会战中达到顶点，尔后即开始走下坡路，从此，再无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保卫大武汉”战役期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及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团结和组织了云集在武汉三镇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界人士，不分昼夜，积极工作。他们组织抗敌演剧队在武汉三镇，到激战的前线，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战区的上空到处飘扬着团结抗日，慷慨激昂的歌声：“鲜血沸腾在鄱阳！荷花开遍了长江。全国发出了爆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保卫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国共合作歌》）。

邓颖超也和宋美龄密切合作，有声有色展开妇女抗日救亡活动。邓颖超、吴贻芳、刘清扬等人热情帮助宋美龄办好由“新妇女指导委员会”主持的“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以宋美龄任会长，邓颖超、李德全任副会长的“战时

儿童保育会”，从战区抢救了很多儿童到安全的后方，并通过募捐、筹款、办保育院等形式救济和抚育难童。

10月初，日寇继续向武汉进逼。刚返回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恩来急速来到武汉，在此危急的时刻，他又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批评了由于武汉不保而产生新的悲观心理，使某些国民党人能从困惑中看清前途。他指出：保卫武汉要发扬我国的政治优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只要我们能绝对相信这种政治优势，努力发展这种政治优势”，游击战争的烈火将燃烧到华中、江南，“敌人虽然深入了我们的内地，直等于进入墓地。”武汉的得失，决不能看作是否能长期抗战的关键，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即使从武汉撤退了，“只要艰苦奋斗，抗日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周恩来这次从延安赶回武汉，还给蒋介石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函原文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凡在国人、无不崇拜。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无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得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者注）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信表达了中共真诚团结的愿望和对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10月下旬，日军已占领武汉郊区，敌机在市区狂轰滥炸，形势越来越紧张了。22日下午，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应蒋介石的召请从华北战场飞抵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周恩来先把朱德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休息，并为他准备好交给蒋介石的《建议书》。周恩来在《建议书》中写道：“根据目前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根据作战部队的实际情况，根据蒋委员长关于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的讲话精神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动员全国民众实行真正的人民的持久战争思想，我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撤离武汉后，迅速创办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训练连以上、师以下各级指挥人员。训练班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由国共两党协商决定。训练班的基本教材，为中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傍晚，周恩来陪同朱德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看建议书，满口答应在南岳举行训练班。第二天上午，周恩来送走朱德后，又立即投入紧张的撤退前的各种善后工作。

10月24日，日寇的大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还夹杂着机枪的哒哒

声，到处是浓烟烈火、断壁残垣、尸体狼藉。爆炸的声浪，扬起了片片枯叶和废纸，周恩来神情严峻，浓眉紧锁，时而穿行在炮火硝烟之中，时而出没在大街小巷里。视察战场、慰问伤员，召见地下党负责人布置武汉沦陷后的工作。……天全黑了，他才回到办事处设在鄱阳街一幢有地下室的楼房里。

深夜，日军已踏上武汉郊区，周恩来来到汉口界限路《新华日报》馆，炮弹的爆炸声震得房屋摇晃，碎玻璃唏哩哗啦往下掉。周恩来不顾同志们的劝告，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25日凌晨，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印好了，他才和同志们一起在隆隆的炮声中告别武汉。

蒋介石也是武汉失守前最后撤离的人。撤离武汉前，他发表《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此次兵力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攻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的枢纽，绝不可认为战事失利与退却。”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撤退到湖南省衡阳市北面的南岳，但因飞机迷失方向而又返回汉口。当25日凌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起飞时，日寇已逼近到汉口城外仅有15公里路程的地方（四）

#### （四）

武汉失守以后，长沙暂时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云集的地方。11月初，蒋介石在这里主持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日寇进攻长沙，则实际“焦土抗战”，将市内的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之后，他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11月12日，日寇侵占岳阳，并继续向新墙河进攻。上午9时许，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打来电话，告诉他委员长要对长沙使用焦土政策。没过多久。张治中就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令：“限1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接到这个电令后，立即指定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制订焚城计划，拟定俟日寇进抵汨罗江，即发出空袭警报，由警备部队胁迫老百姓出城，然后放火焚城。

夜里，张治中接到日寇到达新河（长沙附近）的报告。其实日寇此时仍在新墙河（岳阳以南附近），有人把“新墙河”误传为“新河”，这一字之差，相差200余里。由于深夜人静，没有办法核实报告的真假，而果真是日寇攻占长沙而长沙又没有变成“焦土”的话，张治中是没法向蒋介石交代的，于是，张治中以电话命令酆悌，将已准备妥当的引火器材点燃焚城。因为事关重大，酆悌向张治中要放火的“命令公文，”张治中说：“时间紧迫，先执行照办，正式命令马上就到。”酆悌遵命而行。很快，整个长沙市被大火吞没了……。

周恩来虽然不知道蒋介石要火烧长沙，但对蒋介石的整个撤退计划和安排是心中有数的。11月12日，正是孙中山先生诞生72周年纪念日，尽管军事形势相当紧迫，国民党军政要员大部分已离开长沙，但是，周恩来仍然召开纪念大会，并从容不迫地介绍了岳阳前线的战况和当前抗战形势，指出抗战最后胜利的必然前途。最后他叮嘱即将撤离长沙三厅人员说：敌人距长沙还远，晚饭后慢慢走，沿途多做宣传工作，注意敌机空袭。

深夜，周恩来回到长沙寿星街住处，又忙于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撤退工

作。当办事处开走最后一辆卡车时，已是深夜 12 时，办事处只剩下周恩来、叶剑英，副官邱南章和司机 4 个人，周恩来叫邱南章打电话给陈诚办公室询问敌情，因为陈诚、白崇禧和周恩来约好明天一早一起到南岳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陈诚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风平浪静，日军还在洞庭湖。”这时，劳累一整天的周恩来才躺下入睡。

没有睡多久，周恩来就被周围的爆炸声惊醒。起床一看，到处一片火海，他冷静地判断情况，便和叶剑英、邱南章向外走。到门口一看，糟糕！汽车和司机都不见。周恩来镇定地说：“不要紧，这里离湘江不远，赶紧撤到那里去。”说罢，3 人手拉手钻出火海。

到了湘潭渡口，天已亮了。码头上，撤退车马挤成一条长龙，周恩来看到陈诚、白崇禧的汽车也在里面。据说。陈诚和白崇禧虽然知道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但也没有料到烧得这样突然。他俩哭笑不得，邀请周恩来等人坐上他们的汽车一起南下。

14 日，周恩来等人赶到南岳，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就长沙大火的责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长沙大火是 20 世纪以来世界最大的人为大火灾，它显然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国民党的有夫人员竟把它说成是中外战争史上常见的“坚壁清野”，企图开脱责任。周恩来清楚，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谁也不敢放火焚城的，然而为了继续团结蒋介石抗日救国，他没有点明长沙大火的主犯，只是从正面阐述“坚壁清野”的含义，并提出处理善后的意见。

他说，“‘坚壁清野’是一种深入的组织群众，同仇敌忾，共同制敌的工作，必须极端关心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尽量减少损失。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他们才愿意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具体做法上，要认真安置好老弱妇孺，组织青壮年配合部队把能搬走、能埋藏的物资处理好，只剩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毁掉，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而长沙大火，事先不通知老百姓，深夜里全城放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多少物资，侥幸逃出火海的人因寒冬腊月冻死饿死了不少。这种便宜敌人，难住自己的做法，绝不是什么“坚壁清野”。武汉沦陷前，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就散布抗日必亡论，说什么再抗战，全国就要成一片焦土了。现在，长沙已成焦土了，还说是‘坚壁清野’。这岂不是中了汪、陈之流反对抗日战争，主张投降的毒么？除了汉奸、日寇欢迎，还有谁高兴呢？”

听了这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除极端顽固分子外，无不为之动容。蒋介石自知理亏，不得不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善后办法：严惩放火责任者、拨款救济灾民、帮助居民修建房屋，稳定人心。

16 日，蒋介石和周恩来各自乘坐汽车从南岳赶到长沙。

当蒋介石走上劫后余生的长沙最高点——天心阁，俯瞰全城，发现几天前还是繁华的街道此刻已变成一片瓦砾的时候，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突，嘴里哼哼叽叽。随行人员见状，暗自思忖：委员长要杀人了。果然，不多时，蒋介石就下令逮捕直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警察局长文重孚 3 人。命令第九战区军事分监部组成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判决前，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曾力保他的亲信酆悌免于死，但他的政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不肯放过。审判长钱大钧看张、陈矛盾，但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上报蒋介石。酆悌本是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后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二组组长，颇受宠爱。可是蒋介石知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因此，他在判决书写上“疏鲁怠情、玩忽职守，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几个字。18日早晨，新任长沙警备司令俞济时遵令将酆、徐、文3人枪毙。当天，蒋介石返回南岳。

大火的善后工作，十分艰苦繁杂。周恩来到长沙，在余火未尽的省财政厅，设立了善后救灾办事处。他以三厅所属的5个队为主力，组成一支善后工作突击队，分头活动。或抢救伤病员、清理死难尸体以得到掩埋和认领；或抢救粮食物资、扑灭余人，清理街道；或开设粥米站，动员灾民回城，发放救济金；或出墙报。恢复抗日宣传，等等。周恩来以过人的精力运筹帷幄，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了人少事多的矛盾，顺利完成大火的善后工作。尤其是发放救济金，国民党有些贪官污吏想利用这个机会捞一把，争吵不休地要他们经手发放。灾民也议论纷纷说，历来救灾都是贪官发财，群众背名。周恩来从政治影响和灾民利益出发，亲自抓了这件事，干脆利索把50万元每人5元的救济金分发到灾民手里，哪怕是在大火中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份。事后灾民知道此事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的，都说，“难怪！只有周公才有这样的魄力。他开创了赈灾史上一个廉洁的范例。”

在救灾宣传中，有些同志鉴于“长沙大火”是蒋介石的“焦土政策”造成的，因此不愿写上诸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周恩来耐心开导他们：“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还是照旧写、照样贴，他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嘛！现在他还讲抗战，也下令枪毙放火主犯，同意拨款救灾……，这些对于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有利的。”说得大家心诚口服。

在救灾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亲笔起草了一份激动人心的《告长沙同胞书》，他首先极其严厉地批评放火者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然后非常策略地把笔锋一转，指出“大火”已经给人民、给抗战带来了莫大的困难，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大家团结起来，重建家园，坚持抗战。《告长沙同胞书》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长沙人民的抗战情绪重新高涨起来。

25日，周恩来从长沙赶回衡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

日寇占领湖南岳阳后，因为随着战争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兵力越来越感到不足，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日寇既然不进攻长沙，蒋介石本想把统帅部迁回长沙，可惜长沙如今已付之一炬，蒋介石只好于12月初来到战时的首都重庆。

12月18日，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借口，带着老婆陈璧君、秘书曾仲鸣乘飞机离开重庆飞到昆明，次日又飞往越南河内，公开叛国投敌，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

因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所以他的突然出走，中外瞩目，以为他是受国民政府密使，去和日本讲和的。蒋介石是21日在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时接到云南省主席的电报，知道汪精卫已叛逃的。24日下午4时，蒋介石飞回重庆。当晚，蒋介石让顾问端纳转告美、英大使，声明：“江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媾和、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26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如果中国同意日军驻扎华北，允许内蒙古设立特别区，中国就不会有1937年7月7日的抗战，……日本现在缺少的是一个能被欺骗和威吓制服的中国，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幻想通过和谈和妥协而求得国家的独立和平等，那简直是无异白日做梦。”

12月27日，蒋介石给在河内的汪精卫发去电报，劝其速返重庆。汪精卫不予理睬。随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主持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行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和敌后根据地军民以及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纷纷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提出“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定”，“打击卖国叛党的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

1939年1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反动实质，并对各种妥协投降谬论作了批判。同一天，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声讨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指出：“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的抗战力量。”全国规模的反汪怒潮，使汪精卫汉奸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阴谋计划遭到沉重打击。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团结战斗一年多来，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战绩。日寇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漫长泥潭，“速战速决”战略方针遭到破产。战线的拉长，日寇的兵力越来越不足；战争的长期化，使得日寇进攻锐气受挫、士气下降。

这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的：

“在经过了十年最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 第六章雾都茫茫煮豆相煎

### (一)

冬日的浓雾不时从长江和嘉陵江的江面上浮起，然后顺着山势渐渐升高，不知不觉就笼罩了重庆城。寒雾所到之处，公路、房屋和人群都变得影影绰绰，好似蒙上一层铅灰色的帐幔。目力很好的人也只能看到一点轮廓。

1938年12月，蒋介石、周恩来先后从南岳转移到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如同这茫茫雾都一样吐散着阴郁的闷气，国共两党的磨擦斗争也时隐时现。

中共代表团的办公室以及周恩来、邓颖超住处坐落在曾家岩50号一座日后被人称为“周公馆”的小楼。蒋介石对“周公馆”的里外环境作了苦心安排，特务头子戴笠公馆就在它侧面的一条胡同里，周恩来的出入只得在戴公馆附近上下汽车，还得徒步走过一段狭窄的小胡同；而小胡同的西侧，还有三、四家茶馆和几个香烟摊子，这都是“戴老板”布置的“坐勤”；周公馆小楼有3层，传达室由国共双方各占一半；就连通往防空洞和厕所的路上，也住着一些特务。

12月12日，周恩来应约来到郊外的黄山官邸会晤蒋介石。风景秀丽的黄山坐落在长江的南岸，与重庆城区遥遥相望。黄山因乃本埠白理洋行买办黄三阶的产业而故名。抗战前就是达官贵人的避暑胜地，南京保卫战前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黄山开始被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郊外官邸。一幢幢小巧的别墅，掩映在绵延起伏的绿树之中；一条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高低错落，通往幽深的花圃，恍如世外桃源。

此刻蒋介石却无心赏景，而是皱起眉头，绞尽脑汁思索着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在同中共的长期交往中，他深知这是一个其纲领和政策深得民众赞同而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极大影响的政党，其存在与发展是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最大的威胁。因此，在过去总是想方设法将共产党一举剿灭。然而，事与愿违，共产党虽然几遭挫折，甚至濒于绝境，但是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并且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和更为迅猛的势头发展壮大，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极度的惊惶。

日寇的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蒋介石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已经无力“剿共”了，只好把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惊惶暂埋心底，以待将来。可是，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并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只好被迫同意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国民党的方针改变了，由原来的“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进攻重点转移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敌后解放区。这时，蒋介石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对日寇和中共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打击和限制共产党。他这次约见周恩来就是怀着鲸吞企图的。

黄山官邸的会晤，拉开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在重庆较量的序幕。

周恩来本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民族斗争第一，统一团结第一”的精

神，为了把蒋介石、国民党留在抗日营垒中，避免内战爆发和国共两党的分裂，再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以“共产党员凭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办法。

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跨党办法，而提出所谓“一个大党”的主张，他说：“大家都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因而不赞成跨党办法。共产党既然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党。”接着，他想引诱周恩来上钩，“如果一时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做不到，那么可先由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

周恩来当即答复，说：“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之出路，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共两党终究是两个党，跨党而不变名字，正是为了取得互相信任。当然，如果时机未到，我们也不强求。至于谈到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里面去成为一个党，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事情；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而且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

蒋介石一味坚持己见：“我的责任就是要把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的革命部分合并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不达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会改变。”

1939年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在自己的官邸约见周恩来商谈所谓“一大党”问题再次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21日，周恩来向延安汇报了两次会晤的情况并提议中央有针对性地发一封密电给蒋介石。2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并转送中央的密电。中央的密电真诚地希望在抗战新阶段中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同时也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的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所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容。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周恩来的信件，则以大量确凿之事实、充足的理由批驳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所谓不满言论，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反共行为，指出：“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并诚恳地建议：“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前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接触既多，基本信念可固。困难既多经解决，进一步办法必随之产生，中共中央之所允诺保证者，亦得于实际中证明其诚意，而增益两党之互信。职所见本末如此，谨率直陈之如上，愿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

蒋介石看了这些电函后，知道通过谈判把中共“溶”入“一大党”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转变手法，集中力量，制造舆论破坏国共合作。

1939年1月底，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报告，扬言“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制定“整理党务案”和“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

会后，蒋介石颁布了五花八门的反共文件。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际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宣传赤化”，“实行暴动”，“阴谋推翻政府”。他御用的《黄埔》杂志，公

然把浴血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扫除”。

6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制造了屠杀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平江惨案”。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的政治重点已由抗日转向限共、反共。围绕着“平江惨案”，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自抗战以来第一次严重冲突。“惨案”发生了，蒋介石先后指使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周恩来，开脱罪责，颠倒是非，把新四军平江留守人员抗日行为说成是“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把残杀浴血抗战的将士说成是“维护后方治安”。为了解决因“平江惨案”所引起的国共之间的磨擦，周恩来特地离渝返延，与毛泽东商讨有关策略原则。

7月，周恩来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部长官，严正批驳国民党军方歪曲报道和造谣中伤。指出：新四军平江留守人员勤勤恳恳地为抗日事业献身，支援前线作战，维护当地治安，决非土匪可言，至于什么藏匿逃兵之说，全是无稽之谈，更不存在所谓拒绝搜查的事情。明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反而诬为“土匪”，而凶手居然无罪，难道古今中外还有如此奇冤么！国共合作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国人只有同心协力，方可挽狂澜于既倒。”“今当局任意加爱国者以上匪之名，沉冤莫白，令实际助日寇者，免国法之讨，怙恶难悛，此风一开，后患胡底。”周恩来要求派员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雪冤治罪。最后，蒋介石为敷衍社会舆论，不得已叫薛岳进行所谓调查。

8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十分中肯地指出：“现在我们遭遇了新的困难与危机，主要是国民党的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克服这一投降妥协危险的关键，在于全民族团结，各党派的合作，其中心是国共两党合作，亦即在于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很有预见性地提醒全党警惕：注意时局有突变的危险。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由一般磨擦发展到大规模的进攻。他气势凶猛地对中共发动三次大的军事攻势，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

12月，蒋介石授意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大举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五个县城和16个区。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蒋介石还集结重兵，准备进攻延安，气焰甚嚣尘上。在山西，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突然进攻晋西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纵队，惨杀共产党人和八路军伤病员。接着，他又图谋控制晋西北，派两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四纵队，并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一二师彭绍辉三五八旅）。蒋介石还想一口吞下太行山，指令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纠合庞炳勋、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等部，兵分三路进攻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华北游击战争中枢和敌后重要抗战基地的太行山区。

反共逆流使统一战线面临破裂，中共为在斗争中求团结而奋起反击。

八路军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调回陕甘宁边区，协同边区留守部队打退了朱绍良部的进攻；驱逐了绥德分区五县的反动军队，使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连成一片。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给阎锡山军队以重大打击后，分别转移到晋西北和太岳区，正式编入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八路军

忍无可忍，奋起自卫，歼灭了朱怀冰、石友三部 2 万人，粉碎了顽军进攻八路军总部的企图，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在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后，为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日，改善国共合作而顾全大局，相忍为国，适时停止了军事反击，并提出重开谈判。

1940 年 3 月底，在莫斯科治伤的周恩来偕邓颖超飞返延安，1939 年 8 月，周恩来要去中央党校作报告，刚刚当上“第一夫人”的江青为了出风头，竟不听毛泽东的劝告，骑上马，跟着周恩来一块走。做完报告后，两人一起骑马返回张家岭，因劳累而疲倦的周恩来缓慢而行；江青跟得不耐烦，只想飞马回家。到了延河边，她突然扬鞭，向前奔去；周恩来的马受惊也猛跳跃起来，冷不防，他摔倒下来，右肘关节不幸骨折。周恩来不得已赴苏医伤。如今半年过去了，他的骨伤并未痊愈，身体也消瘦了一些。战友们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两道浓眉和炯炯双目，仍然光彩照人。

他顾不上休息，连续几次为中央领导核心介绍了即将开始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并结合国内抗战局势，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延安因此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工作部署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

为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5 月 9 日，周恩来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奉劝他看清形势，恳切希望他能维护团结，坚持抗战。信中有道：

“举国抗战，瞬达三载。华北苦撑，赖先生维护其间，得有今日。不幸晋中新旧之争，竟成骑虎之势。来于远道闻之，已感至痛，归后得悉梗概，深觉此种亲痛仇快之事，必有奸人插弄其间，故欲使先生多年心血所造成之抗战力量归于瓦解而后快意者。”“来实为我山西之模范抗日阵线痛惜不置。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

阎锡山的态度于是有所改变，在蒋介石再次发起反共逆流时，保持了中立立场。

蒋介石制造了这次反共军事磨擦，不仅在广大中间势力中丧失人心，而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损失兵力达 3 个师以上。他不得不把军事磨擦暂停下来，被迫坐下来谈判。5 月 10 日，周恩来“因委座电催南下”而离延，31 日，抵渝。几天后，周恩来到黄山官邸会晤蒋介石，向他表明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诚意。周恩来指出：“中共诚意抗日，拥蒋反汪，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到底。有人说中共要暴动，推翻蒋介石，全系造谣。中共是要发展，但中共发展主要是敌占区，是要在那里与敌、汪争取群众。而今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加紧反共、溶共、剿共，制造分裂，准备妥协，这只能帮助了敌人。”

神圣的抗日战争，绕过暗礁，又蓬勃地向前发展。

## (二)

1940 年秋，国际形势的演变，使蒋介石的身价猛涨。

中国是亚洲大陆抗击日本的主要国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德国在欧洲的一连串胜利，鼓舞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互相承认在欧亚的霸权地位。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放手南进攫取东南亚，因此，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做出停开运城、鄂北两个飞机场，从南宁、陇州等地撤兵的让步姿态。面对这种形势，英美两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拉蒋介石加入英美同盟的政策，以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

进。苏联为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积极援华。

一直彼丧师失地弄得一筹莫展的蒋介石，从此春风得意起来了。他意识到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自己开始成为一个受诸方面重视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要借机谋私，于是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蒋介石因为在华北丧失了进行大规模武装磨擦的力量，难以再大有作为。所以，他把反共重心转向华中，伺机进攻新四军。

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致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是“自由行动”、“自由扩大”、“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30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新四军大举进攻；密令重庆的军统特务严密监视周恩来，不准他离开重庆一步。

身为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利用他在国统区的特殊条件，一方面将所了解的各方面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直接参与党中央对顽固派斗争的决策；另一方面，在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同顽固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他根据各种迹象判定，反共高潮正在上升，蒋介石的企图就是从局部“讨伐”入手，逼迫中共领导的武装移到黄河以北。他还向中央提出，对《皓电》决不能同意，但必须给以回答，不能置之不理。11月2日，又致电中央，提出为准备同蒋介石决裂，必须顾及国统区力量的疏散和隐蔽；建议暂缓发表通电，“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避免的袭击”，也有利在重庆争取避免破裂的可能。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应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之计；全党要有秩序地撤退，博古、凯丰即返延安，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与此同时，加强统战工作，动员舆论界力量呼吁停止内战，力争局面好转。周恩来根据党中央部署在重庆疾声呼吁，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必亡党亡国，有百害无一利。他不辞劳苦，拜访了许多民主人士、中间派人士和国民党元老，向他们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呼吁他们支持国共团结，反对内战和投降。周恩来的真诚态度，感动了覃振、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他们表示愿意联络冯玉祥、孙科等人，共商制止内战的办法；而张申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等众多民主人士也对中共的苦心表示同情和支持。

经过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往返电商，终于做出决策：在皖南采取让步，在华中采取自卫，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的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方针。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名义发表的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对《皓电》进行有力的批驳、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限期将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表示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然而，蒋介石对此让步并不满足，反而视中共以民族抗战利益力重的委曲求全的态度为有隙可乘，他一意孤行，暗中加紧策划消灭华中新四军的阴谋。

11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国民政府军令部拟订的《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以第三、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本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

年1月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东四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12月8日，何、白再次致电朱、彭、叶、项，重弹其所谓八路军、新四军不遵“统帅命令”的老调，要求“迅速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甚至杀气腾腾地申言：“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如不“听从军令调度”，“中央亦难遏其悲愤”，“深惟覆巢完卵之戒，切悟焚箕煮豆之非”，“时机不容再误，遵令乃见公忠”。蒋介石还亲自出面，于12月9日发布要新四军限期北移手令；第二天，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中旬，顾祝同为提高“剿共”效率，方便直接与“总裁”联系，还下令赶修了重庆至上饶的长途载波电话线。

蒋介石做贼心虚，唯恐阴谋败露，于是亲自出马施放烟雾弹，以遮人耳目。为此他在12月25日邀见周恩来。他装成伤感样子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为好。”然后假惺惺大谈他不愿内战，不希望自相残杀，“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接着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我是发展了，你是低落了。如果非留在江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最后则称周恩来是他的患难朋友，提议为“和平与友谊”干杯。周恩来申明了中共的立场，并警觉到这是蒋介石要对新四军发动进攻的信号。第二天，他即报告中央：蒋介石在“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他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后来周恩来曾这样回忆这次与蒋介石会晤：“那时候我在重庆。12月25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10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和副军长项英，对迫在眉睫的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缺乏精神准备，又强调“北移困难”，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应“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延迟”的命令。他坚持新四军留在皖南的错误主张，拒绝北移。直到中央对其严厉批评与督促，才决定于次年1月初北移，这已给顾祝同得以调兵遣将的充裕时间。顾祝同按照蒋介石关于“对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指令，抽调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七个师和二十炮兵旅，计七八万人，在新四军北移途中设下重重埋伏，并指定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对北移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的总指挥。

1941年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主力部队6个团约9000人，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悲壮歌声中，冒雨由云岭启程北移。他

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在前进途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场血雨腥风。

6日，蒋介石正式发出讨代电令：“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决强制执行之。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顾祝同接电后，马上命令上官云相：“为整饬法纪，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予进剿，仰贵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

7日，新四军刚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群起围攻。新四军将士奋起还击，血战近9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1000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其中，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为叛徒刘厚总杀害。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这就是皖南事变。

1月11日，新四军浴血皖南的第4天，《新华日报》正在重庆化龙桥虎头岩下简朴的饭厅里举行创刊3周年活动。就在大家凝神静听周恩来讲话时，八路军办事处机要人员从红岩跑步送来一份急电。周恩来看完电文后，以悲愤的心情，向同志们宣布皖南事变的不幸消息。

恰好这时，电灯忽然熄了，大家估计又是国民党特务搞的鬼，都为周恩来安全担心，可是他巍然屹立，坚定沉着。他高声说道：“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

过了一会儿，电灯又亮了。他继续说道：“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所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继续斗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他提醒大家，“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当天晚上，周恩来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形势和斗争方针、措施。随即，他驱车谴责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并写信给蒋介石，要他下令撤围让路。

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告诉“新四军在茂林已被国民党重兵包围近一周，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文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面说明国民党有意破裂。”13日晨，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围攻新四军行动”，旋又约见刘为章进行交涉。15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告以“中央决定在政治上进行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攻击”的对策，并强调“只有猛烈的坚决的全面进攻，才能打倒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

蒋介石在导演皖南血腥事件后，步步进逼。1月17日，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当晚，周恩来闻讯，即驱车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住处，提出强烈抗议。又打电话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夜里，周恩来返回红岩嘴召集会议，向大家讲述皖南事变经过的情况及如何在国统区心脏区坚持斗争等问题，指出，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经过我们的斗争，两党仍维

持合作抗日的关系，我们应该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他对国统区的应变政策作了全面的部署，并表示他将和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到底。

这时《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前来紧急汇报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压禁登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周恩来听后，以愤慨和沉痛的心情挥笔撰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指示刊登在扣稿件的地方，赶在重庆各大报之前发出。

《新华日报》社遵照周恩来指示，巧妙避开新闻检查加紧排印，组织发送报纸队伍。次日凌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送到重庆人民及国内外人士手中，面对周恩来的题词，蒋介石如临大敌，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以《新华日报》违检为由，给予一个“最后警告”的处分。在延安的毛泽东读到周恩来的题词，即于2月2日给周恩来打来电报，表示“欣慰之至”、“为之神往”。

由于周恩来等人在重庆的环境日恶，中央曾来电指示他们于最短期内借故离渝返延，渝办和报社干部也尽量撤退转移。周恩来结合国统区实际采取一系列措施，安全转移撤退隐蔽一大批干部。而他和邓颖超则仍坚守在重庆，团结各方面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争取局势的好转。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经过对国内外形势的慎重研究，鉴于蒋介石还没有宣布取消八路军，还没有宣布中共“叛变”和发动全面内战，为顾全抗日大局计，最后决定以“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来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高潮。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的命令，号召新四军将士为保卫国家民族，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的旗帜。在军事、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后，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善后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搬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支付国法审判。”

1月25日，周恩来约见张冲，面嘱他将这12条善后办法转交蒋介石，蒋介石接到这“12条”，颇感进退维谷，如果接受这12条，那就等于向人民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责，承认自己是“完全错了”，而且要自己惩办自己；如果无理拒绝这12条，就进一步向全国人民暴露自己妥协分裂的面目，使共产党更加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合情合理的12条，使蒋介石政治上进入波动境地。

为了加紧政治攻势，周恩来在重庆做了大量工作，向国际舆论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德国朋友王安娜应周恩来的要求，把事变真相告诉他的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把季来所钦佩的周恩来请到自己家里商谈，随后卡尔将皖南事变的真相报告英国政府。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另一个美国朋友卡尔逊在事变后放弃他的华北之行，立即返回美国。1月下旬即在檀香山发表谈话，就皖南事变抨击国民政府。对此，蒋介石非常恐慌，急令外交部



电示驻美大使胡适设法禁登类似卡尔逊言论。无奈，转眼之间，美国各大报刊都已登载了关于中国内战危机的报道，举国朝野议论纷纷。此外，周恩来还通过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公布皖南事变的材料，打电报给刚刚回国的美国记者斯特朗，附去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立即通过纽约各报把蒋介石的反共真相披露出去。

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后，国内外都感到极为震惊，纷纷谴责或责问蒋介石。宋庆龄等在香港致书蒋介石，奉劝他勿为奸小所惑，应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政策。冯玉祥公开申言：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实没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地方实力派感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也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恐惧与对中共的同情。各民主党派多数人均对中共表示同情，对国民党则大感失望。

东南亚侨领陈嘉庚致电告诫蒋介石：“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弭止内战，加强团结，抗战前途，实利赖之！”美洲侨领司徒美堂通电称皖南事变乃“自坏长城、自促亡国”之奉，美国加州华工合作会致电斥责蒋介石：“当此国家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正需团结而不暇，岂容分裂而内战。曹植七步之诗，煮豆相煎。岳飞十二金牌之诏，宋室以亡。干戈对内，无异于敌人以可乘之机，自相残杀，等于陷万劫于不复之境，国家民族前途，何堪设想。5年抗战之英勇成就，将士热血头颅之牺牲，民众茹辛耐苦之艰困，侨胞节衣缩食之捐输，将一切空付东流，抗战建国之伟业，将功亏一篑。”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于1月25日会见蒋介石，声明：“贵国中央军队与新四军之冲突与斗争，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英美为了让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南进，均不愿意看到于此时进行内战。于是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在内战危险没有消除、国内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援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则面见蒋介石，劝其停止国共冲突，否则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蒋介石等人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有权谋谄谀的蒋介石，不会不感到人心背向严重意义。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粉饰皖南事变以来的严重局势，逃避罪责，减轻来自国内外的责难与压力，蒋介石又使出“拉”的一手、多次诱骗中共参政员出席第二届参政会。2月间，国民党准备于3月1日召开国民参政会。

但是，蒋介石这次打错算盘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决非陈独秀、张国焘辈，中共也决非首次国共合作时那样幼稚，那么容易哄骗。

2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玉皇观与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勱等商谈出席第二届参政会问题。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不出席二届参政会的方针。沈钧儒等表示谅解，并建议中共以12条作为出席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会后，周恩来立即向延安致电提议采纳沈钧儒的建议。14日，延安复电周恩来，同意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将党中央所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12条提交国民党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阵容，坚持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同一天，毛泽东也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于蒋不利，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之攻势（12

条) 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在军事上的守势, 政治上的攻势, 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会破坏国共关系, 只会拉拢国共合作, 不会妨蒋抗日, 只会逼蒋抗日。我们提出 12 条的目的, 不在蒋承认 12 条或其中之一部分, 他是不会承认的, 而在于以此攻势打退他的攻势, 用我们的政治进攻之手来缝好由于蒋介石进攻撕进攻的裂口。”

18 日, 周恩来将七名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致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公函声明: 在中共所提 12 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 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参政会。王世杰得到这份公函后感到事态严重, 立即找张冲商量。

第二天, 张冲亲赴曾家岩会晤周恩来, 要求收回中共七参政员公函, 以免蒋介石翻脸, 并说蒋介石要约见周恩来。周恩来严词拒绝, 说: “公函决不能收回。翻脸已半翻脸了, 现在所能做的, 不过是讨伐令, 全面清党, 逮捕办事处人员, 封闭《新华日报》等, 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 必不能得结果。”

25 日, 张冲再次会晤周恩来。他苦苦哀求收回公函, 甚至说: 为了国家计, 我跪下都可以。周恩来说: 这不是个人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对我们继续政治压迫, 军事进攻, 我们确无让步的可能, 因此, 公函不能收回。张冲又说: 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 你们是忠, 他们(指国民党顽固派)是奸; 你们要顾全大局, 他们是不顾全大局的。前函可称文字有差, 拿出校对一次, 故充暂请撤函, 以便委员长能见周先生。周恩来说: 公函不能撤回, 目前见蒋介石亦没有意义, 因为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张冲又提出三点具体解决意见, 即: 第一, 军事上, 十八集团军的正规军汗到黄河以北, 其他游击队完全留华中, 再归还一军的番号, 以补新四军的缺, 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 边区及晋察冀政权照前议, 第二, 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 讨论党派问题, 以蒋介石为主席, 周恩来为副主席。第三, 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 政治压迫总要解决, 请蒋介石负责纠正, 再不许发生新事件。周恩来答复说, 不拒绝谈判。具体条件可以电告延安请示, 但参政会公函绝对不能撤回。见蒋介石更无必要。

当晚, 周恩来致电向中央汇报。中央当即电示三点, 第一, 非 12 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 确有保证之后, 决不能出席参政会。第二, 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 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第三, 如彼方有诚意则应: 甲, 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 乙, 在两个月内解决 12 条意见及一切悬案; 丙, 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 以便讨论彼方意见。第二天, 周恩来约见张冲, 将中央答复的电报给他看。张冲看后说, 电中所提等于破裂。周恩来当即指出: “破裂的责任在于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 才提出 12 条。”

蒋介石眼看诱骗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未能奏效, 心里很着急。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扬言, 专门等观光参政会开会后, 才返美国。于是, 他又耍出新招, 企图利用中间党派想联合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心情, 以让步的姿态为钓饵, 引诱他们上钩, 孤立中共, 各个击破。蒋介石先是宴请参政员们, 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 并且“允诺”增加委员的人数。2 月 27 日, 蒋介石又会见各中间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勱、褚辅成、左舜生六人, 并原则上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 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 二、军队国家化, 与党派绝缘; 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议之实行; 四、成立各党派委员会, 以讨论并保证以上各项之执行。

蒋介石的让步姿态，使中间派一些人对他产生某种幻想。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瀚溟于是到曾家岩 50 号会见周恩来，希望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

他们走后，周恩来将蒋介石拉拢中间党派及中间党派的态度电告中央。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更有利于以事实揭露蒋介石的哄骗行径，进一步争取中间党派，提出新 12 条：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 6 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新的 12 条与老的 12 条相比，形式上比较缓和，但内容却更加深化，硬没有硬到使统一战线破裂的程度，软没有软到丧失原则立场，这是挫败蒋介石他们在参政会最后玩弄阴谋的有力武器。

3 月 1 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要在重庆复兴关开幕了，蒋介石连派两批特使去请董必武和邓颖超出席，均遭拒绝。蒋介石曲“高”和“寡”孤掌难鸣，不得已决定延长会期一天，继续争取中共代表出席。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书面提出中共的临时解决办法新 12 条，并谓“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能报到出席”。张冲表示时间过急，将信函及 12 条退回，周恩来将函送去，并申明：如果退回原信，就等于表示破裂，接着，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中间党派代表，告以中共为顾全大局，“实已委曲求全”，“改定临时解决 12 条”，倘能接受，并有明确保证，董必武、邓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如仍被拒绝，时局恶化，也“问心无愧”。

中共不出席参政会，理直气壮；国民党无可奈何，束手无策。3 月 6 日，蒋介石在参政会发表演说，仍大弹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但也不得不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中央日报》社论也称：“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共事实也不至发展。”

3 月 9 日，周恩来报告延安，蒋介石的演说“是带防御性的”，12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的攻势（双 12 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做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布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 12 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想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介石的说法是“一种阿 Q 主义，骂我们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

参政会会议闭幕后，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向中共作出缓和姿态。3 月 14 日，他邀请周恩来到其官邸会晤。他一见周恩来，便说，“两月多没有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会后延安有否电来？”

“没有”，周恩来回答。蒋介石要周恩来与延安通电，询问最近中共中央的意见。周恩来告诉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接着又提出新四军

事件及 2 月份的各种压迫事件，要求按中共所提出的 12 条解决。

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事件避而不谈，对其他种种压迫事件则极力推托，说这是底下人所为，他们不明白他的意旨。并表示，关于恢复《新华日报》的正常营业、放李涛等人、发护照诸事，都可办到。

周恩来又提到防地，扩军等问题。蒋介石对防地问题未作回答，但也未谈原先提出的要共产党军队开赴黄河北岸之事，仅谈到：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周恩来提出要见叶挺；蒋介石说他还来到达重庆，如到可以见。最后蒋介石约周恩来下星期再见，这时在座的宋美龄说要请吃饭，3 月 25 日，周恩来。邓颖超应邀出席蒋介石。宋美龄举行的家庭宴会。国共两党争端又趋于平息。

以皖南事变为高潮的反共军事磨擦，虽然使国民党在军事上暂时捡得一点便宜，但因其反共分裂不得人心，政治上的损失很大。在国内外，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而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却大为降低。

不久，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又一次作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并表示要“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从长远讨论“两党提出的问题，以求得合理的解决。”这表明蒋介石在客观形势面前，顾虑到全国出现分裂的危险，正在改变其原来明目张胆的反共态度，开始寻求缓和国共两党的关系的途径，表明他仍有一定的民族性。

而中共仍然本着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执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方针，4 月上旬，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明确指出：在伟大的抗战中，“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

### （三）

1941 年下半年，风云变幻，战争席卷全球。

6 月 22 日，德国不宣而战，突然进攻苏联。当天，自称“在最近 25 年来，没有人比我更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说：“希特勒侵犯俄国只是侵犯不列颠诸岛的先声，因之苏联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2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声明：“美国决定于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已明显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蒋介石因此而怀着一种依赖外力战胜日本的乐观心理和希望日本北进的侥幸心理。周恩来善意地批评这种没出息“想头”，严肃指出内部团结才是中国抗战的铁则。6 月 28 日，周恩来发表《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已屹然不动地坚持了四年”，“因为苏德战争及日本有北进的可能而引起的一种过份的乐观心理，这在我们四年来抗战中已屡次证明是有害的心理”。“我们更不应该过份乐观，致使放松对外，转向对内。”7 月 20 日，他又发表《团结起来打敌人》，说明：不管日寇内阁现作何变动，也不管其侵略方针是先北进而后南进，还是南北并进，但其灭华之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而且还有可能先实行西进。我们应该从敌人先西进做准备，才是万全之策，那种专门希望日寇打别人，是一种最没有出息的想头，为了打击国际上的法西斯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敌人

之一着，他强调，“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今天中国抗战的铁则，谁不遵守这个铁则，谁将成为万世罪人。”

10月19日，周恩来鞭辟入里地分析世界大势，发表《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独具慧眼地预言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本东条上台即是太平洋危机到来，这个新危机的范围，决不止于北进，日寇必然是以占领苏联西伯利亚，囊括南太平洋，解决“中国事变”为其连贯的方针，现在日寇又在太平洋作新的冒险。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

果然，1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以海空军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偷袭珍珠港，打破了美国在军事上继续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并不参战的可能性。日本的大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使中国感到如释重负。因此，美国和日本开战的消息传到重庆，顿时出现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韩素音回忆：

“街上不多时立即喧嚷起来，报童喊叫卖号外，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剧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

12月8日清晨，为避逃日寇飞机狂轰滥炸而住到南郊黄山官邸的蒋介石突然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他立即赶赴重庆，当天上午8时就在曾家岩官邸紧急召开中央常委特别会议，研究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抗战是有利的。首先，美国参战进一步坚定了一贯依赖英美的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决心，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亲德派无疑是一个打击。其次，由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也促进中国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巩固。美国这时更迫切需要同苏联合作，以加强西方对德作战；在东方依靠中国抗战，把大批日军继续拖住在中国战场，以便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为此，它除了在军事上、经济上援助中国外，还需要同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合作。所以，更加需要中国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这对中国国内的反共妥协势力，当然是一个牵制。

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因此，他采取了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方针，以贮存美国援华物资、壮大国民党军队，等抗战胜利后，消灭共产党；而在目前，他不得不暂时“为适应国际环境和抗日局势，对中共采取宽大的政策”，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为主。因为上次反共军事磨擦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要在抗日战争期间用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是困难的，也是国内外形势所不允许的。他在年底召开的国民党九中全会上指出：“国共关系不外僵持、放任、断然处置、和平解决四途。但僵持不可久，放任非常策，断然处置又为国际国内环境所不允，则和平解决实为正当途径。”会议于是确定了和平解决国共关系的方法：第十八集团军完全国有化；整编新四军“残部”归就近战区指挥；取消所有地方部队和边区政府，然后，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和活动，1942年8月，蒋介石约见周恩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国共关系的一些根本问题。

周恩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和蒋介石这种政治动向，认为，目前国共关系会缓和下去，并存在着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根本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也看清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的企图是重演历史上“杯酒释兵权”的老例，想利用国内外的时势和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徒托空言，诱骗中共取消“割据式”政府，交回“部落式”部队，然后迫中共就范。因此，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在目前情况下与蒋介石见面不会有好结果，但又不能拒绝。他建议以林彪代替毛泽东来重庆与蒋介石见面。

毛泽东与周恩来看法一致。10月7日，毛泽东派林彪抵渝，协助周恩来正式与蒋介石、张治中进行改善两党关系的谈判。

谈判歇歇谈谈，拖了几个月。其间蒋介石两次会见林彪。当林彪提到新四军问题时，话未说完，即被蒋介石打断：“你不要再提新四军了，你是我的学生，我才告诉你。”后来又说：“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爱护人才，不会偏私。希望国共问题整个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由于蒋介石没有诚意，别具用心，缺乏应有的实际行动，谈判没有进展。国共关系仍是拖而不解。

1943年春天，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一举歼灭了德国精锐部队33万人，这使苏德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迫使德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且决定了整个法西斯阵营的败局。而美国则完全掌握了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日本眼看就要失掉了。

对世界大战局势的这一突变，蒋介石既喜又惧，欧战一旦结束，英美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抗战胜利及还都南京指日可望；可是三十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战后的民主力量将大为增强，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共更是他封建法西斯统治的绝大威胁。蒋介石为了在战后能维持乃至扩大自己的独裁统治，感到有必要抓紧时机，对中共发动新的攻势。

蒋介石吸取以往的教训，决心做好充分的舆论准备。3月，向来不擅长文墨的他突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一本由御用文人陶希圣根据其主子的思想代笔炮制的充斥着刀光剑影的反共宣言书。蒋介石通令全国军民通读他的“大作”。顿时，神州大地掀起一片反共浪潮。

《中国之命运》篡改首次国共合作发动革命以来的历史，打着三民主义招牌，贩卖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书中声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叫嚣，“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对内的具体目标就是要铲除“破坏抗战”，“妨碍统一”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

两个月后，共产国际为使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本国革命的复杂问题，并促进各国共产党加强与本国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战线，而宣告解散。这本来对中国抗战很有利，但蒋介石以为是加紧发动反共高潮的大好时机。6月，蒋介石唆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夏兴社特务分子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凑合了几个人召开了10分钟的“座谈会”，然后致电延安，要求“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国民党报刊狂叫，“中共既系外生存，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部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蒋介石还七拼八凑所谓“人民团体”通电响应。

蒋介石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了。他密令何应钦、白崇禧急赴陕甘耀县与“西北王”胡宗南商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会后，胡宗南视察了洛川以北地区，做出兵分九路闪击延安的决策。驻守黄河防范日寇的大军奉命纷纷

西调，军车人马络绎于途。换上全新美式装备的 50 万国军完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6 月 28 日，周恩来等一百多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表明国共谈判破裂。7 月初：“国军”开始炮击陕甘宁边区。

为了荡清以《中国之命运》为先导扑面而来的这股反共恶风浊浪，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行径，制止其反共冒险军事行动，6 月初，周恩来即向延安提出了自《中国之命运》发表以及国际解散后的形势分析和对策。他指出：国民党将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加强政治攻势，同时施以军事压力，强迫我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他的所谓政治解决之目的。而我们的对策应该是，因此，我们应向各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多谈边区及有关情况；分化顽固分子，争取广泛同情；着重研究民主合作的道路及实施政策，以教育民主分子；用各种方式宣传我党的抗战和建设成果。宣传我党坚持团结和民主的主张和事实，宣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辅以揭发敌伪某些阴谋与当局政策的矛盾。

延安对来自统战前线的真灼之见极为重视，并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刘少奇主持延安理论会议对《中国之命运》展开批判。随后，《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谁革命？革谁的命？》、《袁世凯再版》，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吕振羽《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文章，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奋笔写下《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向国民党提出一连串的质问，警告它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反共军队，纠正一切错误；朱德致电蒋介石等人，严正抗议对边区的挑衅；延安召开 3 万群众参加的大会，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中共中央从晋绥边区抽调 4 个团；毛泽东还致电彭德怀：如果发生内战，迅速从五台、太行山两个区抽调 10 个大团支援边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地军民纷纷举行民众大会，发表通电一致表示：誓为陕甘宁边区的后盾，坚决打退反动派的进攻。

7 月 16 日，周恩来回到了阔别四载的革命圣地延安，同时回延安的有邓颖超、林彪、孔原等 100 余人。8 月 2 日，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全体中央委员出席了对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盛大欢迎会。在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后，周恩来讲了话。他阐述了自己离开延安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共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党的发展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严厉地批驳反共分子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攻击和诬蔑。

8 月 16 日，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贩卖法西斯主义并发动反共高潮而撰写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深刻地分析了国民党统治的实质，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本性。文章指出：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唯心论、其伦理观，是倡导儒学的“四维八德”；其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其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的歧视的压迫”；其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其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相结合物”；其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其经济思

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蒋介石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在抗日战争，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手法，扩大自己力量，排斥异己，抗日不力、反共却颇为积极。但“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

中共政治攻势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民主政团主席致函蒋介石，正告他“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力以内争之有？”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通电全国，反对进攻陕甘宁边区，以免亡国惨祸之发生。他还呼吁制止内战，以挽救危亡。

在中国民族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大敌当头的时刻，蒋介石又一次打错了算盘。他的反共高潮不仅遭到中共和人民的反对，在国际上也是不得人心的。美国罗斯福政府不希望在战胜法西斯之前，中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何况是利用美援的抗日物资去打共产党。

8月11日，美军参谋长马歇尔电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9月6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的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抗日，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气得蒋介石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干涉”和“威胁”。

蒋介石深感处境不妙，如果再一意孤行，势必陷入更深的困境而不可收拾，于是只好偃旗息鼓，宣告收场，授意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大举进攻。9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发表演说，尽管继续发表其反共谬论，但也说到：“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所应遵循的原则。”接着，他又做出某些让步，以缓和国内外的反对。10月5日，他派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谈话，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并表示国民党对边区没有用兵之意，希能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

中共为维护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日，也于随后停止发表一切揭露国民党的文稿，以示缓和。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准备实施宪政，“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诺言，提出了实现宪政的一个基础、三十先决条件和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五点意见。他说：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欲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做基础，必须首先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真愿用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各边区及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及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并给予接济，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4月，日本力打通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豫湘桂地区发动新的攻势，腐败的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造成大溃败。中共为挽救当时由于国民党在豫湘桂作战军事溃败而出现的危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于4月下旬派林伯渠为代表去西安、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就实施民主政治和解决党争等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为这次和谈规定了原则，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在民主改革问题上不退步。在一些小的问题上虚与应付，实施暂时拖、将来打的阴谋。因此，当林伯渠提



出以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中提出一个基础、三个先决条件、五点意见“作为民主宪政和政治解决党争的谈判的基础”时，即遭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他们反过来提出了国民党政府的提示案，强调所谓“军令政令统一”，“限期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由各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抗日根据地人民选出来的民主政府。

几个月过去了，国共双方的谈判毫无进展。8月初，蒋介石为摆脱困境，欺骗舆论，指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发表公开演讲，梁氏妄称“国共谈判已使若干问题得以解决。国共关系有所进展，并将继续改进”，并歪曲事实攻击中共。8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问，揭穿了梁寒操的谎言。他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成果，而根本障碍在国民党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

接着中共鉴于国民党面对着强弩之末的日寇进攻竟然连续大溃败，显得十足的腐败无能，而国统区和大后方民主运动又日益高涨的新局面，认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必须立即改组国民党和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0月10日，延安各界集会庆祝双十节。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著名讲演，对蒋介石发动了新的政治攻势。他说：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错误的失败主义和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政策，致使国民党战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域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改组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台时唯一的正确方案。其具体步骤是：第一、各方按其所代表的实力，自己推选自己的代表；第二、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国事会议；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政府所执行的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编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时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周恩来强调指出：必须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国共两党争端进入了关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斗争了，即：是一直朝一党专政、亡国灭种的黑暗死胡同走下去，还是把中国推向民主和平统一独立的道路上？中共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涨。

就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插手国共谈判。

#### （四）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从美国经过缅甸到达重庆，他是来调整中国战区统帅部最高统帅蒋介石和参谋长史迪威的矛盾的。不久，他即插手国共争端。蒋史有什么矛盾、他俩的矛盾和国共关系又有何

瓜葛？美国人何要在这时插入中国内部争端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军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仅看到中国在战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还有其长远的打算：战后中国应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国，这个东方大国首先要站在美国的一边，以填补日本留下的空间，并作为抵御苏联的广阔的空间地带。于是，罗斯福日益重视中国。

1942年1月，根据罗斯福的主意，盟军单独辟出中国战区，由蒋介石由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3月，应蒋介石要美国委派参谋长的请求，罗斯福派曾经在华生活10年的被誉“中国通的中国通”的陆军中将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

史迪威抵达重庆后，执行“美国出钱，中国出人，打败日本，保卫美国”的基本战略，设立中、印、缅美军指挥中心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并要求对中国部队的指挥权，以消除蒋介石集团的动摇，使其在抗日战争中为美国的目的服务。但史迪威没有想到蒋介石却有另外打算，蒋介石只希望在抗日的旗帜下，源源不断地得到美援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得抗战胜利后消灭共产党。尤其是当史迪威和周恩来有了来往，真正了解到中国两个战场的对比后，发现真正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逐渐识穿了“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英雄”的假象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在关于军队指挥权、美援的支配等方面的矛盾就越来越白热化。1943年9月，史迪威致信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从速装备八路军，使之从速出兵晋、豫，以牵制日寇减轻平汉路日军进逼的压力。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不予接受，那时他正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4年初，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占领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等许多重要岛屿，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线。这时，美军非常需要中国部队的配合，因为，日本为救援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中国华东、华南的轰炸基地，使日本本土免遭继续轰炸，急需打通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4月开始，日本发动对中国的豫湘桂地区的攻势，国民党大军一触即溃，损失惨重。蒋介石的军事溃败，对美军的太平洋战略极为不利，美国朝野一片不满和怨言。

6月，罗斯福派他的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考察，他向蒋介石表明，美国愿意调解中国内部争端，要求蒋介石和共产党改善关系，以共同击败日本。蒋介石则劝说华莱士不要受共产党的影响，还莫名其妙说：豫湘桂战场失败是史迪威不合作和美国人对于国民党的批评的结果。华莱士经过半个月的考察，从昆明给罗斯福发出如下电报：

“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内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导人必将在演变中或革命中涌现，而现在看来更可能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但是，除了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

史迪威则不仅看到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而且向他的老上级、老朋友

马歇尔建议，剥夺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将指挥权交给他，否则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将不会发挥任何作用。马歇尔表示同意。

7月初，罗斯福采纳马歇尔的建议，给蒋介石发来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由史迪威统率所有中国军队，对中共部队也同样供给武装和粮食。蒋介石当然不同意让共产党得到美式装备，心想共产党的军队早已羽毛渐丰，如再增加粮食和新式装备，那无异是如虎添翼，更加无法对付。他不愿意看到中国抗战胜利后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他要誓死反共，但另一方面他还是希望靠美国的外援打败日本，否则日本人胜利了，中国则是汪精卫掌权，也不是蒋介石的天下。因此，他虽然不愿意把军权交给美国人，但也不敢断然拒绝罗斯福提出的让史迪威掌握军权的“紧急提议”。没有美援，他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他采取了拖延战术，几天后，他致电罗斯福，表示原则同意史迪威的提议，但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否则就是军权交出来，史迪威也不好指挥，同时希望美国派一“富有政治远见”的全权代表来重庆协商具体办法，调整他和史迪威的矛盾。9月，美国总统全权代表赫尔利来华，但是，蒋介石仍以“深思熟虑”为理由，继续敷衍美国人。

蒋介石想利用赫尔利赶走史迪威，“以夷制夷”，因此对赫尔利格外款待，每次会面蒋介石都到大门以外迎送，而蒋介石对任何外宾，从来不迎不来送往，即使是美国副总统威尔基·华莱士也一样，唯独对赫尔利如此尊敬。赫尔利受宠若惊，在史、蒋之间矛盾双方，也就站到蒋介石的一方了，他对蒋介石表示：“罗斯福派我来的任务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巩固和蒋委员长的权威”。

国民党的军队在继续溃败，而蒋介石的军权却迟迟不肯交给史迪威。罗斯福担心中国时刻会被日本打垮，从而增加最后战胜日本的困难，9月18日，他给蒋介石发来“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正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其重要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积极采取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我相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中国所有军队。……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罗斯福的这份电报是打给史迪威转交蒋介石的，意味着他偏爱史迪威而轻蔑蒋介石。史迪威得到电报后十分激动。

第二天是周末，蒋介石照例请赫尔利在黄山别墅度假。不速之客史迪威把罗斯福电报的中文翻译件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拿起电报看了一下，仰着头一言不发，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而史迪威则怀着称心如意的复仇感，用诗一般的语言给他的夫人写信，说：“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

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9月20日，蒋介石正式向赫尔利摊牌，他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调一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赫尔利经过一番苦心思索之后致电罗斯福，竭力劝说他收回成命。赫尔利替罗斯福分析，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并已坚持抗日七年之久的国家元首，对他不应施加压力，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

日力量可能也随之化为乌有，这样处理问题美国人民不会赞同。赫尔利要求罗斯福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高级将领顶替其职务，并谈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也能够与除史迪威以外美国将军真诚合作。罗斯福感到在中国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最后只好让步，并于10月调回史迪威。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他接受史迪威的教训，对蒋介石毕恭毕敬，没有提出要求指挥中国军队，没有提出用美援武装中共军队。

由于史迪威离华，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为了战后独占中国，美国希望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得到巩固。因此，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的重点由援华抗日逐渐转为扶蒋反共，他把蒋介石集团看作是维护美国在中国利益和消灭中国“共产主义危险”的工具。为此，赫尔利插手国共两党的争端。

11月7日，赫尔利飞到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谈判。11月10日，双方在延安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协定(草案)》。草案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建立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联合政府应成为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提倡进步、民主与自由；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应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合理分配军援装备；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这五项协议，虽然和中国人民基本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但如能实现，总还有利于抗日战争。同一天，周恩来偕赫尔利由延飞渝，继续和蒋介石谈判。

11月11日，周恩来在郭沫若为柳亚子由桂林来渝的宴会上说：总的来说，重庆好像摆好擂台等我来打一样。郭沫若说：希望你给重庆带来太阳。沈钧儒说：你来得好，我们不再受骗。经过周恩来长期工作，经过多年事实的教育，确实使人们的觉悟提高，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最大限度地被孤立了。擂台打下来了，太阳照耀到雾都重庆。

赫尔利一回重庆就把延安五项协议交给蒋介石。他认为这五项协议对蒋介石有利，因为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这样便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所以他高兴地对蒋介石说。“五条协议是共产党签定的将他们武装部队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文件。”但是，极端独裁的蒋介石就连这样的协定也拒绝，甚至十分恼火地骂赫尔利为“大傻瓜”。这的确也是赫尔利所意想不到的。

11月17日，蒋介石亲拟一份国民党的“反建议”，并和赫尔利反复密谈、推敲。赫尔利要蒋介石让共产党“插进一只脚趾”，意思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必须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作为交换条件”。而蒋介石则深怕“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出来”。赫尔利终于背叛他在延安所签的白纸黑字，与蒋介石重新拟定一个拒绝《五点协议草案》的《三条反建议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国民政府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愿将中共武力改编后，收为国军的部分。承认中共合作地位；二、中共在竭诚拥护政府，并把军队交由政府统一指挥后，政府在中共之高级军官中，遴选参加军委会；三、政府遵守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依抗日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其他公民自由予以保障，但各该自由权利，应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之限制。

赫尔利深知周恩来是久经政治、军事斗争考验的人物，要让他能接受这三条“反建议”，必须施展一些手腕。11月21日，赫尔利约见周恩来，并把蒋介石的三条反建议交给他，然后装得颇为公正地说：“我是代表罗斯福

总统来帮助中国团结的，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东西也决不会偏重在某一方。国民党借日本人的刀来消灭共产党，我是主张国共并肩作战的。我们准备帮助你们，成万架飞机的东西在等待着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们无法帮忙。”他在诱骗周恩来接受三条。

周恩来看到蒋介石的三条反建议，全是老调重弹，它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把军队交出，而给予中共的只是象征性的政治代表权，同时只字不提成立联合政府；又听了赫尔利的一番甜言蜜语，便识破他们的阴谋。他淡淡地说道：“参加政府，我们处在观察者地位，不能有实权。”

赫尔利以为周恩来已经上钩了，又一边解释，一面吹嘘一番：“参加是不等于有实权，但事在人为。你们参加，先是一只脚进来。一口咬不下，不妨做三四口咬。国民党已经僵化，失去了弹性，你们进来，可以大有作为。你还不了解自己的强大，你们进来而能拥蒋，把事情弄好，蒋介石就没有再退的理由，比如，我们议会的有些成员，有的就能控制议周恩来一针见血地反击了，他有力他说，你用美援是钓不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你不懂中国的事情，不了解中国人民，不了解国共争端的历史情况，中国共产党经历了17年艰苦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烈火的锤炼，因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她和她领导的人民不会忘记从自己早期斗争的挫折中，通过无数先烈的生命和战士的鲜血而取得了最根本的教训——人民必须牢牢掌握自己的军队，没有了军队，就没有了自由，也就没有了一切。

赫尔利白费心思。

11月22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味坚持要中共先交出军队，然后政府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对此，周恩来断然拒绝，他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换几个人到政府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同一天，周恩来又约见赫尔利，说因为蒋介石直接拒绝五项协定草案，他留在重庆毫无意义，要求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提供飞机送他回延安。12月7日，周恩来飞回延安。

周恩来返延，即写信给赫尔利，指出：我们从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中，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我们认为，为告知民众，并使政府改变其态度，现有公布我们的五点建议案的必要。五点建议案是赫尔利签字的，如果公布了那岂不是出美国人的丑！赫尔利急忙复电周恩来，希望不要公布五点建议案，并望周恩来再次来渝谈判，还说他不相信谈判已经终结。12月21日，他又发来电报，希望周恩来前来谈判。

12月24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说，周恩来正在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难以离开延安，并且国民党政府没有表示充分的诚意，以保证在五点建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意在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上进行抽象的讨论，因此提出四点附加意见，请赫尔利转交蒋介石：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撤退包围边区及袭击新四军之国民党军队；三、废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压迫性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1945年1月6日，赫尔利和蒋介石密谈了一天，决定由赫尔利偕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安进行两党商谈，以代表“诚意”。次日，赫尔利复电周恩来，说中共附加四点和原定谈判程序有距离，但也相信国民党可能作出一种解决问题的让步，还表示了要来延安会谈的“诚意”。11日，毛泽东复函赫尔利说，来延安会谈，盛言可感，只恐不得结果，徒劳往返。八年来一

切秘密会谈，均证明国民党当局毫无诚意，为此，建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筹备会”，由国共两党和民

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与会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此议如获国方接受，周恩来则来重庆磋商。20日，赫尔利在和蒋介石密谈后，致函毛泽东，说明国民政府的计划有某些变更，并估计这些不可能得到中共的同意，但希望中共不要马上予以拒绝，请求周恩来来渝“作一短期访问”。

24日，周恩来离延飞渝。临上飞机前，他在延安机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为着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为挽救当前的危机起见，急须与政府及各方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具体步骤。此次去渝，即系本此方针，代表我党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具体步骤问题。”抵达重庆时，他又在机场重申延安机场谈话的精神。当晚，周恩来应邀出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举行的宴会，赫尔利出席，王世杰、张治中作陪。

周恩来在重庆反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召开各党派国事会议及改组政府问题，但均为对方拒绝。国民党代表在坚持他们原来提出了三项条件之外又提出了三点，即：“一、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下，附设一机构，邀请中共及其他党派参加；二、由蒋介石委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名中共将领）、美军官一人，负责中共军队改编；三、由蒋介石委派一“美国军官充任中共军队之直接司令长官。”同时，赫尔利亦提出四个补充办法，企图将中共军队完全置于美国控制之下。周恩来拒绝国民党和赫尔利这些无理主张和办法。

2月12日，魏德迈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布：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军事人员，只受命支持国民党的中政府。

2月13日，周恩来到黄山官邸会晤蒋介石，赫尔利在座。周恩来坦诚告诉蒋介石关于中共对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及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废除一党专政，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取缔一切特务机构及特务活动，真正开放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承认解放区，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蒋介石直率地拒绝周恩来所提的先决条件，他说：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

谈判无法继续进行。

14日，周恩来在重庆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李璜，章伯钧、屈武、陶行知、杨耿光、陈真如、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特生、黄炎培等人，报告最近国共谈判经过和昨天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指出：国共谈判的大门虽然没有完全关闭，但蒋介石在赫尔利的支持下，对中共提出的最起码的民主措施都不愿意予以考虑，只想在谈判桌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军事统一”为借口，达到“整编”中共军队的目的。

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谈判基本结束了。同一天，“调解”失败，即将回美述职的赫尔利大使秘密会见蒋介石。赫尔利重申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请蒋介石放心，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蒋介石则感谢赫尔利“拯救了整个亚洲，使它不致落入共党之子。”

“尽管统一战线隐藏着深刻的裂缝，而且此一裂缝必定会在战争结束时暴露无遗，但是只要日本仍是威胁中国生存的大敌，那么，旧的世仇、不和及冤屈就将被控制。”在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和很多

局部磨擦，但始终成不了蔓延全国的大气候，国共两党合作始终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中共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紧紧把握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点，将它作为处理阶级矛盾和国共关系的基本依据，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磨擦和高潮，总是从抗日大局出发，以不破裂合作为限度，通过有节有理的斗争加以解决，达到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而且有一定民族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只要坚持抗日，就自然不能全面发动反共内战，否则会自取灭亡，因为反共磨擦根本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越搞下去必然使蒋介石集团越失掉民心，所以，蒋介石集团一直没有宣布中共叛变，没有与中共全面决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抗击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胜利。

国共两党的抗日爱国志士不惜流血牺牲对祖国对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铭记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建树的功绩。

## 第七章国运决战旋转乾坤

### (一)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撩开了蒋介石的面纱，揭露其独裁反动真相。他说：蒋介石“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做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3月1日宣布的要在今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十分中肯。

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以1936年5月5日由国民党公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法”为依据的宪法，要把一个完全没有民意的国民党政府，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强加在人民头上。蒋介石在会上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根据蒋介石决心反共的精神，大会制定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抢摘桃子”，独吞中华民族付出巨大牺牲而取得的胜利果实。但条件还不够成熟：刚刚摆脱战争苦难的人民，反战情绪空前高涨，中共及其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壮大；相反，大批美式装备的中央军还远在西南边陲。因此，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又摆出一副和平协商的样子。他接受政学系的献计，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23日，蒋介石“诚恳”电邀毛泽东说：“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接送，特再驰电速驾！”

高层次的谈判，是双方领导人在形势判断、权衡决策方面的高级较量。善于同竞争对手谈判，通过谈判争取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局面，这是革命斗争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是革命政党进行战略决策指导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的盘算，无疑是心中有数。但没有因此就对国民党的和谈邀请加以简单的拒绝、或者即使赴会也只虚与委蛇，而是一方面对和谈保持足够的警惕，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措施；一方面对和谈问题深思熟虑，对蒋介石的来电以及复杂局势及时作出反应。

中共中央考虑到国内外的和平呼声，特别是经历了多年战争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强烈和平愿望，同时也考虑到，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可能经过和谈之后，有条件地承认中共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



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党中央认为在不放松自己武装准备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成立联合政府，达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如果和平不能实现，经过谈判斗争，也可以教育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28日下午3时45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专程到延安迎接的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坐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大型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此刻，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应急讨论与中共谈判的方针。他们曾主观臆断共产党不会来谈判，据《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透露：“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和谈，我们更有文章好做。”因此，毛泽东等人亲临重庆，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蒋介石为国民党拟定谈判三个原则：“一、不得在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显然，这是一种以虚假民主的允诺，来骗取取消人民武装的策略。

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为毛泽东、周恩来洗尘。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等作陪。2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

重庆谈判历时43天，无论在会场或战场都充满着尖锐的斗争。双方谈判的焦点，在如何对待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治问题上，共方要求尊重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这一事实；而国方则始终坚持“军令政令统一”。蒋介石曾对周恩来说，“恩来，盼告诉润之（毛泽东号），要和，就按照这个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而毛泽东在另一种场合也明确警告蒋介石：“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占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

国民党为迫共产党就范，还在谈判桌外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蒋介石密令向各战区印发他在1932年编写的《剿匪手册》。9月上中旬，蒋介石下令山西阎锡山部12个师向中共的晋东南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忍无可忍，在山西上党地区奋起反击，歼敌3万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在战前动员时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了不少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他这个人吃硬不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而倒收敛一点。”

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会场的斗争。中共在军事胜利的同时，又在会谈中主动让步：将解放区的武装部队缩编数目，由会谈初期提出的48个师减少为24个师至少20个师，并表示愿意让出南方8块解放区，表现了和谈的诚意。国民党在战场上受到沉重打击后，也在桌上收敛了一些。国共双方都明确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同意取消特务统治，释放政治犯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则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彻底实行三民主义”。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寓所客厅里，国共双方签订会谈纪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协定签定后，毛泽东决定返回延安，蒋介石提出要用自己的专机送毛泽东。周恩来颇为担心，这时，恰好张治中透露：蒋介石要他明天乘飞机去兰州，周恩来于是机智地指出，请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再去兰州。11日，毛泽东、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安全回到延安，周恩来则继续留渝，同蒋介石商谈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表示满意，他认为：“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接受蒋的领导。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的方案了。第三，军队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至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可惜，蒋介石没有远见，更缺乏国共合作、避免内战的诚意。《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便在10月13日向各战区下达“剿匪”密令，称“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所系”，要求“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11月上、中旬，他又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计划在六个月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计划的第一步是控制苏北、皖北，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第二步是集结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绥。经过一系列密谋，国民党军即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攻击。

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在察绥、平汉路、津浦路等战役中，连续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发动局部内战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进一步玩弄起和平欺骗阴谋，被迫同意召开按《双十协定》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为揭穿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花招，进一步团结教育人民，便围绕着政协会议、停战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中国大地上形成一种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奇特局势。

周恩来是11月25日离渝返延的。12月16日，他又率领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离渝飞渝，其中有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30余人。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共代表团此次来渝的任务，一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为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当前首先急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只有先不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因此，政协会议的第一件事即是停止内战，第二件事是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的方案。中共对这些都有具体意见。同时，我们还将就国民大会的代表改选、会期、宪法、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等问题，向政协会议提出我党的主张。

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战后中国问题的妥善解决。美国政府鉴于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采取了调解国共争端的对华政策。1945年11月赫尔利离职，12月20日，在美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的美军五星上将、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杜鲁门总统特使的身份飞抵上海；21日抵南京，立即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马歇尔在史迪威事件中支持了史迪威，也骂过蒋介石无能腐败，他在蒋介石心目中是属于“受了中共宣传之蒙骗而对中国政府下无偏见”之类的美国人。因此，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殷勤态度中兼有小心谨慎和疑惑成份，他怕这位美国调停人“亲共”。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周恩来前往机场迎接，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那时飞机隔音设备不

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

23日，周恩来来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他。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有听清周恩来讲活的原因。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多方面人士会谈。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条件。因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很好，我们共产党在内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目前又出现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恢复了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关于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条书面意见：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和平协商解决；在政协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发生内战区域实地考察，并将事实真相公布之。但是，蒋介石企图从四面八方包围解放区，切断中共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因而硬要中共部队将已占领的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多伦两个战略据点交给国民党军。这根本违背了就地停战的基本原则。因此，一直到1946年1月9日——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达成协议。

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条件为借口企图占领赤峰、多伦两地，这是毫无道理的，国为中苏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于东北地区。明天即是政协会议开幕，那两个地区已由我军解放，根据就地停火的原则，当然应由我军驻守。在东北问题上，我们已向国民党作了重大让步。而如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话合情合理，随即表示愿按周恩来的建议，与蒋介石会谈。晚上，马歇尔面劝蒋介石不要因小失大。蒋介石表示可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撤回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午夜，马歇尔电话通知周恩来，说明蒋介石同意让步。

10日8时至10时，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停战命令，为马上就要开幕的政协会议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气氛。晚上7时，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断续至18年之久，其间虽因抗战而停止了冲突一个时期，但在抗战中，又发生了冲突。像这次公开发表双方停战命令，还是历史上未有的事情。我想这一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与督促，同样的应归功于同盟国人民的要求与希望。同样……，我们看到了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我们看到了政府代表的努力，最后也显示出了蒋主席的决心”。

周恩来接受马歇尔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周恩来向马歇尔强调，中共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内争，但也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美国的调解有利于促成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同时美国不得以武力援助国民党统一中国。

对此马歇尔表示同意，他来华初期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周恩来觉得他较公正、坦诚，相处得较融洽，在最初两次接触后，周恩来曾说：“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1月10日上午10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出席者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代表36人。在会议开幕前，孙科主持预备会议，中共代表陆定一引用了旧金山会议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的话：“让我们用这个会场作为最后的战场”，来表明中共的诚意和对大会的良好祝愿。

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许下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他说：

“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我们所要商讨的，是国家由战时渡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的基本方案，也就是怎样集中一切力量，增强一切力量，以开始建国工作的问题。我们八年抗战，死者为国牺牲，生者备尝痛苦，唯一的目的，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排除建国的障碍，以求得这一复兴建设的良机。现在抗战既以胜利结束，建国工作就应立即开始。我们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已为全国所公认，中国必须成为统一民主而强盛的国家，更是世界所切望。”

“我们过去因为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抗战，一切的措置与法令都着重于适应军事的要求。抗战结束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善后为先、建设第一’，许多战时法令，已经在陆续废止或修改，今后政治上和社会上一切设施，都要尽量纳之于正常的轨辙，加强法治的精神，以立宪政的基础。”周恩来接着致词。他说：

“中国目前状况之不满人意，是毋庸讳言的，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紧接着不幸的国内战争，使中国人民，世界盟邦的政府和人民都关心此事，并要求迅速结束内争。中共是当事人的一方面，此次代表团前来陪都，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经20多天的呼吁和奔走，经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经我们盟邦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最后赖蒋主席的远见和决心，使全中国和全世界所关心的内战，在今天双方下令停止了（大鼓掌）。18年国内惨痛的经验，人民的痛苦，使我们今天在先烈的昭示之下，在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大鼓掌）。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并望以此努力，告慰全国人民。”“军事冲突停止了，才能很好的谈到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就是要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并在此过渡期中，我们提议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会议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坚决主张必须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化。而部分中间人士，则抱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提出要“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的所谓希望。周恩来一针见血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盘，就是‘你交给我军队，我再给你民主’，以便他们吃掉人民军队。我们人民军队可以交给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只能是民主的国家，而不能是反人民的国家。我党代表团提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是：第一，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即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统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实行军队的民主化。因为，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国民党在吃掉人民军队之后，必然向人民猛扑过来，把人民的民主也吃得一干二净。第二，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军队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真正平等合理，否定任何一个党的特权。”周恩来的讲话，

既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也批判了中间人士的幻想。关于“国家民主化”问题，蒋介石根本不想触动他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只是主张在他的政府中扩大几个政府委员，想让中共领袖和几个民主人士到他那里去“做官”。从而放弃革命和民主运动；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交给蒋介石接管。周恩来一方面坚持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保障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改组成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各项讨论基本结束后，1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30日，又飞到重庆。31日清晨，周恩来向马歇尔通报了从延安带回的信息。周恩来说：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回一个口信。毛主席认为，你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今天我们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的话，对毛泽东捎来的话表示感激。他说：他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中共公开宣布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介石在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马歇尔甚至私下提出了他个人对如何加快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

当天下午，政协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宪法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大会五个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民主和平的要求。

蒋介石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他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说：

“我要趁今天会议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时候。

将我多年来蕴蓄在心而没有说的话，简单的向各位申述。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于现在抗战胜利，这35年之中，所有革命战役，无役不从，艰难困苦，无所不经，自省革命志愿与应尽的革命义务，幸无陨越，对于国家和人民，亦已尽了我一份子的天职，略可自慰。今天虽不能说国民革命已经完全成功，但是铲除革命障碍的工作，确已告一段落。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可是，我们国家当此元气调伤之后，国运前途的危难和建国事业的艰巨，只有比战前乃至战时更加严重，实在不胜临渊履冰之惧。幸而此次政治协商去议，订定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各种有关问题的方案，建国初基已具，宪政实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负起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责：今后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这一个重大的责任，要交给各位同人和全国同胞来共同担负。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去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尽的事功。同时要求各位同人，为国家为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们在抗战时期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诚团结，来担负今后建国的重任，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周恩来在会上致词，他说：

“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具有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在这些协议当中，我们愿意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而把

这两方面——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就是改组政府的这一协议。我们一致地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准备宪政。”“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

会议胜利闭幕的第二天，恰好是旧历除夕，晚上，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了会餐，喜迎新春佳节，周恩来亲自下厨房做菜，他烧了许多味美可口的菜肴。红烧狮子头是他的拿手好戏，一大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红烧狮子头端上来了。他招呼大家说，“来，尝尝味道怎样？好多年没有烧，怕不行了。”同志们一边吃一边称赞说：“蛮好，副主席真不愧是下江人，这菜是地道的江苏味。”会餐后，还举行了文娱晚会。

这时候，大街小巷传来了断断续续爆竹声，人民在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和平年节，在期待着蒋介石将口头的允诺，变成真正的行动。

## (二)

蒋介石认为政协会议上最大损失就是确定了改组国民政府，一些国民党所谓“元老”，甚至大骂大闹要弹劾本党出席政协代表。政协决议墨迹未干，他们就处心积虑阴谋破坏，并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头炮，制造较场口血案。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较场口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雄壮的口号声和嘹亮的歌声响彻古老的山城，上午9时许，大会开始，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德全、沈钧儒、李公朴、史良、施复亮等走上主席台。突然，主席台周围响起狼嚎般的怪叫声，自称“市农会代表”的刘野樵爬上主席台，霸占扩音器，自称总主席，宣布开会，特务蜂拥而上，抬起棍棒劈头就打，顿时秩序大乱。李公朴、郭沫若头破血流，施复亮腿部重伤，马寅初的礼服被剥去，还有许多人受伤和失踪。

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见状十分气愤，大声说道：“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清楚。”特务们见势不妙，一声口哨，一窝蜂似的退走了。紧接着，周恩来又到医院探望受害者。

当晚政协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周恩来痛心疾呼：“特务分子这样横行下去，如何得了！人民的自由安全，哪里还有保障。”会后，周恩来要直接去质问蒋介石，但因蒋介石已于今晨飞抵上海而未能面晤。

12日，周恩来面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要求他代电蒋介石陈述政协代表对较场口血案的意见。第二天清晨，周恩来即收到一封恐吓信。该信的信封写着：“子弹一颗，立交周恩来亲启10号”，信封里面附子弹一颗，还有一封短信：

“恩来：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之味！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儿回了，现不能再忍，请你看看谁的手段高强吧！10冠英二、十二。”

周恩来看毕，幽默地对警卫员龙飞虎说：“好吧！我们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并交代他立即把信交给《新华日报》公布。

国民党特务有恃无恐。2月22日，又以卑劣手段，欺骗一些青年学生，举行一场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中共代表团驻所和发表那篇恐吓信的《新华

日报》社。周恩来闻讯，满腔怒火，当即致函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

“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之后，较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盟国合作，造成国内分裂，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之阴谋活动。长此以往，凡赞成团结民主之人士，在阴谋分子与特工人员淫威之下，生命与自由毫无保障，民主政治谓何？盟国团结谓何？堕国家威信，置钧座庄严之诺言于何地？恩来等，为国家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计，不得不郑重提出严重之抗议，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对敌方及民主同盟所受损害，实行道歉与赔偿，并保证此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2月24日，蒋介石由外地飞返重庆后收到这封抗议信。翌日，他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假惺惺地说：“国际外交大事，应注重理智，切不可有过激之情感，更不可超出其应有的范围，否则即涉及我们民族整个荣誉，徒增国家的困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他“训话”的次日，重庆又出现了反苏反共游行，在宁、沪、蓉、穗等大城市掀起一股反苏反共浪潮。

3月1日，被蒋介石称为“不仅关系到本党成败。而且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他公开号召，应“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政协决议。17日，全会闭幕，通过了全面摧毁了政协决议以及许多向中共挑衅的决议案。

第二天，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蒋介石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的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动派于阴谋破坏活动初起之时，又未曾坚持政协决议于全会会堂之上，反而亲临主持反对政协要案之通过，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动摇了也是蒋先生亲自主持起草通过的政协决议。”“政协决议是民主盟约，决不容动摇或修改，希望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起来，监督政协决议全部实现。

这时随着大批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运进东北。东北上空战云密布。3月21日，周恩来飞回延安，与毛泽东等人商讨对时局的意见。

东北，是蒋介石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以不抵抗政策拱送日本的。在东北被日寇铁蹄蹂躏的14个春秋中，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与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当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时，蒋介石的军队还远在川滇边陲。马歇尔来华时，中共军队已在东北占有相当的优势，但为了实现和平，中共在政协会议所签订的协议中，对国民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国民党接收被苏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同意国民党军有五比一的优势，但国民党必须承认中共及其部队在东北的合法地位，承认东北业已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周恩来曾多次向马歇尔提出东北问题，但他极力回避。因为马歇尔对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关系一直怀存疑虑，他愿意让国民党在东北占有更大的优势。针对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升级，周恩来向中共提议：只有蒋介石在大打大斗政策受到挫折之后，才有谈判的可能。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东北大打的准备，不能对国民党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几天后，周恩来又飞抵重庆。

4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招待外国记者，就蒋介石于当天上午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的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的演说，讲明国共关系的紧张局势和中共的态度：国共两党举行谈判以来，我党屡次让步，委曲求全；国民党得寸进尺，并无团结诚意。目前何应钦、陈诚等暗中

备战。有数十万装备完整的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推进，意在“剿共”，破坏和平，造成国内战争，使数千万生灵涂炭，战祸罪责应归咎于国民党。中共现向世界声明“中共至万不得已时，即当迫而应战”。

4月22日，周恩来在怡园同美国归来的马歇尔长谈。马歇尔向周恩来介绍了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尤其是详细地解释了英、美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的形成过程，并运用谨慎的、试探性的措词，似乎想说服周恩来放弃军队。但他又暗示周恩来不必立即回答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以免使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为推动中国和平民主进程，也为了融洽会谈气氛，他认真思考着对方提出的每项建议，对那些具有实际性的内容的建议，他还要提出简短的问话，以便弄清对方提议的动机与关键之处，然后才后发制人，赢得主动权。马歇尔言毕，周恩来即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送给我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谈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三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返国述职期间，蒋介石破坏各项政协决议的情况详细说明。周恩来开诚布公的谈话，使马歇尔无言以对，他在给社鲁门总统的报告中承认：蒋介石给了中共以指责的口实。

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谈判才干显然给马歇尔留下深刻印象。这次会谈后不久，在与无党派职业外交家、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马歇尔坦率地说。“在他本人的经历中，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马歇尔还承认，那时共产党的领袖确有执行协议的诚意，一般说来，来自上级的命令也会被共产党部队的指战员执行；相反，马歇尔常常感到与蒋介石打交道很困难，以致有时他会同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作一些让步。这时，马歇尔和周恩来个人关系还很好。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马歇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有所动摇。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已预感到，蒋介石一心想采取武力政策，到头来不仅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反而会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这正是他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军事冒险的根本动机。

4月29日，马歇尔先会晤蒋介石，商谈东北问题。蒋介石说：“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才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其它若干要求。”接着，马歇尔会见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态度，周恩来坚决表示：“如不能无条件停战，则中共亦不能接受政府方面之意见。”

4月30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东北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为停止东北内战，中共、第三方面和马歇尔将军多日以来，奔走商谈，曾作多种努力，但至今仍未达到目的。而东北内战仍在政府当局非拿下长春不能停战的坚持下继续扩大，实在焦急万分。根据目前形势，东北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大打下去，这不仅糜烂东北，而且极有可能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的大内战，这是人民绝对不许可的。第二种是立即停止内战，这是唯一的好前途。他警告蒋介石当局：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的主张，是十分危险的，“早下决心，回头不晚”。最后他仍然希望能在南京继续进行协商



谈判。

1946年5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也飞往南京。至此，中共领导国统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由渝移宁。

周恩来到南京不久，曾和董必武在梅园新村30号庭院里合影留念。从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苍翠挺拔的翠柏、沐浴着初夏的阳光，他们站在宅前的葡萄树下，神情是那样坚定而安详。可是谁能想到，就在周恩来住地周围不到100米的范围里，蒋介石设立10多个特务据点，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特别刑庭的侦讯室，有国民党首都警察厅长的“公馆”……前后左右、门对门、窗对窗，虎视眈眈地对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严密监视。特务专用的摩托车、吉普车、小卧车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命先生、三轮车夫的特殊人物，也日夜在周围审来窜去。对于这一切，周恩来泰然处之，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地在敌人巢穴里周旋。

在内战硝烟即将弥漫全国，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大决战的严重时刻，周恩来肩负中共和人民赋予的坚决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神圣使命，在南京开始了日日夜夜的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

5月中旬，东北内战日趋激烈。22日，国民党军攻占了长春。蒋介石春风得意，不可一世，23日，携夫人宋美龄乘马歇尔的专机趾高气扬飞抵沈阳视察，亲自部署下一步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蒋氏夫妇还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幸明陪同下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说：“自从1914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查革命情势，实则已经是相距32年之后旧地重游。”

周恩来判断，内战已临近全国化边缘，但美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马歇尔担心蒋介石打内战将引起严重的后果。于是，周恩来使用“逼马压蒋”的策略，来尽量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6月3日，周恩来和马歇尔就东北主权，恢复交通。整编部队等问题进行6个小时的长谈，周恩来重申中共关于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以政治协商解决问题的主张。

在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时，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现实使他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华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就是罗斯福总统所自下下来的世界各国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的方针；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边，而积极帮助国民党搞独裁。周恩来列举了美国授蒋的大量事实，向马歇尔表明，美国对中国内战是负有责任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是有办法制止中国内战的。他说：“美国援蒋就好比从自来水管放水，已经流出来的自然收不回去，但至少不应再放了。把水龙头关上，美国是有这个权力的。”随后，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他对马歇尔说：“你来中国代表了美国政策中的好的一面，在你来华初期，蒋介石就不希望你的使命获得成功，现在蒋介石正在准备大打，想把你拖下水。”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国政府政策的致命的矛盾：既要继续援蒋，又想抑制蒋介石打内战的欲望。这正好击中了马歇尔的痛处。马歇尔在使华之前，就相当担心蒋介石不一定会接受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让步。为此，他曾向杜鲁门总统要一张底牌，那就是如果蒋介石不愿让步而使国共关系无法协调时，美国到头来是否还得支持蒋介石。对此，杜鲁门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而这一点恰恰很快就被蒋介石心领神会了。马歇尔实在苦恼。

6月4日，蒋介石凯旋回宁的第二天，即接到东北传来的国民党军队不

断战败、被歼的噩耗。原来国民党在东北的胜利，只是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广大地区都在中共军的手中。而中共采用的是“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大城市，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的战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东北停战的缓兵之计。6月5日，蒋介石、周恩来、马歇尔达成东北停战15天的协者。6日，国共双方下停战令，蒋介石和周恩来就此分别发表声明。

蒋介石说：

“余刻已对我在东北各军下令，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进攻，期限为15天。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

周恩来说：

“不论对于中国本部的冲突或者对于东北的冲突，中国共产党都是主张无条件而且真正停止内战的。由于中共的坚持，中国人民的愿望和马歇尔将军的努力，才得蒋委员长下令停止在东北进攻15天，进行下列事项的谈判：一、结束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二、完全恢复中国交通之含有时间限制的议定办法；三、不再延迟地执行2月25日关于中国军队复员的整编及统编的协定之基础。我们虽然担心这15天时间的短促，且谈判中又必然要牵连到东北乃至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需要更多时间，但我们不放弃任何机会以求和平之实现，仍同意这一休战15天的办法，并愿一切努力，谋取谈判成功。我们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具最大诚意，使过去一切协议见诸实施，并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作战，永远停止进攻，以符合中国人民及世界友邦之要求。”

6月21日，东北停战15天期限已满。蒋介石、周恩来同时宣布停战时间再延长八天。周恩来还在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

东北停战时间再延长八日，“此虽然与我们主张相距甚远，但凡有一线和平希望，我们无不努力以赴。”

6月23日，港粤各界及爱好和平民主人士何香凝等96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通电说：

“时局险恶、祸起萧墙，国脉奄奄，民不堪命。今时局中心系于南京谈判，现谈判已逾两周，尚未获具体协议，休战暂延长八日，转瞬期满。虽和平希望未绝，但人心咸感焦的。同人等一致认为如内战重演，必招致国破家亡之严重后果。23日之休战谈判必须达成永久和平之协议，和平谈判已届最后机缘，或成或败，有关国家民族之兴衰与后世子孙之祸福。是故此一谈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宜延长不宜终止，必须使东北休战成为全国休战，使暂时和平成为永久和平。恢复交通，整编军队，政协决议必须一一付诸实现，然后国家民族始有复兴之望。目下国计民生濒于绝境，千万灾民死亡相继，何忍再事自相残杀，以绝生机。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咸盼国共两党相忍为国，其他党派与社会贤达，竭力斡旋，共底谈判于成，以慰民望而固国本！”

6月26日，当周恩来正与马歇尔商谈，表示中共愿在军事问题上作出让步，以便政府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趋向政府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并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办法的时候。蒋介石自恃其主力军队80%约160万人已调集前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30万军队从信阳、罗山、光山、高城、黄安等地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全国内战爆发。

(二)

中共中原解放区以河南省桐柏地区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地处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横跨平汉铁路，南临武汉，北近许昌、洛阳，东接合肥，西连襄樊、南阳。中共部队雄据中原，就像一把利刀插在蒋家王朝的心腹之中，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战略上极为不利。因此，他把全面内战的突破口选择在这里。

早在5月初，中原大战已迫在眉睫。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地解放区已被国民党军队侵占，迫得中原中共部队无处藏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

面对30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中原解放区不但粮食极其缺乏，连饮水、柴都难以解决，更谈不上药品。周恩来这时虽远在重庆、南京，但对中原情况了如指掌，他时刻关心着中原的严峻处境和6万人民子弟兵的安全，他向美蒋代表建议组成三人小组赴宣化店视察，解决中原军事冲突，并于5月8日中午，抵达宣化店。当晚，他听取了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关于部队情况和敌我双方态势的汇报，分析了时局，就中原部队适时进行战略转移作了具体部署。

6月26日，蒋介石认为其围歼计划业已准备就绪，就命令刘峙指挥30万大军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以此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他的如意算盘是：6月份用48小时歼灭中原解放军；7月份用两个星期占领苏皖解放区；8月份用三个星期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晋冀豫解放区……五个月内消灭中共及其所有部队，在全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

6月29日、7月1日中原部队分北、南两路主力先后越过平汉铁路，突破所谓“铁桶”包围圈，然后分别向济南、鄂西北方向前进，像两把利刀插到敌人的背后，钳制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晋冀鲁豫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中原战火的迅速蔓延，使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战争的痛苦和灾难之中。7月3日，由马歇尔提议，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南京商谈，双方就历次谈判的问题作全面检讨，但毫无结果。会谈刚结束，国民党悍然决定国民大会定于11月12日召开，不再变更。7月7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对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大”提出书面抗议：

“本月3日，为国民党一党执政机关之国防委员会，竟片面决定召集国大日期为本年11月12日。敝方闻之，不胜诧异。当即一再要求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此事，乃未获贵方同意，而国民政府已于本月4日，明令公布矣。

“贵方此种举动，是否表示不管各党派意见如何，抑或置政协于不顾，不能不令人发生疑虑。查政协决议，曾经蒋主席与各方代表（包括国民党代表在内）庄严起立表决，如有修改，亦须得各方同意。今贵方表示若此，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敝方坚决反对。敝方向贵方郑重声明：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敝方并仍坚持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国大及其有关问题之主张。贵方如仍予拒绝，并因此而引起纠纷，其责任应由贵方负之。”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书面抗议下当一回事，7月14日，他飞向他的夏都庐山避暑，并密谋策划内战勾当。而周恩来则不顾盛夏酷暑在“长江人炉”南京为国家民族利益奔波。邓颖超曾在上海会见记者说：“周恩来因公忙碌，午睡既不可，夜睡也不能安，现在消瘦，无复年前之壮健。”

7月26日，周恩来会晤马歇尔并提出两项建议：一、颁发全国无条件停战令；二、停战令下后，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改组国民政府。马歇尔随即赴庐山转致蒋介石，蒋介石不仅不接受建议，反而于8月2日，出动八架飞机轰炸延安。两天后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示抗议：

“本人兹奉命向国民政府提出最严重之抗议，政府如不承认此举为全国内战开始之信号，则请立即实行下列两项办法，以制止此类暴行之扩大：一、下令调查此次暴行之经过，并严惩此次暴行之负责者。二、将全国空军置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管理监督之下，以保证中国空军不再参加中国内战。事态此发展至速，务请迅赐回答，以利和平商谈，不胜企盼之至。”

蒋介石避而不谈延安轰炸事件，却于8月6日，叫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自庐山飞往南京，向周恩来转达他提出的所谓“东北整军及中共部队在关内外驻地划分之方案”，

提出五项荒谬条件，要求解放区退出如下地区：一、苏皖边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以及以南地区至迄冀东沿海；

四、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除去当时黑龙江和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1946年6月7日，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蒋介石还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国民党政府则不考虑停战问题。

10日上午，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会谈。马、司徒企图诱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五项条件。司徒雷登说：“如果接受6日转达的五项条件，我们即督促政府尽早为召开拟定中的非正式委员会作出安排，并接着成立指导委员会和国府委员会。这样在事实上建立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共产党有自己的代表，从而可以不仅对那些正在特别考虑中的地区，而且也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着手处理所有诸如地方政权的问题。”周恩来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五项无理要求。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处”失败。

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坚持如期召开“国大”。18日，马歇尔在庐山牯岭致电周恩来，称政府拟扩大基础，共产党是否提出名单，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周恩来复电马歇尔，重申国民党政府尚未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关于改组政府的条件，故无意提出名单。21日，周恩来在南京会晤司徒雷登，重申应无条件停战，切实履行协议决定，并认为全面停战为改组政府的先决条件。

2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谈判症结所在；就是国民党政府无理提出五点要求。对此，我们拒绝考虑，拒绝接受。在改组政府以前，必须弄清政府是否放弃五点要求，是否马上停战这两个问题。我们欢迎美国调处，但反对片面帮助。争取和平，主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我们的态度是，“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要求无条件停战，根据政协决议办事。当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便唯有坚决抵抗，且动员解放区人民起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鉴于蒋介石一直在庐山牯岭避风，一方面让下面的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中共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的手法制造和谈空气，以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以为他还是愿意谈判，和谈还是有希望的。9月1日开始，周恩来从南京到上海，住进马斯南路107号“周公馆”，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彻底揭露蒋介石假

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他对记者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和谈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我可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况。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9月16日，周恩来第四次从南京来上海。19日，他在“周公馆”单独接见美国联合社记者，声明：“本人已暂退出南京政治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国代表进行‘无意义，之磋商。此次磋商殆为掩饰中国内战情况，使中美两国民众不能获悉真相。”周恩来的声明，使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感到问题严重，26日，他俩联合俱函邀请周恩来将军早日返回南京。27日，周恩来复函他俩，表示“催我回京，盛情可感，唯因真相未明，特请董必武先生代表我方与阁下等先行接洽。”他自己则继续留在上海。

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部署三路大军进攻解放区的军政中心——张家口以后，感到秋天已届，天气开始凉爽了，便返回南京。

国共关系濒临于最后破裂的境地。9月30日，周恩来等在上海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10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座谈会，到会的中外记者70余人，会上，他慷慨激昂，以缓慢而有力的声调，从“拖中大打”的局势，谈到空前规模的内战；从内战责任由谁负责的问题，谈到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并表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仍然有决心始终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独立、统一而奋斗。会后，外国通讯社和国内外报纸均用显著的位置进行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蒋介石一意孤行。10月2日，他约见司徒雷登，宣布他“决意要攻取张家口，并决心保持这一点。”

10月9日上午，马歇尔突然由南京飞抵上海，登门求见周恩来，并于中午在吉伦中校的官邸宴请周恩来，然后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当晚，周恩来会见报界人士，说明只要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愿意参加谈判。

10月11日上午，国民党军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下午，蒋介石发出命令：定于民国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明目张胆地显示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埋葬政协决议的决心。与此同时，为了欺骗舆论，又继续展开“和平攻势”，于17日派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人为代表，从南京来上海，要求会见周恩来，继续举行商谈。第三方面人士为此拜会了周恩来。周恩来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和平、民主，表示愿意出席商谈。

10月20日，周恩来授权秘书陈家康对记者发表谈话：自政府于11日攻占张家口，同时颁布‘国大’召集令后，和谈大门本已关闭，全面破裂迫在眉睫。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精神，为民主和平呼号奔走，悲天悯人，可感可泣。谈判所以重开就是这个缘故。过去两日在沪举行非正式商谈，限于交换意见，发现问题，并无结论。现定于21日将谈判移往南京继续进行。中国共产党救濒于分裂的中国如救垂危之慈母，若有一线生机，无不是竭力以赴。

离沪前夕，周恩来约请各党派代表和爱国人士来“周公馆”座谈。在上海的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等均应邀出席，周恩来对他们说：蒋介石已经完全撕破和谈面具，放手大打起来。我们全党全军坚决以自卫战争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正在进行，胜负现在还未定数。但是，从各方面情况看，再经过几年的苦战，一定能够胜利的。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1931年冬，我离开上海时，对何时能回上海，觉得渺茫；现在，可就不同了。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无论是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10月21日上午9时，周恩来乘飞机离沪，10时10分抵宁，随即由孙科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毫无诚意，只是虚伪地做表面文章。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是周恩来和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详情如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飞往台湾，致使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度会谈宣告失败。

10月31日，蒋介石60寿辰，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王惠宠像歌颂封建帝王一样献祝寿词：“黄锁宣威，苍生托命，川岳重光，人天顺应。仁者无敌，德必有邻，吹嘘所及，禹甸同春。寿考作人，康强逢吉，宏开太平，永奠基石。筹添海屋，欢动神州，惟崧极峻，与国同麻。”

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终于在南京开场了，蒋介石内战独裁道路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当天，《中央日报》专门印发了号外，吹嘘“天下事大定矣”，好像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可以从此安如泰山了。参加大会的代表1600多人，全都是圈定、收买而来的。国民党代表占85%，中共、民主同盟和许多正义人士，坚决拒绝参加。青年党、民社党和一切所谓社会贤达、以及老牌汉奸，则作为非国民党代表出席，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粉饰一番。群众骂青年党是一批“狮子头”（青年党早期创办过《醒狮》周刊，他们力争当国民党政府部长和国大代表，丑态百出）；骂民社党首领张君勱为“张君卖”，说他接受了国民党的重金收买而卖给国民党。人们把参加“国大”比做政治上“失去贞节”、“堕入妓院的火坑”，把“国大”称为“猪仔国大”。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宪草”演说：

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的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60岁，就不像过去20年一样能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同胞，要还政于民了。但国前大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如果这样毫无保障，就实行五权宪法，我个人认为非常危险，而且恐怕将来掌握政权的人，不能以国父之心为心。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

一言以蔽之，还是要由他实行个人独裁。

和平大门完全被蒋介石关闭。周恩来就要返回延安了。11月16日，他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很多，不少人不得不拥挤在门口、窗外和院子里。

周恩来先在会上散发书面声明，严正指出，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国大”。“国大”一开，不但使和平谈判破裂，也彻底破坏了政协会议以来的一切决议，这是蒋介石企图把独裁、内战和卖国“合法”化。我们中共将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一起，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到底。

周恩来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形势图。他右手指着地图，向中外记者介绍了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胜利，然后宣布

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平，但国民党要用武力来消灭我们，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我将于日内撤回延安。

记者问：假如国大通过对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如何自处？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笑了笑，回答说，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抗战前的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之后一年纠纷，都经过了。我们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了一下，对发问的记者说，“假如你是替我们担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要紧。”

记者们原来很紧张，听到这儿，都为周恩来洞察未来的惊人气魄所鼓舞，不由笑了起来。

又有记者问：“如果国军进攻延安，将会出现何种情况？”周恩来坚定地回答：“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自己的区域里实行自卫，假如国民党继续进攻，特别进攻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是逼得我们从里面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旋乾转坤的局面了。”

当记者问到他何时返回南京时，周恩来说：“南京我们倒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再回到政协决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

11月19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一个多月后，1947年1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说了句貌似以公正实力蒋介石推卸内战责任的话。“和平最大的障碍是国共双方彼此完全猜疑相对。”之后，他回美国任国务卿去了。他应该记得周恩来最后留给他的两句话：“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背向是决定一切的。”

#### (四)

对垒双方对这场战略决战前景均颇力自信和乐观。1946年12月7日，蒋介石对司徒雷登说：“要在苏联变为活跃之前，于1947年内结束共产党的问题。”12月31日，周恩来则在写给留居上海的郭沫若的新年贺信中预见“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最变质的跃进。”

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105个城市，达到部分战略目标，但损失的兵力竟达66个旅71万人。由于占地日广，兵力不敷防御，丧失全面进攻的能力，不得不采取重点进攻的战略。蒋介石把重点进攻方向选在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企图将两翼解放军消灭或驱赶至华北地区后，实行东西夹击，再一举歼灭；接着挥军出关，统一全国。

中共中央军委继续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面以山东、陕北部队在战略防御中吸引并逐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其他战场的反攻创造条件；一面组织其他战场的部队寻机歼灭当面之敌，伺机转入战略反攻，配合陕北、山东部队作战，以达到最后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策略。

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同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胡宗南是“黄埔系”实力派首领，胡宗南集团乃蒋介石嫡系之“王牌”，有大批装备优良的34个旅，计23万人；该集团控制着西北广大地区，兼有四川等地作后方，以及

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兵员补充，物资供应较为方便。而中共在西北战场仅有4个旅，兵力不及对方的十五分之一，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虽有华北解放区可适当支援，但黄河阻隔，路途遥远，兵员补充，物质供应较困难。可见，双方力量多么悬殊。难怪胡宗南向蒋介石立下将军令：“三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和共匪的首脑机关，三个月内聚歼共匪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迫共匪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自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北犯，直取延安，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对来犯之敌英勇阻击，在圆满完成掩护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和延安群众撤出延安后，对延安实行坚壁清野，19日主动撤出延安。

胡宗南进占延安城后，马上向蒋介石发出“捷报”：“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亲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理之中。”夺回丧失13年的延安，光复“中国赤都”，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最大的喜讯了，更何况有此“战果”。他得意洋洋，旋于3月20日致电嘉奖胡宗南：“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10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1947年4月18日，是国民党所谓“奠都南京20周年纪念日”，蒋介石把“陕北大捷”视为他在南京成立独裁统治20周年的献礼。他选择这一天，宣布“改组政府”，成立“介乎训政与宪政之间的政府”，标榜他的政府已不是一党包办，而是“三党政府”，幻想由这个政府主持大选，再召开“国大”，选举总统，让他登上金銮宝殿，并将借外债打内战“合法化”。国民党还煞有介事地吹嘘“改组政府”后已集合了一大群“有进步思想的自由主义分子”，其实，那些粉墨登场的人，如任行政院长、政学系头子、老亲日派张群、任副院长的背叛政协的无耻捐客王云五，以及任国府委员的臭名远扬的青年党党棍曾琮、左舜生，人们并不生疏。

蒋介石美梦未醒。他效法封建帝王，在南京紫金山麓介乎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的紫霞湖畔的小山岗，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归宿之地，并破土动工修建一个作为墓地标记的大型亭式建筑物“正气亭”。小山岗满山丛林，一派翠绿，其中还夹杂片片映山红和野生红枫，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十分壮丽。紫霞湖就在小山岗的前面，圆圆的湖面清澈如镜，在周围林木花草的点缀下，显得格外幽美。蒋介石还亲手题写了亭名和“紫霞笼罩宝珠峰，浩气远连忠烈塔”的楹联。

可惜此刻，离解放军进占南哀仅仅24个月的时间！

与蒋介石的估计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后，并没有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而是分别化名李德胜，胡必成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说：“留在陕北可牵制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嘛。”周恩来说，“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有生力量被我们消灭了，城市和地方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不仅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4月22日，周恩来就南京政府的所谓“改组”撰写了一篇题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的社论文新华社发表。社论深刻指出：“这一‘改组政府’的把戏，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旧筹安会出现之后，袁世凯不久就垮了台。新筹安会出现之后，蒋介石的命运决不会好过袁世凯，也许



比他更坏。因为中国人民的力量比 32 年前已经大了不知多少倍。”

西北野战军根据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空城急于寻找主力决战的心理，诱敌深入，运用“蘑菇战术”歼灭敌人。到 5 月份，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个战役，接连歼敌三个旅，计 14000 余人。

胡宗南一反他那胜利者骄态，狼狈不堪地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电：“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为安定国本，消除匪患，拟请万分困难之中，另编新军，以应此艰巨任务，而免匪势再事蔓延。”

这些正如周恩来于本月初，在《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一文中所指出的：“蒋介石最后一张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甫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定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灭亡的象征。”

与此同时，在山东战场上，蒋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王牌”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全歼，师长张灵甫等集体自杀。蒋介石闻噩耗后哀叹“此乃我军剿匪以来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他和陈诚立即赶到徐州怒斥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将其救援无力的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撤职；并几乎要杀掉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十分伤心的蒋介石把原先准备好在南京的祝捷会改为追悼会，狂叫要把他的全部精神用到山东战场上。

随着“第一战场”的胜利，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动了“第二战场”。5 月 23 日发表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指示国统区的反内战示威运动，要灵活地运用各种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分别又结合；尽量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统区各级中共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英勇机智地战斗在第二战线上，与战场上的第一战线互相呼应，使蒋家王朝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6 月，国统区 60 个大中城市学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几十个城市 5000 多个产业部门的 3250 万工人也参加“要生存，要饭吃，反对独裁专制，反对内战”的斗争行列；广大农民更是被逼上梁山，纷纷起义，反对抓丁征粮，民变之火，势如燎原，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被迫派了几十万正规军对付国统区人民的反抗斗争。

5 月 30 日，新华社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蒋介石政府正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指出：“无论在军事战线上，或者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战，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办法。”

6 月 30 日，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作《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讲话，第一次公开承认，军事处于严重态势。他说：“现在真是本党千钧一发，存亡续绝的关头，我们为什么还不把握这个时机，群策群力，同心同德来改造党，挽救当前的危机呢？”会后，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

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蒋介石自以为“明令讨代共匪”，“军令一振”，即可加速“戡乱进程”。因此，他又自信起来说：“半年至多一年可勘平共匪。”可是他的同僚、国府副主席兼行政院长孙科在上海答记者问时，却很不乐观地唱了反调：“对于战争的估计，未可尽加入意。”“结束确期，除上帝知晓外，无人可有把握的猜想。”

孙科的悲观不无道理，然而确有人对战争的进程“作有把握的猜想”，他们不是上帝，而是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虽保持进攻态势，但因机动兵力不足，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已转为守势，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已成为强弩之末，中原地区兵力薄弱；人民解放军除山东、陕西战场外，其他战场逐步转入战略性反攻，改善了战略态势。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在敌方战略进攻尚未完全被粉碎，我兵力装备仍未优于敌人的情况下，果断地制定了全国性的反攻的策略，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以加速战争进程。

中共中央英明地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既是敌人要害又是敌人防御薄弱的大别山地区。地处豫东皖西鄂东北的大别山区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逼近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对蒋介石的威胁极大。中共军队的行动必然逼使蒋介石纠集大量兵力来阻截围歼，调动其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中共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样中共就可能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扭转战局。对于这一战略行动，毛泽东曾生动比喻：“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兵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两个拳头一张，胸膛就露了出来。这样的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力量强，还有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

为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部署。1947年7月下旬，在水抱山环的美丽小村庄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央高于会议上，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对这一战略部署作了简要的说明：三军挺进是打到外线的，三路大军如三把利刀，直接插向敌人的心脏；刘邓的晋豫鲁冀野战军12万人，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陈粟的华东野战军18万人为左路，在鲁西渡过黄河，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谢的晋冀鲁豫太岳兵团8万人为右路，自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在战略上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在南起长江、北至黄河、西达汉水，东到黄海的中原大地上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与此同时，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之敌北上，将敌之“右拳”拉向沙漠边缘；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调动进攻山东的敌人向东，将敌之“左拳”拉向渤海之滨。这就是两翼牵制，它使蒋军兵力更加分散，更加“胸膛袒露”，更便于南下三大主力行动。

8月初，刘邓大军于鲁西南强渡黄河天险歼敌5.6万人，胜利完成鲁西南战役后，又突然甩开30个旅敌军的分进合击，兵分三路向南疾驰越过陇海线，涉越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重重障碍，于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地区。随即一面牵制敌人，寻机歼敌，一面展开发动群众，摧毁反动势力，以卷席之势，迄9月底解放鄂豫皖边大部分地区，直抵长江北岸，如同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宁、汉之间。8月，陈谢太岳兵团于晋西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经三个月作战，歼敌4万余人，解放了豫西和豫陕边广大地区，孤立豫西重镇洛阳，威逼潼关。陈粟大军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兵进

攻后，于9月初挺进鲁西南并随即南越陇海线路，于皖苏地区辗转歼敌，至11月，共歼敌10余万，恢复发展豫皖苏解放区，孤立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和郑州。三大主力在广阔战线的品字形攻势，迫使敌人处于全面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南征大军向外线进攻的同时，中若内线作战部队也先后转入反攻。人民解放军外线出击和内线战场的反攻相配合，组成了全面进攻的总攻势，迫使敌人把战线从黄河移到长江，从重点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路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的黄河防线，转战江淮河汉的捷报传到陕北，传到中共首脑机关。毛泽东、周恩来抬头遥望南天，心情激动不已。是啊！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共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一直处于被敌人包围的境地。现在，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从而扭转了蒋介石集团反革命的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从而推进了革命的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蒋介石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任何安眠药物对他都无济于事。从来不沾一滴酒、只喝白开水的他，现在每晚却要饮一杯半威士忌酒，才稍能安眠片刻。这年寒冬的一个深夜，他在日记本上写下“反省录”，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入劣势被动之危境，……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此刻，他可能忘记去年这个时候对司徒雷登夸下的海口！

## （五）

为挽救垂危政局，止沸民怨。蒋介石决心召集“行宪国大”，再次取得“合法”地位，借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

1948年3月29日，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于南京开场，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代表们都知蒋总裁要兼总统了，有人讽刺说：蒋介石在穷途末路时，还想效法袁世凯，急于过一阵“皇帝”瘾，要登上总统宝座。会议开始后代表们精神不振，或窃窃私议，或闭目养神，或嗑瓜子、猛抽烟，会场十分冷落。

不料4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上提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并说要把总统的宝座让给北大校长胡适博士，“行宪国大”知道这一消息，顿时热闹起来。原来，早些时候，司徒雷登传出让胡适当总统是美国的意思：由“文入学者”当傀儡总统，以显示国民党“致力于民主改革”了，蒋介石作为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掌握军政实权，以全力“剿共”。既要权力又要名誉的蒋介石，对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怎肯让给他人，狡猾的蒋介石将计就计，口头上答应美国人的建议，表示不当总统，实际上是作为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因为一年多以前“制宪国大”制定的那部宪法，还缺少一条“在勘乱建国非常时期赋予总统处理非常事变的权力”；而蒙来独裁专制的蒋介石，岂肯自甘“阿斗”，做第二往林森，所以，他使出招数，以退为进。果然，最善于体会蒋介石用心的张群对大家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草案制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能想法补救，规定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经张群一说，国民党中常会大员们茅塞顿开，随即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3人带着这一意见去见蒋介石。4月17日，中常

会决定，在宪法外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紧急处置权”。蒋介石心情畅快，亲自到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上讲话，他先追述自己如何。追随先总理参加革命，如何誓师北伐，定都南京、削平内乱，领导抗战胜利。最后激愤地说：“我是国民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4月19日，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行宪国大”闹剧的高峰，是竞选副总统，美国人眼看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日益动摇，便筹划扶持手中还握有几十万军队、控制着广西和华中广大地区的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让他必要时代替蒋介石。李宗仁得到美国暗中支持，决定竞选副总统。于是，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骤然加剧。蒋介石召见李宗仁，通知他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科了，希望他顾全大局，退出竞选。而李宗仁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他的行动得到国民党内若干派系的支持，李宗仁也积极进行拉选票的活动，和夫人郭德洁每日结伴跑旅社、或临开会时站立会堂门口和代表们握手，寒暄打招呼，以示热情和蔼，平易近人和有民主的风度，还由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分头出面设宴，拉选票。有一次，在黄绍珪举行的午宴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今天来学习民主，好比一个乡下小姑娘初次跑到城里来谈恋爱，这是生平破题儿第一遭，没有经验，难免笑话，丢人现眼。代表先生女士们都是我的‘大姐姐’，是‘情场，的过来人，经验丰富，可千万不能见笑，还该多多指导帮助我这个‘小妹妹’能逐渐熟悉起来”。在座的人都为之忍俊不禁，说值得投他一票。4月29日，李宗仁终以微弱多数击败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这时，蒋介石正在其黄埔路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的选举实况，当听到李宗仁获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在地。

副总统选举事毕，通过几个徒具形式的决议，闹剧算是谢幕了。

5月1日，正当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举行“总统宣誓典礼”的时候，由西北转移到华北的中共中央发布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号召。

开春以来，解放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所谓“分区防御”的策略。西北、东北、华北、中原各地战场捷报频传。为了迎接胜利的曙光，夺取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伟大的战略转移，东渡黄河、迁往华北。

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从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大路两旁和崖畔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毛泽东、周恩来含着微笑向人们频频挥手告别。队伍整齐有序地向东方——黄河岸边行进。23日，黄河两岸春光明媚，几只木船停靠在陕西吴堡县川口村外的神庙渡口。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登上“元号”和“二号”木船。木船离开河岸，乘风破浪，向对岸的山西省驶去，波涛上荡漾着他俩爽朗的笑声。

他们在山西省临县高家塔下滩里上岸后，即沿黄河岸边。骑马东进。3月26日，曲临县三交镇双塔村改乘汽车，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蔡家崖。4月4日，清晨，他们离开蔡家崖，越过崇山峻岭，4月6日来到雁门古城——代县。4月7日清晨，雪后初晴，碧空万里，周恩来提前登程，检查沿途情况，他一面不断地向沿途清扫积雪的群众招手问好，一面又不时地停下车来，仔细检查路面。当汽车开到五台山望海峰和翠岩峰相交的公路最高点——鸿门岩时，风大路险雪滑。周恩来跳下汽车，站在狂风咆哮的山岭上，一直等到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来到后，才和毛泽东步行走过鸿门岩天险，来到台怀镇的塔院寺休息。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车继续东行，他

们翻越雄伟的大行山，进入河北，沿途在阜平、城南庄等地小作停留。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于4月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也于5月26日到达西柏坡。

在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场旋转乾坤的大决战中，指挥几百万军队于各个战区不断歼灭敌人，最后打垮蒋介石并解放全中国的最高统帅就是毛泽东；而作为最高统帅的总参谋、帮助统帅“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就是周恩来。蒋介石为了挽救军事上的败局。8月初，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各地区“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多人参加的军事检讨会议，对战争做一次全面部署。这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会议确定，收缩战线，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实行重点防御，以阻止“共匪”南渡长江；沈阳坚持守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变化，原则上不放弃沈阳，但同时也做好撤退准备。

蒋介石在会上以沉重的语气告诫部下：“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剿匪时，还要有利。但由于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各将要对自己的精神思想、生活行动，必须彻底反省、彻底检讨，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下努力，等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万一”的“不幸”被蒋介石所言中了。

9月初，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和战争的胜利发展：经过两年解放战争，国民党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430万减少为365万，其中正规军198万，用于第一线作战的174万被分割以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等为中心的五个战场上，进行重点防御。而解放军的总兵力由120万发展到280万，其中野战军149万，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据此，会议提出了军队的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在决定战局的第3年，争取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即军队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加速全国胜利。

针对蒋介石准备实施“战略收缩、图谋顽抗”的计划，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敌人来不及逃跑之前，抓住战机，组织战略决战，并把决战的矛头，首先指向东北战场。因为这时东北战场于中共更加有利，共产党在东北有主力部队70万，地方部队30万，国民党只有正规军40万，非正规军7万，是中共部队超过敌人的唯一战场。而且敌人孤立地困守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蒋介石对撤退东北计划又举棋不定。所以，把战略决战矛头指向东北，就把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其次，消灭东北敌军，既可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又可使我军及时转入关内作战，还可利用东北工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正式向部下提出撤退东北的计划，要求坚守锦州两个月，维持关内外陆上唯一通道，以便利用这一时间，把沈阳和长春两地守军经辽西走廊撤至关内，转用于平津、徐州战场。可惜，这个“安全撤退计划”被人民解放军对锦州的大举进攻所打破。早在9月初，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使用主力于锦州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于不顾，并

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打锦州，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进而全歼东北敌军。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突然奔袭北宁线。10月1日攻克义县，包围锦州。10月15日攻克锦州，全歼守敌，国民党陆上退路被切断，置长春、沈阳两城于死地。怪不得蒋介石因锦州失守而急得数度大口吐血。

锦州被克后，蒋介石又急飞抵沈阳，令空军空投手令给长春守军司令部郑洞国等高级将领，严令他们：“率领新七军和六十军立即突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但是，由于锦州被克后，长春更加孤悬突出，宛如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波涛所吞没。在中共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下，国民党守军料定顽抗必加速灭顶之灾，17日，六十军全体将士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毅然起义投诚，并一致将枪口转向准备挣扎到底的新七军，大炮瞄准长春警备司令部。

18月拂晓，东北野战军完全控制了长春城内东部地区，长春西城守敌新七军一片慌乱，这时只要来一个突击，敌人即全军覆没。但中共中央决定争取新七军自动放下武器。周恩来为此亲自致电东北“剿共”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敦促他“宜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起义。电报原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1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大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多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刚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逼，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者也。

周恩来

10月18日

郑洞国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即于第二天率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与新七军全体官兵投诚，长春遂告解放。

28日，东北野战军在辽河以南地区歼灭廖耀湘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廖耀湘后，乘胜追击，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共歼敌47万人，使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部队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变为优势。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战略决战的第二幕——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就开始了。

徐州地处陇海、津浦两线交叉点，又是长江流域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诚如蒋介石所言：“政府保有徐州时，敌军不能安然以其全力进攻长江阵线。但徐州一夫，南京、上海便不易保守。”

为歼灭国民党南线主力，中央军委命令，11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从兖州一带向鲁南运动，集结于徐州以东；中原野战军从郑州跨越平汉路向东运动，集结于徐州以西。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粟裕组成的总前委领

导的两大野战军 60 多万人，在徐州东西地区摆开与国民党军决战的态势。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也拟定了“徐蚌会战计划”，不惜放弃陇海路上若干重要城市，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共 80 万收缩于徐州、蚌埠间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同样摆出了决战阵势。徐州“剿共”总司令是资格老，军阶高的刘峙。但蒋介石认为他能力平庸，不堪任此重任，因此，调整指挥力量，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负实际指挥责任。

11 月 6 日，决战开始。华野向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8 日，担负拱卫徐州东北韩庄、贾汪、台儿庄的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大部约 2 万多人起义。

第三绥靖区部队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为抗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一直遭到蒋介石的歧视。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开赴徐州。徐州会战前夕，蒋介石又把它推到防线突出处，不论谁胜谁负，反正让它先完蛋。蒋介石一心想排斥异己，但绝没有想到这支部队的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是经过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共，如今已有 19 年党龄的中共秘密党员；或音是由周恩来巧妙安排，成为第一位私访延安国民党高级将领、又秘密加入中共的特殊人物。

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1926 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1929 年在上海会见了一直和自己保持联系的中共党员张存实，再次向中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周恩来批准了他入党。在入党宣誓仪式上，张存实亲切地对他说：“周恩来同志关心你，问候你，他将直接领导你的工作。你是特别党员，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可暴露身份。”他愉快地接受党中央交付的重托，返回西北军任职。

何基沣，卢沟桥抗战的英雄。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向我卢沟桥守军开枪射击，守军旅长何基沣亲临前防阵地，指挥军队奋起抵抗，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7 月 8 日，日军要求谈判，狂妄要求中国守军撤走。何基沣当即予以痛斥：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如果有准胆敢侵占中国领土。就必然遭到中国军队的抗击！”他指着日方代表说：“你们要知道，中国人是不好欺侮的，中国军队也不是好惹！”日方代表恼羞成怒，当即拔出指挥刀，直逼何基沣。何基沣毫无惧色，猛地从腰间抽出手枪，枪口对准对方。最后日方代表悻悻离去。7 月 9 日日军飞机大炮猛击宛平城，中国守军背水一战，日方伤亡惨重，继松游少将被击毙，田代中将也不得不剖腹自杀。何基沣名声大震。9 月，在大名血战中，已升任师长的何基沣率部抗敌三天两夜，最终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大名。他痛心疾首，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排斥异己的政策！”他举起手枪，对准自己左胸。枪声响了，他倒在血泊中。闻声前来抢救的部下，发现师长身边留有一张墨迹未干的字条：“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

1938 年 1 月，他来武汉养伤，聆听了周恩来的一次讲演后，顿时心明眼亮，苦闷的心一下舒展开了，感到中国的前途，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他立即登门拜访了周恩来，吐露了自己的心曲并提出到延安的愿望，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周恩来对他坚决抗日的行为表示敬佩。何师长要去延安，我代表党中央表示欢迎，只是此行要十分隐蔽，我建议你先去广西小住几天，制造一个周游全国的假象，然后悄悄地去延安。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2 月，他踏上延安这块崭新的土地，会见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

袖，还向刘少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39年1月，他如愿以偿，成为中共特别党员。中共要求他长期隐蔽，秘密积蓄力量，准备率部起义。

1946年夏秋间，张克侠、何基洋分别接受中共的指示。夏天的一个夜晚，周恩来从梅园新村驱车甩开特务的盯梢开到五台山下偏僻的路边，会见从徐州来南京为冯玉祥出国送行的张克侠。张克侠向周恩来汇报徐州方面的情报。当请示今后的工作时，周恩来说：“我们不但要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内部去打击他们，要争取策动大部队起义，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上气。”张克侠体会到周恩来话中的份量，大战即将重开，自己面临的任務更重了。夜幕笼罩着金陵古城，一片漆黑。就在这沉闷的黑夜中，在国民党首都的街头上，周恩来从容不迫发出打击敌人的重要指示，这是何等令人赞叹的壮举啊！张克侠由衷地表示敬佩，他感到浑身在充满信心和力量。

几月后，在与南京遥遥相对的古都北平，叶剑英告诉何基洋：“关于组织起义的事。你可以和张克侠商量，他是非常可靠的同志。”

张克侠、何基洋这两位和组织上没有横向联系的同志，现在都为了解到对方的真正身份而自豪。其实他俩早在一起作战的戎马生涯中，相互间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了。

话又说回来，蒋介石虽然不知道他俩是中共特别党员，但对他俩的言行早已注意，派了亲信陈继淹担任第三绥靖区参谋长，密切监视他俩。第三绥靖区司令部设在徐州，决战前夕，又在相距100多里的贾汪设立前方指挥部，只让何基洋在贾汪前线，却形同软禁地留庄张克侠于徐州，使两人分开。以防密谋叛变。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时秘密向张克侠、何基洋传达陈毅的指示，要他俩于8日率部起义。11月7日，华东野战军渡过运河，向贾汪、台儿庄逼近。何基洋以此为理由，急电徐州，要张克侠来前线指挥，陈继淹等以讨论作战计划为托词纠缠住张克侠。直到8日凌晨4时，张克侠巧妙地摆脱监视，带一名随从，乘吉普车直奔贾汪。

张克侠、何基洋肩并肩地站在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官兵面前，宣布起义。张克侠向官兵们发出震撼云天的吼声：“恶贯满盈的蒋家王朝马上就要垮台了，内战的罪魁祸首蒋介石一定要打倒。”何基洋面对官兵，倾诉着他的肺腑之声：“这仗打得很不好，本来就不应该打这样的臭仗！中国人用美国人的枪炮屠杀中国人自己，死的是自己的同胞，我们再也不干这样的傻事了！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老百姓不愿意打，我们就不打！”全场的官兵沸腾了。淮海战役就是这样揭开了胜利的序幕的。

淮海战役的炮声刚响，蒋介石就败倒在对手脚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看了起义的电报，高兴得举杯祝贺。中央军委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出电报：“北线何基洋、张克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胜利，望各纵队干部充分认识这一胜利对于战争全面胜利的伟大意义……。”

在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互相配合下，国民党军队连连惨败。至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共歼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55万余人，生俘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戕而死，解放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兵锋之下。

淮海战役激战方酣，战略决战的第三幕——平津战役又打响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率东北野战军入关，兵临北平城下，1949年1月15日，解



放天津，活捉守敌指挥官陈长捷；1月17日，解放塘沽；1月31日，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共歼敌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三大战役历时仅四个多月、歼敌154万，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的江北广大地区。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局面已经基本确定。

## （六）

末日来临，蒋介石的亲信都纷纷发布绝望的哀鸣，1948年冬天，曾历任蒋介石侍卫长，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说：“我看这样下去，我们恐怕只有这样一条路好走——跳黄浦江！”有人想跳江自杀，有人则服药自尽。蒋介石的国策顾问、代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于南京湖南路陈公馆中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他给夫人及儿女的信中写道：“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来日大难……后事如何，不忍预嘱”；在致蒋介石的遗书中说：“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云云。这位追随蒋介石大凡22年之久，被誉为总裁文胆的陈布雷，看到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和一连串的失败，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将付诸东流。而自己又绝无回天之术，挽救党国于覆亡时，便感到心灰意冷和绝望而选择了自手解脱之路。蒋介石对陈布雷之死非常伤心，痛感：“在此国难未纾之时，天夺良辅，你的眼睛一闭，离我而夫，可是丢下了我，叫我又怎么办呢？”

战局逆转，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司徒雷登眼看蒋介石失势的趋势，便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委员长（指蒋介石）退休，让位与李宗仁。”对于美国的这个换马之计，桂系实力派白崇禧积极响应。白崇禧此刻坐镇汉口，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手中握有30万能战之兵，驻守长江中游南北两岸。自东北、华北、华东会战以来，国民党嫡系主力损失殆尽，唯有这支力量尚保持完整。因此，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12月24日，他在汉口突然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表示民心军心都不能再战。他打着“和谈”旗号，借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野。好由桂系取而代之。25日，副总统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发出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30日，河南省主席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长亦发出请蒋介石下野的通电。同日，白崇禧再次发出主和通电，并警告说：“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作出下野的决定。圣诞节那天晚上他亲笔写下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两句诗，以作万般无奈之叹。

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邀中央执、监委员约40人在黄埔路总统官邸聚餐，虽然餐厅里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但在辉煌耀眼的彩灯下映出的，却是个个忧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谈话，唯闻杯盘盏碟之声。党国的要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晚餐”。会上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即张群）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张群念完全文，全场鸦雀无声，空气十分紧张，李宗仁坐在蒋介石的右首，不动声色。还是蒋介石打破沉默，问李宗仁对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介石此时再也难以自制，他人冒三丈，直言不讳：“我

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只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讲完随即要张群记录下这段话，然后拂袖而去。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作出要“和谈”和“引退”的表示。1月21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他以与平时激昂慷慨截然不同的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的语调，正式宣布引退。下午，蒋介石驱车至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下午四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依复恩，绕主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与国民党这种“败象亡证，江河溃决”的覆亡前夕的惨淡局面的鲜明对照，共产党的威望有了极大的提高。自由资产阶级向中共寻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来到解放区。

对于桂系军阀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倒蒋议和”和“假和平”运动，周恩来早在1948年夏天就英明预见到。那时他为中央起草的《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的党内指示中指出：

“在我人民解放战争日益胜利面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少的派别和个人，在美帝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着一种假和平运动，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中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表面牺牲了蒋介石，宣布停战议和，实际上是让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的力量。在这一活动当中，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至于蒋介石及其死党则将尽力挣扎，非至万不得已，不肯轻易下台。我们必须密切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要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运用坚定而灵活的策略方针，以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

以后局势的发展确如周恩来预见的那样。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反动政府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代总统李宗仁急于稳住国民党政府残局的阵势，上台后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并于2月14日，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抵北平，以作试探。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石家庄接见了前来的代表，充分表示了对和平的诚意。

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平山西柏坡移到北平。第二天，中共中央通过电台正式通知南京政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4月1日开始，于北平正式同南京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方面派遣代表团，依照上述时间、地点前来。

南京政府在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的同时，确定了谈判的指导思想：1.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

迫我方接受不体面之条件；2·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应建议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3·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前提下讨论八条。张治中到奉化向蒋介石请示有关和谈限度时，蒋介石特别抓住“划江而治”的“南北朝”主张下放，规定和谈的限度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李宗仁对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3月31日晚，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宴会后，李宗仁又在办公室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讨论加强长江防务问题，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人民解放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南京政府公开表明“和平诚意”，暗中却仍在进行战争部署。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经过双方接触和交换意见后，于13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中南海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将经过与各方磋商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正式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他就此阐明了中共立场和意见：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战，国民党就要完蛋；和，国民党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他宣布：南京政府必须在4月20日前表示态度。

4月16日，黄绍竑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返南京，请求政府批准。李宗仁下敢贸然决定，急派人赴溪口请示。蒋介石阅毕黄绍竑携回的那份《国内和平协定》后，即表示：“‘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条件24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的条件。其前文叙及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合通电，对《国内和平协定》予以全面拒绝。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是国民党总裁，实权仍在他手里，他下野后，便积极部署长江防务，以便凭借长江天堑，负隅顽抗。他所谓的和谈只想拖延时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幻想在美国的庇护下，重新统治中国。麦克阿瑟曾对他表示，只要国民党能坚持一年，美国一定以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正是由于对美国寄予希望作了上述部署，所以他敢于置国内外呼声于不顾，孤注一掷，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几天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次长还说：“长江自古是天险，曹操、符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除非它是天兵天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说：“长江天险，共军没有海、空军配合，不易大举渡江。”当解放军渡江成功，彻底摧毁了“固若金汤”的国民党江防以后，汤恩伯于22日下午匆匆决定全线撤退。国民党军仓皇逃命，溃不成军。23日清晨，李宗仁登机飞离南京。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4月25日，蒋介石离开奉化前，祭祖谒墓，自不在言，更主要的是他已有从此一别故土，何时重返的心情，其唏嘘感慨可以想象。他匆匆赶到上海后，即召集守备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团长以上的军官，在汤恩伯司令部训话。他重弹不出三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到那时美国就会恢复援助。再

说上海兵力雄厚，固守三个月没有问题，并表示自己将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等等。蒋介石虽然佯装镇静，但当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动攻击的炮声一响，他便悄悄地登上飞机，逃之夭夭了。汤恩伯也把司令部搬上了兵舰。

解放军乘胜追击，5月12日打响了淞沪战役，27日，解放上海。至此，历时一个多月的渡江战役，取得了歼敌40万，解放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名城重镇和苏、浙、皖、赣、闽、鄂等省广大地区的辉煌胜利。

6月1日，败阵而逃的蒋介石在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此刻，他惊魂初定，但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江山，结果美梦一场；如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的反攻战略，亦成泡影了。蒋介石面对颓势难回，众叛亲离的残局，也只得追来逐去地力图挽救。地不停地来往于云南、广州、重庆、成都、台湾、厦门，真是时不与蒋兮，狂澜难挽。

中共各路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用战斗或和平的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

1949年11月28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抵重庆市郊的南温泉，重庆已被包围。29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从由穗迁渝的国民党政府即日迁蓉，但却下见其最高负责人李宗仁。原来他早已于11月13日，即蒋介石来重庆的头一天，托言有病，突然飞港转赴美国而去。这天中午，蒋介石在山洞陵园召集军政头目，布置撤退及对重庆的大破坏。晚上10时，蒋经国闻“枪声大作”，催促蒋介石“早离此危险地区”。当父子两个乘车开出山洞陵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小轿车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前进，蒋介石不得不下车徒步，“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介石就睡在“美龄”号专机座仓里。11月30日清晨，“美龄”号离渝飞蓉时，解放军距离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住在成都中央军校的蒋介石，知道四川守不下去，只想把胡宗南的残部安全转移到西昌去，在那里设立大本营，表示大陆还有地盘，以待国际局势变化。他表面上还是装腔作势，而实际上已是坐立不安、一筹莫展了。他每天关起门来对着军用地图发呆，不时责骂胡宗南。他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更是放不下心，经常请他们吃饭，借以监视他们。12月9日傍晚，传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等秘密离开了成都的消息，蒋介石更加慌乱起来了。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县人，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的热情帮助，逐步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那是1942年2月一天深夜，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一位民主人士吴晋航家里首次秘密和刘文辉会面。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说：“尽管国际上法西斯势力一时尚逞疯狂之势，国内反动派在日寇军事压力和政治引诱下也有投降敌人和加紧分裂的危险。但是，只要全国的民主力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刘文辉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这三个坚持、三个反对中，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极为重要。只有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争取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各个阶层的民主权力，才能有效地坚持团结进步、坚持抗战。”

周恩来这番话触动了刘文辉的心思。早先刘文辉苦心经营多年，有了相当的力量，后来经不起蒋介石的花言巧语的诱惑，而追随他，为他卖命，但结果却是地盘被吞食，力量被削弱，直到被迫退居川西一隅，历史教训，使刘文辉懂得高举民主旗帜，反对独裁专制是一条好出路，周恩来接着鼓励说：“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斗争中，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的民主派携手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区实力派能够同共产党加强联合，具体配合。”

深夜的大地是宁静的，寒冷的，室内的气氛却是热烈的、温暖的。周恩来代表中共推心置腹地给地方实力派做工作，争取朋友；刘文辉则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请中共中央指点和支。时间已经过去两小时，但谁也没有一点倦意，特别是周恩来，虽然长时间的日夜操劳，显得有些消瘦，但仍旧容光焕发，话语有力。告辞的时候，周恩来紧握刘文辉的手说，“自乾先生，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啊！望你在国民党的内部多做团结工作。而团结又是为了斗争，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反动政策和措施，都要予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现在你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大胆行动起来吧，我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一席赤诚的话，说得刘文辉热乎乎的。

刘文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针对蒋介石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消灭地方实力派的阴谋，加强了同西南地方各方力量的联合和团结。在四川，他不计前嫌，主动与邓锡侯、潘文华重归于好，约请大家一起和云南的尤云联合起来，达成川滇康三省联合起来“抗蒋自卫”的协议，使蒋介石消灭西南势力的阴谋不能得逞。

1942年7月，刘文辉在雅安驻地接见了周恩来派来的联系人王少春。王少春根据一月前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的指示：“蒋介石排斥异己，与刘有某些矛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去做工作；去后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失败，主要是策反刘文辉及潘文华、邓锡侯。”在那里设立一个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报，以便及时帮助刘文辉了解中共的方针。从此以后一直不间断，刘文辉对王少春送来的电文部认真阅读，有时事情忙不过来就利用抽大烟的时间，边抽边看，甚至看得入神，忘了抽烟。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一度产生疑虑，对王少春也有些疏远。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即通过王少春转告刘文辉，希望他要当政治家，不要做“政治商”，如果认为不需要联系人，请他买张飞机票把王少春送到香港，飞机票的钱也会寄还给他。刘文辉这才警觉起来，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友好合作态度。

1949年10月，解放战争的中心逐步转向西南，王少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劝导刘文辉联合西南各方实力派，走起义的光辉道路。刘文辉这时虽有这方面准备，但还是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王少春对他说：“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写好自己的历史。”接着针对他既怕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利的思想，严肃指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祖国是不会忘记的。”经过反复说服，加上局势明朗，刘文辉终于表态要起义。

周恩来根据刘文辉的态度，对王少春电授机宜：“大军行将西进，希积极准备，相机行事，过早行动，会招致不必要的损失。”王少春和刘文辉一起研究起义的时机、对付蒋介石、配合解放大军等问题。随后刘文辉亲赴成都与邓锡侯等人商量起义事宜。

12月5日，周恩来电示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8日，周恩来又电告率大军挺进西南的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之联系”。刘文辉和刘邓大军终于取得直接联系。

12月9日傍晚，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离开成都，在雅安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义。

12月10日，成都市内秩序大乱，时间枪声，势临绝境。蒋介石的侍卫人员发现“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认为是刘文辉的便衣队，建议蒋介石赶快从后门逃走。蒋介石此时已知道刘文辉等起义的消息，他极为担心“西安事变”重演，于是携着蒋经国仓皇出逃。下午之时，“美龄”号专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升空，向台湾方向飞，等蒋介石再从机窗往下望去时，眼底已是茫茫的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后来蒋经国回忆这次成都之行时说：“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 第八章 海峡劫波恩仇几多

### (一)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当会议开幕之际，与礼炮轰鸣的同时，北平曾一度雷电交加，但旋即雨过天晴，繁星满天。这被人们喻为新旧中国历史交替的象征——黑云压城、山雨满楼的动荡岁月过去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已被荡涤一清，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9月30日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前，举行了隆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周恩来代表政协主席团在严肃气氛中致词，然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碑文。最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及全体政协委员扬起铁锹铲土，给纪念碑奠定墓石。

这天晚上，正是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夕。周恩来要安排各种具体工作，十分忙碌。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亲笔起草准备在天安门向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他们都辛勤地工作至通宵。黎明时分，毛泽东身上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步入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从桌边站起来，问候道：“主席还没有休息？”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也没有休息啊！”于是，他们在桌旁坐下来，共同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10月1日，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古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被装饰一新，宽阔的红色宫墙显得尤其庄严，黄澄澄的琉璃瓦在秋阳的照耀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八只绛红色的大型宫灯垂着金黄色的流苏在微风中摆动，高高的城楼檐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会标。下午3时，盛大而隆重的开国大典开始。天安门广场已聚集30万群众队伍，到处是盈盈笑语，到处是鲜艳的红旗，在乐曲声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红旗飞舞，一片欢腾。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不久，1949年12月，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势力败退台湾地区，并在原台湾总督府上树起一面青天白日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

12月31日，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陪同下荡舟日月潭，垂钓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蒋经国望着那须发斑白的父亲，不禁悲从中来：63岁的蒋介石似乎突然间老了10岁，挺得笔直的腰弯曲了，肩脾骨高高地耸起，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介石连忙收杆，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无可奈何地浮出水面。“好！好！”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微微露出了笑容。除夕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的好兆头，他想，1950年会是“否极泰来”，时来运转的。

元旦那天，蒋介石到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思新年对策，这时收音机里传来的北京新政府的声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中共的立场，原在他的意料之中。这时，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如何，被蒋介石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华盛顿曾数度集会，反复讨论蒋介石政权能否得救的问题。会议分成两

派，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将受威胁。他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澎。国务卿艾奇逊则驳斥了这种观点，他把蒋介石看成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共事实上控制着全国，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自己崩溃，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同时，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总统支持了艾奇逊的见解，1950年1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途径。”声明还明确表示美国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看来，美国是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

蒋介石虽然严密封锁消息，但人们也都感到美国“弃蒋”的种种迹象。新年开始，台岛便笼罩浓浓的失败空气，岛内外的舆论，都认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在台岛苟延残喘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

1月13日，留美多年，备受杜鲁门冷漠鄙夷的宋美龄，默然归台。她的心情凄切到了极点。她的丈夫，不但没有成为美国的华盛顿，反而成了偏安一隅的南唐后主，甚至比南唐后主还不如，因为他毕竟还有半个中国，而蒋介石却只有一个小岛，弄不好，连小岛也守不住，最后可能葬身鱼腹。

3月初，蒋介石在台北复行“总统”职务。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全力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

4月中旬，仅6天时间，解放军跨过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海南是仅次于台湾的大岛，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台湾当局都有极高的价值。海南失守，台湾人心浮动，蒋介石声望再次下降。解放军所向披靡，相继攻占万山群岛、福建海外的东山岛等岛屿，逼近台湾。一般估计，解放军进攻台湾的时间6—8月间，因为9月开始，台湾海峡进入台风季节，不利征战。

江南在《蒋经国传》一书中有一段话形容当时的台湾：“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

就在这时，命运转机的奇迹突然降临在危殆的台湾岛上。这个转机来得如此及时，直使蒋介石惊喜交集。转机来自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是二次大战以后苏美对峙的焦点之一。美国势力当然不甘心从南朝鲜撤出，失去一个台湾岛，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无足轻重，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到威胁，苏联的势力将大为扩张，美国将无法在亚洲立足。为了整个东南亚的防御体系，杜鲁门又把蒋介石拣了回来，把台湾纳入美国战略防御体系，以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向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两天以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蒋介石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中午接到其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电报的。他当即放下饭碗，向李承晚驰电声援，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深夜邵毓麟又驰电报告蒋介石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其，



今后韩战的发展如果有利于南韩，也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而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于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蒋介石的想法与邵毓麟不谋而合。他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欲乘朝鲜战争的爆发，借美国的力量扩大战火，重返大陆。6月26日下午，蒋介石通过外交程序向杜鲁门提出派遣台湾最精锐的第五十二军（33000人）支援南朝鲜的建议。

杜鲁门曾考虑接受台湾提供的部队。他认为使用台湾部队虽然需要美国大量的后勤支援，但可减少美军在朝鲜的损失。然而国务卿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却持反对意见。他们不仅怀疑蒋军的作用，他们对几百万蒋军在3年内溃败在中国大陆，记忆犹新，而且认为弄不好会牵制美国。最后杜鲁门终于意识到：蒋介石唯一得救的希望，在于挑起美国和中国的大战，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和台湾的关系；其次动用台湾军队也将遭到欧洲盟国的激烈反对。

6月30日，当蒋介石在台北接到了杜鲁门婉拒其出兵朝鲜电报时，气得面色发青，因为他趁火打劫，借助外力重返大陆的机会化为乌有了。同一天，麦克阿瑟总部的政治顾问西博尔德衔命来到台北阳明山会见蒋介石，当面解释美国谢绝台湾出兵的原委，蒋介石态度非常冷淡，连一般的外交礼节上的应酬话也不说。只是等到西博尔德向他转达杜鲁门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时，蒋介石才淡然微笑起来，勉强表示谢意。

当晚，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开最高“国策”会议时，仍盛怒未熄，大骂杜鲁门等人“完全是重演当年张伯伦的故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朝鲜人那里流血牺牲，却不肯动用在日本的美军地面部队，甚至拒绝我们向朝鲜提供的及时而有效的援助，何其愚蠢至此！让他们去吃共产党的苦头吧！”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使解放军改变了原定攻台计划。

6月2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就杜鲁门总统6月27日发表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指出美国政府决定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七舰队已向台湾沿海出动，这是对我国领土的武装侵略。中国人民必将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机器，通过了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随后，美国纠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9月中旬侵略者在朝鲜中部西海岸仁川登陆后，疯狂向北进攻。

9月30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美国侵略者把中国的和平愿望看成是软弱可欺，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10月2日，越过“三八线”，并于21日侵占平壤后，竟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轰炸我国安东等地，狂叫“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中朝）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鉴于美国的侵略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到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至1951年5月，连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回到原来发动侵略战争的“三八线”附近，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板门店同中朝方面签订停战协定。

朝鲜战场停火，解放军的海、空军得以南移，开展对浙闽海域施加压力。

蒋介石利用韩战和美军“援台”，而获得喘息机会，钻进美国的保护伞，并重新整顿国民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阵脚。他把台湾搞成党政军清一色的蒋家一统天下了。这一点，他在大陆20多年，一直未能做到，如今海岛一隅，倒是容易做到了，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CC系的陈果夫1951年8月病逝，陈立夫很快即被蒋介石夺权失势而出走美国，以养鸡“消遣度日”。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着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连闹了20多年的CC系，都树倒猢猻散，其他非蒋系势力的情形也可想而知。

蒋介石还修补他的反共思想体系，鼓吹狂热的反共宣传。1951年底，他视察金门时，在太武山摩崖题了四个字“毋忘在莒”，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随后，台湾掀起了“毋忘在莒运动”。

1952年冬天，美台关系的“蜜月时期”开始了。这年10月1日，美国大选揭晓，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后，任命坚决反共的杜勒斯为美国国务卿。他俩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出发，大大推进和台湾的关系。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的首次国情咨文中，宣布立即解除台湾中立化，恢复台湾军队对大陆的行动自由，并正式任命兰金为“驻台大使”。8月20日，美台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向全世界表明美台关系并向新中国示威。

对此，中国人民作出了严正的回答。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一天不解放，我国的领土就一天不完整。我们的和平建设环境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远东和世界和平建设环境就一天得不到保障。”他严正指出，“一切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或者交中立国代管、以及‘中立化’台湾和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的领土，奴役台湾和中国人民，使美国侵占台湾行为合法化，这都是中国绝对不能容许的。”解放军炮击金门，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反对美国利用维持现状，搞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并把台湾问题提到世界舆论面前。

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这是1949年后访台的美国最高官员。尼克松在台北发表演说，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接着他和蒋介石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开始谈判。蒋介石梦寐以求地想与美国联盟，这样既可借美国之力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又能伺机反攻大陆。而美国则想利用一纸“条约”，进一步控制台湾，作为其全球战略在亚洲的一环。这样，美蒋双方政策构想逐步接近。“蒋台共同防御条约”是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军事性同盟性条约，杜勒斯叫嚷要用美

国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太平洋海军总司令亲率舰队到大陈岛活动。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访台，蒋介石就“共同防御条约”问题进行三次长谈，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署生效。条约宣扬美蒋将一致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蒋介石以为，有了美国这张“保护伞”，解放军就不敢进攻他所占据的任何岛屿了。

12月8日，周恩来就美蒋条约发表严正表明，指出：“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其目的是美国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战争。声明再次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予以坚决的回击”。并明确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军挥师沿海诸岛，驱逐盘踞的国民党军队。1955年初，解放军陆海空协同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大陈岛及浙江沿海全部岛屿，使蒋介石占领的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成为解放军进攻的下一个主要目标，这时，距离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时间只二十月左右。

解放军对沿海诸岛的军事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密切关注。3月3日，艾森豪威尔十分明确地向记者宣布，“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湾地位。”蒋介石也源源不断增兵金门和马祖，金、马兵力达到台湾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1955年4月5日，艾森豪威尔致杜勒斯备忘录中说：“美国可以而且愿意以最大限度的力量协助蒋，使之得以支援他在金门与马祖的前沿部队；并且装备和支持他的大批军队，作为一种待机力量，以便随时利用大陆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一举进犯而获得相当有把握的成功。”

美国的干涉行动招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不满。丘吉尔再三寄诚美国，对于蒋介石，“应给予保护之盾，而不给以动武之矛”。文森豪威尔致函丘吉尔：“我们得到蒋的协议，除非我们同意，蒋不会从福摩萨或者从他的沿岸阵地回大陆进行任何攻击性活动。”

由于美国的干涉，海峡两岸出现了一相当长的对峙局面。国共两党开始了一场新的较量——冷战。

## （二）

外交，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高贵而神秘的字眼，它意味着少数人的活动决定亿万生灵的命运。

1955年初，印尼总理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4月蒋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亚非会议，将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也是打开新中国外交的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因此，他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

蒋介石集团对周恩来将应邀出席亚非会议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台湾会因此而更加孤立，于是决定暗杀周恩来。

蒋介石逃到台岛后，因中统和军统已丧失实际作用，而重建特务机构。他先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不久又把它改为由蒋经国负责的“总统府机

要室资料组”，“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万隆会议前夕，归蒋经国指挥的特工人员在5万以上，“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把暗杀周恩来的计划定为代号“1”。

4月7日，周恩来拖着刚动过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抵穗，准备取道香港飞赴万隆。这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大型飞机，只好向印度租用一架叫“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4月11日，该机从香港启德机杨起飞五个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的中、越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好险啊！周恩来本来也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后因临时决定先去仰光，才侥幸避过蒋介石的暗箭。

“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中国外交部曾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要求务必保证在香港启程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香港政府随即在启德机场采取了防范措施，但因忽略对机身的检查，致使伪装成加油工的台湾特务周驹埋藏在飞机油箱里的定时炸弹没被发现……。

在事件发生后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决定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跟随周恩来，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第二天，中国政府表示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谋害。”

局势险恶丛生，但周恩来面无惧色，处之泰然。4月12日，他复信邓颖超，深情感谢她的“好意和诤言”，并坚定地说，“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4月14日，周恩来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代表团，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代表团经过仰光时，周恩来会见缅甸、印度、埃及三国总理，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针对大家的恐惧情绪，冷静地分析了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人民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的民族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一定会成功。”对于飞机事件的处理，周恩来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后来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周恩来的私人代表熊向晖一起到香港调查，经过交涉，英国当局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宣布对犯有特务罪的周驹已经发出逮捕令，要台湾蒋介石当局将已逃回台湾的这名罪犯送交港英政府处理。）

4月16日，周恩来一行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雷雨区，为了避险，只得被迫降落。新加坡尚未与新中国建交，机场上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杨奇清建议大家飞机上等候，但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到贵宾室休息。当周恩来一行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一眼认出两名面孔颇熟的国民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当即暗示警卫人员提高警惕，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因而把守在门口。周恩来神情自若，沉着冷静，一边吃看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两个小时后，飞机重上蓝天。

中国代表团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雅加达，急坏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同志。他们万分焦急地等待着。

下午6时，银灰色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

在机舱门口时；机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为他祝福的欢呼声。4月17日，周恩来一行在苏加诺总统的陪同下到达万隆。街上，人山人海，周恩来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无数欢迎鼓掌声和“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声。

蒋介石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孤注一掷，重金悬赏其驻雅加达“敢死暗杀队”在万隆伺机暗杀周恩来。会议的第三天，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一封匿名信，此信的原文如下：

“敬启者：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适宜属支部，于本年3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28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20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20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40万盾。本月19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议，讲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1日至5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黄镇大使收到这封匿名信，马上请示陈毅。陈毅当即召集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决定加强总理的随身警卫工作，并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了汇报并看了这封信，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中外广大人民站在我们一边，这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立即向印尼方面递交备忘录，使他们对代表团的安全负起责任来。”于是杨奇清和黄镇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忘录。

会议期间，由于印尼方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并临时拘留一批嫌疑分子，蒋介石的罪恶计划终于未能得逞。

4月18日上午，会议在充满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中开幕。不料，翌日下午，会议就出现分歧和矛盾，有些国家的代表偏离会议主题，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并说中国在其边境设置自治区就是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颠覆。随着会场气氛的突然紧张，很多国家的代表以幸灾乐祸或者同情焦虑的目光注视着周恩来。为避免会议出现分裂的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把发言稿当作书面报告散发，并利用休息的片刻时间草就补充发言稿。

在听完多数国家代表发言之后，周恩来开始发表他的演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我国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的痛苦。因此，我们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中国人民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困苦，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干涉别人的内政呢？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有自治的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稍为停顿一下，会场安静得连翻纸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代表们都屏息倾听。周恩来宣布：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大厦沸腾了。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还有印度、缅甸等国总理纷纷离开座位，去与周恩来握手。一位目睹这一盛况的美国记者评论说：“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态度的绝好说明，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它是两天来会议的高潮。”事后证明，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精神，是使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29个亚非国家终于找到了构成“万隆精神”的精髓的共同语言，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20日傍晚，某国代表团长忽然退出会场，单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台湾应该取得独立国的地位，建议把台湾托管四年或五年。其他几个国家也跟着坚持这种观点。会议处在十字路口之中。这是讨论一国内政问题，还是互不干涉内政，讨论增进共同利益的问题。

面对这种挑战，周恩来从容不迫，高屋建瓴。他首先在会上简明表示中国不能同意这位总理的言论，但不准备开展争论，以免偏离会议主题。等到休息后，他又找这位总理单独长谈，向他介绍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主张。诚恳而坦率的态度减少了对方的疑虑和对立，这位总理对中国的态度表示理解，同意不在会上展开无谓争论，鉴于对中国误解而怀有戒心的国家不止一个，周恩来见缝插针，利用各种机会，同到会的各国代表团长，探讨相互间关心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阐述中国的政策和立场。于是，一些有对立情绪国家总理，因此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并同周恩来建立了友谊。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长罗慕洛于1985年4月在纽约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一往情深地回忆起30年前的往事：“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万隆会议闭幕前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在印尼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向各国代表团阐述了台湾问题的两重性质。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又是国际问题。”这时巴基斯坦总理插话：“如果台湾和平解放，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着回答：“完全可以。”接着，周恩来又向大家说明了朝鲜战争的真相：“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当时，中国曾通过印度政府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扩大，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历史的真相是，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美国军队咄咄逼人，飞机和炸弹都越过鸭绿江，这才导致中国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印度总理当即证明了这段史实。所以很多不明真相的国家对所谓“中国好战”的真实背景、对中国既坚持原则维护主权；又谋求和平、重视协商的立场有了新的认识。出席宴会的各国代表纷纷提议周恩来公布自己的立场。

下午，周恩来接受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

顷刻之间，周恩来讲法和声明震动了万隆，波及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

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4月24日，会议胜利闭幕。5月7日，周恩来满载着累累果实飞回北京。

周恩来，这位中国革命神话般的领袖人物，在万隆会议，作为新中国的优秀代表，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天才，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另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只要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和掌声。”“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蒋介石也疯了，不过他是被周恩来气疯了，吓疯了。他因暗杀周恩来的计划未能得逞，声名狼藉，而且周恩来在万隆的精采表演大大提高了年轻共和国的威望和自尊，使帝国主义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更使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日益孤立。

蒋介石尽管有美国人为他撑腰，但对万隆会议以后的远东局势，感到恐慌。1956年3月，他在台北接见美国合众社社长时回肠九转，长吁短叹：“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在遭遇失败，很不幸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

12月，他又完成一部名叫《苏俄在中国》又名《和平共存？》的专著，全面、系统地歪曲和篡改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沉痛”总结了国民党的历史、“经验”及其失败教训，警告“自由世界”不能与共产世界“和平共存”。书中表达了蒋介石对万隆会议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以及日益深入各国民心的“和平共处”方针，所体现的“杞人之忧”。他“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伎，转而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告诫“自由世界”、以“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他还表示只要“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反攻大陆”定能成功。该书结尾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我们能够痛定思痛，提高警惕、埋头奋斗，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

1958年8月，蒋介石飞抵金门岛视察。这时，他已年老体衰，走路离不开拐杖，到炮兵阵地视察只能坐在凳子上，从炮位上的望远镜里眺望大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大陆故土，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本岛。他对官兵训话时叫嚣：“为国家复兴而忍耻受辱，已有10年之久，今日是打胜仗的最好机会，复仇雪耻就在今朝。金马部队负有打第一次胜仗的任务，决心与牺牲是打胜仗和成功的先决条件，与阵地共存亡，即是与国家共存亡。”他下令金马、马祖两岛的国民党军队向福建沿海地区炮击。

海峡两岸发生了激烈的炮战。9月4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称：“总统已经国会联合决议案授权，得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以保卫如金门与马祖等有关据点。”接着，美国即以第七舰队护航，送运大批军用物资抵金门、马祖，还调遣地中海舰队部分船只驶往远东，大批美军集结台湾地区，新式军用飞机首批交给台湾，“胜利女神”导弹营抵台。台湾军队实力大增，海峡两岸更大规模直接冲突迫在眉睫。

海峡炮战引起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关切。英国首相认为，金、马等外岛应予非军事化，他尤为反对蒋介石重兵驻扎金马和马祖。美国迫于国际舆论和担心金、马会成为卷入中国内战的触发点，国务卿杜勒斯只好告诉台湾“驻

美大使”：“美国的政策在盟国和中立国几无支持，在世界舆论上是孤立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认为增兵“不是一件好事”。

蒋介石集团的态度十分强硬，不肯让步，尽管它接受了大量的美援。他们声称“任何涉及国军金、马外岛中立化或非军事化的任何决定，均将被视为有损我合法权益”。在蒋介石看来，金、马两岛是反攻大陆的前哨阵地。他说：“无金门即无台湾，有台湾便有大陆；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决心打到最后一人”。“在紧急状态中，亦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副总统”陈诚甚至不点名地指责美国：“谁也无法叫我们把这些岛屿非军事化。”

美国政府为弥合与台湾的分歧，协和立场。10月，杜勒斯奉命访台，与蒋介石会谈，发表“台美联合公报”，指出：“再次确认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之关连”；达成“统一中国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蒋介石对第一点表示满意，对第二点则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向外界作新的解释：“中华民国”没有向美国保证只有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才使用武力，所谓“光复大陆”并未放弃使用武力。

1961年，美国民主党人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接过艾森豪威尔对华政策的三个原则：1.承认台湾为中国合法政府；2.拒绝承认中国；3.拒绝中国进入联合国。5月14日，副总统约翰逊又到台北，向蒋介石保证，美国支持其在亚洲的盟国，无意承认北京。

这时，中国大陆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中苏大论战进入高潮，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台湾当局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反攻机会”。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叫嚷要进行“反共抗暴的革命运动”。同年春，他又在“告全国青年书”中喧嚷：“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刻到了。”美国新闻界立刻披露，视为一大新闻。《时代周刊》专栏刊载，并配以蒋介石的戎装照片，显示反攻行为即在眼前。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国会内外积极活动，力图使肯尼迪信服，台湾很快将占有整个大陆。

1962年5月，“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的国民党八届八中全会在台北举行，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好像“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随后蒋介石不断接见记者，一再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涉”，“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年内可平定全国”。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蒋介石歇斯底里的反攻叫嚣投以蔑视的眼光，人民解放军加紧在福建沿海修建军事设备，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沉不住气了，1962年8月，他礼貌地通知蒋介石：“时间不成熟，美国的无限支持不是垂手可得的。现在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

像玩猴把戏一样，又是锣又是鼓，反攻大陆虽然闹腾了一阵，猴子毕竟是猴子，成不了人气。到了最后，猴子一走，戏也就散了。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仅仅折腾了8个月，便悄然收场了。

### （三）

1965年，本是蒋介石所“钦定”的“反攻圣战平定全国”的年份，然而



他不仅未能离开孤岛一步，倒是曾任南京政府代总统的原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这生动体现国共两党长期较量的、轰动世界的新闻，从酝酿到实现、前后经历整是十年之久。

1955年夏，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关于台湾海峡局势和中美关系的谈话和声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同年8月从美国新泽西州传来了李宗仁非同凡响的回声，他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解决台湾的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第二条，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的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作出安排。

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67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完全可以肯定他说，他去同意我的意见的。”

中国人民从这个简短的声明中，立即感觉到这个过去曾经是人民的敌人，如今流落异邦的政治家对他过去的悔悟和对祖国的忠诚。

周恩来没有仅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体谅这个曾经背弃祖国的人的痛苦呼声，他的脑子里，正构思着祖国统一的宏伟蓝图。他要树立一个榜样，让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人看到，共产党对其过去的敌人，只要他们改变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同样有他们平等的一席。

1956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款待从香港返大陆观光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远。周恩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合作的历史讲到现在祖国对国民党的希望：“国家当前的内外方针，是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此，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国共曾经两度合作，反帝反封建，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合作，结果均是凶终隙末；然而追源究始，事实俱在，有目共睹，责任不在共产党。”谈到李宗仁时他说，“李宗仁先生去年8月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反对‘台湾托管’，‘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民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在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回到香港维多利亚海北岸海滨寓所后，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给李宗仁写信，转告周恩来的希望和自己回国的感受。这时李宗仁正面临如他后来在回国声明中所说的两种前途选择：“一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李宗仁与蒋介石分手赴美后，在纽约医院割治胃溃疡病。出院后，他和夫人郭德洁选中美丽而宁静的盎格鲁村镇花了6万美元购置一座二层楼房定居下来。

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的一席话，成了李宗仁回国的契机。1958年秋天，李宗仁在致老朋友李济深的长信中用“树高千尺，落叶归根”的古语，百感交集地表达他意欲归国的愿望。1959年10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第二次宴请回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典礼的程思远。周恩来谈到李宗仁归国的问

题时说：“李宗仁先生要回来，我们是欢迎的。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适当的时候，李先生可以先到欧洲走一走。欧洲有什么地方可走吗？”程思远回答说：“可以到瑞士的苏黎世，郭德洁女士的表弟田桂昌在那里开饭馆。”周恩来笑一笑说，“那好么！瑞士是个很美的地方，又有这样一位开饭店的亲戚，有吃有喝啊！”然后神色又严肃起来，“到欧洲去，只是走一走，玩一玩。你同他见面谈谈。但是，李先生必须按时回到美国去。”

为了避开美蒋特务机构的怀疑，程思远和李宗仁的通信都用约好的暗语，但无论用得如何巧妙，也不能淋漓尽致的表达彼此的感情。1960年9月，郭德洁受李宗仁的委托，秘密来香港会晤程思远。她说，“德邻已经下决心要回到大陆。他是一个政治家，虽然年逾古稀，但不愿和蒋介石一起，背着那狼藉的名声载入中国的史册，他经常重复中国的那句古话‘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和孔夫子的名言，‘朝闻道夕死足矣’。”程思远向她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语重心长的嘱咐。

郭德洁从香港带来的信息，使李宗仁大为兴奋。1961年，他致信肯尼迪总统，指出：把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当作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能掩耳盗铃，只有中共所领导的北京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63年夏天，李宗仁在接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占斯托·玛赛丽的时候，以饱经风霜的政治家的深邃睿智，纵谈天下大势与中国问题。

记者问：“李将军，你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了，你为什么在谈到红色中国的边界时说‘我们的’？”

李宗仁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中国人总归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政治制度。”

“让我们谈谈蒋吧”，记者又说。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而现在的举动好像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同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区别的是，我完全下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下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1963年冬天，经过长期准备，李宗仁决定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会晤程思远。11月14日，程思远上京向周恩来请示有关问题，15日晚上，周恩来在紫光阁接见他，殷殷嘱咐赴欧要注意的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并一再要他记住向李宗仁转达的“四可”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12月17日，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阔别14年的李宗仁和程思远，首次重逢于苏黎世，他俩在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里找到一个僻静的座位后，就通宵达旦畅谈起来。

李宗仁说：“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但是，蒋介石那个‘中国’，是与我无缘的。我如今悔之晚矣。因为我的一切灾难和不幸，都是因为与蒋介石决裂太晚形成的。一时犹疑，错过了良机，酿成千古之恨。现在，白崇禧的日子也不好过，那就是一个例子。”

程思远说，“他号称‘小诸葛’，看来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李宗仁又说：“张国焘那种事更不能干。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写骂共产党的书，将来也不会有脸去见江东父老。我要回到祖国去，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过去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程思远又把周恩来的问候和“四可”意见向李宗仁转达。这时，李宗仁激动得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感慨万分地对程思远说：“我们这些人，过去颇有些雄心抱负，立志干一番事业。不过在今天看来，那是非常渺小的，因为它还没有脱离我个人的范畴。我对意大利记者说，我不把失败的往事记在心上，但真正不放在心上是不容易的，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共产党领袖，才是真正虚怀若谷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的人。他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他们也包括我们，包括今天也包括明天。这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正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众望所归的缘故。而蒋介石国民党在于什么呢？直到前几天，还在互相踢脚，骂我是共产党……周恩来对我们说的话，是金玉良言哪！如果在这样真诚而恳切的态度面前，沉湎于个人的区区得失之中，裹足之前，那就要真的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十恶不赦的罪人了。请你转告周总理，我只要一可，就是回祖国定居。”

12月22日，李宗仁和程思远分别离开了苏黎世。程思远返港，即写信报告了周总理。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亲共举动感到怒火中烧，他指使台湾舆论界蓄意攻击，密令其特务机构加紧监视。

那次，郭德洁秘密抵港会晤程思远被他们发现并窃取有关信件后，国民党的报纸即做了一番耸人听闻而也确实有其事的报道：“郭德洁女士神秘抵港，可能与李宗仁意欲投共有关。”

不过，无孔不入的美蒋特务有时也真是神经过敏。一次，李宗仁离开寓所去参加桂林同乡廖行健与柴秀丽的婚礼。台湾驻美特务就叫嚷李宗仁“突然离开美国”、“在香港，并试图进入红色中国。”李宗仁返回家里后，竟然还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查询电话，并派人赶到李宅来核实回电话的人是不是李宗仁。直到他们目睹李宗仁与新郎新娘在一起的照片后，才消除怀疑。

1964年初，中法建交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李宗仁即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法戴高乐政府同新中国调整关系。蒋介石非常震惊。这时美国舆论寻中，主张与大陆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日趋响亮，他担心李宗仁的公开信，会为这种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怀疑李宗仁此举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于是他紧急动员岛内外所能动员之力量，肆意攻击李宗仁。2月15日，纽约《华美日报》发表《是何居心》社论，说李宗仁“是以此稿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

华侨社会及向美同进行游说工作”。2月24日，香港《快报》发表评论，指责他“向红朝屈膝”。在香港的前广西军政人员黄旭初、夏威等人联名写信劝他“保全晚节”。3月18日，在台北息影多年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崇禧致电李宗仁，说：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以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其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归心似箭的李宗仁看到白崇禧辈的电报、信函后，置之一笑，继续我行我素，筹划归国事宜。

1965年3月，他致信程思远，表示急于回国，不愿再在美国虚度晚年了。程思远把这一信息传递到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多年的宿愿可以实现了。李宗仁得到周恩来的这一答复，欣喜若狂。

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华克城移民局，提出要带刚刚手术后不久的夫人郭德洁去气候适宜的瑞士休养。仅六天时间，美国移民局便爽爽快快地把出国护照发下来。原来两年前李宗仁按周恩来的安排走了一趟欧洲，并且按时返回美国，给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都造成了错觉，以为李宗仁对美利坚台众国这片丰腴的土地是充满依恋之情的。批准他出国，就像让鸟儿出林了一样，只要到了黄昏时分，还会扇动着翅膀，依然归来，移民局甚至还了解到那次李宗仁从瑞士飞回美国时在纽约机场所说的一句话：“好险，差一点赶不回来过圣诞节了。”因此，当李宗仁真的准备离开美国，甚至把房产都卖掉了，联邦调查局还稳坐钓鱼船哩！（香港一记者为此曾访问了调查局和移民局，发表《李宗仁巧计离美》通讯，说1963年欧洲之行实在是胸怀大略之举。这记者当然不知道，这一置美国人于目瞪口呆、懊恼无限境地之举，原是周恩来略微施展了一下他的智谋。）

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欧。程思远接到电报后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请他立刻前来北京，交代李宗仁从欧洲回国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由于耽误了时间，程思远18日下午2时才到北京，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已于当天上午10时乘专机出访非洲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总理访非日期是早已确定的，但是，他对李宗仁归国的有关安全、路线等备方面问题，都作了详细周到的安排了……”。

28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与李宗仁会合。李宗仁夫妇等他们的次子志圣一起回国，两个星期过去了，儿子还未到来，他们正欲赴洛桑一游，急然接到中共有关方面的紧急通知：“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

7月13日下午2时，一位青年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并郑重嘱咐：“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绝对不要走下飞机。”“波音707”客机挟风而起，飞上了欧洲7月的蓝天。

几乎是同时，另一架“波音707”客机在苏黎世机场的另一条跑道上徐徐降落。座舱的门刚打开，两应身穿白色西装的中国人便匆匆跑下舷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离开停机坪，穿过大厅，钻进小轿车。这两个人的公开身份是台湾驻联合国日内瓦机构工作人员，实际是蒋介石的特务。他们刚接到台

北的指令，要不惜代价，不惜采取何种手段，设法制止一件可怕的政治事件发生——李宗仁归国。然而，他们晚了一步。

华灯初上时分，李宗仁一行所乘客机，经过日内瓦后，降落在雅典机场，爱琴海上吹来的海风，湿润而凉爽，仿佛可以减弱一点归心似箭的焦急，平慰一下与故国久别之后即将重逢的激动。他们哪里知道，在苏黎世的两个国民党特务已知道他们的行踪。电波载着李宗仁的最新情报，跨越千山万水，飞入台北蒋介石的官邸。笔者没有办法取得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后的反应的资料，所能知道只是，短短几个小时后，当李宗仁所乘客机在贝鲁特机场降落后，他就收到从白崇禧等台湾发来的几封特急电报，劝说李宗仁放弃回归大陆的打算。蒋介石的用心何其良苦！可惜，李宗仁并不买他的账，那些电报没有拆开便塞进旅行提包里。

飞机又从贝鲁特飞向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蒋介石心里明白，李宗仁回到大陆，将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将在台湾人民、海外侨胞，特别是港、澳以及华侨集中的东南亚引起怎样的严重后果。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决定：宁可在全人类面前承担血腥暗杀的指责，也不能让李宗仁回归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一封杀气腾腾的密电令抢在飞机前几小时到达卡拉奇。蒋介石命令他在巴基斯坦的特务组织，在卡拉奇机场的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暗杀李宗仁。

7月14日凌晨2时，飞机降落在卡拉奇机场。这三位心潮起伏的旅人，此刻不知道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蒋介石花费重金收买来的死亡之神，正望眼欲言地等待着他们，无声手枪的枪膛里，已经装上含有剧毒的子弹；插在口袋里的手，不断地抚弄着光滑的枪机。

飞机刚刚停稳，李宗仁等三人就准备离开机舱了。这时，机外传来警车声，他们三人还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卡拉奇的迷人夜景，就被站在舱梯平台上的巴基斯坦军警请进警车，风驰电掣般地离开机场。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笑着回过头来说：“李先生、郭女士、程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前来迎接你们。”原来，蒋介石的密令被大陆有关方面破译了，北京急电驻巴大使馆，指令要万无一失保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的生命安全。大使接着说：“因为蒋介石已在机场布置好暗杀你们的特务，我们不得不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动用保安部的警车接你们。这是周恩来总理再三指示的。”李宗仁听毕，一股暖流冲上心头，泪水涌出眼眶，他一把抓住大使的手，急促地说：“谢谢周恩来总理，谢谢您。”

候机大厅里，刺客还在焦急地寻找行凶的对象，目不转睛地盯着出入口处。但是，他们终于失望了，眼巴巴看着飞机又载着那些酒足饭饱的旅客重上蓝天朝终点香港方向飞去。

一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在经历几乎整整一生的奋斗、思索、挣扎之后，在晚年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本身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较量的胜负，这也是人心向背的历史判决，但刚愎自用的蒋介石本人决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个判决，他还要使出一切可以施展的伎俩，做出猖狂的一跳，当他悉知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后，暴跳如雷，几乎在半疯狂的状态下，发出第二道密令，要求他的特务机构侦察出李宗仁回大陆所乘专机的时间和路线，准备派飞机拦击。他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准则、不顾国际法、也不顾飞机属于哪个国家所有。这倒也符合蒋介石的一贯性格的：只要翻了脸，就是亲娘老子也下得毒手！

李宗仁焦急地在中国使馆度过两天的时光。7月17日夜，大使对他说：“周恩来此刻在上海，他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指示我陪同你飞回祖国。为了避免‘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悲剧重演，必须使我们的行动十分秘密。现在，我们还要来采取一点掩人耳目的措施。”……

零点30分，波音707飞机在印度洋岸边的卡拉奇起飞，从漫漫的黑夜，飞向灿烂的黎明，18日早晨5时，进入中国云南上空。

此刻，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东湖宾馆，周恩来准备入睡了。昨天夜里，他决定了李宗仁的行程后，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他指令有关方面，密切注意波音707航线附近的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直到旭日临窗，红霞满天，电话里传来“李宗仁先生所乘班机，已经安全进入我国领空”的消息时，周恩来的脸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看了看正在打盹的陈毅，诙谐地说：“陈老总，蒋介石大概还在做梦吧，现在该轮到咱们睡一会儿的时候了！”

上午8时，波音707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他只了解到李宗仁在卡拉奇神秘失踪。等到7月21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海外归来到达北京》的消息和《李宗仁声明》之后，蒋介石才大梦初醒。

李宗仁在广州稍事休息后，于上午11时飞抵上海的虹桥机场，他看到周恩来和葛地站在候机室门前，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不已，连声说：“总理，你好！”

19日，周恩来在东湖宾馆设宴欢迎李宗仁一行。出席宴会的陈毅爽朗地对李宗仁说：“欢迎你回来！你这一回来，北伐革命军的七个军长就有四个生活在新中国了（即第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长程潜、第七军长李宗仁、李八军长唐生智）。”他们掐着指头，不禁为光阴的飞逝和人间的沧桑巨变而感慨万端。这时，周恩来凑了过来，鼓励李宗仁从头开始，与人民一道为爱国反帝和祖国建设作出贡献。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关于蒋介石，我没有李先生熟悉。但我和蒋介石在过去几个重要时期都有过接触和较量，因此，对蒋介石还有所了解。此人没有一句真话，不以信义待人，不可信么。当然，蒋介石虽然不可信，但台湾保存在他的手里，还是比让别人霸占去强么。”李宗仁说：“我衷心地祈祷蒋介石活到百年。”周恩来说：“你希望蒋介石活到百年，是出于爱国心。但是，蒋介石不会相信，他会认为你讲这个话是争取他的部下。蒋介石已经70多岁了，余年不多了，但是，在台湾人士中，卖国的、赞成分裂的、以及心甘情愿做历史罪人的只是极少数，祖国的统一事业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总有一天要实现。这个历史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7月20日，周恩来的专机比李宗仁先20分钟到北京。上午11时，李宗仁由上海飞抵北京，他步出机舱，抬眼一望，不禁怔住了，因为周恩来所安排的盛大欢迎仪式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停机坪前有周恩来、彭真、郭沫若、贺龙、陈毅、罗瑞卿、叶剑英、傅作义等领导人和解放军三军将领。欢迎人群中他熟悉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竑、还有他的旧部社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人。当他来到当年和谈代表和起义将领面前时，李宗仁百感交集，为自己和旧部能殊途回归，感到荣幸，尤其是来到黄绍竑面前时，李宗仁意外地喊出声来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往事如烟了，1949年4月，黄绍

竑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在北平携带与中共方面商定的和平条款，飞回南京，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一住三天，以至友和旧部的双重身份，力劝他在条款上签字。结果，像历史已经证明了那样，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对自已的实力的错误估计，坐失良机。因此，他与黄绍竑紧紧一抱的瞬间，是用无声的语言倾尽了自己无限的悔恨。

7月22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隆重欢迎李宗仁夫妇。心情激动的李宗仁操着一口浓重的广西口音说：“周总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使宗仁与各位首长欢聚一堂，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谢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欢迎我回到祖国，这种宽大精神，更使我感动。”这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为一位投奔新中国的国民党首领，举行的第一次盛大欢迎宴会。笔者深信，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7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新落成的游泳池边的休息室里，会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刚刚坐定，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对李宗仁说：“吓！吓！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一时无话可答，机智的程思远立刻为他解围，说：“宗仁先生与蒋介石合作，才是误上贼船。如今，我们已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彼岸了。”毛泽东大笑起来。当李宗仁表示为台湾问题久悬未决而忧虑时，毛泽东说：“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人对李宗仁归国开诚相见，优礼相待，祖国大地到处是亲切的笑脸和热情的双手，他内心激动，毕生难忘。9月26日，李宗仁在政协礼堂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记者300多人，为建国后所仅见。他说：“经过体察，最使他感奋的是祖国的现状与旧社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对比。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见，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先生所创立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一百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李宗仁最后说：“宗仁在海外住了16年以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一条爱国反帝的道路，并认为这是吾辈国民党人今后唯一可能抉择的光荣的道路。深望台湾国民党同志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相率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

#### （四）

60年代中期，中国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日益重要。1964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是西方大国，此举大大影响整个西方世界。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影响正如法国前总理富尔所说“试爆的是一枚政治炸弹”。原子弹的连锁反应波及到白宫，国际政治的现实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量的转变。

1965年9月下旬，蒋介石派“国防部长”蒋经国访美，向美国提出派军队到越南参战：“远东的情势正在变动，那里有许多新的发展，中华民国愿出军队分担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包袱。”结果，遭到拒绝。美国人否定台湾利用美国乘机反攻大陆的意图。1966年7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时，有记者问他：“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腊斯克回答说：“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两字消失了。

不久，蒋介石认为大陆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他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1967年3月底，蒋经国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记者访问时，提出“挥师北伐，必成必胜”，并公开要求美国立即给以后勤支援。可是《纽约时报》以《中国神话》为题发表社论，强调对美国人而言，此时此际最应记住的是巡逻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具有重要的功能。”警告台湾当局不要轻举妄动。

1968年2月，曾带头反共亲蒋、反对承认红色中国，并跟麦卡锡相呼应，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的理查德·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演说中说：“我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今后八年内将看到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八年中，中国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这位政治嗅觉灵敏的政治家的思想观点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1969年2月，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出访欧洲，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那天，他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跟前，一边看着窗外花园的美景，一边谈到苏联，谈到二次大战，谈到中国。谈话中他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尼克松说：“在美苏对话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步，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戴高乐爽直地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1969年4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的所谓“全国各界纪念太原500完人成仁20周年大会”上说：“现在大陆一片混乱，伪政权土崩瓦解，匪首间夺权斗争必更凶猛。不是过去的文斗，也不是过去的武斗，将是军事割据之内战。在这个战场中，当有游击队发难起义，与我们国民革命军呼应结合。正是有志之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之时机。我们在烈士碧血丹心光辉照耀下，唯有以气节自砺，以廉耻互勉，同仇敌忾，集中在国民革命光复大陆总决战的总反攻行列中，争取最后之胜利，以副大陆同胞喁喁之望，以慰革命诸烈士在天之灵。”针对“老朋友”“反攻大陆”的高调，尼克松却作出了低调的反应：第七舰队减少在台湾海峡的活动。

尼克松开始为与中国对话进而承认中国作出艰苦的努力。下半年，尼克松安排了代号“月辉”的环球旅行——出访亚洲六国和东欧的罗马尼亚，以寻求打通中美关系的渠道，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两人把自己关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口信带给中国领导人。

1970年1月30日，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意味深长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马上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中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2月22日，尼克松收到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他：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



中国人，“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尼克松十分高兴，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从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

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寓意根深地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12月9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来到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办公室，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新信息：“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尼克松批准基辛格草拟的回信，说：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问题……。”

1971年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接近尾声。这天早晨，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上午10时30分美驻日使馆给美国国务院拍发了加急电报。

无线电波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飞向华盛顿，它跨越万顷太平洋，就像是兴致勃勃的游人一步迈过山脚下若隐若现的溪流。东京，是春光照人的正午，华盛顿此刻却是接近午夜。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国务卿罗杰斯都在办公。尼克松看了加急电报又惊又喜，他未曾想到中美关系的突破会以乒乓球访问的方式得以实现。他认为：北京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一个充满含义的微妙示意：它绝不是一段孤立的曲，而是盼望已久的一个重大外交进程的开端。

在美国接受邀请后，周恩来把黄华、章文晋两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布置好接待工作。他说：“毛主席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对于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其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我准备接见他们。”15年后，章文晋忆及此事时说：“一个把握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计划已经在总理心中完整地形成。”

深夜了，周恩来的办公室的灯光还晶莹透明，他在灯下继续办公，细心批阅名古屋传来的汇报，直到4月8日凌晨的悄悄到来。作为一个毕生为中国人民幸福而辛勤工作的共和国总理，作为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他不能不为正在眼前展开的历史进程新画面而欣慰。

蒋介石却不那么开心。一年之前，蒋介石已感觉到尼克松的行动，1970年4月初，“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正式访问美国。蒋经国就台美关系向尼克松建议：“台湾、越南、南朝鲜、泰国应组成集体防卫体系以对抗共产主义。这种联盟需要美国的支持与领导才能发生作用。”尼克松很有礼貌地倾听，未作任何承诺。尼克松对蒋经国的冷淡态度被某些有识之士认为是，美国向台湾“道别的一种方式”。

1971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访问，就“乒乓外交”一事对尼克松和北美舆论界提出“警告”：中共的邀请与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中国大陆，说明北平政权在国际阴谋范围内的新攻势，中共这种在国外进行渗透与颠覆的战术已获得初步成果，中共最近数月所展开的“笑脸宣传”，依本人看来，只是一种欺诈的战略，共产党的基本阴谋并未改变，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本人竭诚希望，自由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张开眼睛窥见这些事实，切勿为中共的和平攻势所诱而坠入陷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一天，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跨过南中国深

圳的罗浮桥。傍晚，他们自广州乘飞机抵达北京，下榻新侨饭店。一位聪明的接待人员对美国客人说：“在中国‘侨’与‘桥’同音。如果我们把这座饭店视为‘新桥’的话，诸位一定会有深入的联想。”

历史的巨潮是蒋介石不可阻挡的。然而，潮头涌来，将蒋介石自己过去站立的地方吞没了，这位艰辛的跋涉者难免会有一种惆怅的失落感。4月12日，正当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与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时，台“驻美大使”周书楷奉蒋介石之命由陈香梅陪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要卸任归台了。周书楷思考再三，用外交语言对尼克松说：“蒋总统希望你要采取冷静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但尼克松转了话题，说了些客气话，尽管他脑子里翻腾着围绕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而纷至沓来的信息。周书楷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会客厅里的人都仿佛觉察到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4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美国客人，他微笑着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打开了新的篇章。我相信，这友谊的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你们同意我这个看法吗？”正在聚精会神倾听着的美国客人热烈鼓掌。

周恩来认出他的老相识约翰·罗德里克。他是随队来华的美国记者，40年代长驻中国，1946年曾重点采访国共两党谈判，与蒋介石、周恩来等头面人物很熟悉，直到1949年才离开中国。周恩来走过来和他握手，说：“啊，罗德里克先生，我们好久不见了！”“是啊，我们在延安见过面，后来是南京，然后20多年的今天。”老记者笑了。“你们看到了吧，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周恩来的语气中充满感慨。“我亲眼看见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关心着中美关系。”老记者点头回答。“哦，现在，门打开了，”周恩来应声说道。大厅里回荡着这一声音，是啊，为了启开这道凝重的门整整经历了一代人的光阴。

4月21日上午，访华归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白宫工作人员引导下走进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尼克松立即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握手相迎。然后在沙发上相间而坐。斯廷霍文介绍了中国之行，说已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还问总统：“如果来到美国访问的中国运动员希望见见总统先生，我该如何回答？”尼克松说：“给予完全对等的接待。”

“乒”的一下，周恩来把球从太平洋东岸打了过来，现在轮到尼克松作出反应了。以被基辛格评为“周恩来的代表作”的“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双方接触的速度显著加快了。

4月27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前往白宫，带去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本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这个口信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但他对“公开接待”，感到为难，他知道自己出访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之前，事情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破坏全部工作。5月10日，基辛格通过叶海亚给周恩来带来口信：“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中国的邀请；事先由基辛格博士秘密前往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尼克松如坐针毡地等待中国领导人的答复。6月2日黄昏，基辛格从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接过周恩来的回信。他紧张得有点发颤。那两页纸的信上写

道：“……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尼克松读了信，禁不住眉开眼笑。基辛格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拿出一瓶并未开封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与基辛格斟酒祝贺这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月9日正午，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他表情忧虑，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下午4点钟，周恩来来到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基辛格和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接，他们排成一行，各个垂生站立，表情僵硬，似乎有些手足无措。周恩来微笑着握住基辛格的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几年来第一次握手。”“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基辛格说着，把自己的随员一一介绍给周恩来。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是在香港学的吧！”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学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温斯顿·洛德，后曾任美驻华大使。他的夫人贝蒂，中国名字叫包柏漪，著有《春月》一书。）美国客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拘束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了。7月11日，基辛格带走双方认可的联合公报，经巴基斯坦飞返美国。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舒尔坦后来说：基辛格去时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7月14日（太平洋时间）傍晚，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直升飞机从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飞往洛杉矶，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7点整，尼克松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晚上好！”总统开始讲话了。“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尼克松刚念完《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评论员。这些人都怔住了，神态都显得目瞪口呆。全世界都发愣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

蒋介石是在尼克松宣读《公告》前20多分钟才接获通知的，他感到有如“晴天之大霹雳”。

早在6月10日，尼克松宣布解除21年来对大陆禁运。同一天，蒋介石为以安定人心而发表“庄敬自强”的文告：

“古人云：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因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如果今天看到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蔑视正义，侈言和平而实在葬送和平的作为，吾人即为其所激怒，或为

其所沮丧，那就正是在‘自毁其壮志’！……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善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

尼克松宣布将访问北京后，台湾人心慌乱，当局也仓皇失措。蒋介石授权命“行政院长”严家淦发表“保持镇静，处变不惊”的谈话：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软化或放弃我们的坚定立场，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强权之下，我们必须遵从总统蒋公的训示：‘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坚忍奋斗，以达成建国复国的目标。”

不久，蒋介石发表“公告”：

“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我们从不以目前的挫折与欺侮表示愤慨或隐于悲哀，我们坚持我们的意志力与我们的决心……我祷告上苍并满怀信心……我们必须提高警觉，谨慎从事，而不气馁。我们必须仔细观察敌人幕后与世界急遽和惊人的转变。如此，我们得以以不变应万变，并以坚强的意志与冷静的决心，克除过分的感情用事而努力奋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在加速，而且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形势也不可逆转。台湾上空，阴云四起，凝聚不散。蒋介石眼看“冷战”大势已去，便不择手段，再度暴露了当年的上海滩的流氓嘴脸，

下手令将密谋 10 多年的谋害周恩来的暗杀计划付诸行动。

1955 年，美蒋特务谋杀周恩来的阴谋破产后，仍没有罢休，而进一步制定更为阴险毒辣的计划。他们挑选了一条刚断奶的纯种德国警犬“凯利”，把它饲养在一间特殊的房间里，使狗从小除食物气味外，不接触任何其他气味。万隆会议刚闭幕，谋杀小组以旅行社商人的身份混进印尼，收买了饭店和宾馆的招待员、服务员，收集凡是周恩来用过的刀叉、床单、毛巾等物，然后秘密装运到台湾，让警犬“凯利”熟悉周恩来的气味。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当把“凯利”放在野外时，它竟然能准确无误地直奔放在一英里外的周恩来曾用过的物品。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从别的国家收集周恩来用过的东西，训练了三代“凯利”，寻机谋杀周恩来。

1971 年 8 月，“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特工人员侦知周恩来将于 10 月份在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访问法国的重要消息。蒋介石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密令谋害小组副组长赵某从台湾移居巴黎，执行谋杀计划。赵某把第三代“凯利”装进箱笼里带往巴黎，在凯旋门旁边的一家中国餐馆当园师，企图在两个月后，周恩来访问巴黎在凯旋门前停车，接受巴黎少女献花时放出“凯利”接近周恩来，赵某即遥控引爆在狗脖圈里的烈性炸弹。然而，值得庆幸的是，9 月 13 日，林彪事件发生，为此，周恩来取消了巴黎之行。蒋介石的罪恶幻梦彻底破灭了。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在表决前就静悄悄地率代表团退出联合国，以免出现尴尬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有 20 多个国家和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蒋介石在承认这是“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的同时，为鼓其动摇的军心和民心而发所谓“告同胞书”，略谓：

“反共的行程，正如在风云变幻莫测的海洋中探舟前进，只要大家对于反共的基本形势，都有共同的认识，不为一时的变局所迷惑，紧紧把握着正确的方向，精诚团结，协力同心，祸福相倚，甘

苦与共，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惰；在狂风暴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形势愈险恶，我们愈坚强、愈奋斗，必可很快到达彼岸，拯救同胞，光复大陆。”

1972年元旦，这位“其介如石”的86岁老人在其“元旦文告”中又说：“我们与中共的唯一接触，是在军事行动上，敌前敌后阵线中，铁与血的接触，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接触！”

2月21日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这个时间是尼克松精心安排的。此刻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10点半，是电视机观众最多的时刻。舱门开了。走出来的只有尼克松和他的夫人。他的随从人员，包括罗杰斯、基辛格，全部留在机舱里。这也是总统特别关照的，因他特别重视第一次同周恩来握手，认为电视转播时为突出这个重要场面，镜头里美方只能有总统一个人。他说这是为了纠正1954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

尼克松走下舷梯，离地面还有三、四层台级，就向周恩来微笑着伸出了手。他和周恩来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这一历史性的握手足足持续一分钟。在驶往钓鱼台国宾馆的小轿车里，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啊！”

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当谈到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说：“我们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和总理为匪，不知主席叫他什么？”毛泽东笑了，周恩来回答：“我们一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啰，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们的交情比你们同他们的交情长得多。”……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尼克松一行。在周恩来致视词后，尼克松致答词。他说：

“总理先生，我要感谢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辩的讲话。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地方这样的场合都要多。”“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虽然我们双方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在主宴席上，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帕特寒暄一阵子，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两只大熊猫。”帕特惊喜异常。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了五天，与周恩来前后会谈了四次。除了双方关心的大事外，两人就像老朋友聊天似的谈了许多与公报无关的事。尼克松不仅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十分敬佩，也对他处于70多岁的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周恩来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在楼厅门口迎接。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在美国安排了好几次的电视转播。舆论界认为，“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他在祝词中寓意深刻地谈了他参观长城的感想：

“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长城还使人们想到，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我们已经开始了拆除我们之间这座城墙的长期过程。”

周恩来的祝词崇论宏议：

“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原则分歧，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使彼此的立场和主张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深信，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管历史的发展会有什么曲折反复，世界的总的趋势肯定是走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

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双方在上海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公报说：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周恩来举行的送别宴会上，茅台酒使尼克松脸上泛着红光，他洋洋得意、喜不自禁地乘着酒兴，来到麦克风前，踌躇满意地作即席讲话：

“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今后为建立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月28日早上，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立即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当周恩来谈到尼克松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笑了：“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要飞到北京？”

此刻，尼克松正飞回美国去。在飞机上，他十分精辟地对夫人帕特说：“周恩来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人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应周恩来之邀请访问大陆的一周真的改变了世界吗？这姑且勿论，但的确如当头一棒，把蒋介石这位86岁的老人打得头昏眼花。3月6日他指示沈剑虹前往白宫会见尼克松，要求美当局澄清对台政策，以消除因“上海公报”中未提及共同防御条约而引起不安。尼克松只是礼貌而笼统地要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台湾所要求的正是美国总统的保证。”3月7日，沈剑虹飞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屋漏偏遭连阴雨。不久，蒋介石染上台湾流行恶性感冒并转为治疗颇为费事的肺炎，9月30日，侍从送来一份简报到蒋介石的房间。简报上说：“9月25日日本总理田中角荣应周恩来之邀访问大陆。29日双方在北平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谓中日邦交正常化，并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蒋介石看后竟一把扯碎报纸，浑身一阵痉挛，昏迷过去。本来就是风烛残年、心力交瘁的他，从此卧床不起，秋风萧瑟，落叶生悲。

“世界改变了”，但蒋介石仍不能面对现实，拿出确实可行的应付办法，只是经常对其“国民”发表“以不变应万变”的空洞无力的说教。请看他老人家晚年几则被人“引为笑柄”的话：

1973年“元旦文告”：

“复兴基地的不断壮盛，就是海内外敌前敌后，以至一切从迷失中觉醒的人们，所认同回归的中心磁极；亦就是我们革命复国再北伐再统一的凭藉。……大陆的每一角落，每一刻时光，都会有天旋地转的爆炸突变发生，只要大家都能秉持其忠肝热血，苦撑坚忍，对世局逆流制变，向革命旗号集中，那就能一齐来承受中华文化历史的光辉，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的重大任务。”

1974年“元旦文告”：

“我们国民革命，就是每个人都经得起时代的严格的考验，以不成不止的定力勇气，来贯彻国父和先烈倡导的国民革命终极目标、根据昨天的延续，创造明天的成就。”

1975年“元旦文告”：

“我们绝不受任何海市蜃楼的欺骗，绝不因一时之得失而放弃我们的目标。”

直到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间，还口述“反攻大陆”的遗嘱：

“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光复大陆国土。”

4月5日，清明节午夜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遵照他的遗愿，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厝蒋介石之“灵柩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但是，国民党还有“光复大陆”的未来吗？请听蒋介石追随者“仰面呼天”的长叹吧：“苦雨凄风挽蒋公，大陆倚谁去反攻？”

8个月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与病魔搏斗中耗尽了生命最后的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深关切，离开了人世。

四年前，1972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已持续了七年，中共最高领袖的失误，加上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的相继形成，使八亿神州人民饱经忧患。是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以他的睿智雄才和对人民的热爱，力挽狂澜，砥柱中流，支撑危局，维护了中共的团结和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年五月，不幸降临到人民头上，周恩来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患有癌症。

经确诊患癌症后，周恩来本应停止一切工作，住院治疗。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不能说服他从速离开中南海。他决不是抱着权力不放的人，他说，国内外要做的事情很多，那些被赶下台的干部正在等待解放，又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搞得一团糟的经济得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整顿。

到了1974年，由于过度劳累，加上极“左”分子的干扰，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终于不得不住院治疗。6月1日中午，他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里，度过了他生命历程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时代巨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仍日夜为祖国和人民操劳着。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中国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后来者最重要的政治遗言。12月20日，周恩来的体温一直在 $38^{\circ}7$ ，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他关切地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说。”随后，便昏迷过去。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病情仍在恶化，生命垂危，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生养哺育他的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他要求在撒骨灰前，把他的骨灰盒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殷切希望台湾与大陆早日实现统一。

1月8日，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噩耗传来，神州大地，泪流成河。他受到人民的怀念、哀悼、爱戴和崇敬之深，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所仅见。

周恩来逝世后，一位从台湾移居某国的原蒋介石亲信、国民党退役将军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不过，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临走时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假如我们在内战中，把周恩来请到我们这边来，今天我们就会在北京了。”



## 尾声 吉祥彩虹统一暖流

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周恩来

1956年6月28日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16日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颐和园宴请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时候，站在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立场上，以不计前仇、不咎既往的宽大胸怀，首次提出了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政治用语和设想。曹聚仁问道：“总理，你不久前在‘人大’会议上所许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要台湾的决不是投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对周恩来传递的和谈统一信息，蒋介石整整考虑了近一年的时间。1957年4月；为了探听虚实，“知己知彼”，他决定派自己的学生、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立法院”委员宋宜山为密使前往北京。

宋宜山秘密到达北京后，下榻北京饭店。第三天，周恩来在著名的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在京期间宋宜山除了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商谈到有关具体问题外，还到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探访他的亲兄弟、原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

半个月后，宋宜山回到香港，他将此行印象写了洋洋1.5万多字的报告，并通过在香港主持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的许孝炎转呈蒋介石。他写道：“和周恩来、李维汉晤谈，得悉中共意向如下：国共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之自治区，其政府仍归总裁领导，中共不干预。我党可派人赴北平参加对全国政务之领导。窃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胞兄希濂亦有同感。举凡大陆工厂、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反共复国，似已无望。不若遵循国父遗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与中共携手共图统一大业……”

蒋介石看着这份报告，脸色愈来愈难看。不待看毕，他便把报告朝桌上一掼，大发雷霆：“娘西匹，把共产党说得这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许孝炎，你告诉宋宜山，他不必回国府了，就在香港算了，薪饷每月寄给他，哎？”

蒋介石决定与中共对抗到底。似乎仅仅是一念之差，便使台湾与大陆的

隔绝，整整延长了几十年。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的“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还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在此之前，台湾海峡两岸隔一天就互相炮轰一次。《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大陆单方面停止了炮轰金门、马祖诸岛。不久，台湾也停止打炮。从此，这条充满火药味的海峡，逐渐鸣金收戈，荡漾出和平的浪花；这条被炮声震荡了30年的海峡，变得宁静了。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要点为：

1. 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统一大业；
2. 建议双方为通邮、通商、通航、旅游及文化之交流提供方便；
3. 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自治权，保留军队；
4. 台湾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5. 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
6.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7. 台湾人民有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8.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大陆投资，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9. 欢迎台湾人士采取多种方式提供建议，商量国事。

10月9日，在北京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邀请蒋经国先生和台湾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回故乡，回大陆看看。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以兄弟之谊致函蒋经国，进言“同捐前嫌，共商祖国统一大业”。

1984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他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用武力收回，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这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决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也反映了台湾人民的利益，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拥护。

1985年初，台湾《薪火周刊》评论指出：六年来，中国领导人不断发出和平的呼吁，不但充分体现中共和谈的诚意，而且减少了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深受国际间的好评。台湾同胞从早期对大陆政府采用怀疑、观望态度，发展到赞成统一，强烈要求与大陆广泛接触，首先向国民党当局一再拒绝接受大陆的“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政策，人为禁止往来的藩篱发起

了冲击。亲人要团聚，祖国要统一，已成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

1985年底，在台湾南园举行过一次极其秘密的学术讨论会。会上，翁松燃教授认为：“不管台北国府是否情愿，台湾的‘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太过消极，是迟早要改弦更张的，因为形势比人强。……未来10年，它若仍在‘处变不惊’，不积极拓展营运，将来的选择还可能更少。”

1986年1月1日香港出版《百姓》半月刊刊登一篇《访康宁详谈中国统一问题》有如下内容：“康：现在呀，其实‘三通’早通得一塌糊涂了。人民到中国大陆去了回来的也很多。所以现在什么都通了，但问题是不能公开化，不能把它合法化。”“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一直要把共产党当成叛徒，这样，他的政权才合法化。如果你承认了‘三通’了，那就等于承认你和叛徒已经通了，那你的合法政权的理论根据就没了，跟着来的问题就麻烦了，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结。”

3月，台湾史学家钱穆在《联合月刊》上发表了《新春看时局》一文，有几句话很深刻：

“我认为此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和平统一，始是个大前途大希望。”

“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更看重历史的传统文化精神，我所说的‘和平统一’是根据我一生研究历史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了解而言，这是我们的民族性。”

“我认为中国五千多年来，传统相承所建立的和平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人类所稀有的杰出伟大的贡献。”

“所以如何来领导和和平统一的商谈，终不失为积极的一面。拒绝和谈，恐终是消极的一面。主要是在领导如何谈，不在谈不谈，倘领导谈而对方拒绝，这不是失败，而是其事尚在曲折进行中，与拒不相谈，一若绝无其事大不同。”

4月28日，台湾高雄《民众日报》发表题为《何人不起故园情》的长篇评论说：“在人类所有感情之中，最原始最基本的就是乡情，”“实际上，这正是我国文化之根的所在——此即饮水思源，不忘本的起点。”生活在台湾的两种人，都对大陆充满“想念与情怀”。一种“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被日本统治50年，光复至今，仍未能“一亲祖国的土地，一睹祖国的风光”，而另一种是1949年后随“政府”来台的人，他们长年离乡背井，“尤其是50岁左右以上的人——因为他们离开大陆时，至少也有10岁以上了”，对于他们，闻乡情，真可谓是“情不自禁，涕泪何从！”1988年第4期《中国建设》提供如下一组资料，“1979年以来八年中，每年有20多万台湾居民以其他名义前往港澳地区，其中有不少人在港澳与大陆亲友会面，或辗转赴大陆探亲访友和观光旅游。”

1987年4月6日，台湾高雄市退伍军人、退休公教人员投书《民众日报》，发出了他们埋藏心底的悲怆呼声：“40年呀，多么漫长的40年！我们穷，我们苦，我们咬着牙齿忍受。天天盼，夜夜盼，我们含着眼泪盼望，盼望有一天能回到故乡，回到那生长的地方，能再拥抱我们的妻儿、爹娘！”

8月，在台湾长大的三名青年，林光全、刘义加、林赢福，竟然被好奇心所驱使，冒险偷渡，在厦门、福州、上海、无锡、南京等地作出一次浪漫的观光旅行。接着台湾《自立晚报》采取了更加大胆的“自立”行动，派记者李亦得，徐璐到大陆采访。

文艺、艺术界更是推波助澜。台湾新地出版社率先公开推出大陆作家阿城小说集《棋王》，为台湾掀起的“大陆热”开了先河……。

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巡天摇看，千万条涓涓细流，大有沛然莫之能御之势。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面临抉择。

1987年初，蒋经国鉴于台湾岛内外的民意，改变了其先父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训示，发出了“时代变了，潮流变了，形势变了，我们要对历史有所交代”的心声，在岛内解除了军事戒严状态，解除党禁、报禁，允许台湾海峡两岸人员在香港会面，宣布不禁止台湾与大陆民间的间接贸易。

9月16日，蒋经国在台北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议，研讨存关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事宜，这一议是已讨论多次，因为分歧较大，一直悬而未决，今天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断。这堪算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长达八年的呼吁——“两岸实行‘三通’作出的第一次间接的正式反应。会上，持不同意见的中常委之间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蒋经国始终一言不发，他在权衡利弊得失，考虑究竟把筹码押在哪一边……他终于痛苦地接受了现实，终于在摇摆不定的政治天平上的一端放上了一个重要的筹码，终于作出了有限度地允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这一历史性的抉择。这无疑为他晚年的历史抹上了几许亮色。

这样，“一国两制”的构思，穿越大海青天，终于在海峡那边有了点回响。于是，本世纪80年代末叶，最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大团圆”乐章在东方的波涛上演出了。来自海峡那边的探亲者，他、他们，还有她、她们，都那么执着、那么虔诚。他们越过波涛汹涌的海峡，不顾旅途辗转，为的是看一眼梦中的故土，投入终日无不思念的亲人怀抱。“何处望神州？”今日，宿愿得偿，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台湾海峡38年亲情隔绝的历史，终于写下了句号。

从“走过三百六十五里路”到“相逢在龙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龙，中华民族的吉祥物。1988年春节前夕，同为龙的传人，厦门市郊的何厝人通过高音喇叭，向相隔3600米小金门同胞倡议：共同举办高空焰火联欢晚会，共庆龙年新春。初一夜晚，只见两岸礼花争艳，莹光耀璨。那阵阵礼炮化作了惊天雷鸣，那“满天星雨”化作朵朵祥云，那五彩金龙挟着雷声，遨游在神州的三天之上……。

1988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逝世。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发去唁电：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中共中央对蒋经国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的同时，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指出：

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代，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的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辉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被称为“四十年第一电”的中共中央唁电“显示了中共愿意化解前嫌，争取两党和解合作，齐心协力振兴中华之诚意”，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7月上旬，国民党“十三大”在台北召开，李登辉当选为主席，完成了国民党高层人士更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方案，明确指出：“任何分裂国土的主张，都是民族大义所不容、国家法令所不许”，“只有团结一致，谋求统一，国家才有生机和出路”，强调要“消除偏安思想，和‘台独’意识”等。这些立场和主张，对于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三通”和祖国和平统一，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却同时又指出“以国家安全与厘清敌我意识为原则”，仍然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这实在是背离时代，拂逆人心之论。当今世界，改革和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的潮流，海峡两岸同胞是一国之内的兄弟，更应该坐下来，沟通对话，达诚谅解。中共认为：

“在最近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上，国民党领导人就两岸关系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不得不这样讲。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们也有些积极的想法。特别是一些先生在会上就如何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促进国家统一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设想。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中国统一问题一直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实现国家统一，海峡两岸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传统上，都有着不少共识和深厚的基础：第一，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第二，海峡两岸都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第三，海峡两岸都需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明有着伟大的贡献。这一灿烂的文化凝聚着我们，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愿与中国国民党和台湾人民一道，为在上述共识与基础之上早日实现国家统一而继续努力。我们希望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适乎潮流，顺应民心，为祖国统一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地理学上，北太平洋西部有股流势最强的台湾暖流，它沿着台湾岛的海岸永不停息地向北奔流。

在38年泪洒海峡、隔岸相思的历史写下句号之后。海峡两岸掀起了更为强烈的涛声——祖国和平统一。

暖流，是不可抗拒的。

1988年12月28日于广州

## 主要参考书目

-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上卷）、1984 年版（下卷）。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  
怀恩：《周总理生平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南新宙：《周恩来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  
刘焱、米镇波编：《周恩来研究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严静文：《周恩来评传》，（香港）波文书局 1974 年版。  
（美）埃德加·斯诺等：《周恩来访问记》，（香港）万源图书公司 1976 年版。  
《周恩来的一生》（资料选辑），（香港）新中图书公司 1977 年版。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 1961 年版。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文化事业出版社 1960 年版。  
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68 年版。  
王蓝等：《蒋总统与中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5 年版。  
《蒋介石外传》，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鸿鸣：《蒋家王朝》，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57 年版。  
蒋经国：《我的父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57 年版。  
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 年版。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湾）世界书局 1982 年版。  
杨思真：《蒋公》，（台湾）名人事业出版公司 1982 年版。  
（德）施罗曼、费德林史坦：《蒋介石传》，（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5 年版。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林家有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5 年版。  
李淑英、肖学信：《国共合作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美）路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译丛》，求实出版社 1984 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33 年版。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 1—3 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 1974 年—1975 年版。  
（美）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年版。

- 邓颖超：《纪念与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年版。
- 《张治中回忆录》（上、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 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魏宏远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5 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周树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裘克安編集：《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
- （日）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广东省内部刊物登记证 015 号 1982 年版。
- 《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广东文史资料》第 37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 版。
- 《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 《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长城出版社 1984 年版。
- 谭力浚、朱生灿：《惠州史稿》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惠州市文化局 1982 年版。
-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曾庆榴：《东征演义》，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王健吾等：《黄埔军校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中山舰事件》，粤出字第 185 号 1981 年版。
- 《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
- 《苏联顾问在中国》（1923—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刘秉粹编：《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实战记》，（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1 年版。
- 陈德珠、吴定贤收集整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史料》，惠阳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惠阳地区博物馆 1981 年版。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曾成贵、江抗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许玉英、卞杏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 周尚文、贺世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鲍罗庭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陈态凌：《新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苏）亚·伊·列潘诺奇：《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史全生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西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 穆欣：《陈赓大将》，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
- 胥佩兰、郑鹏飞：《陈赓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 《名人传记》1987 年第四、五期，黄河文艺出版社。
- 《党史资料》总第 7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冯建辉：《星星之火遍神州——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 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马齐彬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 《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
- 《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顾隆刚：《四渡赤水之战》，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赵蔚：《长征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
- 魏巍：《地球上的红飘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 《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
- 《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
- 《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 年版。
- 赵云声：《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 陈元方、史础农：《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陕西旅游出版社 1986 年版。
-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
- 李敖：《蒋介石与张学良》，（台湾）自由时代系列丛书 1987 年版。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甘国治主编：《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阚孔壁：《周恩来重庆统战纪事》，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
- （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 《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 《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 1986 年版。何钟山等：《血战台儿庄》，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册），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
-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马仲廉：《抗日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年版。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美）费正清：《中国之行》，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
- （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 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黄友凡等：《抗日战争中的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 刘以顺、童志强：《外战中的内战》，春秋出版社 1987 年版。
- 张平：《解放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
- 《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
- 苗冰舒：《刘邓在中原前线》，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
- 《陈粟大军征战记》，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 《党史文汇》，1987 年第 6 期、1988 年第 1 期。
- 蔡惠霖、孔维礼编：《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回忆录》（上、下册），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玉等编：《西南义举——卢汉、刘文辉起义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纵横》1988 年第一期，中国文史出版社。
- 姚夫等：《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81—1984），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
- 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庄永淑：《新中国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的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

顾笑言等：《李宗仁归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解放军文艺》，1988 年第 1 期。

啸天：《尼克松》，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华英烈》1988 年第 2 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1—4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  
版。

《国际问题研究》，1983 年第 3 期。

